





中國基督徒的半個世紀叢書



# 汗過流淚谷

袁梁惠珍生命見證

袁梁惠珍自述  
白 民 整理

· 中國基督徒的半個世紀 叢書 ·

## 行過流淚谷

——袁梁惠珍生命見證

- ◎ 袁梁惠珍自述
- ◎ 白 民 整理

出版及發行	生命出版社 670 Bonded Parkway Streamwood, IL 60107, USA(美國) 電話 / (630) 837-7551 傳真 / (630) 837-7552 網址 / <a href="http://www.smyxy.org">www.smyxy.org</a> 電郵 / <a href="mailto:cclife@sbcglobal.net">cclife@sbcglobal.net</a>
責任編輯 排 版	屈傲聆 黃颺斌

2011年5月初版

· 版權所有 ·

### **Passed Through the Valley of Weeping**

by Huizhen L. Yuan

© 2011 by Christian Life Press, Inc.

670 Bonded Parkway

Streamwood, IL 60107, USA

Tel: (630) 837-7551 Fax: (630) 837-7552

Website: [www.smyxy.org](http://www.smyxy.org)

Email: [cclife@sbcglobal.net](mailto:cclife@sbcglobal.net)

First Print, April 2011

All Right Reserved

ISBN 978-0-971901650

# 目 录

“中国基督徒的半个世纪”丛书总序 .....	1
自 序 .....	3
纪念我们的母亲梁惠珍 .....	5
第 一 章 .....	9
第 二 章 .....	23
第 三 章 .....	53
第 四 章 .....	67
第 五 章 .....	103
第 六 章 .....	139
第 七 章 .....	161
第 八 章 .....	217
第 九 章 .....	257
第 十 章 .....	341
袁相忱、梁惠珍生平年表 .....	389
后 记 .....	396



# “中国基督徒的半个世纪” 丛书

## 总 序

从二十世纪 50 年代初期到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家庭教会走过了半个世纪坎坷不平的信仰之路。走在这条路上的老一代圣徒，其生命经历正如赵西门老弟兄在诗歌《十架归路》中所描述的那样，是“有血、有泪、有争战”，且“多风、多雨、多险阻”。当然，在血泪争战和风雨险阻之中，软弱、失败也有。然而，无论是得胜还是失败，这些经历对中国教会来说都是宝贵的。

为了使这笔宝贵的属灵财富能够得以保存，生命季刊(生命出版社)决定出版这套“中国基督徒的半个世纪”丛书。在丛书中，一批有半个世纪信仰经历的老一代信徒，将他们的生命见证及神学思考记录下来（或由其他人整理出来），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神在中国教会的作为，也可以使年轻一代信徒，对半个世纪的中国教会发展历程有更多的了解。

这套丛书希望能够兼顾到个人见证和神学思考两个方面。或有人认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家庭教会信徒见证如云，相比之下，神学思考或对信仰经历的神学总结就少了些。是的，这是一个特殊环境所造成的事实。然而，半个世纪的信仰经历，不会没有与之相伴的神学。与信仰经历密切相关的神学思考——特别是与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历程有关的神学思考——还是有的。但更多的神学思想需要中国基督徒在圣灵的引导下继续总结。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历史的见证提醒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到了在至圣的真道上扎扎实实建造自己的时候了。老一代中国圣徒走过十字架的道路，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

架的真理有过深刻而独特的领会。这一切都会激励后来者坚定地回归十字架——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福音真理的核心。我们在编辑和出版这套“中国基督徒的半个世纪”丛书时，存着在基督里的盼望遥想下一个“半个世纪”。但愿“半个世纪”以后有人出版另一套“中国基督徒的半个世纪”丛书，其中将记录下圣灵在中国教会所带起的更新、更大的复兴，以及更多、更美的生命见证。

生命季刊编辑部  
2005年1月16日



# 自序

蒙神的恩典，使我得以把相忱和我在主里蒙恩的见证和弟兄姊妹们分享。我们实在没有丝毫可以夸口的，唯独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相忱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传道人，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和出众的恩赐，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为主传道的事上。他虽然早年接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以后的几十年却主要在教会中事奉，特别是他的中年差不多都是在监禁中过去的，重新开始事奉时已经近七十岁了，所以后来继续学习的机会不多。有些弟兄姊妹对相忱的一些教导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的认为相忱是反对“上神学”的，但是大家可能不了解相忱年青时是接受过神学教育的，从远东神学院毕业后还在那里做过一段时间的助教工作；此外在他重新事奉后，也曾有几次亲笔写信把家庭教会的年轻传道人推荐到海外的神学院去接受装备。因此，相忱提出反对“上神学”，是出于海外越来越多的神学教育已经沦入新派、灵恩派和世俗化等非正统神学的背景，而不是说传道人不需要接受装备和教育。还有相忱曾主张牧师和教师是为了牧养教会的属灵恩赐，故不同意教会通行的牧师制度，他本人确实也没有接受过牧师的按立。其他各个方面的还有很多，请恕我不在此一一地赘述了。相忱是个有限的人，他的领受和教导必定存在着很多的错误和不足，我恳切地请求弟兄姊妹依据《圣经》的原则，加以辨别和批评。

主已经把相忱接到天家了，却还留我在这世上。既然这样，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把我的劝勉和众弟兄姊妹们分享。首先，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教会的道路要走十字架的窄路，教会的根基要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的基础上。在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坚持家庭教会的敬拜形式是唯一合宜的道路，愿神祝福家庭教会在中国遍地开花。我还要劝

各位为主作传道人的弟兄们，你们“...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作。”务要坚持纯正的福音真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和升天，他还要再来；要学习使徒的榜样，“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可以帮助你们抵御这个世界的情欲和诱惑；不要惧怕逼迫和试炼，“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

我已经年过九旬，身体也渐渐衰残，但主留我在这世上一天，我就要天天跟随主。虽然我已经不能做更多的事，但我还可以祷告，可以日夜为教会和弟兄姊妹们代祷。也感谢所有在主里关心我，不住地为我代祷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彼此记念，同心合意地仰望我们的主再来的日子。

主内末肢 梁惠珍  
主后 2009 年 12 月于北京

## 纪念我们的母亲梁惠珍

二零零五年八月，父亲袁相忱归主之后，我们的母亲梁惠珍继续持守着她在主面前的事奉。那年她已经是八十六岁了。母亲常对前来探访的肢体们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主做工。求主保守我的晚节，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她也常提醒我们：“虽然你们信主有很多年了，但你们能不能持守真道到底呢？”

母亲晚年的生活是规律而简朴的。她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首先是晨祷，然后才用早餐。上午的时间大都是在接待来访的弟兄姊妹，午餐后休息一会儿，下午还是继续接待；有时还要出去探访。晚餐后她通常都要有两三个小时的祷告。母亲在原单位的退休金还是比较丰厚的，但她的吃穿却是极简单的。每餐只有一小碗稀饭和不多的青菜，衣服也都是旧的，几乎从不肯让我们给她做新衣服。剩余的大部分退休金都被她用来周济有困难的肢体了。每到领退休金的日子，母亲就拿出她早已预备好的清单，催促我们按着上面的名字和地址把钱尽早汇出去，一大半的退休金都被她用在了这项事工上。有一位南方的弟兄因为运送属灵书籍被判刑，以前他也曾为白塔寺教会送过书籍。母亲听说了他的事情后就经常给他家里寄钱，又写信勉励他的家人。

母亲对来访的接待是全无任何限制的，什么时候有人来访或来电她都接待。如果下午有人预定来访，她就不去午休了，提早收拾齐整，坐在客厅里等待人家；即使是她中午饭后刚刚躺下，只要听见外边有人进来或是电话铃声，她都马上起来接待。这几年中，母亲每年在家中的接待都有两三千人次。

来访的人中有不少是专门带慕道友来听讲福音的，母亲就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创造与救赎的道理详细地对他们讲解，劝诫他们要悔改，信福音，以致得救。也有的人是带着各自的疑惑和困难来寻求帮助的，母亲就本着真理为他们答疑解惑。她也用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见证勉励大家务要信靠救主，胜过眼前的试炼。每逢有年轻的传道人来访，母亲都格外地高兴，对他们也格外地尊敬，鼓励他们务要效法使徒保罗的

榜样，尽心尽力地为主传道。她说：“看到中国教会后继有人，就是教会复兴的盼望！”

母亲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中国教会守望和祷告。她迫切地在祷告中祈求主保守中国教会，坚持十字架的道路，追随使徒们的脚踪，坚持家庭聚会，坚持不向各种各样的世俗权柄妥协。近两三年，有人在教会中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虚假道理，使中国教会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许多教会的同工为此来找母亲交通、祷告。母亲同样是本着真理和她自己在教会几十年事奉的经历，劝诫大家说：教会是属基督的，必须坚决持守主所赐的圣洁和真理，切切不可与世俗同流合污；也要把教会建造在圣经的真理上，要学会在真理上分辨，合乎圣经的要持守，虚假的要弃绝。差不多所有来访的教会同工和弟兄姊妹都要求母亲为他们祷告，所以母亲常常为此累得嗓音嘶哑、气喘吁吁。家人想劝她休息一下，可她却完全不为所动，一边继续低头闭目祷告，一边伸手把我们推开。老人有着清晰、缜密的思维能力和令我们惊讶的记忆力，能熟记众多教会和肢体们的问题和需要，在她个人的祷告中，在主耶稣面前一一地为他们代求。

二零零八年七月，母亲在家中不慎摔倒，经医院确诊为左侧股骨颈骨折，但医生对这位九旬老人的伤痛完全束手无策。母亲见此情景，只是平静地说：“我们回家吧。”由于一切的治疗措施都不适用，母亲只能卧床休养。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都可能给母亲的伤处带来难以忍受的剧痛，但我们的母亲却从没喊过一声疼，更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她对闻讯前来探望的弟兄姊妹们说：“凡是临到我们的事，都是主所许可的。我就默然不语。”又说：“主是爱我，一点不叫我感到疼。主这是叫我好好休息，让我在床上作守望的工作。”母亲一如既往的平安、喜乐，使所有见到她的人都相信主真的与她同在，主在安慰着、医治着祂的婢女。不仅如此，即使是躺在病床上，母亲还是照往常一样地接待来访的肢体们，和他们交通，为众人祷告。一次有几位神学生前来探望，母亲看到这些年轻的传道人非常高兴，和他们谈了很久，逐个地询问他们在教会事奉、在神学院学习的情况和个人的生活，鼓励这几位弟兄好好学习，为教会的事奉打下基础。按照医生的说法，像母亲这样已经年逾九旬的老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有希望治愈和下床的

了。但是完全靠着主的恩典和怜悯，还有众弟兄姊妹的代祷，母亲在卧床四个半月后又能坐起来了，虽然不能自己行走，但可以坐轮椅。于是，母亲就这样坐在轮椅上接待来访的肢体，所有见到母亲的人无不开口赞美，感谢上帝的恩典。从那时起又有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母亲像以前一样地事奉主。

二零一零年七月底，母亲突患感冒，发烧。八月二日凌晨，母亲安息主怀。父母的一生，正如一位老弟兄在纪念父母结婚五十周年之际的赠诗所言：“相敬互爱，忱盟事奉；惠恩常随，珍重主托。”

二零一零年八月七日，母亲的追思礼拜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二千多位弟兄姊妹参加。八月廿一日，和父亲袁相忱一同安葬在北京八达岭人民公墓。

母亲的回忆见证是从二零零七年初开始，由她亲自口述，由一位弟兄执笔，于二零零九年完成。这是上帝的丰盛恩典在我们的父母和全家中间的历史见证。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祂，直到永远。

母亲在世时，常对关心她的肢体们说：“感谢大家为我祷告，是你们的祷告托着我。”在此，我们再次感谢所有关心我们全家、为我们全家代祷的肢体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在祂里面彼此相爱，同走天路。

我们的父亲、母亲都已经息了他们在地上的工作和劳苦，安息在主的怀中。我们全家必要遵行父母为我们留下的教诲——“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愿主耶稣基督看顾保守我们，让我们跟随使徒们的脚踪行，让我们以完全的爱心，在祂面前同做那最美好的见证。

袁福音 袁福声 袁福乐  
袁安湖 袁平湖 袁爱湖

2010年11月



第一章

強暴人備過人的時候

端身作事

暴令之外

刑外邦人

想元下落之禁止強暴

象想元禮之物清風

去遠宏書十卷



我一九一九年农历十月十七日出生于中国北方城市天津一户梁姓的广东籍人家，是家中的长女，父母为我取名惠珍。

我的祖父梁耀南，字汝辉，原籍广东肇庆，毕业于清末的广东黄埔水师学堂，在广东水师服役。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祖父随所在的“广丙”号军舰奉调北上，加入北洋舰队作战，浴血抵御外敌。战后，祖父离开水师转入天津北宁铁路局工作，从此带领全家在天津定居下来。

小时候，我看到过祖父珍藏的水师军服，上衣和帽子上都缀着金黄色的穗子；也听过他亲口讲述在海上战斗的往事。祖父亲身参加过著名的黄海大东沟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一八九五年初，刘公岛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祖父讲到他们在风雪严寒中从威海卫仓皇撤退，路旁丢落的银元宝都没有人去拾，不禁发出深深的感叹，“那时候，顾命不顾钱啦！”

祖父在军舰上担任测量。清末水师都使用英文操典，甚至用英文喊口令，所以官兵都有不同程度的英文水平。祖父是水师学堂毕业的，当然英文更是熟练，书写也很流利，可我看他的中文却写得歪歪扭扭，看起来简直和英文的字母一个模样了，就故意逗他，问：“爷爷，你是外国人呀？怎么写字这样呀？”祖父笑笑，回答：“我写惯英文了。”

父亲梁巨骥，字展云，是祖父的独生子，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被学校推荐出国留学，当时他还没有和母亲结婚，本没有什么家庭负担，但他为了侍奉父母就放弃了这样的机会，自愿留在国内工作。

祖父在铁路局同时兼有两份差事，一份是作“洋帐房”，就是用英文来记帐；另一份是“测量-记时”。因为铁路上必须有精确和统一的记时，但那个时代所通用的机械式钟表又经常存在误差，就需要通过每天定时测量太阳的角度和位置，计算出准确的本地标准时间，以统一调校铁路



局管辖内各处的钟表。有时，祖父就在自家的院子里，拿着一个我们叫不上名字的仪器，对着太阳照，仪器上有一面水银的镜子，当反射的太阳光线与仪器上的标志对成一条直线时，便记下数字，再对照着一本从美国寄来的手册计算时间。

父亲大学毕业后也进入天津北宁铁路局，先在营业课作课员，不久升任营业课课长。

祖母梁黄氏和母亲林贵好也是广东人，都是信佛的。祖母性情温和，乐善好施，时常尽力周济那些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亲朋和邻里。母亲曾念过私塾，但是识字不多，十七岁嫁给父亲，虽然出身于富商家庭，却能勤俭持家，不仅能做漂亮的针线活，还能料理一手地道美味的广东菜。

到我出生的时候，因为有祖父和父亲两个人一共三份在铁路局里的优厚薪水，全家居住在靠近铁路局的河北区新大路二经路多禄里六号，过着殷实平稳的小康生活。那是一座宽大舒适的院落，有七间中式的平房，房间里摆设的是全套古旧的硬木家具，还雇有佣人做饭、洗衣服。后来随着弟妹们的出生，家里人口逐渐增多，又有了专门做衣服的裁缝。长方形的院子有三、四十平米，院里有单独的厨房、压水井和厕所等。房子后面还有一个略小的后院，虽然在北方定居生活已经多年，全家人仍保持着广东人喜食生鲜的饮食习惯，因此后院除种植一些花草之外，常年笼养着一二十只鸡鸭，还有一个水泥砌成的池子，里面总是存有一二十条鲜活的鲩鱼。那个时代，水泥被称为“洋灰”，是中国不能生产的，能用昂贵的进口“洋灰”在家里砌鱼池子，可不是寻常家庭可以做到的。

## 二

在天津劝业场附近的法国租界里，住着另一家姓罗的广东同乡，家里只有老两口，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在外地。因为两家是老世交，我就称呼他们“罗公”、“罗婆”。罗公名叫罗子纲，和祖父同在天津铁路局的洋帐房里做事。罗婆也姓黄，和祖母同姓，又是同乡，加上彼此很谈得来，就结拜为干姐妹，于是两家又成了干亲，往来十分亲密。

罗婆常来家里做客，主要就是和祖母谈天，有时就留下和我们一起吃饭，祖母也常带着我去罗家回访。罗婆特别喜欢我，一见我们来了，都顾不上和祖母多说话，就赶紧忙活着给我拿出早已预备好的各样小零食，把我搂在身边，一边端详，一边爱抚，不住地夸我：“阿珍真漂亮啊！”儿时的我，皮肤白皙，脸蛋红润，两只大眼睛清澈明亮，是个人人喜爱的小姑娘。她又摸摸我的小辫儿，问：“小辫儿这么漂亮，谁给你梳的啊？”我说：“妈妈给我梳的。”罗婆又夸小辫儿梳得真好。每天早晨，母亲都亲手给我梳起两只整齐的小辫子，辫梢儿还扎上彩色的毛线，天天都换不同的颜色，有红的，有粉的，有绿的……

在我四岁的那年，罗婆的女儿从外地回到天津长住，也和罗婆一起来家里，因为罗婆的女婿家姓袁，母亲让我叫她“袁婶”。和袁婶一起的还有一个身体瘦弱的小男孩，约摸比我高半个头，脸色又黑又黄，头上剪成略有点土气的短寸头，身上穿着小大褂，外面套一件小马褂，母亲告诉我他是罗婆的外孙，那年已经九岁了，比我大五岁。母亲让我管这个小男孩叫“阿邦哥”，可我却很少这样叫他，可能是因为年龄的缘故，我不怎么喜欢搭理这个比我大五岁的小哥哥，也不怎么喜欢跟他一起玩。

按着两家的世交，阿邦也称呼母亲为“二婶”。虽说是初来乍到，可看起来阿邦并没有显出半点的拘谨，倒还模仿着大人走路的派头，故意踱着方步，摇晃着身子，摆动起胳膊。进到客厅，自己大模大样地往沙发上一坐，前后左右打量起房间的陈设，看见书柜，就过去打开柜门，拿出一本翻看几下就放回去，又拿出一本……我猜他大概是已经上学认识字的，连着翻看了几本之后，可能是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关上柜门，开始在客厅里四处巡视，发现有兴趣的就摆弄几下。

我就坐在一边看着他，也不说话。一直等他看够了，才转到我这边来，开口问我：“你都爱玩什么游戏呀？”我平时最喜爱的是一套精致的木头雕刻的小玩偶，有小人，小房子，小桌椅等等，都存放在一个贴着花纸的大盒子里，那可是我的宝贝，从来都不让别人碰的。于是我故意反问他：“那你都玩什么啊？”阿邦眨眨眼，没说话，伸出右手，掌心朝

上，半握拳，大拇指向外一弹，说：“我玩这个！”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的是玩弹球啊！

阿邦看看我们俩实在玩不起来，就又鼓动我再去叫一些邻居的小孩子们到家里来一起玩。等到人来齐了，阿邦竟很自然地当起了这群孩子的头儿，指挥着他们在院子里玩起了丢手绢，各人的位置都得由他来派定，“你在这儿，你在那儿……”我正和其他人一起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忽然觉得头上一紧，一回头，阿邦正从我身后跑开，原来是他趁着丢手绢的时候，在我身后猛地揪了一下我的小辫儿。“干吗揪我小辫儿呀？！讨厌！”可阿邦却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玩他的游戏。隔不多一会儿，趁着我不注意，又来揪了一下，这下我真的不乐意了，冲着他说：“你还揪？再揪我不跟你玩了，你走吧！”可阿邦却一点不把我的抗议当回事，依旧嘻嘻哈哈地跑前跑后，也不管我理不理他，时不时的瞅空再来揪一下我的小辫儿。

那些天，阿邦跟着罗婆和袁婶几乎天天过来家里，一来了还是叫我去找邻居家的小孩子们一起来玩游戏，还总是时常揪两下我的小辫，但是可以看出阿邦越来越不满足于丢手绢这样的游戏，终于没过两天，他就忍不住拉上邻居家的几个男孩子，跑到院门外的胡同里去玩他最喜欢的弹球了。我没有跟着他出去，因为我根本就不玩那个游戏，也不愿意在一旁观战。大半天的工夫，阿邦兴冲冲地跑回来，把一个装满各色玻璃球的小铁盒伸到我面前，里面的玻璃球五颜六色，有白的，有蓝的，还有花的……美滋滋地对我说：“你看，我赢了那么多！”我故意偏着脸不看他那只顾自己得意洋洋的样子，心里想：这有什么好玩的啊。

阿邦并不在意我对他的反应，照旧由着他自己的心意尽情地玩耍，也许是自认为和我最“熟识”，即便是我不怎么爱理他，阿邦还是喜欢找我玩。有一次，阿邦来的时候正碰上我和女孩子们在院子里跳绳，就是两边各有一人摇绳，大家排着队从中间依次跳过去的那种游戏。这原本是我们女孩子一起玩的，没有阿邦的份，没想到他看见我们在跳就来了兴致，冲着我叫了一声：“嗨！你看我跳！”也不待我们同意自己钻进

去就跳，跳了一个还不肯出来，单脚，双脚，转着圈不停的跳。阿邦比我们都要大上好几岁，跳得确实比我们好。又有一次，阿邦听见我们在唱儿歌，“小白菜，地里黄，两三岁呀，没有娘。”就凑上来说：“这个，我也会。”女孩们故意逗他，说：“那你给我们唱一个啊！”他就真的大声地唱起来：“小白菜，地里黄，两三岁呀，没有娘。”

阿邦把揪我的小辫儿当成了他最乐此不疲的恶作剧，只要有机会免不了总要来揪上两下，有时父母看到也不加过问，我就更是拿他没有办法。当然如若遇到有更多的捉弄人的机会，阿邦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因为我从小就很怕葱、蒜和韭菜的味道，故而小时候每次吃饭前，我都会用广东话悄悄地提醒母亲：“我吃没葱的！”谁知阿邦把这情景看在眼里，下次吃饭的时候，他就故意学着我的表情和语气，抢先说：“我吃没葱的！”说完自己就呵呵地笑起来，我先前被他学得有点不好意思，马上又被他这副怪样子逗乐了，说：“你干吗呀！”满桌的人也都跟着我们笑了起来。

这样过了有半个月的光景，阿邦忽然不来了，听罗婆说他去上学了。那以后，罗婆和袁婶还是常来家里与祖母、母亲谈天，也常在家里吃饭，却很少再见到阿邦的影子。

又过了不久，正赶上祖父生日，在家里摆办寿筵宴请宾朋，罗婆全家当然也在受邀之列，这次阿邦跟着来了。母亲专门为亲友家和邻居家常在一起玩的小孩子们单独预备了一桌饭菜，阿邦虽然已经上了学，却还是先前那副样子，这次他又当仁不让地成了我们这桌的“头儿”了，先自己上去坐在主人的席位上，就开始指挥着其他人，“你坐这儿，你坐那儿……”我在心里说：哼，又没有人选你！看到饭菜端上来了，他又开始招呼在座的孩子，“你吃这个，你吃那个……”自己却乘机撕下一个肥大的鸡腿，大口大口地嚼起来，吃得真是兴高采烈。我瞧着他吃的样子，口里不说什么，心里却直撇嘴，“瞧他，什么样啊！”

### 三

后来从长辈们的谈话中逐渐知道，阿邦大名叫袁振邦，祖籍广东东

莞。阿邦的祖父追随清末著名的广东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生北上，参加修建京张铁路，工程完工后就留在铁路上做事，定居在北京昌平县的南口镇。阿邦的父亲名叫袁禹庭，成年后子承父业，也在铁路上工作。

袁罗两家也是世交，阿邦的父亲和罗婶结婚的时候，正在安徽蚌埠的铁路上工作。一九一四年农历六月，阿邦就出生在那里。当时，铁路在中国是新兴的产业，要求员工的素质高，待遇也远比其他行业更为优厚。阿邦的父亲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懂英文，人又聪明，手脚勤快，靠着在铁路上作行李员的薪水，一家三口过着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

阿邦一岁的时候，父亲调到徐州车站的售票房工作，全家也随之迁居到徐州。那个时代正值中华民国初年，市面上流通着两种法定的货币，一种是银元，一种是新发行的纸币，根据法令这两者是可以等值兑换的。但是当时的人们对纸币这种新生事物不大接受，加上担心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大家都更情愿接受和储存银元，于是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不小的差价和专门兑换货币的黑市。阿邦的父亲在铁路的售票房每天都能经手大量的票款，其中有银元，也有纸币，在对上级结算票款时两者是等值的。他马上就发现了这其中的窍门，把每天票款中所收到的银元拿到黑市上按高价兑换成纸币，再把纸币等值地补足票款，余下的差额就可以放进自己的腰包了。当时黑市上，一元银元最高时能兑换到一元五角纸币，加上每天经他手的票款数额都很大，这样一个月下来，他这份私下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既然在工作之间就能如此轻易地赚到大钱，一家人的生活很快变得奢靡无度起来。大吃大喝，花钱大手大脚，家里有男女佣人侍候，还开办了一家自己的饮料厂，阿邦的父亲在戏园子里也有了写着自己名牌的包厢，阿邦的母亲则终日沉溺于麻将之中。金钱的增加往往不免使人原本被掩盖的罪性加倍地暴露出来。随着财富的日益加增，阿邦的父亲也逐渐陷入败坏堕落的泥沼之中，越来越难以自拔，吃喝嫖赌，挥霍无度……这样的光景虽然也维持了好几年，但是对于金钱和欲望的无止境

的贪婪，注定使人走上一条不归之路，倒卖银元的所得已经不再能满足他的欲壑，阿邦的父亲进而开始挪用铁路的票款。最后终于在一九二三年东窗事发，徐州铁路局不仅开除了他的公职，还限令他赔偿所亏空的款项，否则就要面临被法办。阿邦的父亲被迫变卖了饮料厂和所有的家产，仍不足还清欠款，还是远在天津的罗伯帮女婿填补上了剩下的余额，才使他免受牢狱之灾。因为父母早亡，阿邦的父亲在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举家来到天津，暂时寄居在岳父的家中。

又听大人们说起阿邦，才知道原来他是不足月出生的，出生的时候只有七个月，因为先天不足，再加上在襁褓中不怎么能吃东西，不仅身体非常瘦弱，而且三天两头地生病。阿邦七岁的时候在徐州入过私塾，在读书上很有灵气，已经能认识不少字，在天津这里的新学堂的学习也不错。

阿邦长得很像他的父亲，我称呼阿邦父亲“袁伯”。袁伯只在他们刚到天津时来过我家里一次，后来就很少见他了。听说罗公先是介绍他在京张铁路上做了不长一段时间的电报员，后来罗公的一位本家亲戚，在北京租赁京汉铁路局在东华门大街的食堂开办了一家“真光电影院”，罗公又把女婿介绍到那里作收票员的工作。

因为这段时间，袁伯的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袁婶和阿邦一直都留在天津罗公的家里。没多久，罗家也从法租界搬到河北区的容和里，两家离得更近了，来往自然更加密切。袁婶这时非常清闲，常和罗婆一起来家里谈天。她早年毕业于女子师范，这在当时算是很高的文化程度，还会一手很好的刺绣手艺。母女俩都笃信佛教，走到哪里手上时时都挂着一串长长的念珠。

只是阿邦上学以后很少再和罗婆她们一起来。没过两年我也上学了，就更没有以前那样与阿邦见面和一起玩耍的机会了。又过了两年，阿邦的父亲单独把他一个人接到北京上学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见过面了。

童年青梅竹马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渐行渐远了。阿邦在我

的记忆中也越来越模糊，只依稀记得那是一个专爱揪我小辫的小淘气儿。

## 四

我父母共生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十一个人，除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幼年不幸夭折，其余的五个男孩、四个女孩全都长大成人。

人口的加添并没有给家里的生活增加过多的负担，我们的童年生活完全是快乐的。家里特意从广东原籍买了两个女孩子作丫头，专门照看孩子。她俩在家里并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每天只是领着我和弟妹们去各处玩耍，我们要吃什么她们都会买给我们。

祖母最是宠爱我这个大孙女。出去逛商场、去银行或者串门等等都要带上我，腊月岁末还带我去买年货，看我小手冻红了，赶快当场就给我买一副小手套。我的各项要求，从小到大，必定能从她老人家那里得到完全的满足。祖母心地善良，又乐于助人，被尊称为梁老善人。无论是亲朋或是邻里，凡有困难的，她总要尽力周济；遇有上门告借的，也必定不让人家空手而归。罗婆也是常向祖母借贷的，记得有一次罗家急着用钱，我家里又正好没有现钱，祖母竟毫不迟疑地退下自己手上一两重的一对金镯子递给罗婆，说：“你拿去卖了吧，我不要了。”又安慰罗婆：“不要紧，我还有呢。”她看到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非常辛苦，每次家里买他们的东西，鱼、肉、点心等等，总是要尽量多买一些，有时看担子里还剩一二十条鱼，就干脆说：“都放在后院的池子里吧。”不仅从不要小贩们找还零钱，也不查点数量和质量，难得的是这些小贩们也从来没有在这上面糊弄过她。

我六岁那年祖父的去世并没有给家庭的经济状况带来太大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母亲的深明大义和勤俭持家。母亲自己虽是出身富商家庭，身上却极少见“小姐脾气”，平时在家常穿朴素的中式布衣，只有在出门的时候才穿一些好的衣服。她也很爱我们，每天早晨都会一个一个地给我和妹妹们梳小辫儿，也会亲手给我们做各式漂亮的衣服。

虽然家里从来不缺做活的人手，也从来没有为了日常的用度而发愁，母亲却不曾因此停下过她手里每日的劳作。记得小时候每到冬天临近，母亲都会买来整块的白铁皮，剪成长条，自己动手卷制烟筒。又有一次，母亲用一个亚细亚牌的方形空油桶，下边的桶壁上打四五个孔，穿上几根铁条作炉箅子，自己和泥搪炉壁，最后再把做成的煤炉子安放在一个旧椅子上，椅子脚正好成为方便搬抬的把手。说来奇妙，母亲做的这个小炉子非常简陋，倒是出人意外的好用，遇到家里宴客，母亲用这一个炉子连炒一二十个菜肴，一点也不会迟误。

我五岁上幼儿园，六岁进铁路子弟学校读小学。其实，从还没上学的时候，父亲已经开始教我写字，到五六岁时我已经能够为家里代笔写简单的便信了。父母十分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我以后的弟妹们也都是在适学的年龄入学，顺利完成各自的学业，并且女孩男孩完全没有分别，这在当时的年代是很不平凡的。

小学的功课对我来说很轻松，我仍然可以像以前一样和邻居的女孩子们一起在院子里跳绳、丢手绢。课业之外我又喜欢上了体育运动，校内校外都是跑啊、跳啊……就是上下学的路上也是跑来跑去。结果有一次不小心，把一个刚给我买的新墨盒跑掉了，墨盒是铜的，形状像个打开的扇子，上面还刻着梅花，亮晶晶的，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可是在路上怎样跑掉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回来就告诉母亲说：“丢了。”母亲批评我：“你这孩子，刚买的你怎么就丢了？什么东西你也存不住！”祖母听见，过来说母亲：“你说她干吗呀！孩子还有不丢东西的！”又对我说：“给你钱，再买一个！”

既然是爱好体育运动，参加运动会当然是少不了我。我所在的铁路子弟学校本来已经备有专业的运动鞋，就是当时在世人眼中看为“新鲜”的专业跑鞋、跳鞋，学生可以向学校借用，可这些却还是不能令我满意，嫌学校的运动鞋不好，因为穿过的人太多，已经显得陈旧了。我就一定要有我自己的运动鞋，回家来就叫祖母给我买，并且跑鞋、跳鞋都要有。当我把新的运动鞋带到学校去的时候，学校里人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



我，我心里得意极了。

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祖母染上伤寒症，高烧不退，一周后就去世了。老人病重时，每天都把我叫到床头，拉着我的手，切切地反复叮嘱我：“我不久就不在人世了，你要好好念书，要好好念书。”临终前仍然抓住我的手不放，眼睛一直望着我。

初中时，父亲为我选择了一所名叫伯特利学校的教会学校。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看法一样，父亲选择把我送进教会开办的学校与信仰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因为那里有其他学校所没有的正规的英文教育。到了我上初三的时候，离家不远的地方新开了一所仰山学校，也是教会学校，父亲看这所新学校里外国人担任教师的比较多，就又把我也转到仰山学校。

我上过的这两所教会学校，都在每星期六开设专门的圣经课，学生要在课上朗读、背诵圣经；每个星期日还有主日聚会，由学校的老师讲道。在我的感受中，老师们都是一些敬虔爱神，又对学生满有爱心的人，他们向每一个学生传讲福音，带领愿意悔改的学生决志信主。从老师的讲解中，我知道了仰山学校的校名源于《诗篇》第一二一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那个时候我只不过是在口头上敷衍老师，心里却想：我的生活已经很充实，很满足了，并不需要从谁那里得到什么帮助啊！回到家里我也会读经，但仅仅只是为了完成圣经课这门课程的作业，并不是出自心里的需要。我的圣经课成绩相当优秀，整本圣经详细诵读了一遍以上，很多金句都能熟练地用中英文背诵。每堂圣经课上，老师会要求学生轮流开口祷告，轮到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就会使用早就学会的各种祷告中常有的词句，和别人一样流利地大声祷告。那时当然也唯有我自己才最清楚，这样的祷告只是出自我的口里，而并非出自我的心里。学校还会组织学生排演圣剧在圣诞节和其他时候演出，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文娱活动，当然要积极参加。

在三年的教会学校生活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仰山学校一位来自神召会的徐老师，因为他凡事祷告，向神祈求。妻子生病也不请

医生，而是自己每个课间的十分钟都赶回在校内的宿舍为她祷告。出于好奇，我就在课间时跟在他后面要看个究竟，从宿舍窗子里看见徐老师真的跪在地上，举着手，开声向神祷告，求神医治。这件事成为在我一生当中对于祷告的最初印象。

初中毕业后我考进当时天津最著名的三八女中，这是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附属的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不像教会学校，这里没有圣经课，更没有主日聚会，我也就顺理成章不必再读经和参加主日聚会了，只有在考试遇上难处的时候才会偶尔想起向神祷告。

既然没有信，生活上自然也没有发生什么更新变化。自从祖母去世以后，外面少去了一分溺爱，里面反倒更多地生出几分骄傲、顽梗和不顺服。二八年华，正值一个女孩子最美、也最爱美的时光，冬天，不管母亲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我都不肯穿臃肿难看的棉衣棉裤，坚持只穿毛衣和呢子大衣。为了讲究衣着在色彩和样式上的搭配，光是各式各样的鞋我就有四十多双，有高跟的，有平眼的，有皮鞋，有布鞋，有凉鞋，都有不同的颜色，红的，黑的，白的……也有很多漂亮的衣服，还要父亲托人到上海和香港帮我买最新流行花色的布料，让家里的裁缝为我做成我想要的衣服。裁缝在裁剪缝制的时候，我就站在他身后看，看看就明白了，学会了，因此我更加满意自己的聪明。

从小我就不吃葱、蒜和韭菜，母亲都要尽量给我做不放葱、蒜的菜，或者在饭前把菜里的葱、蒜等专门为我挑出来。我最讨厌的就是韭菜，容不得家里有一丁点韭菜的味道。母亲只有趁我外出的时候匆匆给家人做上一些韭菜，还要赶在我回来之前收拾干净，生怕被我闻到，即使是这样，我只要发现一点韭菜的痕迹，还是要向家人大发脾气。

我在三八女中学的是家政系，职业学校的学业比起普通高中又要轻松不少，使我可以有更多的心思放在“玩”上。体育运动的爱好已经从小时候的跑跑跳跳扩展到游泳、滑冰等等，每到星期六还可以到劝业场去看电影。开始，母亲因为担心安全就不许我去游泳，于是我为了能去游泳就向她撒谎，游泳回来把游泳衣存放在同学那里，对母亲只说是去别

的地方玩了。母亲很精明，只用一张硬纸卡片在我手臂上划一下，被水浸泡过的皮肤上就会反应出一道白色的痕迹：“你去游泳啦！”对于自己的谎言和母亲的责备，我同样丝毫不以为然，照旧在游泳的事情上我行我素。后来，年龄大了一些，就愈不把母亲的管教放在心里，再去游泳回来，就干脆和母亲直说：“我去游泳了。”我最喜欢游泳，喜欢享受仰面漂在平静的水面上的感觉，整个人仿佛进入了一个自由而充实的世界。

这时，我虽然已经相信天地万物之上存有一位神，也熟知了不少圣经的内容，却不曾在心里相信和求告他的名；听见我们都是罪人，耶稣基督是救主，却没有真正明白救恩的真理，不曾在心里认罪悔改和接受他为主。可最令我感到奇妙莫名的是，神的名却时常在我面前向我显现，又在我心里的深处久久萦绕，使我不住地思想他……



第二章

强暴人備逼人的時候，

墙慰你。

暴令之外

判外邦人

想无下落，禁止強日

長想，无禮，云物清化。

去這宏書中，共載



一九三七年夏初，我从三八女中毕业。父母都希望我能继续上大学，母亲早早已经把我上大学的费用预备出来了。但是我此前就学的“三八女中”只是一所职业培训性质的女子学校，所学的课程不适合报考大学的考试要求。好在我上学早，这年才十八岁，父母就安排为我另找一所普通的高级中学，重新读三年的高中课程以后再报考大学。父亲为我在北平的女一中和天津的一所高中分别报了名。考试要等到九月份临近开学的时候，我对这样的考试一点也不担心，根本不需要专门去准备，照旧在游泳池中享受这个炎热而平静的夏天。

就在人们毫不察觉之际，天空中正在发生着一场改变人们命运的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一步步地逼近华北，在北平和天津的许多地方都驻有他们的军队，天津有日本的租界，海光寺还有日本军营，中日两军也不断地发生大大小小的摩擦。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晚上，中日两军再次在北平城南的卢沟桥发生交火。天津距离北平只有二百多公里，并且平津两地当时是由同一支中国军队驻守。随着北平方面的冲突规模越来越大，到7月下旬，天津的形势也骤然紧张起来。父亲时时关注着外边的消息，母亲提早把一些现金和细软收拾在一个小包袱里，随时放在手边防备不测。弟妹们也忙着收拾各自随身的用品。我没顾上多想，就拿出平时读的那本圣经，塞进了母亲的包袱。

七月的最后三天里，日本军队开始猛烈进攻天津。整个市区除少数的租界地以外都沦为他们肆意狂轰滥炸的目标，父亲急忙带领全家往租界躲避战火。走在昔日熟悉而今却充满陌生的街市上，沿途店铺紧闭，整个城市笼罩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之下，以往繁华热闹的津门一下子荡然无存，只剩下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行色匆匆……

刚刚离开家不远，空中突然出现几架日军的飞机，其中一架飞到我

们头上，机翼一歪，六个小黑点带着尖利的呼啸，瞬间变成六个黑长的炸弹，直向我们头顶砸下来……人们惊叫着四散奔跑，猛然间，一声巨响好像就在身边不远的地方炸开，脚下的大地也跟着一震，一刹那，巨大的火光冲天而起，黑烟弥漫，遮满了天空……我的身体和心灵都被强烈地震撼，又仿佛有火从内到外烘烤着我……眼前这争战，这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还有这吞灭的火焰……这既陌生而又熟悉的场面，不正在见证圣经中耶和華神借众先知所预言的，要以他的公义审判万国、万邦、万民的景象吗？

轰炸过后，惊恐不已的人群漫无目的地涌来涌去，哭声、喊声连成一片……幸好我们一家人都平安，没有人受伤，就又继续向前赶路。沿途不断见到有受伤的人，被人搀扶着或抬着的，也有倒卧在地上辗转哀号而无人顾及的，更有躺在那边一动不动的，不知是不是已经死去了……遍地血迹斑斑……在这兵荒马乱之中，人的生命是何等的渺茫无助，不知道什么时候炸弹落到谁身旁，谁的生命就没有了。还有那些在痛苦中呼求无门的伤者，谁又是他们的帮助呢？

我们全家原打算到意（大利）租界暂避一时，不曾想意（大利）租界的大铁栅栏门紧闭，拒绝接纳任何中国人进入。守门的人蛮横凶狠，先是厉声呵斥威吓在门外聚集等候的难民，进而又用高压水龙喷射驱散门前的人群。我们身上也都被淋得精湿，却又进退不得，只好随着人流在租界大门外拥挤徘徊。这时不远处传来烧饼的叫卖声，这声音真不啻一瓢冷水在滚烫的油锅里炸开，众人近乎疯狂地拥向叫卖烧饼的小贩，你争我夺地抢购，全然不问这些普普通通的烧饼此时竟然被抬价到一元钱一个！父亲拼尽力气也只为我们买到两个烧饼，全家十一口人坐在道边的马路牙子上，一人掰一小块，分着吃这两个小小的烧饼。我们早晨七点多钟离家的时候，仓皇得连一点干粮也没有顾上带，整整一个白天都在疲于奔命，甚至都想不起为自己找一点食物充饥，直到此时已近傍晚时分，才从这些发国难财的黑心人手中讨得这一份小小的食物，难以果腹。夜幕初降，天上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刚才被水龙冲湿的衣

服还没有干，这时又被雨水再一次无情地湿透。虽然正是仲夏季节，我却是被地上人喷射的水，天上的雨水，还有自己的汗水和泪水所浸透，从皮肤直到心里深处，犹如身陷在寒冬般的冷酷之间。

回想起白天在路上所见过的那些伤者和死者，人的生命为何如此渺茫？人死后灵魂又要往何处去呢？此时此刻，我真是又困又累，又冷又饿，又惊慌恐惧，又困惑迷茫，生命的道路已经黯然沦入绝境……

一个细小的声音从我心里的最深处悄然涌起：“主啊，我需要你，求你救我！”神的灵在我里面感动我，向他呼求。我依旧坐在马路牙子上，低头闭目，默默地向着主祷告：

“主啊，我知道唯有你是可靠的！主啊，我需要你！求你救我！”

“主啊，在你面前我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过犯！”

“主啊，我真心需要你，求你救我！求你救我的全家！”

渐渐的，有一股平安的暖意从心里升起；缓缓地，溢满我的全身，直到整个身体仿佛被融入一股暖流之中……

过了一会儿，看见有人由远而近打着旗子招呼：“难民们，你们都过来，这里有难民收容所。”于是，我们和周围那些同样在黑暗寒冷中走投无路的人群一起涌进难民收容所。收容所是露天搭建的席棚，里面已经人满为患，其中有不少是受伤的人，地上的血迹随处可见。那里没有床，只在地上铺着草席，大家席地坐卧，饭食就是收容所为难民施舍的稀粥。

过了三天，父亲好不容易才托人在法租界里租了一间房子，要十五元一个月，全家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暂时栖身的地方。

## 二

一家人在这所临时租来的房子里安顿下来。我的心也从流离失所的惊惶与凄苦中，归入了平安，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平安。我发现从过去几天的经历中，让我明白了许多以前不懂的道理，更带给我一种新的渴望。于是，我从母亲的包袱里取出我的那本圣经，开始一字一句地读了



起来，读经之外的时间也主动帮母亲做家务。细心的母亲觉察到了我身上正在发生着的微小变化，特意吩咐几个年幼的弟妹，说：“你们别打搅她，让她看吧。”过了几天，外面的局势稍有好转，母亲不放心在河北区的家，急着要搬回去。这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平津地区，附近一带的战事也已基本停止了，但日本占领军的纪律十分败坏，时常在街道上野蛮地横冲直撞，打人杀人、抢夺财物和侮辱妇女的事情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父母担心我们，就决定让我带着大妹继续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是法国的租界，日本军队不能随意进入。

父母他们回去了，留下我和大妹仍住在这里，不久又有两位广东同乡的女孩来和我们俩同住。虽然我们在租界内的行动是安全的，而且租界里也有不少繁华热闹的场所，但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以往的想法，只是留在屋里专心地读经。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也学着向神祷告。

度过了一个多月平安的时光，转眼又到了9月份学校开学的时候。我要到北平去参加女一中的入学考试，乘火车来回加上在北平停留要三天。母亲为此专门写信给已经迁居北平的老世交罗家，请他们在我去北平的那两天，帮忙照看我。原来，罗公年事已高，又看到国家战乱，民生凋敝，铁路上也大不如以前景气，就在五年前辞掉了天津铁路局的工作，三口人移居北平，与先前已在那里的阿邦父子一家团聚。

因为女一中的入学考试是在星期一，我就提前一天星期日坐火车来北平。早晨六点半钟，父亲亲自把我送上火车，十点多钟就到达北平。平津两地虽然相距很近，这却是我第一次来北平，也没有叫人来接站，我自己在车站外面雇了一辆三轮车，按照手里的地址找到东华门锡拉胡同十四号的罗家。

袁家显然已经收到了母亲的信，正等着我的到来。罗婆一见我来了，真是高兴的了不得，还是像小时候那样把我搂在身边，拉着我的手，不住地说：“哎呀，你可来啦！”袁婶也在边上一个劲儿地问候：“你父母好不好？家里都怎么样啊？”自从祖母去世以后，两家的来往比之前少了很

多；罗公举家迁居北平后，彼此见面的机会就更稀少，中间除了袁婶曾在有一年的八月节时来过我家一次，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们了。即便这样，两家毕竟是同乡，又是多年的老世交，罗婆更是从小最喜爱我的。虽然是星期日，可家里却只有罗婆和袁婶两个人，袁伯和阿邦父子俩都没有在家，距离午饭的时间还早，我就和她们坐在屋里拉家常。

锡拉胡同十四号是一座两进的中式四合院，罗家从天津迁到北平定居后把这里全租下来，整座院子共有二十多间房，自己一家人住在后面第二进院子的三间北房和一间东房，前面的第一进院子还有第二进院子的南房、西房再都转租出去，罗家成了二房东。罗家自住的三间北房，一明两暗，罗公已经在不久前去世了，家里只剩下罗婆和袁伯、袁婶夫妇分住在两侧，中间一间是用作客厅。房子还是很讲究的，前廊后厦，窗户上镶着宽大的玻璃，房间里摆设的都是硬木家具，北房的客厅里，后面靠墙是一条硬木的大条几，前面是一套西式的大沙发，倒也还算得上是敞亮气派。

约莫过了中午十二点，我正和罗婆在客厅里坐着说话，从玻璃窗里望见一个二十多岁清瘦的年轻人推着自行车走进院，放好车子，径直朝北房走来。上了台阶，他已经从敞开的房门里也看见了坐在屋里的我们，赶紧进来，笑呵呵地冲着我说：“呵，你来啦！”我知道这就是阿邦，显然他也认出了我，虽然从他离开天津到北平上学，我们至少都有十年没有再见过面，但是在儿时的印象和眼前的环境中，我们都很自然地彼此认出了对方。我也站起来，大大方方地向他打着招呼：“阿邦哥，你回来了。”阿邦也笑着点头回应我。“阿邦哥”原本是小时候母亲就要我这样称呼他的，可那时我这个娇惯任性的小女孩儿压根就不待近这个总是揪我小辫儿的小淘气哥哥，从来没有心甘情愿地叫过他“阿邦哥”，可此时面对这个成熟稳重又热情开朗的年轻人，“阿邦哥”这样的称呼实在是再亲切自然不过的了！记得上次袁婶来天津家里的时候和母亲拉家常，说起阿邦信“耶稣洋教”入了魔，硬是从马上就要毕业的财政商业专门学校退学，跑去上什么神学，家里人苦口婆心的劝说也听不进去，他们已经为

这个“没出息”的“忤逆”孩子伤透了心，甚至气忿忿地说：“我就全当没有这个儿子了！”虽然我当时听到袁婶的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想法，今天见到阿邦却对他有一种从心里发出的尊敬。

袁伯中午不回来，所以午饭就只有我们四个人。吃饭的中间，阿邦问我：“你住这儿啊？”

“嗯，我住这儿。”大概是母亲记住了袁婶曾说起过阿邦是信基督的，并且已经在上神学的事情，就在这次给袁家的信里专门提到我也开始信基督了，最近又常读圣经。阿邦想必已经看过了母亲的来信，就直接问我：“你信主了？读圣经了么？”

我回答说：“是的，我读了。圣经我都读了一遍了，圣经真好，真宝贵！”

他又问：“你祷告么？”

“嗯，我祷告。”

可以感觉到阿邦很兴奋，脸上始终带着笑容。吃了饭，大家又简单说了几句话，阿邦就推着车匆匆走了，临走前对我说了一句：“我上学去了。”

阿邦仍然像小时候那样的瘦削，个子可比我高出差不多有一个头了，脸色还是那样的黝黑，却没有了当初那种蜡黄的颜色，穿一身洗得挺干净的灰色旧学生装，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可以看得出，阿邦精神很好，身体也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的羸弱。我知道他这时正在远东圣书学院上四年级，只是不晓得他怎么星期日下午还要去学校，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禁不住心里说：呵，真像个大人啦！

下午还是罗婆母女俩陪着我一起说话。罗婆拉我挨着她坐，摸摸我的头发，摸摸我的脸，一个劲儿地夸我白净漂亮，又想起问我：“这小辫还是你妈给你梳的吗？”我回答说是，虽然我已经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母亲还是天天早晨为我们梳头，只是样式早就从原来的两根小辫变成梳在中间的一根大辫子。罗婆跟我总有说不完的话，看见我身上穿的一件白底、大红色斜条纹的丝绸旗袍，也用手摸摸质地，问我：“这衣服真好

看，哪买的啊？”

“从香港给带来的。”

“真好！谁做的啊？”

“我妈帮我裁，我自己学着做的。”

听我说自己学着做衣服，罗婆又高兴地连着夸奖我聪明手巧。趁这时，袁婶有点难为情地对我提起，说：“我们以前借你们的钱，都还没还完……”我知道罗家以前曾经向祖母借过不少钱，有一些一直都没有还，这次临出来之前，母亲专门叮嘱我：“你别提这事了。他们要问钱，你就说不要了。”于是我就照着母亲交待给我的说：

“我妈说不要了。”

袁婶说：“真是！你们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也用了你们不少的钱，还用了一对金镯子。”

我当然还记得祖母那次为了罗家急等用钱，就把自己手上的一对金镯子交给罗婆去变卖的事，但我还是说：“我妈跟我说了，这些都不要了。”

罗婆母女对我们都很感激，对我的接待也格外的热情。罗婆还记得我小时候喜欢吃糖果，特地为我准备了进口的咖啡糖，还有一种特别的奶油炒花生米，是真光电影院专门供给观众的，外面都没有卖的。午饭和晚饭都相当丰盛，看得出来很多好吃的菜肴都是专门为我做的，晚饭时还从外面的饭庄叫人送来了烤鸭。

晚饭仍是我们四个人，袁伯还没有回来。饭后，阿邦没有马上回他自己住的东房，留在客厅和我们一起说话，罗婆还是像白天一样拉我坐在她身边，不住地摸摸我的手、我的头发，袁婶也坐在一旁听着我和阿邦说话。阿邦问我：“你觉得信神以后有什么改变？”我就给他讲，我信神以后整个人变化很大，脾气也变了，我母亲对我的变化特别高兴，说耶稣真有办法，我这个姑娘以前脾气那么不好，又爱美，现在全都改变了。我们彼此分享了各人在这上面的一些见证，然后阿邦告诉我：“信神的人，肯定要有改变！这是生命里的改变，不再是老我的那个老旧的生命，而是在主里面重生的那个新生命的样式。”接着，阿邦又向我详尽地

讲述福音的源本涵义，他知道我曾经在教会学校里接触过一些福音，就特别向我指出：单单只是像在教会学校里那样知道耶稣的名字是不够的，要真心相信耶稣就要把主接到自己的心里来，这才是真正有生命信仰。阿邦听我说到在天津战乱中的经历，告诉我说：“外面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天津不太平，北平也不安宁，唯有信靠主耶稣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

我前几年在教会学校时就熟读过圣经，金句都会背诵，也听到过救恩的道理，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又有一个来月前，神借着战乱给我的感动，我已经开始在心里愿意接受主基督；现在经阿邦再这么一讲，心里真是一片无限的光明，又如同被油厚厚膏抹般的滋润甘美。

袁伯一直到晚上快十二点了才回来，见了我当然少不了又是一番热情的寒暄。听袁婶含糊地说起袁伯在真光电影院做事，每天都要等晚场电影散场再去吃宵夜，所以回来得很晚，今天还是因为我来家而提早回来的。

阿邦把他原来住的小东屋让给我，自己临时睡在北屋中间的客厅里，袁家对我的到来早有预备，屋子打扫收拾得很整洁，床上也铺上了新换洗过的被褥。比起北屋，阿邦住的这间小东屋的陈设就简陋多了，屋里除去一张普通的木床、一张普通的三屉桌和两把椅子之外，最特别的就是桌上整齐排列的几十本属灵的书籍。阿邦拿给我几册远东宣教会出版的福音刊物《暗中之光》，里面有他翻译的文章。

第二天就是星期一，我按时去北平女一中参加考试。这天还是住在袁家，袁家对我的招待也还是那么热情周到，晚饭仍是我们四个人。饭后和前天一样，照旧是罗婆、袁婶坐在边上听着阿邦和我叙话。接着上次的话题，阿邦询问起我聚会的状况，当听到我说因为时间仓促，加上又正带着妹妹在租界里躲避战乱缘故，一时还没有来得及找到一个聚会的时候，马上介绍我去张周新弟兄的圣会所聚会，又简明扼要地向我讲解了基督徒参加聚会就是“连于主基督身体”的道理，鼓励我一定要参加聚会。他知道我这次来北平是为了报考高中，就问起我今后有什么打

算，我回答说：家里的意思是要我重新读三年高中，然后再上大学，自己原先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主张，就是这样照着父母的安排去行了；但是自从在这次战乱中，真实地经历了主的恩典之后，在心里开始朦朦胧胧地产生了自己的想法，就是越来越感受到主的恩典实在是宝贵，也想为主奉献作传道人，去传扬主的福音，拯救失丧的灵魂。阿邦看我有这样的心志，更是高兴，当下为我推荐了一所“天津圣书学院”。阿邦知道我明天就要回天津了，最后特别郑重地嘱咐我，说：“你要好好地读圣经！要好好地追求！”我也认真地点头回应他，表示我已经记在心里了。

我又和罗婆、袁婶拉了一些家常，这天袁伯回来的还是和前天一样的晚。

第三天一早，阿邦过来对我说：“你走了，我不送你了！我没功夫送你，我得上学，不能落课。”从他推着自行车匆匆离去的背影里，我看出阿邦是个学习很用功，很认真的人。

上午的时候，我礼貌地感谢过罗婆一家对我的接待，就辞别她们出来，一个人乘火车返回天津。

相隔了十年再一次见到阿邦，两天中间我们所谈论的除了主里的话，就再没有其他别的话题。我生命的萌芽也确实借着 he 得到了最初的一份浇灌，但是此外，阿邦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

以后每当相忆和我回顾这一生在主里面所共同走过的路程时，总会惊喜地发现，原来神在我们还完全不能明白、不能觉察的时候，就已经将恩典的种子播撒在我们各自的心田里，又以慈爱浇灌她的成长，直到在他里面结出爱之果子。

### 三

回到天津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着阿邦给我的地址去圣会所聚会。因为外面的局势还没有恢复正常，母亲让我和大妹妹暂时还住在租界里，平时也不让我俩出来。恰巧，圣会所也正在法（国）租界的耀华里，距离我住的地方也不远，坐有轨电车只有几站路，母亲看到聚会地点和来往

路程都在租界以内，又看到我信主以后的变化，就愿意我去参加聚会。从这时起，我就开始在圣会所聚会、查经。

基督徒圣会所的前身是宋尚节博士三十年代初在全国巡回布道期间在天津创办的布道团。一九三四年宋博士于天津召开布道大会后，由一群热心的信徒奉献发起成立教会，由张周新、陈善理夫妇负责。因为有这一层的渊源，我到圣会所聚会后不久就有幸亲身聆听了宋尚节博士的讲道。宋博士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奋兴布道家，也是那个时代最有恩赐的传道人之一，很多人都慕名来听他的讲道，圣会所的屋里挤满了人，连外面的院子里都站满了人。宋博士的布道与其他的传道人大有不同，他毫不留情地直击世人在神面前的一切罪恶过犯，仿佛两千年前神的先知施洗约翰的大声疾呼再一次响彻在东方的旷野：“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的身材瘦弱，但讲道时却是充满力量，又非常形象而生动，不像其他人那样站在讲台上不动，而是在台上不住地跳啊、跳啊……又从讲台这边蹦到那边，再从那边蹦回到这边，通身大汗淋漓，身上穿的蓝布长衫都被汗水湿透了半截，他也全然不顾。正讲着，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制作得很逼真的木头小棺材，“呼”的一声砸在桌子上，台下的听众中有人被他这个怪异的举动逗笑了，他也不顾他们，厉声说：“这就是人的归宿！死亡！下地狱！”这下人们可笑不出来了，都认真地听着他往下讲，他把棺材盖一打开，又重重地拍在桌子，如同重重地击打在每个人的心里，讲：我们要认罪悔改，仅仅用耳朵听道是不行的，各人要打开自己心里的“棺材”，还要打开得彻底，把里面的“死行”一件一件地取出来，人只有把内心里所有罪行清洗干净，才可以使基督的生命充溢。

他揭露出人心的虚伪诡诈，斥责那些口里尊崇主名，内心却是刚硬地拒绝悔改，也不肯远离恶行的“挂名基督徒”，尤其是那些假冒为善的教会传道人和长老、执事，他手指着台下的听众，说：“谁也逃脱不掉神的审判！别看你是个基督徒，别看你是个牧师，你是个长老，你有罪！你们快要落到地狱里面了，你们还不悔改！”正说着，猛地把外面的长衫一

脱，露出里面穿的另外一件长衫，前后身都贴着很多白色的实心圆圈，圆圈上的黑字写的是人的各种罪恶，有说谎、嫉妒、偷盗、奸淫、自私、仇恨、凶残、不信等，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无遗。“人唯有一条正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一边唱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众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一边把身上这件写满诸多罪恶的长衫也脱下，抬手挂在教堂前面墙上的十字架上，唱罢又向听众宣讲十字架是神救赎的恩典和大能，讲罢再领头高声颂赞主“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众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宋博士虽然讲得声嘶力竭，但劝人悔改、引人向主的心意诚恳迫切，圣灵也大大地做工，神的真光就照亮人心，凡听见这真道的，个个扎心，人人痛悔，当即有很多人跪在台前向神认罪悔改。

讲道过后，宋博士又给人医病。我坐在台下远远望见宋博士站在台上，闭目祷告，面色表情庄重，前边的讲台上放着一个盛满橄榄油的小碟子。前来求神医治的病人排着队到他面前，有瞎子、有瘸子、有架着拐杖的……宋博士仍是严肃地闭目祷告，看也不看来到他面前的人，就伸手到碟子里沾油，按手在病人的头上，说：“奉主耶稣的名医治你！”按一个过去一个，有的人当场得到医治，就像当年蒙主基督亲自医治的病人一样，扔掉了拐杖，高声赞美主，笑着跳着走了。确实有很多人的疾病得到了医治，聚会结束后我就看见地上扔着好几条被人丢弃的拐杖，但是，也确实有一些是没有医好的。

宋博士所传讲的完全是以十字架为中心，毫不留情地指斥人的罪，后来我也听到过不少传道人的信息，还有相忱的讲道，但是没有一个人像宋博士这样的激烈，这样的无畏，这样的不知疲倦，甘心背着十字架献上自己，再没有一个人像宋尚节博士这样，只可惜他去世得太早。

张周新弟兄本人就是在宋博士的布道大会上悔改信主的，他是圣会所的负责人，也是个敬虔的“祷告人”。平时他并不常在聚会时讲道，但每周必定亲自带领祷告会，通常都是跪下连续一两个小时的开声祷告，



赞美，交托，祈求……为福音，为教会，为众弟兄姐妹，更为神的国……不住地向神祷告，仿佛和神有着说不完的话，到最后嘴角直淌出白沫他也浑然不觉。张弟兄的祷告对建立和坚固我一生中在主面前的祷告的事奉有着很深刻的影响。从那以后，无论我身处何种境况，直到我年届九旬的时候，都是每日必定屈膝跪在主前安静地祷告。每当有弟兄姐妹向我求教有关祷告的问题，我都会给他们讲张弟兄的这个见证，勉励他们和我一起作一个以张周新弟兄为榜样的“祷告人”。

每个主日我都在圣会所参加聚会，聚精会神地听道，也参加周间的查经和祷告会，热心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分享，彼此代祷。平时就在租界的临时住处里，安静地读经、灵修和祷告，越读越是觉得圣经宝贵，上面的很多话正是对我说的。外面的世界已经没有一样东西再能吸引我，唯有日日渴慕追求神的话语，享受他的喜乐平安。

神的话语把我昔日的过犯一一地光照在我的眼前，神的灵在我的里面带领我为我的罪向神认罪悔改。尽管我这时没有住在家里，没有在父母的身边，我的良心却为我从前在家里，在父母面前的各样过犯深深地责备我。我因为偏行己意而不肯顺服父母，不仅常常不肯听从他们的管教，更有在言语上顶撞母亲，母亲说我一句，我就要“回敬”母亲两句，父母看着我这个样子也没有任何一点办法。还有对家里的佣人发脾气，比如我喜欢虚荣，就对衣着格外看重，佣人洗熨的衣服稍有不如意，就把衣服往他们面前一甩，说：“烫的不好，重烫。”可我这个平素骄傲任性惯了的“大小姐”，如今却真要顺服谦卑地当面向父母，甚至向家里的佣人承认自己的过犯，实在不是靠着我自己力量可以做到的。从北平回来，我就在心里为这个事情反复挣扎，争战，也一次次地向神祷告，神垂听了我的祷告，赐我力量胜过里面的老我，终于低下头站在父母的面前，诚心诚意地向他们承认我过去在家里各样的悖逆顶撞，自私，不体恤人等等过犯，末了再向他们深深地鞠一个躬，请求他们宽恕我。从父母那里出来，我又专门去向家里的佣人们认罪，同样也向她们鞠躬，请求她们原谅我。

从那时起，我平生第一次真实地品尝到神赦罪的恩带给我的丰富的喜乐和平安！神更借着我的悔改，把原来那个以自己为中心，又骄傲，贪爱世界的虚荣，不顺服父母，不怜恤人的老我，与主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又在耶稣基督里重造一个愿意顺服神，渴慕神的真道，谦卑温柔，又与人相爱如己的新我。

不多久，北平和天津的两所中学都给我发来了录取通知书，父母来问我愿意上哪所学校，可我不久前还模糊动摇的心志，这时候已经清晰而坚定，那就是：神已经使我领受到爱人灵魂是最伟大的，这是神的工，世上的工没有任何一种能与之相比！我向父母坦陈了心里的想法：“我不再想上大学了，而是想去读神学院，预备将来作传道人去为神传福音，救人灵魂。”有些出乎我意外的是父母竟是一致赞成我的想法，特别是母亲看到我自打信主以后变化这么大，总说：“从前我这个闺女脾气那么不好，冬天只穿件毛衣就出去溜冰，叫穿衣服也不听，可现在改变这么大，这耶稣真有办法，谁能改变她？没有人能改变她，就是耶稣能改变她！信耶稣就是好！就让她上神学去吧，我觉得行！”

看到家里同意我上神学，真是喜出望外，就提出在北平时阿邦给我推荐的天津远东圣书学院，父母听说是阿邦推荐的自然更没有二话，可待到和学院的潘子丰院长一联系，才知道这所学院因为没有宿舍，所以只招走读生，并且学院地处偏僻距离市区太远，父母看到外面四处兵荒马乱的样子，就很担心我每天往返路途中的安全。我虽然满心渴望现在马上就进入神学院学习装备自己，渴望在他丰富无尽的真理之中使自己饥渴的生命得以成长，更渴望以我的身体、心灵去事奉这位怜爱世人的独一真神，可想想父母的担忧也并非全无道理……在祷告中神让我看到，神已经悦纳我在他面前的奉献的心志，既然目前神还没有为我开路，我就愿意顺服神，安静等待，我已经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相信神必按他的心意为我成就。这样的选择，不是凭血气的，而是凭着信心！“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提摩太后书 1：12）这时我的心里充满平安。

他们看到神在我身上显出的变化，认为信耶稣实在是件好事，一点也不阻拦我信主和参加聚会，只是他们自己却还是不肯相信。

## 四

父母没有坚持要我依照他们原来的意思去上高中和大学，而是同意待到时局平稳后，再让我自己去另找一所合适的神学院。我一时没有学校可上，外面乱糟糟的也不便出去工作，就仍是带着妹妹住在租界，除了每周照常去耀华里的圣会所聚会、查经，就是自己一个人在住处读经、祷告、灵修。从这时开始，神的恩典越来越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也越来越迫切地向身边的人传福音。父母暂时都还没有信，我又继续向和我同住的妹妹及另外那两位广东同乡传福音，她们俩也没有信，只有妹妹在口头上说她信了，却很少去参加聚会，只是有时被我拉着一起读经、祷告。我心里虽然是为她们焦急，也唯有一边不住地为她们祷告，求神感动她们，一边在生活上尽力关心照顾她们。妹妹看我每日专心一意地读经、祷告，还要常常出去聚会，就主动承担起全部的家务事，一切买菜做饭收拾房间等等都不要我操心动手，我在感谢她之余，就更加期盼她早日在心里真正地接受福音。

外面的动荡开始渐渐地平息下来，我也可以时常离开租界回多禄里的家中看望父母弟妹，也顺便取些日用的物品，只是担心发生意外每次都不敢在家停留得太久。

心里身外都很不平静的一九三七年就如此静静地过去了。

一九三八年元旦过后不久的一天，我在家里听到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消息，母亲告诉我：“阿邦前天来家里了，他现在南市那边的教堂里实习呢。”自从去年九月份从北平回来，我们彼此就再未有过联系，我也没有在教会其他人那里听到过他的消息，现在他突然来到天津，实在让我感到又惊又喜。

我知道母亲所说的南市教堂就是位于南市的福音堂，是圣会所下属

的一个支堂，我虽然没有在那里聚会过，但对那一带非常熟悉，那里离开租界不远，又是商业区，安全上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于是，我定意在下一个主日去南市福音堂聚会，顺便探望阿邦。

主日清晨，我特意提早半个小时来到福音堂。这时离聚会开始还早，阿邦正在堂里和几位早到的信徒们谈道，看见我从外边进来就赶快迎上来，笑呵呵地和我打招呼：“阿珍，你来了！太好了！盼望你每次都能来！”接下来就问我：“你圣经读得怎么样了？读到哪儿了？”

南市临近日（本）租界，是当时天津最为繁华热闹的商业街之一，福音堂就在这里临街的一处房子里，一共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地方，外面一大间是聚会的场地，能坐下二百多人，里面还有一小间房子是供给传道工作和起居的，此时只有阿邦一个人在福音堂服事，也住在这里。

看看离聚会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为了不影响他和信徒们正在进行的交通，我就自己走进里面阿邦住的小屋。里面不仅狭小又特别简陋，但收拾得干净整洁，仅有的一张单人木床上放着一摞新洗的衣服，我一眼瞥见最上面的那件旧竹布大褂上的一个扣子已经松脱了，只勉强还连着一点点线。环顾四周，见屋里唯一的一张旧二屉桌上有一个普通香烟盒大小的铁盒，走过去打开一看，里面竟真的有针和线！等到我缝好扣子把衣服放回原处，正好聚会开始的时间也到了。

这天参加聚会的有一百多人，阿邦一个人既带领唱诗又要讲道。聚会结束后，阿邦邀请我留下和他一起去附近的信徒家里探访，临走前还送我一些属灵的小册子，嘱咐我回去仔细阅读。

接下来的那个主日我还是去南市福音堂聚会，阿邦看见我就问：“我的扣子是你缝的吗？”我点头说是，他说：“怪不得呢，我说没有别人来过嘛！”然后很认真地只说：“感谢主！”却再没有说一句感谢我的话，就转头忙他的事工去了。望着他的身影，我心里想：“这人可真是梗直啊！难得的是他心里唯独只有神！”其实我的心里又何尝不是同他一样的不住地感谢神呢！感谢神奇妙的预备，是神在那个铁盒里预备了针和线，

预备我为他这样缝好扣子！但是我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此刻已经为我预备了更丰盛更奇妙的恩典，在不远的前面，要为我成就！

聚会以后，阿邦还是要我同他一起去信徒家里探访。这天我们走访了四、五个信徒的家庭，每到一家都要为他们解答信仰上的疑问，也为他们当中的困难和病痛献上祷告。从阿邦与信徒们的亲切交通中我可以看出，他虽然才刚刚到天津服事，就已经和这里教会的弟兄们在主里面建立起彼此相爱，彼此信任的关系，特别是一位腿脚有病的崔弟兄，阿邦更是经常去到他家里为他祷告。

探访回来的路上，阿邦向我讲解如何探访，要我记住，并且说：“这是我们将来工作的‘剪影’。”这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给北平的家里写信请父母为他向我提亲的事情，更不知道神已经赐给他信心，预备他和我在主里成为合一，共同事奉。

因为在圣会所那边熟悉的姊妹比较多，平时常在一起交通又彼此代祷，所以在探望过阿邦两次之后，我还是回到圣会所参加主日的聚会。没想到，过不多久，阿邦也转来圣会所服事，我们又在聚会上见面了。阿邦还是穿着他那件旧的浅蓝色的竹布大褂，看见我进来还是像在南市福音堂一样的笑呵呵地上来打招呼：“你来了，你能来真好！”接下来还是问：“圣经读到哪儿了？”

在南市福音堂的时候只有阿邦一个人服事，聚会时从领唱诗到讲道就都由他一个人担起来了。到了圣会所，在这里服事的传道人多了，都是大家轮流上台去讲，有时是张周新弟兄讲，有时是另外的传道人讲，阿邦在这里讲道比较少，所承担的主要事工是在聚会时带领唱诗，也出外到信徒家里带领聚会。我那时看阿邦并没有像其他许多传道人那样出众的口才，但还可以胜任讲台的事奉；加上他刚刚从神学院毕业，讲道实在还算不得太好，也没有别人那么流利。但他所讲的不是那么高深，而是听起来朴实易懂；讲章很有条理，层次清晰，也没见他在台上有什么紧张，挺自然的，就是那样规规矩矩地讲；还有他的嗓音虽然只是一般，但能非常准确熟练地识读五线谱，显然阿邦在这上面是下过功夫的。

结婚以后，阿邦给我看他在神学院时的笔记，从中证实了我最初对他的印象：阿邦在神学院学习时为日后在主里面的服事做好了认真而充足的预备。以后，他在服事中逐渐成熟起来，翻开圣经到某一个需要的章节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不必再依赖预先的准备。唯有他从起初就有的那种深入浅出的阐明真理和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成为贯穿他一生事工的鲜明特征。

在这段不长的日子里，我们每周有几次在教会中见面，每次他都必定要询问我读经的状况，此外所讲的也全是主里的话，还经常送我一些属灵的小册子。我一点也没有察觉到自己对阿邦的印象正在默默地开始变化，从最初的几乎无话可说，借着主里面的交通，不知不觉地进入彼此相通。

## 五

有一天，父亲忽然托人带信来，要我周末回多禄里一趟，说是有些事情跟我谈，我也没有多想，就在周六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

家里一切照旧，父亲去上班还没有回来，母亲在厨房忙着料理家务，我一个人信步走进客厅。一进门就被桌子上的一个普通的信封吸引住了，信是写给父亲的，下面的落款是“北平锡拉胡同十四号”，这是袁家在北平的地址。我打开信，没看上几行心里就被吓了一跳，再往下看，越看越是吃惊不已。这是一封袁伯亲笔写给父亲的长信，内容半文半白，大意是：“我们得知令爱阿珍也信了耶稣，并且说非基督徒不嫁，我们很为她高兴。我家阿邦也是信耶稣的，如您不嫌弃，就恳请向令爱提提这件事，看看他们两个的想法。我们也知道，按理说我家阿邦无论从各方面都配不上阿珍，如果您能与令爱商量一下此事，我们将感激不尽。”这封信措辞谦卑，语气恳切，字迹也相当工整，看来袁伯为这封信确实是很动了一番脑筋。我怀着一颗“砰砰”狂跳的心，把信按着原样放回父亲的桌上。噢，原来父亲今天叫我回来就是为了这封信啊！那我见阿邦时他怎么就没跟我提起过一个字啊！

父亲回来了却并没有对我说什么，从父亲的脸上比往日更加凝重的表情分明可以看出，他此时也正经历着困扰。我尽力在家人面前保持着镇静，掩饰住内心中的紧张和羞涩，让自己看上去仿佛就和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心里却忍不住七上八下，已经乱得没有一点主张了。我只好这样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父亲开口，但出乎我意外的是，一直到我向他们告辞返回租界，父母始终没有向我提起关于袁家这封信的事情。

从家里出来，我先暗自松了一口气，心想怎么会有这事啊？我怎么会嫁给他呀？！就在前不久，也曾经有人到家里给我提亲，对方是一个银行行长的公子，提亲的人担保我一过门就作少奶奶，甚至在我们一家人面前大大地炫耀这家的奢侈生活，说：“人家穿的袜子，即便是昂贵的丝袜，也是穿过一天就扔了，从来不要洗过再穿。”当然这家人都是不信主的，所以我当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父亲对我这样的态度很不理解，希望我至少能和男方见个面，我明确地对父亲讲，我所做的决定不是出于我个人的喜好，而是完全出于我所信的神：“圣经上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 6：14）我信主，就要找个信主的对象。以后请您就别给我张罗了。”父母都了解我的个性，更加看到我信主以后的敬虔和热心追求，口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但我知道他们的心里却都放不下这个事，特别是母亲看着我每天出门就是聚会，进门就是读经，眼见已经是快二十岁的大姑娘了，对自己的终身大事竟一点也不上心，担心女孩子越大越不好找婆家，可我又非要找个信主的对象，心里为我着急却一点也帮不上忙。我这时当然清楚自己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但是除了信神的话，要“信与信的相配，同负一轭”之外，对于自己的婚姻大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就是这次在圣会所遇见阿邦，又和他一起去探访，我的心里都没有生出任何一丝别样的感动，可现在怎么会有这事啊？我怎么会嫁给他啊？转念又想起袁伯信里的那句话，他是如何知道我“非基督徒不嫁”的呢？

第二天是主日，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去圣会所聚会，在那里又看见阿邦，他还像往常一样和我打招呼，一样的询问我的读经、灵修，此外再

没什么多余的话，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过。

从圣会所回来的路上，昨天那些还没有答案的困惑再一次萦绕在我的心里——怎么会有这事啊？我怎么会嫁给他啊？回想起刚刚在聚会上见到阿邦，我觉得他长得不好，面貌平平；学问也不大；而且连一句讨人喜欢的话都不会说；成天就是那一件旧得发白的布大褂，还净是补丁，整个人从头到脚都透着土里土气的，根本不合我的心意呀……可一想到他在台上带领唱诗时的情景，心里又是一动……哎呀！他是信主的，又是与主同工的传道人，自己怎么可以用那样的世俗眼光看待他呢？他从原本很有前途的财商学校退学去为主奉献作传道人，正是看到唯有为主传道救人灵魂才是最宝贵的，自己不是也和他有着相同的心志吗？这个世界上的金钱等等都算不得什么，唯有为主做工的传道人主最喜悦的，也是我最敬佩的，阿邦不正是这样一位主的忠心仆人吗？还有自从在北平见到阿邦，我就羡慕他对圣经的熟悉，他又一直来那么关心我的读经和属灵生命的成长，将来正好可以给我很大的帮助啊……

直到走回租界的住处，我还是思来想去理不出个头绪。自己不是已经求主为自己预备一个信主的人作为人生的伴侣，来一同服事神吗？现在眼前的阿邦不正是这样一位爱主的弟兄吗？况且还是一位值得我敬佩的传道人！可一想到他的条件和家境又开始拿不定主意了……

怀着满心的犹豫困惑，我跪在神的面前，向他祷告，祈求他在我的终身大事上赐我一个凭据，“主啊，你知道你女儿的心愿，我不求他有多少家产，不求有英俊的相貌，只求他有一颗诚实爱主的心，将来我们同心合意地服事你！主啊，求你在这事上赐给我一个凭据，如果是你所配合的，求你让我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并且心里一天比一天更加火热；如果这不是你的心意，就求你让我冷淡下来，忘了这件事。”祷告过后，顷刻间从身体到心灵都感受到一种完全释放以后的轻松与快乐，更有一片平安伴着一点淡淡的暖意从心底深处缓缓地升上来……

随后的几天里，我每日更加迫切地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终身大事献上



祷告，神也真的按着我的祈求回应我的祷告。神以平安充满我的身心，驱走一切曾有过的惊慌和困惑，奇妙的暖意如同岩石中流淌出的温泉，越来越热地滋润着我的心，直热得我每次祷告时都禁不住脸红心跳。

这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我又从租界的住处回到多禄里。这次父母都在家等我，父亲叫我到家里的客厅，先让我坐下，然后把手里拿着的一封信递给我，说：“这封信，你先看看。”我接过来一看，正是上个周六我在这屋父亲的桌子上看过的那封袁家的求婚信，神既然给了我凭据，我就明白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的心意，心里也没有了第一次看见这封信时那样的慌乱。信虽然我已经看过了，但这时还是遵照父亲的吩咐把信打开，认真地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然后重新折好，交还给父亲。

父亲问我：“你看怎么样？”因为在回家以前我预先警戒过自己在这事上要尊重父母，不可顶撞他们，此时也想先听听二位长辈的意见，就回答说：“您二老看怎么样？”

停顿了一下，父亲轻轻叹了口气，说：“阿邦是个好孩子，为人正派，没有不良嗜好，我们也都是看着他长大的，这个没的说。可是他现在作传道人，没有固定的薪水，他家里也是房子没有一间，地没有一亩，你要是嫁给他将来是要受苦的。”说到这又略停了一下，微微摇了摇头，说：“太穷了！我和你妈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有点不满意。”母亲多年操持这个家，对生活的艰辛繁琐自然有着亲身的体会，也比父亲更了解袁家的状况，这时也接着父亲的话劝我说：“他家那么穷，你进门就得受苦挨饿！他自己也没有工资，将来怎么办呀？你们拿什么生活呀？这可是个大事啊，你可得想好！”

父亲看我一直没有开口，就对我说：“你也说说你的想法。”我抬眼望着父母，平静地说：“阿邦是信主的，而且是个传道人，本人也是很正派的；穷不要紧，我只看他是有真正爱主的心。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比较不错的。”

听我这么说，父母马上都没有再说什么，沉默了一阵，父亲才说：“这

是你的终身大事，别急着做决定。我们给你一周的时间，自己好好考虑清楚。”这一周父母要我留在家里，没有再回租界里的住处。

一个人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我开始反复思想今天和父母的谈话。我知道父母是了解和信任阿邦的，况且他们也绝不是贪图财货的势利人，只是为我们以后的生活担心。在北平时我也亲眼看见了袁家的情形，虽然日常生活上还算过得去，但所住的房子不过是租来的，还欠着我们家那么多钱都还不上……说心里话，我当时根本就看不上这个家，就是觉得他们的家境比我们家差远了；加上阿邦自己又是一个穷传道人，如果嫁入这个家，往后的生活恐怕就真的和父母所说的一样。这时我的心里响起阿邦曾对我说起的一句话：“吃饭是小事，你在这样的小事上都不能存着信心依靠主，别的事就更不能了！”是啊，他也真的这样做到了，他既然把自己都完完全全地献给主，甘心为主忍受饥饿痛苦，我也情愿和他一同为主受苦，一同品尝那份苦中才有的甘甜。

接下来的这几天里，尽管父母都闭口不再提这件事，但能看得出来他们的心里实在很不平静。我自己的信心虽然坚固，可毕竟父母都还是不信主的，很难完全理解我的心意，倘若他们执意阻拦我又该怎么办呢……想到这里，我又一次俯伏在神的面前，“神啊，既然这一切都是你的旨意所命定的，就求你感动我的父母，让他们同意我和阿邦的婚事！愿主你的心意成就！”

七个日夜在每天的读经和祷告中悄无声息地逝去，荡漾在我心里的依然是满满的平安和火热。

一直到第三个周六，父亲才又把我叫到客厅，说：“阿珍，你过来吧，来谈谈你想得怎么样了。”

我回答说：“我想过了，我也祷告过了，就冲着他是一个为主做工的传道人，我答应了！传道人的价值不是用挣钱的多少来衡量的，因为传道人传福音救人灵魂，是最有价值的工作，比挣钱更有价值。至于您

二老说的‘受穷’，我相信为主的缘故是不会受穷的。”

父亲眼睁睁地望着我，说：“那耶稣能管你饭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父亲，说：“主会管的！”

父亲有点吃惊地看着我，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

这时母亲插进来说：“这个事，我们俩都是一样的意见——太穷！”

我转过来对母亲说：“我再三考虑过了，穷我不怕！我也不看他的相貌，不看他的家当，就看他本人。他爱主，为主奉献，专心服事主，这样的人很宝贵，所以我看还是可以的。”

母亲还是对我将来的生活放心不下，继续劝我说：“你们将来孩子多了可怎么办呀？你连孩子都养活不起呀！拉着孩子出去要饭都没有人管你呀！这事你可得想好了，后悔莫及啊！”

我说：“主会为我负一切的责任！”

父母又说了很多劝我的话，我因为已经把自己的心意表达清楚了，也就没有再和他们过多地争辩什么。

最后，父亲见我心意已定，就对我说：“你自己说了那么多的理由，我们也不驳你了。婚姻自由嘛，既然你愿意，我们不能强迫你，不能干涉你。但是你要知道：婚姻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要想好，不要将来后悔！”

我郑重地回答父母，说：“是，我绝不后悔，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母亲听见我这样说，脸上露出欢喜的颜色，转头对父亲说：“那太好了！阿珍既下定决心了，你就给袁家回信吧。”父亲的脸色也从严肃中和缓下来，说：“既然你自己诚心愿意，那就这样吧，我们就答应他们家了。”

从这时起，父母就让我搬回家里住，不要再回租界去了。

没过几天，阿邦专程登门来向父母道谢，原来他刚收到北平家里的信，告诉他这边父亲已经去信答应了婚事。看他真是高兴的样子，见了我就笑呵呵的，说：“一切都交托主了！这真是主的恩典！”还说：“我没想到，没想到你父亲能答应！”母亲听阿邦这么一说也深有同感，她也没想到这门婚事会是这样成就的，说：“我看你也挺老实的，你会看上阿珍

了，我也真没想到！”又对着阿邦夸奖我说：“阿珍的变化特别好，这孩子变了一个人了！”阿邦听见母亲这话，瞅着我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与他们一样，我们两家是老世交，虽然我和阿邦从孩提时代就曾经在一起玩耍，但从没设想过我们的生命会以这样的方式永远连结在一起。母亲从小时候就是很喜欢阿邦的，今天见到他将要成为自己的大女婿当然更是加倍的喜欢，晚饭时专门为他准备了很多好吃的，足足摆满了一大桌子。饭后，阿邦说还要回去带领祷告会，就匆匆地告辞走了。

在圣会所的主日聚会上，阿邦看见我比前两天在我家里时笑得还要厉害，对我说：“你挺好的？”看着他那笑起来没完没了的模样，我也忍不住在心里悄悄地乐，口里面回答他说：“我好啊！”心里却想：“呵呵，瞧他这样儿，我怎么看都像是在傻笑。”我们比起以前亲热了许多，但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多的话，因为阿邦原本就不是一个话多的人。这时除了像以往每次那样的关心我读经和灵修的情况，再又是问我：“你剩下的时间都做什么呀？”我告诉他说：“我找同学，劝她们信主。”听到这话，阿邦收敛起笑容，很认真地说：“这个对的！把你所认识的人都带到主面前，这是你的责任。”望着我，又再特别的加重语气说道：“我们都有这个责任！”

自从我接受了福音，内心就像使徒保罗一样深深地感受到我是欠着“福音的债”，我自己已经得了这赦罪与重生的恩典，可很多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神的福音，于是就迫切地愿意向周围的人传福音。从租界搬回家里之后，我把每周聚会、查经以外的时间都用来探访我原来的同学，劝她们信主。很快就有一位叫许道荣的女孩接受了福音、悔改信主，她是我在三八女中的同学，还比我小一岁，也住在我家附近，平时常来家里找我玩。正好母亲也不放心我独自一人来往耀华里的路途安全，我就拉上许道荣和我一起去聚会，可惜她太贪玩，时常借故就不去了。

聚会结束后，阿邦陪着我一起从圣会所出来，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一路上阿邦还是很少说话，我一下子也不知该和他说些什么，我

他俩就这样静静地并肩走着……已经走出来很远了，我就说：“你别送我了，回去吧。”可阿邦却似乎没听见我这话一样，依旧带着笑走在我的身旁。送到车站，看着我就要上车的时候，阿邦忽然伸手轻轻地拉起我的手，轻轻地握住又放开……在这以前，我们从来都没有握过手，这是阿邦和我的第一次握手，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和异性有这样的接触……这一刻，我的手，我的脸，一直到我的心都是暖洋洋的……我在心里悄悄地对自己说：这人还可以啊，不是那么“倔”嘛！

车开动了，我看见阿邦仍站在那里，笑呵呵地向着我这边张望。在不知不觉中，我的心意已经被神更新变化，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愿意察验他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我眼前的阿邦，也从昨天那个土里土气的年轻人变成今天这样一位可敬可佩的弟兄。回到家里，阿邦身上破旧的蓝布大褂还留在我的眼中，也刺痛着我里面那颗蒙神更新的心。

第二天早上，趁着母亲出去买菜的当口，我从家里存的布料中拿出一块蓝布，要自己动手裁剪成大褂所需的样式，待到拿起剪刀才发现原来根本还没有量过阿邦的尺寸呢。可这时我心里却有一股力量催促着我没有退缩，只有前行，就这样一边靠回忆估算着尺码，一边精心地裁剪。

正要完成的时候母亲从外面回来了，看着我手中的活计，吃惊地问“谁给你裁的？”

“我自己裁的。”

“你怎么会裁？”

“我净看您做了，您做的时候我都在边上看了。”

母亲用手指戳着我，说：“你真行啊！快拿来我看看吧。”一看就说裁剪的还对。接着我又在母亲的缝纫机上把这件大褂缝制完成。当我亲手把这件礼物送给阿邦的时候，他也同样大吃一惊，问我说：

“谁做的？”

我终于开心地笑了，说：“我自己学着做的，做得不好。”

阿邦接过衣服，又是像上次在南市教堂我给他缝扣子时那样认真地

说：“感谢神！”随后就一边高高兴兴地试穿新衣服，一边笑呵呵地冲着我一个劲儿地点头，不住口地说着：“谢谢，谢谢！”

我自己也美滋滋的，要知道这可是我第一次动手做这样的工，所缝制的还是样式复杂的大褂，事先连起码的尺寸都没有量，没想到竟然正好合身，也不肥，也不瘦。我在心里真是满满地感谢赐我聪明智慧的神！因为我确信，我所成就的不是来自我的手，而实在是来自神——那位大能者的臂膀！

阿邦轻抚着自己身上崭新的大褂，又看看旁边刚换下来那件旧的，情绪从最初的兴奋之中逐渐平静下来，语调凝重地对我讲起不久前的一件事情。就在几天之前，圣会所有位信徒邀请阿邦到他家里带领一次家庭聚会，可是到了那里一看，这位信徒的家就在租界，家里的装饰摆设都非常的豪华，所请来的信徒和朋友也无一不是衣着华丽，看着人家身上的西装革履、绫罗绸缎，再打量自己身上这件打着补丁的破旧长衫，他独自坐在边上抬不起头来，脸上一阵一阵地发热，甚至该到自己讲道的时候都不好意思站起来。以后一直到我们在白塔寺家里聚会的时候，相忱还时常提起自己那时的软弱来警诫信徒。

自从相忱和我都知道了双方的父母应允婚事之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每次聚会结束后他都执意要把我送到车站，除了还像以前那样说主里的话，两个人也很自然地开始交通一些各自的状况。阿邦首先给我讲起他名字上的变化，原来在他出生时，父亲给他起名叫“袁振邦”，无非是表达了长辈在孩子身上所能寄托的最大的愿望，期盼这个袁家的长子日后能够长大成人，振兴家邦。七岁那年开蒙的时候，按照当时旧式学塾的规矩，进入学堂的第一天先生要为每一个新生都起一个学名，于是一位留着胡子的老秀才为他重新起了一个学名叫“袁相臣”，也不过就是希望这个学生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成为君王驾前的“肱股之臣”而已。从此“袁相臣”就成为他的正式的名字，只是家人和我们这些同乡世交一直都照着广东人的语言习惯称呼他“阿邦”。可是等到他升入初中以后，因为受到诸如三民主义这类社会流行思潮的影响，十六岁的“袁相臣”开始尝试用他自己的眼光来审视社会，也审视个人的人生，最初引起

他反感的就是他自己这个充满“腐朽气息”的名字——“相臣”，但他这个名字已经使用了好多年，学校里还有周围的人早就熟悉了这个名字，贸然更改成一个全新的名字确实不太方便。想来想去，他就自作主张，把自己名字中那个大臣的“臣”换成热忱的“忱”，发音不改，所表达的意义却有了根本的变化。那时他还没有信主，当然不会想到就在不久的未来，他的整个人生即将发生全新的改变，袁相忱正是要用他热忱的生命来事奉那位用恩典呼召他的神！

## 六

这一年的五月，相忱的母亲专程从北平带着聘礼来到天津。她人很有外场，衣着打扮也很显眼，又很能讲话，口才上也不错，一进门就对着父母说了不少客气恭维的话：“我们真是配不上你们，你们竟答应了这门亲事，我们全家都高兴得了不得啦！特别是外婆从小就爱阿珍，本来她正病在床上，可一听见阿珍要进我们家立刻就高兴得从床上跳下来，病一下子都好啦！现在阿珍能到了我们家，这是多么的巧合呀！”袁家对这门亲事很是急切，从父亲刚一回信答应这门亲事起就不断地催促我们早订婚期，而这时，相忱的母亲又当面向父母再三地请求，还大方地承诺下婚礼的一切花费都由袁家负担，不要我家操心，保证办得体面红火。于是两家把我们的婚礼定在两个月之后的七月二十二日。最后，她又满意又高兴地说：“我们两家是老朋友，老世交啦，你们也是看着阿邦这孩子长大的，这婚事能成就可真是天作之合啊！”听着这话，我心里却明白：这不是巧合，而是神的安排。

我一直都在纳闷相忱的父亲怎么会突然写信来提亲，等相忱的母亲走了以后我就问他：“老爷子怎么会想起来信求婚呀？”

相忱一听，呵呵地笑了出来，边笑边对我说：

“那还是年初我刚到天津不久，第一次到多禄里看望二婶。那会儿你不在家，二婶说你在租界里住呢。二婶跟我说起你信主以后的变化，说你不再像原来那么贪玩，而是每天在家读经，脾气也变得温和了。二婶听说我已经在教会作了传道人，就提起前不久有人给你介绍对象的事，还是个银行行长的儿子，可你因为对方是不信主的就坚决不同意，声明

一定要按照圣经里的教训找个信主的；眼看着你已经是快二十岁的大姑娘了，对自己的婚事一点也不上心，还总是跑出去聚会，她很不放心可又没办法。就托我看看教会里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基督徒给你介绍一个。我也没想到二婶会提出这个事情，当时心里一动，就回答二婶说‘您就把这事交给我吧，您放心。’回到南市心里很有感动，想到：阿珍不错，我也挺喜欢她的，没想到她现在信主这么热心……我又向神祷告，觉得很通，就给北平的家里写信：二婶要我给阿珍物色一个信主的对象；我挺喜欢阿珍的，如果父母也觉得合适，就请父亲写封信给阿珍的父母，向梁家提亲。”

听相忱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事情的原委，我那次并没有在家里遇见相忱，是后来才听母亲说起他正在南市福音堂实习和曾来家里看望，母亲当然不会告诉我她托相忱为我介绍对象的事情；后来我有两次到南市福音堂看望相忱，他虽然已经在祷告里得到了确信，也已经写信请父亲向我家提亲，但一个字也没有向我提起过。最后，相忱很认真地对我说：“这是主的旨意！”我回答说：“是的，这是主的旨意所命定的！”

相忱和我订婚以后，家里也开始紧锣密鼓地为我们筹备结婚的各项需用。母亲自从相忱九岁那年第一次到家里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待，现今就愈加地喜爱他，时常把他叫到家里来陪自己说说话，看他身体瘦弱就变着花样地给他做各种可口的饭食；又看他身边并没有什么衣服，即便仅有的那几件也是单薄破旧，就关心地问：“阿邦，你衣服够不够啊？来量量尺寸，给你做衣服。”因为天气已经渐渐的热了，就特意给相忱做了一套既考究又轻薄的中式礼服，有石青色的绸子大褂和黑罗的马褂，还恐怕照着先前量好的尺码去买来的帽子和鞋他穿戴着不舒适，就干脆说：“阿邦，你下次早来，我带着你自己去试吧。”果然，过不几天就专门带着我们俩去为相忱买了礼帽和皮鞋。

因为要为我备办嫁妆，母亲就询问相忱在安家事情上有什么打算，相忱诚实地回答说：“我们信基督的不讲究这些。况且我们传道人也没有固定的住处，为了传福音，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到那里。”母亲说：“那不行，我们应该给她嫁妆。我们家虽然孩子多，但我的大女儿出嫁决不能马虎。”就要照例为我们的新房采买家具作为我的嫁妆，相忱又劝阻



母亲说：“您别买。我们不在天津安家，我们也不要房子。”母亲当然不依他，叫我们跟随她到当时天津最好的家具店铺去看，卧室的，客厅的，厨房的……一样一样地亲手为我们挑选好，最后让店里的伙计把价钱算下来，一共是七百块。母亲当场并没有买下这些家具，也没有说什么。一直临到结婚之前，把沉甸甸的七百块银元放在我的手里。

婚礼在即，我也开始收拾自己日用的衣服等等。谁料到，这时我才发觉自己拥有的衣服鞋帽原来是这样的多，光是各式各样的鞋就有四十多双，摆在地上竟然足足占去了一间屋子的一大半，多数都是皮鞋，有黑色的，红色的，还有米黄色的；有高跟的，半高跟的，也有平跟的……回想我曾经也是追随这个世界的诱惑，对自己的容貌、衣着如此地热心追求，因为总是在意自己的个子不高就专门最爱穿高跟鞋。当时的学校不允许学生在学校里穿高跟鞋，于是我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把脚上的平跟鞋换成我心爱的高跟鞋。每当我脚下的鞋跟“噔噔”地敲击在地面上的时候，我的心意是如此的骄傲和满足。可是信主以后，从前辈传道人的见证，从我在教会中间的见闻，尤其是从相忱的身上，我渐渐地开始明白一个真以色列人，一个为主奉献的传道人的生活，必须是尽心尽力尽意地爱神，单单地事奉神，以神为乐，且要竭力追求内在属灵生命成长的生活。这与在此之前我个人的生活和追求有着天壤之别！是截然不同的！我并没有注意过相忱的脚上穿的是什么鞋，但至少我没有在他的脚下听到过“噔噔”的声音。低头望着地下这些我昨天的心爱之物，今天在我眼中却已经不再看作是与我有利的，我深信我们即将建立的传道人家家庭和传道人的生活——那在主基督里面有全新的形象和样式的生活，注定与这些东西无份，我自己当然也不会再用得上它们。默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完全地平安了，就对母亲说：“您把这些能送人的都送人吧，我以后用不着了。”

同样也是在这个五月，在相忱和我完成订婚之前，一个主日的下午，我正式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那天在圣会所和我一同受洗的总共有一百多人，能容纳四、五百人的会堂里也坐了不少前来观礼的弟兄姊妹，我们所有预备受洗的都穿上洁白的长袍，为我们施洗的张周新弟兄

也穿着白袍。和其他许多教堂一样，圣会所的讲台前面也有一个供浸礼用的池子，我正走进池子的时候，抬头望见相忱远远地站在会堂的后面，双手放在胸前，低头闭目在敬虔地祷告。当我礼毕更衣重新回到会堂的时候，相忱已经来在面前迎候我了，他全身上下都洋溢着喜乐，拉住我的手，连连地说：“感谢神！感谢神！”洗礼完成以后，照例是圣餐礼，我就站在相忱的身边，这是我们两人一生中第一次在主面前同掰一饼，同领一杯；第一次同心在主面前宣告我们的身体和生命都完全属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救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并肩站立在主的面前，领受主的祝福，立志开始我们永远不变的事奉。

### 第三章

強暴人備過人的時候。

場。對

暴

刑

想。元。下。落。禁。止。強。暴。

象。想。元。禮。云。物。清。風。

去。這。家。書。十。卷。或。



从安睡中醒来，我抬眼望见窗外明亮的阳光欢快地洒满整个房间——这是晴朗的一天！这天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是相忱和我举行婚礼的日子。

原本在这天之前的天气一直都是阴雨绵绵，已经连续有半个来月没有过晴天了，眼见着母亲的脸色也像外面的天气一样，一天阴沉过一天。两天前，母亲和妹妹陪我从天津来到北平，可就是在从火车站搭乘马车来旅馆的路上，因为所带的东西太多，下车时又把雨伞忘记在马车上了。母亲因为这事很不开心，嘴里嘟囔着说：“这怎么这么不顺畅啊！”我赶忙劝解她说：“那算什么，丢就丢了呗！”到了二十一日，已经是婚礼前的最后一天了，天空中还是阴霾依旧，见不到一丝阳光，更丝毫不见就要放晴的模样。母亲本来已经被这阴郁的天气压抑了好久的情绪就更加不快了，不住地抱怨说结婚时下雨不是好兆头。我自己虽然并不觉得阴天下雨真会对我们的婚礼乃至今后的生活带来任何影响，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我也特别在当天晚上的祷告中祈求神：“慈爱全能的神，你掌管万有！倘若合你的心意，就求你明天赐给我们一个晴朗的天，还有明亮的阳光！”

神啊！你是喜爱怜悯的神！感谢你因你的慈爱应允我的祈求！望着被阳光充满的天地万物，我轻轻地舒了口气。母亲终于也被这不期之间从天而降的阳光一扫心头多日的沉闷，欢天喜地地亲手帮我穿戴起婚纱，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哎呀，可见天了！真好啊！”

上午九点钟，相忱带着接亲的队伍来到我们下榻的旅馆。相忱穿戴的正是在天津母亲给他做的那一身中式礼服，我则是穿一套白色的西式婚纱；婚车是一乘有两匹高头大马挽拽的轿车，轿车的车身是红色的，车顶的四角向中间凸起，整个就仿佛是一顶中国老式轿子的模样，挽车的两匹马头顶也扎上了一朵耀眼的大红花；轿车前面是一支十二个人的西式乐队，都穿着大红的制服和缀有金穗子的高帽子，手里都举着金黄

锃亮的铜号和大鼓；轿车后面还跟着一辆小汽车是给母亲和妹妹她们坐的。所有这些婚纱还有婚车、乐队等等都是袁家专门从当时北平最有名的“紫房子”婚庆商店租赁的，这种中西互见的婚礼风俗正是三十年代那时最文明，最兴的。

婚车从旅馆所在的西单舍饭寺出发，乐队一路在前面奏乐前导，经过了当时的半个北平城来到王府井东安市场旁边的颐园饭店。

袁家选择为我们举办婚礼的这家颐园饭店也是当时北平最有名的饭店，场面上算是很隆重了。除了里外的张灯结彩，厅堂两边的墙上还挂满了一二十幅大红绸缎的喜幛，上面写的都是那些“天作之合”、“天长地久”之类的吉祥话。在这天受邀到场的一共有一百多位宾客，中间大约有一半是袁家邀请的亲戚朋友，另外一半是主内的信徒，远东圣书学院的吴智院长和石理富牧师等几位美籍牧师也到场祝贺。婚礼由另一位来自美国，脸庞白净、高个子的芮牧师担任证婚，马星格教授证道。马教授是东北人，他们两位都是相忱在远东圣书学院时的老师。

婚宴开始前，饭店的伙计用一个红漆托盘端上来两小碗面条，领头的堂倌恭恭敬敬地拱着双手分别在相忱和我面前深深作一个揖，口里还一边唱着：“给您道喜啦！”又接着唱出：

“新郎一碗长寿面，新娘一碗长寿面，长长久久到永远！”

随着话音把那两碗面放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我正带着几分好奇看他们的表演，忽然只听坐在我身边的相忱说道：

“我是信耶稣的，不信这个！”

我一愣，连忙抬头望过去，只见他正端起自己面前的那碗面条，弯腰放在桌子下面的地板上，紧接着又伸手拿过我面前的这碗照样放在地上。周围凡看见的人无不被相忱这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惊愕了，从几位外国人的座位那边还传出来一阵轻轻的笑声。而就在另一边，我却发现相忱的母亲的面孔一下子绷紧了，脸上的颜色也变得非常难看，眼睛紧紧地盯住相忱。我很为相忱捏一把汗，生怕他母亲这时候发作起来会和他发生冲突，可相忱全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只顾继续招呼大家吃饭。又过

了好大一阵子，他母亲的脸色才一点儿一点儿地恢复到平常的样子，我一直为相忱悬起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回想那一幕插曲，不禁在心里赞叹相忱，他只是单单地顺服神，为了神的缘故毫不顾忌世人怎么看，怎么说，不愧是真以色列人的脾性。

我们的新房就是锡拉胡同十四号里院相忱原来自己住的那间小东屋，房间重新做过了粉刷裱糊，又更换了几件家具。

第二天的上午，相忱领我首先去拜访萧安娜老师。相忱告诉我，萧老师是他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学校读中小四年级时的英文老师，因为他对英文课很有兴趣，就跟着萧老师从发音、字母开始认真地学习，作业也干净工整，萧老师很快喜欢上了相忱，课堂上总是叫相忱回答她的提问，在萧老师的悉心教导下，相忱的英文进步很快，英文的作文尤其出色；还有相忱的英文名字“Allan”也是那时萧老师为他取的。后来，相忱才慢慢地知道，萧老师原来是一间美国基督教会差派到中国的宣教士，以后她和一位中国弟兄结了婚，美国的母会即与她断绝了经济上的供养，所以她才到教会学校来教授英文，因为她的丈夫姓萧，就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叫萧安娜。那时，相忱的母亲还和外公一家住在天津，只有相忱的父亲带着他借住在父亲工作的真光电影院的一间小房子里，父亲的工作很忙也顾不上照顾他，萧老师就常把相忱带到自己的家里，在生活上给相忱慈母一般的关爱，以致学校的其他同学都戏称相忱是萧老师的“干儿子”。相忱也确实很信任萧老师，有什么心里的话都愿意对她倾吐，萧老师就向相忱传福音，劝他真心接受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生命的救主，相忱虽然知道萧老师是位敬虔的基督徒，也打心眼里觉得她是位可敬可爱的好人，教学认真又对学生真挚和蔼，身上更流露着一种其他世人所没有的平安和喜乐，可他却顽固地不肯接受萧老师给他传讲的那个福音，有时是随口敷衍，有时甚至直接顶撞萧老师说：“根本没有神！如果您能拿出来证据让我看看神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就信！”萧老师并没有因此与他争论或者责怪他，仍然和以往一样地耐心开导他，一样地凡事关爱照顾他，没有一点与他疏远的意思。直到又过了四、五年相忱真正悔改信主的时候，萧老师才告诉他这几年间自己时时都在为他的得救而向神恒

切地祷告。

萧老师住在北平东城的一所普通的四合院里，她的丈夫也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基督徒，曾经在国民政府专门为救助贫寒人士设立的社会救济院担任院长，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从那天算起已经整整七十年过去了，其间所经历过的那些世间的跌宕起伏也不是用文字可以清楚描述的，虽然萧安娜夫妇和相忱都已经安息在主的怀抱里，但两个家庭在主里的情谊和关爱一直延续到今天。

接下来的三天里，相忱又带我去拜访了王克忱老师、基督教青年会英文夜校的崔校长和郭太太。王克忱老师曾经作过相忱的数学老师，同时也是他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带领人；在相忱信主后不久，就是在崔校长家里参加聚会时经历了他一生中第一次的被圣灵充满；郭太太名叫郭孙惠卿，是宋尚节博士的布道团的一位同工，是相忱在远东宣教会的主日聚会时结识的，曾经在 1936 年蒙神感动，资助相忱参加宋尚节博士在厦门鼓浪屿带领的全国第二届基督徒查经大会；她家里每周的聚会则是相忱最早服事的一个工场。郭太太六十年代在监狱里为主殉道了。

婚礼完成以后，我们没有顾上休息，连着几天拜访过北平的主内师长，婚后的第五天我们就一同回到天津继续相忱在圣会所的实习事工。离开的时候，我们两人只随身带了不少的一些日用的衣服，而把其余大部分包括家里给我陪嫁的四大箱子衣服都留在锡拉胡同的家里。我又从母亲最后给我的那七百块大洋中拿出一百块作为十一奉献，放进了圣会所的奉献箱里，剩下的没有用就先存起来。正是神为我们预备下的这六百块大洋，在后来的生活中几次解救我们全家脱离艰难危急的境遇。

相忱和我固然没有闲暇像其他年轻的新婚夫妻那样去同度蜜月，在我们六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中也几乎没有过一起外出游玩，但是我们却因着一同领受主的生命之恩，饱尝了比蜜更美的甘甜。

## 二

婚后我们在家里只住了五天，第六天就赶回天津。

回到天津，相忱先把我送回娘家暂住，自己并没有在家停留，就直接赶到圣会所在葛沽的支堂，那里即将成为相忱新的工场。又过了五天，相忱来接我同去葛沽，临行前我们又一同去拜访张周新夫妇。张弟兄对我们的到来非常热情，坚持挽留我们在他家里留住两天再去葛沽。

张周新弟兄是福建人，所以话语中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听说他早年曾在军阀的队伍中作过混成旅旅长，后来转道经商在天津开有一家华北贸易公司。他是听了宋尚节博士的一次布道会而悔改信主的，此后他开始热心服事，不仅在宋博士布道团的基础上建立起圣会所，还担任天津教会联合会的执事长；张弟兄的原配妻子早年亡故，后来他又和陈善理姊妹结婚。陈姊妹是一位产科医生，当时在天津也开了一家很有名气的产科医院；她也是福建人，个子不高，白净的脸庞上总是挂了微笑，说出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在圣会所里面，她的爱心和温柔更是深为众弟兄姊妹所称道，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陈大夫”。

天津的圣会所是张周新、陈善理夫妇在原有的宋尚节博士布道团的基础上创建发展起来的，在他们二人的带领下，圣会所成为当时天津信仰纯正而有影响的教会，最初在租界耀华里聚会的人数逐步增加到四、五百人，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知识分子，还有不少是医生，他们都是神在陈大夫身上所结的福音的果子。相忱几年前在宋博士布道团同工时就 有幸和张周新弟兄相识，以后又在事奉中逐渐成为相知，这样在一九三八年年初的时候，张弟兄专门邀请相忱来圣会所完成他在远东圣书学院毕业前的实习。原本这个实习按计划到七月份就已经结束了，但当时圣会所的信徒人数增长很快，在天津市内和邻近的郊区陆续新开设了好几所支堂，急需相忱这样受过装备的工人来带领和牧养，于是张弟兄就和相忱交通，希望他在这次实习结束后能够留下再继续服事一段时间。

张周新弟兄的长子名叫张锡焕，是张弟兄已经去世的前妻的孩子，



我们在天津服事的这一年他已经十八、九岁了。锡焕弟兄从年轻时就很有音乐上的恩赐，不仅能弹钢琴，还能作词谱曲，当年教会中广为流传的那首诗歌就是他少年时代的作品：

向前走啊，  
跟主向前走，  
一去不回头。  
向前走啊，  
跟主向前走，  
前进不后退。  
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  
不配进天国；  
向前走啊，  
跟主向前走，  
主就在前头。

虽然在现今的教会中已经很少有人熟悉和传唱它了（海外教会仍有传唱——编者），但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却是信徒中脍炙人口的诗歌。后来锡焕弟兄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抗战时期随学校迁到大后方，那时他热心传福音，能言善道，常常到成都各个校园中布道，组建学生团契，引领许多青年学生悔改信主。一九四五年重新回到北平以后，他又继续在北平的大中院中广泛推动青年学生的福音事工，从起初在王明道先生的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内的学生祷告会开始，直至以院校中的众多学生团契为基础成立了北平基督徒学生会，锡焕弟兄都是其中最重要的发起人和带领者。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学生会不仅在东城西总布胡同三十三号内地会赖恩融牧师所租的房子里建立起每周定期的聚会，还利用学校每年的寒暑假定期举办学生灵修会。可惜，锡焕一九四九年去美国学习神学以后反而灵性下沉，失去了以往服事主的火热，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竟改行经商去了，也没有再回过中国。

张周新弟兄和陈善理姊妹结婚后生育的几个儿女——锡恩、锡圣、锡光那时还都在幼年，全家人住在一栋二层的洋房里，生活富足优裕。

我们在张弟兄家里留住了两天，天天都和他们夫妇一起有很长时间

的祷告，让我又一次直接感受到张周新弟兄作为一个“祷告人”的殷勤恳切的事奉。

我们离开天津之后，张弟兄夫妇也分别变卖了公司、医院和其他家产，在北平香山开办了恩典院，专门接待主内的传道人在那里退修。作为相忱和我所共同尊敬的属灵的师友，我们和张周新弟兄夫妇多年保持着经常的交通，相忱在阜成门内福音堂事奉的期间，也曾经有数次前往香山恩典院退修。在五十年代中国教会经历的那场大风暴中，恩典院是北平仅有的几个为了竭力保守教会的圣洁而拒绝加入“三自会”的基督教团体之一。张周新弟兄和陈善理姊妹都因此被捕，因为在监牢中依然坚定于主的真道，而成为司提反以后千千万万为主殉道的圣徒之一。甚至包括他们的儿女家人在内，我们至今仍不知道他们为主受难时所遭遇的情形。相忱一九七九年回来后曾经告诉我，他在监里遇到过一次张弟兄，在彼此不可能用言语交通的条件下，他们两人用唯有在心里有圣灵的人才能明白的眼光来互相激励。

### 三

在张周新弟兄的家里住过了两天之后，相忱和我谢绝了张弟兄夫妇再次的挽留，来到相忱服事的地点——葛沽。

葛沽是天津的八大沽之一，从天津城里往东还有一百多里的路程，是一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镇子。一条河水从镇子的边上流过，镇外四周则是大片的盐碱滩和沼泽地。我自己虽然在天津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以前不仅从没到过这一带地方，甚至连葛沽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这里是圣会所新近开设的一个支堂，聚会的礼拜堂是租用镇里的一处普通民宅。院子不大，院里还住着房东一家，除了用作礼拜堂的一大间房子，里面还有一间小屋正好可以作相忱和我的住处。张周新弟兄之所以挑选葛沽作为相忱服事的工场，就是考虑这里的条件方便我们两人临时安家居住。

因为有以前工作的基础，我们到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五、六十名信徒。这个支堂只有相忱一个工人担负全部的牧养，主日聚会也是他一个人带领，先自己领唱诗，接着是自己讲道，最后再带大家一起祷告。平时的探访当然也是他一个人，直到一年多以后，我们快要离开时才又有一位崔弟兄来同工。

这时我虽然已经满二十岁了，但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更没有离开过我母亲，骤然改变的生活在我心中平添了几分孤独，几分思念……我想家，又特别想我的母亲，一想到母亲就忍不住掉眼泪。相忱从外面进来，一看见我在抹眼泪马上猜到了我的心思，为要逗乐我就故意提高声音假装和房东家的小孩说话的样子，说：

“呦，大海，谁家炒胡椒面啦？”说着他自己倒先笑了起来，边笑边哄着我说：“别炒了，别炒了！快别炒了！呵呵！”

有时他见我一个人整天闷在屋里，就劝我说：“我们去河边溜溜吧！”我却固执地不肯领受他的好意，一个劲儿地只说：

“不去！不去！”

在那段特别的日子里，写日记成为我与神交通的最好途径，从笔尖上倾吐向神的祷告，用墨水印出神给我的安慰，把自己的心路灵程一站一站地记在日记本上。葛沽虽然离天津不算太远，可那时的交通远没有今天这么便利，故平时即使圣会所里也很少人到这里来，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张锡焕。他很热情，也很活跃，隔三岔五就从天津跑到葛沽来看我们，一路上唱着他自己谱写的那首《向前走》，只要听见院子里响起“向前走，跟主向前走……”的歌声就知道一定是他又来了。锡焕只比我小一、两岁，可处处还像个孩子一样的顽皮，他发现了我的日记就想方设法地偷看，无论我把日记本藏在哪儿都能被他找出来，最后连日记本都不见了，因为平时只有锡焕进过我们这间小小的屋子，所以我当然就以为是他拿走了，可他却嘻嘻哈哈地不肯承认，我一气之下从那时起就再不写日记了。后来听人说起锡焕因为年幼丧母，少年时代性格相当叛逆，家境虽然富足却常常故意偷人东西，比如家里有客人来访，他

就乘机把人家的大衣偷走去当铺当掉，还干脆把当票也烧了，当得的钱都随便花掉。后来相忱看到我这样想家，就提议在事工之余陪我一起回天津看望父母。葛沽边上的那条河里盛产鱼虾，相忱就对我说：

“咱们给妈妈买条鱼吧，买个大的！”不由分说，拉着我和他到河边的市场里选了一条最大的，足足有五斤多重，活蹦乱跳的，里面裹上荷叶，外面再包上几层纸。想想他平时连一个铜板都舍不得花，这次主动买下这么大的一条鱼都没有犹豫，看着他一路上笑呵呵地把鱼抱在怀里，我心里偷偷一乐：呵，这人还不错！回到家，母亲看见相忱抱来这么大一条鱼真是喜欢的了不得，拍着手说：“哎呀，我都没见过这么大条的鱼，你们俩怎么拿来的啊！”

我们很快就在这里的生活中得到了平安。葛沽是个清静的小城镇，生活习惯上基本和北方的乡村更为接近，而与我们以前在城市里的生活有相当大的不同。和大多数敬虔刻苦的信徒一样，相忱也保持着每天早起晨祷的习惯，无论是春夏秋冬必定是天还不亮就起床，被子也顾不上叠就直接起身到外面去祷告，因为起床时都是要摸黑在地上找鞋，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看见鞋就是晚了”。我比他起得略晚一点，起来先要整理好两个人的床铺和被褥，马上也出去或是和他一起祷告或是我自己单独祷告。晨祷以后，相忱还要坐下来读经，我则要赶快去预备早点，那时我们的早点主要就是玉米面粥。上午的时间，相忱通常会安排去信徒家中探访，遇到有特殊需要的时候也会叫上我和他一起去，好在都住在同一个镇子里，行路上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不出去探访，就是一个人坐在屋里研读圣经；这时我大多要去镇子里的市场上购买粮食和蔬菜，回来做中午的饭。午饭后相忱照例要午睡，我自己没有午睡的习惯，就利用中午的时间做些家务，收拾一下房间或是洗洗衣服什么的。下午主要是相忱和我一起读经，有时若有特别的需要也会出去探访。晚饭也还是我自己做，虽然一日三餐都是些粗茶淡饭，但相忱和我吃得却很甘甜；晚饭以后我们一起晚祷，相忱就先去睡了，我还要再做些家务要比他睡得晚一些。

因为这里只有他一个工人服事，特别是到主日时，从唱诗、讲道到

带领祷告，还要和信徒交通，再加上周三晚上的查经祷告会，这些都要相枕独自担当，平时也几乎天天都要出去探访信徒，还有他个人的研经和灵修，所以相枕常说他感觉身体劳累。有时他身体软弱的时候，还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已经给自己定好了，最多活到六十岁，而且恐怕我们不会有孩子了。我当然知道相枕从小到大身体一直都很瘦弱，眼看着他在事工上辛苦劳乏也帮不上他的忙，唯有在神面前不断地为他的身体代祷；为了让他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除了督促他每天午睡，也尽可能地为他调制一些可口的饮食，好在出门不远的市场上天天都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和鱼虾，我就专门买一点单独做给他吃；每月赶集的日子可以买到粮食和其他的日用品，我自己把所有各样的家务事一律承担起来，买菜做饭、洗洗涮涮和其他的事都是我一个人，从来不叫相枕伸手。镇里的人都是从那条河里打水，妇女们也在河边洗衣服，洗的方法就是把衣服摊在条石上用木棒反复地拍打，我看她们这样洗得还是蛮干净的呢。幸好我们刚住下不久，陈师母就叫人在院子里安装了水管，免去了我到河边打水和洗衣服的辛苦。

葛沽周围多是湿地，一到夏天蚊子特别多，必须使用蚊帐。我们住的这一间小房子也就七、八平方米的样子，里面只能勉强排下一张木床、两把椅子和一张二屉桌，因为屋子实在太小，连一张比二屉桌稍微再大一点的三屉桌都放不进去。租来作礼拜堂的大屋子和这间小屋一样显得简陋，四面虽然是砖墙，房顶上却铺的都是草秸，厚厚的草秸上再糊着泥，奇妙的是这样的房顶冬天竟然一点也不感觉到冷。礼拜堂那间房子有七、八十平方米大小，能坐下一百多人。和耀华里不一样，这里的座位都是没有靠背的长条板凳，主日的清晨我会提前来把这些长凳一个个地擦干净。开始的几次聚会，我都是坐在前面专心听相枕讲道，以后看来聚会和慕道的人越来越多，就主动站到门口去接待，等到信徒们都坐好了，再找个后面的空位坐下听道。

这里的信徒纯朴热情。我们初到葛沽的时候，他们听说相枕和我是刚刚结婚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挤到我们的屋子里来看新娘子。在日常的

交通和探访中，作为传道人相忱最关心的是信徒的内在的生命，通过谈话了解他们内心的需要，首先从内心里面帮助他们。相忱和我去探访过一位丈夫有外遇的姊妹，这位姊妹既对丈夫心怀怨恨，又对生活茫然无望，我们到她家里为他们祷告，用神的话语引导她在基督里爱她的丈夫，还要向丈夫传福音，这位姊妹顺服神的话，果然没过多久，神就感动她的丈夫回转心意，不仅重新与妻子和好，而且悔改离弃昔日的罪恶，成为一名热心的基督徒。我们此时的工作使我回想起在南市福音堂时相忱第一次带领我出去探访的情景，这真是印证了相忱当时所说的那个“剪影”。

在我们婚后这一年多的生活里，对我生命成长最有帮助的是每天和相忱一起的读经，经文中遇到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相忱，他都会给我做出耐心细致的讲解，这样，我内心里面原本尚还幼小的生命，因着每日领受神的话语的喂养而不断得以进深，我经常对相忱说：

“你给我讲的那么细，比我自己上神学还好呢！”

听我这样说，相忱总是谦卑地回答：“咱们俩共同研究吧。”

相忱曾经给我讲戴德生的故事，一天晚上，戴德生正在读经，戴师母进来告诉他明天他们没有吃的了，什么都没有了，戴德生说：“没有吃的没关系啊，我们有主的应许！”他们就一起向主祷告，果然第二天一早邮差就敲门送来挂号信，里面是教会奉献的钱款。讲完这个故事，相忱最后强调：

“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有根有基，这个根基就是主的应许！”其实戴德生牧师的故事以前我自己在书里就已经看过了，再经他这么一讲心里就更清楚了。相忱所讲的这些道理，每一句我都认真地记在心里，我们在葛洁这一年多的事奉生活虽然清淡，但是还没有遇到过缺乏和危机，可是过了整整二十年以后，相忱突然被从我们身边带走，教会也被封闭，全家老少八口人的生活一下子全压在我的身上，当我也亲身经历了戴德生那样的困境的时候，才明白神在起初就借着相忱的话来预备我，使我能够胜过后来那更大的困境。

我们婚后的第二年，神赐给我们第一个孩子，恰好在这时，远东圣书学院的吴智院长来信邀请相忱回母校担任翻译。于是，相忱就向张周新弟兄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张弟兄很爽快地说：“那就回去吧！”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相忱结束了在天津圣会所前后一年半的事奉，我们重新回到北平。





第四章

強暴人備過人的時候。

場野

暴今之外

判外邦人

想元下落后禁止強暴

象想元禮云物清以

去遠宏書十卷



回到北平，相忱在远东圣书学院为吴智院长担任翻译，一方面是在课堂上为吴院长作同步口译，再有就是翻译课堂上用的各种教材讲义，另外他还抽空翻译一些文章刊登在《暗中之光》上。吴智院长（C.T. WOODS）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宣教士和神学家。相忱还在远东圣书学院学习时，吴智院长就非常喜爱他，此次也是吴智院长亲自邀请相忱重回母校服事。我是在我们的婚礼上第一次见到吴智院长，他大概有五十岁多的样子，个子不高。

我们仍是住在相忱以前住的那间小东房，这间只有十平方米大小的房子除了在我们结婚的时候简单裱糊过以外，再就是把原来的单人床换成一张双人床，其他的三屉桌和椅子都还是旧有的，我们回来也没有新添置什么。通常这种东房是没有人愿意住的，因为它夏天西晒，到了冬天西北风又直往屋里灌，所以北平有句老话叫做“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说的正是这种房子。

我们回来的第三天，婆婆就把家里的女佣人田妈辞退了，所有各样的家务都落在我的身上。可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开始犯难了，婆婆指名说要吃面条，而且说不爱吃外面买来的，叫我做手擀面，这可真把我给难住了，主食里面我只会焖米饭，只好说：“我不会和面……”婆婆从屋里出来，站在台阶上冲着南屋喊：“叶婶儿，你来，教教她怎么和面，面条她也不会擀。”随着话音，从对面的南屋里出来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跟我来到我做饭的北屋廊子下面，我看着她怎样在面盆里调和面粉和水的比例，怎样把面和到合适的硬度，又怎样在案板上把面擀开，最后再怎样叠起来切成面条，只看叶婶儿做了一遍我就会了，就接过手来自己干。接下来的几天，婆婆又叫我做炖肉和各式各样的炒菜，我结婚前在家里从来没做过饭，而且因为饮食习惯上的不同，她现在要我做的这些饭菜我以前在家里都很少吃过，不单是不会做，就连择菜洗菜一时竟都不知该从哪里下手，每到这时候婆婆就又站在台阶上喊：“叶婶儿，你来，她

不会炖肉。”“叶婶儿，你来，告诉她怎么做这个菜。”叶婶儿仍旧是像第一次那样过来做给我看，我在旁边用心地学，只要经她教过我一遍，我就都能自己做了。叶婶儿是北平人，是租住在南屋的房客，后来她在南屋那边做饭的时候我也常常主动过去看，这样我会做的菜就越来越多，也越做越好吃。叶婶儿是个心直口快的热心人，没两天就和我成了熟人，一次做饭的时候，叶婶儿瞅着婆婆那边悄悄告诉我：“其实她自己都会做！”我听了她这话并没在意。还有开始的时候，家里做饭用的煤球炉子我也不知道怎么烧，是相忱每天早晨帮我把炉子笼起来。和做饭炒菜一样，我从前在家里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洗过，现在我一个人要洗全家人的衣服，特别是婆婆几乎每次都会攒下一大堆衣服给我，当时我已经有了五、六个月的身孕，却常常得坐在院子里的小木凳上洗完满满一大盆衣服。

最令我感到困难的还并不是做饭洗衣这类的家务，也不是经常要服侍婆婆洗脸、洗头、擦澡，而是差不多天天要被叫去伺候婆婆她们打麻将。婆婆痴迷于麻将，打麻将差不多就是她吃饭、睡觉之外唯一的事情，从早到晚整天都不离开麻将桌，有些时候甚至是通宵的打。公公半夜十二点多从电影院下班回来她也不停手，公公一个人去睡觉了她也不管不问，还是继续的打。天热的时候，屋里开着电风扇还嫌不凉快，还要我坐在旁边给她扇扇子，扇了一会儿，又说：“哎呀，你别老在这一边扇呀，过来，再扇扇这边！”我还得赶快挪着椅子转到另一边接着扇。除此之外，我还要为婆婆和同她一起打麻将的几位老太太准备水果，按她们的吩咐把水果洗干净切好，放进她们各人面前的小抽屉里，后来又说小抽屉里不干净，要我把切好的水果盛在盘子里挨个送到她们的手边上。这样跑前跑后地忙活到深夜十一点多，婆婆才手抓着麻将，眼睛也不抬地说上一句：“去回屋去吧，别扇了！”

起初的时候我在心里也有过很大的不平，以前在家里我从没伺候过人，都是别人伺候我，现在我怀着身孕竟还要低声下气地伺候人，我为什么要受这个罪呀？可我明白所有的这些事都是主许可的，主既然许可

所有这些事临到我，必定是要借着所有这些事熬炼我，使我如炉中炼过的银子一般更加纯净合乎主的心意；又要借着所有这些事造就我，使像我经过装备的精兵，满有能力去为主争战。我应当心甘情愿地接受主的雕刻，不应当再抱怨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些辛苦劳累的事，因为主让我明白所有这些事无一不是正在服事他！婆婆她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在她们面前更要有好的见证，不能因为我羞辱主的名！虽然有苦待，我却要照着主的教训一味地顺服，不单单是顺服人，而是顺服神，更要主动用主耶稣的爱去感动她们的心；虽然有苦累，我却要靠着主加给我的力量忍耐到底，因为这条苦路正是十字架的道路，我要从这里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要跟从主到底！既然明白所有这些事都是在服事主，心里重新充满了平安喜乐，不再有疑惑，反而生怕自己做得不好；不再有不平，反而尽力去讨婆婆的欢喜。

我承担起所有这些事也是为了相忱，为了他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为了我们结婚之时在主面前所立的约。靠着主的恩典，我情愿担当辛苦劳累的家务，情愿尽心尽力地伺候公婆，情愿替代相忱承担起所有这些事，使相忱卸下这些烦累，使相忱得以像使徒们一样的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尽管苦累的家务天天压得我的身体疲乏不堪，尽管伺候婆婆常常占去我的很多时间，我仍然没有丝毫减少每天的读经。借着神加在我身上的诸般试炼，我内在的生命更加长大，更加与神亲近，更加渴慕神的话语，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神在圣经中的话语是那么真实，那么宝贵。

婆婆从早年就是信佛的，我很小的时候在家里就见她手上时刻都挂着一串长长的念珠，她那边的屋里供着佛龕，不打麻将的时候也跪在前面的黄垫子上捻着手上的珠子念佛诵经。我抓住和她接近的机会向她传福音，劝她离弃偶像，悔改皈信独一的真神，她却用很不以为然的口气说：“我不信你们那个外国的洋教，我就信中国的。”我知道她错把佛教当成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了，就耐心地为她讲解佛教的起源，告诉她佛教其实也是从古代印度传进中国的，可她根本一点也听不进去，转而向我

抱怨起相忱来，说：“信那个耶稣洋教有什么好处啊？你看看阿邦他信的，连妈都不要了，我的话也不听！”最后还一个劲儿恨恨地嘟囔着：“我就是不要信你们那个耶稣！”我们都明白靠我们自己并不能做成什么，唯有神的灵才能真正改变人心，自这时起，相忱和我开始为我们的亲人的悔改信主恒切地向主祷告。

## 二

回到北平的家里，相忱还和在天津葛沽时一样，照旧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祷告，读经；然后骑自行车去远东圣书学院上班，一般情况下中午都会回来吃饭，饭后再回去上班，下午五、六点钟下班回家。

大多数在家的時候，他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地读经灵修，即使和我说话也都是说主里的事，其他的像那些家长里短的事情从来是绝口不谈，也没有提议我们俩出去游玩。

正是在这个时候，相忱陆续给我讲述了他蒙恩得救的见证。

相忱十三岁的那年，父亲把他从天津外公的家里带到北平，同样也是为了学习英语的原因，把他送进位于东城米市大街的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学校，读小学四年级。在那里，相忱首先遇到了萧安娜老师，虽然他从萧老师得到了无比的关爱，却不肯接受萧老师传给他的福音，因为在他心里想的是：我在课堂上听听圣经教训就够了。我不能相信这外国人的洋教，我还要光宗耀祖，做国家的栋梁呢！

不久，又有一位叫石天民的老师来教相忱的国文课，和萧老师一样，石老师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而且是王明道先生的亲密同工。他也很快喜欢上了相忱，热心地向他传福音，为此还专门带相忱去王明道先生的会堂听道，就是这样，相忱在一九二九年在一九三〇年前后就初次结识了王明道先生，当时王先生还在外面租房子聚会。开始相忱本不情愿去，只是碍于萧、石两位老师的面子才勉强去的，所以每次总是远远地站在最后面，看着王明道先生在台上口若悬河地讲个不停，就很佩服王

先生的口才，但对他所讲的那些内容却很是不以为然，他想：别看你讲得那么好，讲了半天都是空话，都是在说天书！根本就没有神，你讲得再起劲儿也还是没有神！还有王先生在讲道中对罪的指斥也让相忱听起来挺不舒服，他觉得王先生说的也太玄乎了：一个小孩子，也没犯什么大错，又没被法院抓进去，怎么就会有罪呢？！还说每个人都犯了罪，那为什么法院没把每个人都抓进去呀？既然没有被法院抓进去，就不能算是犯了罪！他总是从所听的道中找出各样自以为是的“破绽”来抵挡和否定福音，甚至看着前面那么多正在聚会祷告的人，觉得他们实在是太愚昧，太可怜了！科学一天天地发展，人类的思想也会一天天地进步，再过几十年，等这批老信徒死了，就不会再有人相信基督教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时身上的那些顽皮和任性已经渐渐褪去，代之而起的则是一个学习认真、听话懂事的好孩子，在学校里还被选为班长。一九三〇年秋天，十六岁的相忱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学校里升入初中。此时，他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在身体上和思想上都充满活力的年轻人。除了学习成绩依然优秀之外，他又喜欢上了体育运动，打乒乓球，跳高，滑冰，样样在行；也爱出风头，热衷参加学校的各类公开活动，比如英语演讲比赛什么的，总能找到他的身影。说起那次得到全校第二名的英语演讲比赛，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相忱的脸色上还略带些许不服气。在萧老师的悉心调教下，他的英语非常优秀，口语和发音也很出色，相忱说只是由于他的嗓音不够洪亮，才在比赛中屈居第二。在这件小事上，我看相忱实在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又很有上进心的人。

相忱对我说，那时他也和身边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努力尝试用自己的思想模式来解读自己的人生，希望通过自己的眼光在世界中为自己找寻一条出路，一个方向。三十年代初期，中华民国在经历过长期的战乱后重新归于统一，三民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正在大行其道，身处这个大潮流中，相忱也很时髦地成为三民主义的追随者。时任青年会学校校长的蔡八全先生是国民党党员，他看相忱对三民主义有如此热心的追求，就对相忱说：“我介绍你加入国民党吧。”但这事终因相忱年龄

太小才搁置不提了。相忱说，他当时非常崇拜孙中山先生，相信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只有三民主义才是他理想中的救国主义。他在课余大量地阅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总理遗训》、《建国大纲》、《中山全书》等等，都逐一地细读过，其中的一些篇章甚至可以背诵下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原来的“相臣”改成“相忱”。

以后，我有好多次听到相忱在他的见证中，坦承他那时因为存着刚硬的心，拒绝神的呼召，而使自己的心灵陷入更深的迷惘，以致绝望之中。他不停地涉猎各种书籍，也不停地思考，但有三个问题却始终找不到答案。第一个是他无法解决自己心中莫名的烦恼，那种烦恼总是困扰着他，使他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甚至想要自杀。他一次次地反观自己的生活环境，实在找不出烦恼的来由，但这个烦恼又确实实地无时不在折磨着他。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和长辈都对他疼爱有加；当时父亲的工作已经稳定下来了，生活上丰衣足食；他自己的读书成绩一直很好，和老师、同学相处得也算融洽；因着父亲在电影院做事的缘故，他还可以随便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在这般无忧无虑的环境当中为什么还会有烦恼呢？相忱自己也不明白……有时他被这种烦恼搅扰到不能自拔，甚至想到以死来解决。有一天下午，他照着从书上学来的样子，双手各拿一根大铁钉子准备往电源的插孔里插，就在双手伸向电源的那一刹那，忽然仿佛有一个声音从心里响起：“袁相忱，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父母吗？难道他们就白白地养你一场吗？”伸向插座的双手虽然缓缓地收了回来，但心中的烦恼却丝毫没有减少。

第二个问题是：自己如何才能胜过罪恶的引诱，过上一种圣洁的生活。他亲身感受过自己的家庭被罪恶所苦害的伤痛，也看到许多年轻人在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是何等的纯正刚毅，可一旦踏入社会马上就不由自主地被罪恶同化掉了，迅速地在大染缸里腐化堕落下去。他深深地恨恶罪恶，不肯在其中随波逐流，渴望自己将来能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如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在这个充斥着邪恶败坏的社会中做一个清正的中流砥柱。石老师和萧老师在渴慕圣洁的相忱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

忱说他发现这两位老师与学校里别的老师完全不同：别的老师言谈行为随便，他们两位却恪守规章又待人恭敬得体；别的老师课下就是聚在一处吸烟聊天，他们两位却从不参与那些粗俗的闲谈，下课后就认真地备课；别的老师有时对学生急躁甚至粗暴，而他们两位却一向亲切和蔼；别的老师时常会发点牢骚，可他们两位却常常满有喜乐平安。年轻的相忱十分喜爱石老师和萧老师，他能感觉到这两位老师实在与别人不一样，但是又不明白为什么。其实相忱自己也知道，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对抗社会的潮流无异于以卵击石！那么，圣洁生活的出路到底何在呢？难道就只有这样绝望下去了吗？

相忱解决不了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人死了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呢？到底有没有鬼怪？有没有灵魂？人死以后难道真的就像世人所说的那样“与草木同朽”、“一了百了”了吗？

为了找寻存在心里的那份盼望，相忱深陷在迷惘中苦苦地挣扎。他曾经从传统的宗教入手，希望能在其中找到他所要的答案。在当时对社会有较深影响的有两大传统宗教，一是佛教，一是儒教。相忱以他单纯的眼光来分析和判断这两大宗教。在他看来，佛教固然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社会中间有着持续不断的影响，但“消极出世”的人生观与他光宗耀祖、振兴国家的“远大理想”根本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佛教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而儒教却只教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和“三纲五常”之类的事情，丝毫不提及“将来”和“死后”的事情，这也不能解决他对人死后将何去何从的困惑。他不停地找寻，失望，再找寻……他对面前任何新鲜的观点理论都感兴趣，但任何这些观点理论又都不能使他得到完全真正的满足，他还在不停地再找寻……

最后，相忱又把目光重新转向就在身边的基督教信仰。经过教会学校几年的耳濡目染，尤其是萧、石两位老师的引导，相忱对于圣经和基督教的教义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在伦理方面是无比的，是个很不错的人生哲学，但他却仍然坚持那是个“洋教”，是中国人不能信的！后来，相忱在反省他当时那段的光景时说：最根本的原因



是他还不相信神的存在，因为他一直顽固地认为，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没有。“如果真的有神就叫我肚子疼吧！”这个无知的孩子继续在用他的顽梗来挑战神的存在，当然神也始终在用他完全的怜悯来宽容人的过犯，没有真的叫他肚子疼，这反倒使年轻的相忱由此愈发自鸣得意地认为：“你看，我没有肚子疼啊，所以根本没有神！”

转了一圈，相忱依旧没有找到他要找寻的答案，他依旧彷徨在极度的痛苦和烦恼之中，心灵的空虚使他生活在一种看不见却可以摸得到的黑暗之中……他苦苦地寻觅，却拒绝接受神一再向他发出的呼召；自己明明是饥渴难耐，却不肯就近面前的生命之水；他知道自己需要信仰，却不相信独一的真神！

然而，“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 5：4）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屋外寒风凛冽，屋子里相忱正一个人坐在灯下做作业，煤油灯昏黄摇曳的光亮把他清瘦的身影投在墙壁上，勾勒出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大约九点半钟，相忱完成了功课，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忽然，心中一阵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动，一个意念清晰地显明在了他的心中——真的有神！虽然说不清它的来处，这个意念却是如此的真实而强烈，不是生理学和心理学可以解释的。

从前，他不肯相信神的真实存在，但是现在神已经真实地存在于他的心里，顷刻间就使他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相忱立刻拧熄煤油灯，起身跪在地下向神祷告：“神啊！求你赦免我！我现在知道你真的存在，我愿意接受你为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他承认自己真是个罪人，因为他曾经悖逆这位掌管天地万有的创造之主，独一的真神；接着他又一项一项地向神承认自己所犯的罪：撒谎、偷东西、欺负人、虚伪、恨人、自私、嫉妒、骄傲、思想污秽等等。他久久地俯伏在神的脚前，切切地恳求神赦免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一切的不义和罪，使他从罪中得到自由和释放。

祷告过后，感恩的泪水从眼角涌出，心里长久压抑的重担终于随着

泪水一齐解脱，那颗一度陷入迷惘惶恐的心也得以进入永恒的安息之所。他相信自己已经完全归入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新生命，不再死亡。当他从地上站立起来，重新捻亮煤油灯的时候，好象整个世界都变得光明了！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相忱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属于自己新生命开端的日子——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后他常对信徒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生过两次的人，一次是从肉身生的，一次是从神生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两个生日，都应当好好记住。”可相忱一向不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连他自己肉身的生日也记不清了，只依稀记得是在农历的六月。后来在登记户口的时候，为了方便记忆，就干脆把自己的出生日期写成了六月六日。所以他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肉身生日的人，但他一辈子却牢牢记住了自己从神重生的日子。

在受洗这个问题上，相忱也经历了不少波折。原来在一九三一年末，相忱照例参加了青年会学校每年一度的圣诞节公宴，这是一个任何学生都可以自由参加的晚会，也说不上与信仰有什么关系。吃过饭后，大家也像往常一样举着蜡烛唱了几首圣歌，这时有一位来自公理会名叫王梓仲的牧师来到大家面前，逐一地给各人施点水洗礼，这位王牧师并没有询问在场的人：“谁愿意受洗？”而是直接就为人施洗。相忱当时也受了洗，但他并没有真心相信。

相忱重生以后在真理上非常追求，除了坚持每星期三去王明道先生那里聚会听道，自己也用心查考圣经，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向石天民老师请教。渐渐地，相忱明白了“受洗”的真正含义：“受洗”就是表示“老我”的生命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代之而活的是耶稣宝血换来的新生命。他回想起一九三一年圣诞节公宴上的那次受洗，认识到那不是真正的受洗，因为他那时还没有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更不明白受洗的真正含义，并且按照圣经里的教训，应该是浸洗，点水洗是不合适的，所以他就向石老师提出了重新受洗的想法。石老师听相忱这样说非常高兴，又向相忱讲述了当年王明道先生是如何为了受浸的缘故而被学校革

除教职，石老师本人也是如何为此自动退学。石老师进一步给相忱讲解了有关受洗的意义，确认他已经真正明白神的救恩，就请王明道先生为相忱重新施洗。一九三三年八月，王明道先生在北平西郊万寿山后的青龙桥，为包括相忱在内的十余人施洗，其中有后来成为宽街堂长老的孟向召弟兄。这是王先生第二次为人施洗，当时拍摄的照片有幸保存下来，相忱就站立在王先生身旁，照片上写着：“一九三三年八月，第二批。”王明道先生对要求受洗的人都要进行认真严格的考察，凡要求受洗的都要多次面谈，并且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考验，个人没有清楚得救的根本不予受洗。王先生对圣工的严谨态度，给相忱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就是从受洗这件事当中，相忱开始深入地反思基督教青年会的信仰问题。他逐渐看到，基督教青年会在信仰上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严格地说，基督教青年会不是一个教会，只能算是一种社会团体；在青年会下属的学校中，不讲耶稣基督，不讲十字架的救恩，只有“服务同胞”，“改良社会”，以“慈爱、博爱、牺牲的精神”来服务大众。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来自圣经中的一句话：“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这句经文在马太福音 20：28 以及马可福音 10：45 当中，都有下面的半句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这才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最重要的意义。基督教青年会虽然在正式的名称中冠以“基督教”的字样，但实质上属于“社会福音派”的信仰，就是强调以他们的“社会服务”来取代了悔改赦罪的福音真理。

### 三

自从信主以后，无论学习多么紧张都没有使相忱稍稍放松对真理的火热追求，他热心地参加聚会，向身边的人传福音。重生得救的第二天，相忱在学校里忍不住逢人就讲耶稣在他身上施行的奇异救恩，告诉同学们，唯有信靠耶稣才能得着永远的生命，尽管有些同学嘲笑他是在“痴人说梦”，他也毫不在意。

饱尝过了初信的满足和喜乐，相忱进到了更深的思考和内心的争战之中。他经常在心里默默地反问自己：“袁相忱，你已经归属耶稣了，但为什么你活不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呢？你的内心为什么还有爱慕虚荣、骄傲自大、嫉恨自私等等的不义呢？你为什么不能作一个完全圣洁无暇的人呢？”他反复地诵读罗马书 7 :18-24 的经文，使徒保罗在这里写道：“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體呢？”使徒保罗这段内心的独白，也正是相忱此时此刻最想要喊出来的话：“我真是苦啊！”但使徒保罗在争战的痛苦中，却坚定无比的宣告：“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可是相忱当时还不明白，他需要借着圣灵的大能才能胜过这一切。

大约是在一九三三年的冬天，也就是相忱受洗过了半年以后，山东灵恩会的武熙考牧师来到北平。由于怕有极端灵恩的因素在其中，所以当时北平的教会都不敢邀请他去讲道，只有基督教青年会下属英文夜校的崔校长愿意接待他，于是，武牧师就在崔校长的家中聚会讲道。因为相忱参加夜校的英文查经班，崔校长就特别邀请相忱来他家里参加聚会。相忱一共去过三次，前两次他看聚会的场面太混乱，信徒们有的哭，有的笑，有的说方言，有的大喊大叫，还有的唱灵歌……相忱只感觉到乱七八糟的，就没有什么好印象。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是上完了晚自习才过去，进门的时候聚会已经临近结束，大家正在祷告，相忱也就跪下祷告。这时，崔校长来到他的身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说：“赦免他的罪吧！”话音刚落，相忱就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他不住地哭着，泪水哗啦啦地流个不停，有生以来他就没有这么畅快地哭过，哭过之后接着又是开怀大笑，无法抑制地笑个不停，从崔校长家出来，他骑着自行车

走在大街上还在不住地笑着。相忱说：那一夜，他经历了得胜的释放，安然入睡，因为神已经擦干了他一切的眼泪。这是相忱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圣灵充满。

神的灵浇灌在相忱的身上，使他在圣灵的里面得到洁净，也得到力量。从此，这在圣灵的充满中被更新的生命就进入与神更加深刻，更加真实的联合。

经历过这次被圣灵充满之后，相忱更加渴慕神的话语。通过查考圣经，他在以弗所书 5 :17-18 看到“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相忱明白了，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引导，就必须先把“老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原先那个败坏的“老我”死了，圣灵的大能必定在新的生命中彰显出来；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必须要竭力追求被圣灵充满，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他也看到了，在初代教会的时期，使徒们是如何靠着圣灵的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见证和传扬十字架的福音。相忱那颗火热的心被圣灵感动了，他恒切地向神祷告祈求：“神啊！求你的灵不断地充满我！求你每天让我与你更亲近！让我依靠你的灵，过得胜的生活！”

相忱在他一生的事奉中，始终如一地持守“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神的灵。”他常说：“我们最缺少的是圣灵的恩赐，若用恩赐服事主，那果效就大了！所以，一方面要追求圣灵的充满，不断得到圣灵的恩赐；另外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把基督活出来，工作就更有力量！”

相忱自己注重追求被圣灵充满，在教会中也常常教导和鼓励信徒应当追求被圣灵充满，因此，从一九九〇年代起，有不少人传言相忱是属于灵恩派的，甚至更有某些灵恩派的人士公开将相忱引为同道。相忱听到后，说：“我没有派别。我也没说方言，我也没有认为不说方言不得救。”针对极端灵恩派在教会中所带来的误解和混乱，相忱曾在聚会中专门为信徒讲解过圣经中有关说方言的教训，他说圣经中的方言有三种，一是

使徒行传第二章，说的是别国的话，别人能听懂，用不着翻译；二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是圣灵的恩赐；三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是圣灵里的祷告，用灵歌唱。在聚会的时候，按圣经的教训，如果没有翻译就不要说方言，免得耽误时间；若有翻译，还可能对别人有些造就。普通聚会时，最好不要讲，应当自己在家讲。其实那是圣灵里的祷告。

相忱明确反对灵恩派的某些极端的教训，但却强调不能由此排斥圣灵的工作。他说：“我们在真理上平均发展，要平衡。我说过要追求圣灵充满，但不是指灵恩派的过激行为，而是要按圣经的教训，不走极端。”他也同意教会对极端灵恩派的许多过激言行的批评，同意批评那些过激言行是在挑动“肉体的活动”，表面上很热闹，内在的生命没有成长。在相忱看来，灵恩派也有长处，有能力。灵恩运动在教会历史上是有贡献的，但后来走偏了，偏在方言和医病上。

相忱相信重生和被圣灵充满是两个不同的工作，他引用自己被圣灵充满的见证，说：“我们需要圣灵。我十九岁就受了圣灵，要凭信心求。”被圣灵充满的感觉和表现也各不相同，有人笑，有人哭，有人觉得发烧，好像过电一样，有人拍手，有人跳起来，有人打滚。就他个人的见证来说，他相信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充满你一个“小人”，一定有特殊的表现，有动作，但是也有少数人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相忱常常提醒信徒，说：“被圣灵充满就好像重生一样，不要追求‘感觉’，而要凭信心接受。基督徒应当在真理和知识上多多追求，不应过分注重追求外面的事情。”

因为有些人批评他曾在白塔寺的家里接待过挪威灵恩派教会这件事，相忱坦然直言：“我这里的门是敞开的！只要你相信《使徒信经》就可以来。但来访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我的观点。”其实，与灵恩派的往来也不仅有这一次。一九八〇年代，曾有香港灵恩派教会的传道人来北京，专门邀请相忱和我到他们住的酒店，为我们两人按手祷告了很长时间，结果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既没有说方言，更没有倒在地上。在回来的路上，相忱对我说：“圣灵的恩赐，是神随己意分赐给各人的；不是通过人的按手就可以得到的。”那次我们谁也没有说方言。在我和相忱

六十六年的共同事奉中，我也从来没有见相忱说过方言。另外一次是有人介绍一位来自北美的华裔传道人来自塔寺教会，在主日聚会上她从信徒中间找出六位弟兄，其中还有我们的大儿子福音，接手要教他们说方言，结果当然是福音他们几个人谁也没有说出一句方言，最后不得不尴尬地草草收场。相忱当场没有说什么，会后对我们说：“方言是圣灵的恩赐，怎么是人可以教授的？”而且明确说下次不再请她来教会了。虽然以后这位传道人还经常在国内的教会活动，但我们和她之间再没有来往了。

面对那些在极端灵恩派在教会和信徒中造成的困惑，相忱本着圣经的正意告诫大家，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怕灵恩派的极端，就不去追求被圣灵充满。应当被圣灵充满，应当有恩赐。我们应当高举生命的成熟，内心的洁净，工作的能力。”

## 四

叶婶是我们住的这个院里的老房客，和相忱一家也是多年的老邻居。有一天我去看她炒菜的时候，叶婶忽然压低声音对我说：“自打你进这个家门，他的日子可好过多了！你可替他赎罪了！”她这话让我一下子摸不着头脑，就问她是怎么一回事，叶婶才给我讲起了相忱以前在家里时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她亲眼看见的。

叶婶说从前相忱每天早晨起来先要把煤球炉子笼着了，为还没起床的父母烧好开水，自己凑合热一口头天晚上的剩饭当早点就赶去上学了；中午和晚上放学回来的时候，家里人从来不等他吃饭，他下课回来只能吃些剩的，有时他母亲故意连这点残羹剩饭也不给他留，有好几年他都是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对付过来的。相忱的父亲当时还在真光电影院做事，等十一点多的夜场电影散了才下班，他常年习惯下班后去酒馆吃宵夜，每天回家都要在十二点以后，相忱每天夜里都要给他开门。无论冬夏，无论风雨，父亲在大门口一拉风铃，相忱必须马上从被窝里爬起来跑到外院去开门，倘若这时酒已半酣的父亲认定儿子开门太慢了，当场就会在院子里对着他劈头盖脸地一顿斥骂：“养你一点用都没有，养条狗

还能看门呢！你连狗都不如！叫你开门都开不好，你还能干什么！”叶婶边模仿着公公当时的样子，边告诉我：“对他儿子可真是凶呢，跟个老虎似的，瞪着眼睛。”她还说那几年她都不见家里给相忱添置过什么衣服，他都是穿旧的，旧衣服破了也是他自己动手缝补，到了冬天上身穿件缀了补丁的旧棉袍，脚下却没有棉鞋而还穿着一双单薄的旧球鞋。说到这些，叶婶也叹口气，说：“这孩子受的是什么罪呀！上面过冬，底下过夏！”

叶婶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她所讲的这些事情以前无论是相忱本人还是其他人没有向我说起过。我问叶婶：“您说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叶婶说：“就是他信耶稣以后的事啊！他刚信那会家里为了这个天天和他吵，也没少挨家里的骂，他都是忍着。后来他家里都冷淡他，他爸妈都不理他，当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一直到你进这个家他才好过了。”

从叶婶那边回来，我还在反复不住地思想她刚才讲的话，这是真的吗？怎么相忱以前从来没有向我说起过呢？等到晚上相忱回来，趁着屋里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我就把白天叶婶所说的事情问相忱，他听到我的话先是一怔，抬头望着我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今天街坊说的。”相忱只轻轻“哦”了一声，就转回头不说话了，我继续追问他：“是不是这样的？”他也只是稍微点点头，同样轻轻地说一声：“是。”就又不说话了。虽然很多年以前，婆婆来天津我家里作客时，我就听见她讲起过她是怎样极力反对儿子信那个“耶稣洋教”的话，在天津圣会所也亲眼见到相忱身上那些缀着补丁的破旧衣服，但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相忱为了信仰曾经在家里遭受过许多的苦待。我很想知道当初的具体情形，可相忱却一句也不愿意多讲。好在院子里的街坊们都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就有意地去询问她们，于是叶婶她们几位就把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再把所听来的去求证于相忱，他才约略地讲上几句。慢慢地，我终于搞清了一切事情的原委。

一九三二年，罗公、罗婆就是相忱的外公外婆，同相忱的母亲一起从天津迁居北平，一家人重新团聚在一处。外公、外婆年纪大了，身体又都不好；父亲忙于电影院的工作，早出晚归；母亲也是终日念佛，打



麻将，说闲话。这时的相忱已经十八岁了，还没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正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家人们虽然一如既往地疼爱相忱，却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忧郁沉默的年轻人存在心灵里的迷惘……

因为我们两家原本是世交，袁家的事情我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已经听到不少，就问相忱是何时因为信仰的缘故开始与家里发生冲突的。相忱说他信主以后就向外公、外婆和父母传福音，可他们不仅不肯相信，甚至连倾听他说话的耐心都没有。外婆还教训相忱说：“你是年幼无知，上了外国人的当啦！你以后清醒过来会后悔的！”因为父母和相忱之间早已长年缺乏沟通，对于相忱的信仰的真实状况根本无从了解，在他们自己看来相忱的信仰不过只是小孩子的一时性起而已，所以这时父母虽然知道相忱信了耶稣，却并没有干涉他，以为等他的这股新鲜劲儿过去了，自然就会放弃不信了。直到又过了一年多之后，相忱从即将毕业的青年会财商学校退学，要为主奉献传福音的时候，终于和家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也是从那时起到我们结婚，相忱一直都在忍受家里苦待。

原来在一九三三年的秋天，也就是由王明道先生重新为他施洗后不久，已经初中毕业的相忱顺利地升入同是青年会下属的一所财政商业专门学校。这所简称“财商”的学校在当时的办学条件可算是相当不错的，所开设的也都是簿记、财会、打字等等这类热门的专业。在三十年代，年轻人只要学会上边这几样技能，就不愁在银行、洋行里谋到个很体面的差事，可以过上一种人人羡慕的日子。并且，“财商”还允许对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暂不收学费，可等学生毕业工作后再分期偿还。

“财商”里有一个英文查经班，带领人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宣教士——被称为高顿太太的高爱璧女士(Ms. A. S. Gordan)，当时她在西城的青年会和东城的“财商”专校以及在她自己的家里共开有三个查经班，专门利用练习英语会话来向青年学生传福音。相忱参加了学校的查经班，并且很快就因为出色的英语和传福音的火热而得到高顿太太的器重，成为她在查经班里的助手和翻译。相忱常把慕道的同学带到高顿太太位于南池子灯笼库八十二号的家里去查经。也是在这时，相忱在查经班里结识了

几位同样立志为了兴旺主的福音奉献自己的同学——王堪、陈业和宋士文，这些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很快成为在福音里志同道合的兄弟。

正是在“财商”上学的第一年中，相忱领受了他平生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生命有了真实的成长和更新。也正是在这时，神的呼召临到了他。

原来在相忱初尝福音的甘甜之时，就迫切地想要向周围每个人分享这个好消息。在学校，即使遭遇到很多同学的冷嘲热讽，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传福音的热忱；在家里，父母他们的拒绝不仅没有使他灰心丧气，反而使他在传福音的事上愈加殷勤。谁也没有料到，神使他结出的第一个福音的果子竟然就在他的家里。有一位他母亲的牌友，人称“祥婶”，是位旗人，五十多岁，几乎天天来袁家和相忱的母亲打麻将，她听了相忱传给她的福音就认罪悔改了，以后热心聚会，远离恶事，也向别人传福音；再后来，她自己家里也有了聚会。我们在河北成安县服事的时候，祥婶还在那里和我们同工了半年之久。相忱家的邻居当中，还有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也从他接受了福音，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为医生。

相忱最早开始为主传福音的时候，所凭的只是他里面那颗单纯的热心，他牢牢地记着使徒保罗从主领受了传福音的托付后所说的那句话：“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林前 9：16b）还有使徒保罗即将被浇奠离世之前，给在他以后的传道人留下的嘱咐：“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提后 4：2）到了一九三四年的夏天，相忱在从神而来的异象当中清楚地听到了神给他的呼召，那就是神使他看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正有那么多人因为没有相信福音，正在走向死亡的路上。神呼召相忱起来领受他的使命，出去向他的同胞传讲来自神的福音，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相忱对我说：这个呼召并不是借着一节经文或在某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向他显明的，而是借着圣灵的感动从他心底迸发起一簇福音的火花，在他的身上点燃起一股热火，越烧越热，这热火成为相忱向着神完全奉献自己和传福音的动力。他一生的事奉当中，纵然遭遇过各样数不清的坎坷，但他心里的这份为主传福音的火热却是始终旺盛。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哥

林多前书 9：16a)

他的心迫不及待地要回应神的呼召，去为神拯救那些正在失丧中的灵魂。为此，他不想继续在“财商”的学习了，他要趁着年轻，去为神传福音。可一想到父母，相忱又不由得踌躇起来，他当然知道父母在他这个独生儿子身上所寄托的希望，他们期盼他将来即便没有高官厚禄，也总得有一份像样的工作，吃穿无忧，可以如他们所心愿的那样承担起家庭的生活，指望着他将来“养儿防老”，作为他们后半生的依靠。他也知道，他还有一年多就可以从“财商”毕业了，拿到毕业证再加上他在英语上的出色才能，他满可以顺利地找到一份令世人所羡慕的工作，然后就是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过上自己的安稳日子。相忱知道这就是父母为他精心选定的“理想的道路”，所以好几次他都鼓足了勇气，可话到了嘴边却终于没敢说出来，因为相忱当然知道他这样的想法一旦真的说出来，会引起父母怎样的反应。一方面，他固然仍是惧怕那不可避免的冲突，但其实他更为惧怕的却是自己在这样冲突的重压下不能坚持到底，最后会因着软弱而放弃。好在父母一直忙着打牌、聊天和拜佛念经，全然没有发现相忱已经许多次在他们身边欲言又止，更不可能察觉到相忱外表的沉默和内心深处的挣扎。

“可我又该怎么回应神的呼召呢？”相忱在这样深深的挣扎中不住地盘问自己，“难道可以对神的呼召充耳不闻吗？不！不能！”他在祷告中切切地向神祈求，求神赐给他信心和勇气，帮助他胜过捆绑着自己的那些软弱，让他能够刚强起来，顺服永生神的呼召。在这个暑假几乎整整的两个月当中，相忱始终处在顺服神的呼召与顺服父母的争战之间，神也亲自借着圣灵的感动，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光照这颗孩子般稚嫩的心灵。这期间，相忱在灵修中查考了马太福音 10：37 节和路加福音 14：26 节，他看到在这里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神的话语开始光照他，他在心里问自己：“袁相忱，主的这句话就是对着你说的！你是否爱主胜

过爱父母？是否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否愿意为主走这条无名无利、甚至无人理解的窄路？袁相忱啊，你不是要作主的门徒吗？这就是作门徒的代价！主已经在他的话语中告诉你该怎么做了，现在该你向主交答卷了！你是否愿意真实地为主付上这个代价呢？”为了完全除去自己心中最后的一点点疑惑，相忱还在祷告中祈求神再赐给他一个确据——如果这是神的心意，就让他和在萧老师、石老师交通这件事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两位的支持。于是相忱就马上去找两位老师，他们听了他的话都非常热情地支持他，相忱因此大得鼓舞。

相忱告诉我，是神的话语大大地坚固了他的信心。他说，在下个学期快要开学前的一天，全家人吃过晚饭后，他终于开口对父母说：“我不愿意再读书了。我信了耶稣，我要去传福音，好使别人也能相信耶稣，得着永生的福分。”

讲到这里，相忱就停住不往下说了。其实就算他不说我也能想象得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而且我已经从邻居们的讲述中得知了这些事情的大致情形，但我还是期待着听到相忱亲口讲述的见证。在我的继续追问下，相忱停了一阵子才接着说：听到他的话，父母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好像看见了一个奇怪的陌生人一样。相忱又一次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心意，这一次，终于回过味儿来的父母回答他的是一连串的严厉喝斥。相忱却平静而坚决地说：

“我决心已定。不要再为我缴下学期的学费了，就是缴了我也不会再去念书了。”

父亲说：“你是不是头脑发昏了！不好好学习，跑去信什么‘洋教’！那‘洋教’能当饭吃吗！以后不许你再讲这些，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去上学，毕业后找个工作，安心心地去做事！”

相忱平静地说：“我不能够再学习了。耶稣让我看到人的灵魂是多么的宝贵……”

父亲恼火地打断他，说：“人有灵魂吗？你能看见吗？到底有没有耶稣这个人啊？即使有的话，他又什么时候叫你不读书了！”

相忱回答父亲，说：“上帝叫我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他所喜悦的，也是我这个信耶稣的人理所当然该做的。”

父亲勃然大怒：“我养了你十几年，你还没有把什么献给我呢！”说着就一抬手掀翻了前面的桌子，大骂他是没出息的忤逆子。相忱一句话也不多说，只是退回到自己住的小东屋，安心地读经祷告。

父母看来是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搞乱了手脚，眼见头一天那些硬的不能震住相忱，第二天，可能是经过了商量就改换了另一种方式。首先是让相忱的外公、外婆出面来劝说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二老一向最为疼爱相忱，而且相忱与两位老人的关系确实也更为亲近，他们寄希望于通过这样充满亲情的劝说，可以打动相忱回心转意。外公问相忱：“你年纪轻轻就不上学了，将来干什么呀？”

相忱说：“传福音。”

外婆说他：“传福音也不能当饭吃啊！你总得考虑考虑今后的生活吧！”

相忱说：“我相信主会预备一切。”

两位老人家显然不明白相忱的心思，只能满面流泪，苦口婆心地反复劝说了大半天，相忱却不再与他们过多的辩驳，唯有待到他们翻来覆去地把该说的话都说过了，才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们：“我已经考虑过了，我不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的。”

之后又是母亲的劝说，内容当然都是大同小异，无非是说：作一个传道人没有出息，又没有钱，将来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你现在都二十岁了，找不到个好工作，总不能让父母养活一辈子吧。相忱还是沉默着。最后，无奈的父母竟别出心裁地要给相忱说一门亲事，希冀以此来绑住相忱，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他回心转意，就不会再一门心思地信耶稣，不会再成天只惦记着跑出去传福音。相忱讲到这里，我回想起我们在天津订婚的那时候，相忱就用轻松的语气对我提到过这事，他说：“当初我爸爸妈妈要给我说媳妇。我跟他们说：‘你们要给我说个媳妇，我就跑啦！’他们真给我说，我就跑。”家里人生怕他真的跑了，就没敢在这件婚事上更多地催逼他。

我听说相忱的父亲甚至曾经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说劝说他回心转意，就问相忱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事情，相忱说确实有这样的一次。那是在全家人的轮番劝说都不能奏效之后，仍不肯甘心的父亲还寄希望于最后的努力，从来都是强硬而又威严的父亲这次是破天荒地换上了近乎哀求的口气对儿子说：“圣经上的‘十诫’不是叫人孝顺父母吗？听父母的话就是孝顺父母，你就听我们这一次吧！权当是照着圣经的话来孝顺我们吧！”父亲一贯对相忱极为严厉，这是相忱平生第一次遇见父亲在用这种不寻常的口气说话，以致他的心一瞬间都有点摇动了，但他继续用沉默来回答父亲。

父母和全家人已经对这个被“洋教”迷昏了头的，且又胸无大志的孩子不再抱任何希望，转而开始用冷眼和苦待来惩治这个“不听话”的孩子。相忱说：恼羞成怒的父亲甚至为他分配了两项“特别的差事”，来作为对他的加重处罚，第一是每天要把家里用的三盏煤油灯的玻璃灯罩擦干净；第二就是叶婣曾向我提到过的，每天要为半夜回家的父亲开门。第一件事对于相忱并不算难，他每天都会认认真真的把那三个灯罩的里里外外，都仔仔细细地擦得干干净净，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擦得倍儿亮”，这样的“差事”不仅丝毫没有让他感到“苦”，反到让他很为自己的成果感到一些“得意”。可第二件任务就不那么轻松了，为了能从夜半时的熟睡里及时地醒来去给父亲开门，相忱不得不每天在晚上八点钟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但即使如此，也都难免有开门迟缓的时候。相忱对我说：每逢已经醉醺醺的父亲当场借故发泄对他的恼恨时，相忱都强忍着一声不吭，只默默地把泪水往肚子里咽。上面说的这两件“差事”前后持续了差不多有四年之久，相忱自始至终都在其上恪尽职守，一直到我们结婚以后才得以“自动免除”。

我想起叶婣对我说过，有一次相忱带着被子好像是要出门的样子，可被他母亲追上去硬是又把被子夺了回来，就问他这事又是为了什么。相忱回答说：那是他在远东圣书学院的第一个寒假，他和查经班的同学王堪相约一同去绥远平地泉（今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向那里信乐会的美国人康教士学习布道。当他扛着收拾好的行李走出家门的当口，母亲

从后面赶上来，一直追到院门外的胡同里截住他，问：“你干什么去？”相忱照实回答：“我去绥远学习。”母亲冷冷地说：“不行！别拿被子，不给你！”说着一把夺下相忱手里的被子卷，扭头回去了。我问他：“那你怎么办呀？”相忱说：“没有被子我也要去，就是凭着信心！后来是和王堪弟兄挤着盖他带去的那条被子。可……”说到这里，相忱的声音低沉下来，“可……走出胡同口，一拐弯，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知道绥远位于塞上高原，那里的风一年四季都是寒冷的，但这时真正令相忱感受到刺痛的却是更加寒冷的人心。那几年，父母都是故意的不给相忱添置衣服，衣服破了，都是相忱自己缝补；即使有什么缺乏，他也都是尽力地将就着，从不向家里提任何要求，以免刺激他们给自己招来更大的困难。对此相忱说：“我不向他们要，因为一要反倒更激起他们生气，就更会怪我不读书，不为他们挣钱了。”听到他这些话，不由使我眼前又出现了结婚前我在天津见过的那件里外都打着补丁的破棉袄，就问相忱是不是有叶婶所说的“上面过冬，底下过夏”的情形，相忱简单地回答说：“是那样。”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可听到这话时还是让我从心里为相忱心疼不已，问他：“那你冷不冷啊？”相忱还是简单地回答：“冷就跺跺脚。”

无论是苦苦的劝说，抑或是严厉的惩罚都不能使相忱回头，家里人一致认为这个不可理喻的孩子看来的确是无可救药了。于是，在相忱信主以后的第二年，已经对他彻底绝望了的父母又从孤儿院里领养了一个小女孩，作为他们的养女。相忱的母亲很刻意地逢人就说：“我生这个儿子一点用都没有，就算是白养了！现在我要把这个女儿养大，将来让她嫁给督军，好为我们养老送终！”

这些事情在邻居们讲给我之前，相忱几乎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即使在后来我问他的时候，他也只有简单地说上三言两语。看来他真的是有意谦卑自己，并不把曾经为主所忍受过的苦待看作自己的一份“功劳”，随口向人传扬。还有，相忱在父母面前一贯顺服恭敬，从没见他在家与谁发生过顶嘴、争吵的事；背后也从来没有计较过谁，更不要说抱怨、记恨了，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中间一点也看不出前不久那些冲突的痕

迹。每天从神学院下班回到家里，相忱都必定先到母亲住的北房间安，说上一句“妈，我回来了。”每个月开支以后，也要首先把薪水的一部分亲手送交给母亲，其余的才交给我作为家中日常的用度。虽然父母和家人这时都还在极力地抵挡福音，过去又曾经因为福音的缘故那样的苦待于他，但相忱在家中所行的却是完全地遵行神的教训，尽心尽意地尊敬父母，从这事上，我观察相忱真是把神放在了他的心里。

相忱真是把神高举在他自己的心里，把他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甘心情愿地奉献给主。从他最初顺服神的呼召，从“财商”退学立定心志要为主传道，就是立定心志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直到他回天家都没有改变过，他七十年的事奉始终都是走在这条“窄路”上。从最早为主缘故遭受家人的厌弃开始，在以后的岁月中，无论生活多么艰难，环境多么险恶，他都从来没有冷淡过；即使到了连生的希望都濒临断绝的时刻，他仍是在信心中仰望那位用生命的恩典呼召他的主。

## 五

相忱这时服事的这所由美国远东宣教会开办的圣书学院，也正是他自己几年前曾经就读过的学校。

那还是在一九三四年的夏天，相忱凭着神加给他的信心从“财商”退学以后，最初，相忱虽然立定心志一辈子奉献自己，为主传福音，也清楚自己最迫切需要的是在神的话语中建立和装备自己，可他根本还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这样的学习，也不知道今后神将要如何引领他。相忱说：“我只是借着祷告，把自己前面的道路完全向神交托，完全求神来掌管。”

神并没有让寻求他的孩子等待得太久，很快就为相忱打开了通路。

当时，由来自美国芝加哥的考门牧师（Rev. E. Charles Cowman）和他的助手吉宝仑牧师（Rev. E. Nest Killomne）创建的远东宣教会，一九二五年首先在中国上海开办了第一所远东圣书学院。五年以后，又相继在广州和北平开设了同样的学校。这是一所致力于培养中国传道人的神



学院，报考条件要求是初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要清楚神的呼召，年龄在二十二岁以上。可是相忱当时只有二十岁，他去报名的时候，老师很是遗憾的告诉他，因为他不足报考要求的年龄，所以按规定学校不能正式地录取他；倘若他真想学习，只能作为旁听生入学，这样就意味着：同样的完成四年学习之后，相忱不能像正式的学生那样取得这里的毕业证书。相忱却没有在意这些，他想的是：“做神的工作，有没有神学毕业证是无所谓的，关键是要有神的呼召。我有神的呼召，我来是为学习神的话语，有没有毕业证都无关紧要。”他就是这样单单地凭着神加给他的信心，开始了他的学习。远东圣书学院的学制共是四年，其中三年半为在校上课时间，另外的半年为实习；在这三年半的在校期间，也只有每天的上午是课堂学习，下午则是在教会的服事。学校规定，正式的学生全部可以住校，旁听生则要求走读；正式学生的学费及吃住全免，而旁听生只有免除学费，吃住都要自理，还要另外负担每个学期几元钱的讲义费。相忱告诉我，这点不大的小事又让他陷入了为难的境地，为着他退学作传道的事情，已经和家里闹得很僵了，现在自己还没有挣钱，吃住还要依靠父母养活，若是再向他们伸手要这点讲义费，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样，相忱还是凭着神加给他的信心，继续为这区区几元钱向神祷告，神果然为相忱预备了这笔费用，没有使他所拣选的孩子为此中断学业。同时，虽然相忱还在家里的苦待中过着穷苦的生活，神的恩典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赛 30：20）

相忱在远东圣书学院的这四年学习中，神不仅用他的话语装备他的仆人，更是用他的恩典和慈爱，一路呵护保守他的孩子。一九三六年的春天，远东宣教会创始人考门牧师的夫人，也是著名的《荒漠甘泉》的作者考门夫人来到北平的远东圣书学院视察。当她知道在校学生中有一位名叫袁相忱的旁听生，因为年龄不够，就宁可不要文凭也要来学习神的话语，就亲自来与相忱交通，鼓励相忱始终持守对神的忠心，还特地送他一本自己亲笔题词的英文版《荒漠甘泉》。

远东宣教会和所属的圣书学院着重宣讲四大教义：重生、成圣、神愈、再临，指人在重生得救以后，必须要追求圣洁得胜的生活，并相信在现代神依然在借着施行神迹来医治病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再临。其中，“神愈”的教义令相忱身有感受。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因为身体不好吃了那么多的苦药，结果身体还是那么的瘦弱多病，没有一点好转，这时他想：只要在信心中抓住神的应许，神必定因他的怜悯和大能来医治自己。从这时起，相忱就在信心中祷告：“主啊！我把我的身体交托给你，从今后我不愿再吃药，只愿你来医治我！”此后，一直到年老的时候，相忱都很少生病，偶尔生病他也大多不肯吃药，只是向着神祷告。我也亲眼见证神果真一次又一次地医治他那原本羸弱的身体，竟使他一生中极少因为身体的原因影响到他的事奉。同样在我偶染病痛时，他也来为我祷告，又鼓励我，说：“你也祷告吧。”

在远东圣书学院的学习，使相忱获得了扎实的圣经知识，尤其是《旧约》部分。相忱就是这样在神的话语上建立自己，他那时向神祷告：“神啊！愿你的话语直接供养我，让我的生命植根在你的话语上，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神学观点’上。”我听见他在以后的传道中，经常对信徒们说：“不要被这个‘观点’那个‘观点’搞昏了头！最重要的不是‘观点’，而是神的恩典！”

还在上学的时候，相忱就发挥自己在英文方面的特长，利用课余时间翻译司可福注释在圣经后面的关于个人布道的论述，出版了《个人布道手册》，还相继翻译了一些其他的属灵书籍和文章。相忱在英文上的恩赐也得到了圣书学院和吴智院长的关注，吴智院长非常欣赏相忱出色的英文翻译能力，更喜爱他在事奉上的吃苦奉献，所以才在相忱毕业后又亲笔写信把他从天津召回圣书学院，专门作自己的翻译。相忱也确实在事奉上很好地配合吴智院长。

回到北平以后，相忱和我除了偶尔去过王明道先生的会堂聚会听道以外，其余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远东宣教会参加主日礼拜。远东宣教会及远东圣书学院所在的地安门外东皇城根十四号，原是晚清政府要员载

泽的府邸。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远东宣教会最早的两位华人传道之一刘道光牧师奉派来北平，建立第一个远东宣教会中华圣洁教会，展开福音事工。一九三二年，远东宣教会购置了这座前清遗老的宅院，作为其华北区总会的永久会所，同年，由宣教会的另一位华人传道周维同牧师接替因急病归主的刘牧师，主持教会事务；随后不久，又在这里开办了圣书学院。

因为这座府邸的前主人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婿，所以院落的规模相当庞大，建筑也十分考究。我不仅经常随相忱在这里参加聚会，也曾和他一起受邀到吴智院长等家里做客，看见各处的曲径、回廊、画阁、假山、小桥流水……满有江南园林的风格韵味。这个宅院坐北朝南，从东向西，依次分为东院、中院和西院，在南侧有三个大门，平时出入使用正门，两旁侧门关闭；西院里有吴智院长和另一位美籍教师石理富牧师的住宅，除了他们两位以外，学院还有芮牧师、马牧师等五六位外籍教师，一道南北方向的墙壁把这边和其他的院落分隔开；往东依次是远东宣教会的文字宣传刊物《暗中之光》月刊的编辑部和出版部、售书室、圣书学院课堂、周维同牧师的住宅、礼拜堂和其他教师的住宅，最东面是饭堂、厨房、车库等。

听相忱说起：那还是他在校期间，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的午夜，由东院的电线短路引发一场意外的大火灾，虽然及时发现又经各方全力扑救，除西院的住宅以及《暗中之光》编辑部和南侧临街的一小部分房屋得以幸免之外，包括礼拜堂和圣书学院课堂在内的大部分建筑全被大火吞噬殆尽。当年九月份重建工作开始之时，教会和信徒像当年的以色列民那样，为重建神的殿堂甘心乐意地捐输奉献，圣诞节前夕，礼拜堂和课堂校舍就都建成完工了。我们在这里主日聚会所在的正是这间新建成的礼拜堂，新礼拜堂采用的是新式钢筋水泥架构，中西合璧的样式显示出高贵庄重的气势；教会专门从菲律宾采购热带木材，在堂内搭建了一座完全木质的带圆弧度的长方形讲坛，讲台中央也设有施洗池，平时不用时有木板盖起来，环绕讲坛前面的是祷告台；堂里的长靠背椅同样由采购自菲律宾的木材制成，可以容纳四百人聚会；堂里所有的木制品都只用清漆涂饰，以充分保

持木材原有的受造之美。讲坛的左右两侧平时分别作为圣书学院的男生教室和女生教室，各有一道可折叠推拉的木质门墙与主堂隔开，遇到有特殊的大型聚会时，将折叠的门墙打开使两侧的教室和主堂连成一体，即可另外再增加百余个座位。礼拜堂左侧是男宾接待室、书房以及南北方向的两排男生宿舍，礼拜堂右侧与左侧对称的则是女生宿舍等设施。听相忱介绍宿舍里都有卫生间、洗浴间和水暖设施等等，在当时的北平可算得上是相当不错的条件了。东院是重建的厨房和男女学生的饭厅，有两次主日聚会结束以后相忱带我到这里用餐，饭厅的秩序很好，大家都是排着队按顺序打饭，饭菜也不错，有土豆烧牛肉，还有外边罕见的大对虾，价钱也不贵。以后教会和学院不断扩大，在礼拜堂的后院又陆陆续续增建了几座二层楼房和平房，供中国教牧人员和他们的家庭居住。经历过那次火灾的教训，院里多处安装了新式的消防栓，相忱还特别把礼拜堂的大门指给我看，原来这几扇看似木质的宽敞的大门，实际竟是用钢铁铸造而成的，也同是为了应急疏散的缘故。

## 六

这时相忱在远东圣书学院虽然只有每个上午半天的翻译工作，但薪水却是每个课时五块美金，并且每月可以按时足额地领到，这对于日本占领下生活日益艰难的北平来说，简直就是常人难以奢望的“天堂”了。这笔收入除了完成我们两人在教会的奉献和负担全家人的日用开销之外，还能有多少不等的结余。

我们的生活上也确实比起在天津葛沽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善，添置了一些新的衣物用品。因为工作的需要，相忱开始常常穿西装打领带，我到这时才发现相忱原来很中意这一般装束的。到八十多岁的时候，相忱已经收藏了不少各式各样的领带，每天早晨他都要挑选一条，自己对着镜子仔细地打好，有时还要认真地上下左右端详上一阵。一次，我故意对又站在镜子面前的相忱说：“你是自我欣赏啊！”他竟像个得意的孩子似的，在镜子里点着头朝着我“呵呵”地笑起来。又有一次，我们的大

女儿安湖问她父亲为什么每天在家里也要穿西装打领带，相忱回答说：“人家尊敬我，我也要尊敬人家。这就是表示尊敬。”在他病重归主前最后一次去医院看病时，虽然年迈的身体正在被疾病折磨，出门之前相忱仍坚持自己打好领带。

因为我新到这个家的缘故，相忱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往那样的“剑拔弩张”。公公虽然天天还是半夜才回来，但我看他每次都是自己拿钥匙开门，和我们说话的语气也很平和自然。与最初的那段日子相比，婆婆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开始按广东的语言习惯客气地称呼我“家嫂”，对我说：“家嫂啊，你买菜不用管我们，你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吧！”一家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已经非常的融洽。再遇到相忱回来晚的时候，我都是从厨房把饭菜单独给他留出来，相忱边吃边深有感慨地说：“哎呀，真是感谢神！从前哪儿吃过什么菜呀！”看着他满意的表情，我心里也是同样的满足。我想这样的事情婆婆当然都是知道的，但却没有再过问。

这时家里常有主内的弟兄来和相忱交通，有时还会借住上几天。婆婆一旦看见相忱陪人进来，无论正在做什么都要赶快扭身躲避到自己的屋里，只要客人还在的时候她都不会出来，更不会和人家搭上半句话。来的人里面最多的是相忱的同学，其中就有陈业，他原和相忱同在高顿太太的英文查经班里，也曾到绥远平地泉的教会学习布道；一九三六年，陈业和王堪、宋士文共同组织起“中华西北布道团”从北平启程赴大西北传道；可是在“七七事变”后，他独自一人中途折回北平，没过多久就跟随因病回国的高顿太太去了美国，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大洋两岸之间有来有往。相忱和我回北平以后，他再回国的时候就都是住在我们家里。初见陈业时，我发现他是一个很追求“洋派”的青年，生活中各样细节都十足地模仿着外国人的派头，就连喝水都要喝商店买来的瓶装矿泉水；除此以外，从外表到谈吐上和相忱也没什么差别，只是陈业的身上透着一股常人没有的伶俐，跟他在一起，相忱就显得太木讷了。陈业在年龄上比相忱略小，所以他很客气地称我“大嫂”，住在家里时也常和相忱热

络地攀谈，可我听他虽然偶尔也谈一点与福音有关的话题，但更多的都是些闲话，我也看不出他来往之间正在从事的是哪样的事工，只是觉得他身边好像总带着一些贵重而神秘的东西。

一切都在平安稳妥之中，然而连我也并没有察觉到，正处在平安生活中的相忱心里早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不平安。直到有一天，相忱很严肃地对我道出他的心声：“神呼召我，是去农村传福音！”他说：“我们虽然在城里头，作翻译，还挣钱，生活挺好的。可是我不能享福，我要去完成神对我的托付，就是在农村传福音，不是在城里享福。”我这时才第一次知道他早有这个心愿。其实，相忱重回远东圣书学院是出于吴智院长的邀请，而非出于他自己的要求；作翻译这个事工，正可以运用他在英语上的恩赐，的确也是有果效的。所以，倘若是寻求满足人的心意，这样的事奉和生活本是无可指摘的，不会让人的心里产生出不平安；唯独凡事寻求满足神的心意，把神的呼召当作自己事奉和生活的目标，才会在“平安”的生活中察觉出自己的不平安。我为了相忱向主感恩，因着他真是尽心、尽力、尽意地爱主，我既然在主里和他一同领受了生命之恩，就理当支持相忱的事奉，或处富足，或处穷乏，我相信只要有主就有了一切！于是，我们一起跪下，同心合意地在神面前祷告。相忱恳切地祷告：“神啊！我不能贪图世上的享受，就淡忘了你给我的呼召！你召我本是为了拯救农村的同胞，可是我目前这么优越的生活，这么舒适的环境，与农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我读神学也是为了更好地去农村传福音，可是我现在却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中，越来越远离神的呼召！神啊，如果你让我去农村，就求你来引导我，我愿意完全顺服你的呼召！”我也祷告，求神为我们打开去农村服事的道路。我们在迫切的祷告中，期待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他至高的心意。

既有了神的呼召作为我们的目标，眼下的这些事就不过都是暂时的。无论从天津回来，还是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福音，我们仍是住着那间狭小的东屋，所添的也只有新从北屋搬来一张镶大理石面的写字台，算是我们的“奢侈品”吧！还有结婚时家里给我陪送的嫁妆，其中有四个大衣

箱里面分别是四季的衣服，可我们从葛洁回来却发现一件也没有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我们不在的时候，被一位在我们屋里借住过的亲戚偷拿去变卖了。虽然家里人都感到挺对不住我，婆婆一再向我道歉还说要赔给我，我反倒谢绝了，我想：我们既是没有打算在城里长住，又何必在意这些呢！反正在农村也用不上！

一九三九年底，我因临近产期住进北平著名的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是教会开办的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大多都是基督徒，但在此就医的病人中有很多是不信主的。所以，每天清晨开始工作之前，十多位医生、护士必定先要整齐地集合在病房里，齐声唱诗祷告，然后才分别到各个病床前为病人诊疗。在每位病人的床前，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地为他们诵读圣经，用神的话语安慰患病的人。我记得他们最常诵读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医院的各样设备和生活条件更是远远高于当时北平一般的医院，病房干净整洁，正餐的规格是“四菜一汤”，品种丰富，可用餐者自由选择搭配。这就是那个已经被现代人淡忘了的“老协和”，那个时代的“协和”的医生们不仅医术精湛，在他们身上真实地彰显着从神而来的仁爱之心；不仅可以医治人身体上的疾病，更可以使病痛的心灵得到安慰。彼时的和谐，在现今的医院当中早已不复存在，如此足以见证在生活的一切事上若不是存着荣耀神的心，人手所做的就不会有真实的果效。

有一位护士长林小姐到我身边查床时发现了我枕头边的圣经，就很高兴地说：“原来你是信主的啊！”后来她又听说相枕是传道人就愈加惊喜不已。到了缴医疗费的时候，林小姐问我：“你现在身上带了多少钱？”我告诉她我身上现有十二元钱，只是我在这里日常的用度，其他的医疗费用家里已经预先准备好了，我会要相枕下次带过来。可林小姐并不要我多解释，用很认真的口气对我说：“你把身上的十二元钱给我吧，我们只收你这么多就好了。”这可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啊！神的恩典如此丰盛，远远超过人的所思所想！在我不曾向他开口祈求之前，他就已为我成就

了一切！

蒙神恩典的保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我在协和医院顺利产下一个男婴。全家上下为了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兴奋非常，当然最高兴的莫过于公公袁禹庭，他期待相忱和我将来一共会生育五子三女，还费尽心思地把五个孙子的名字全都安排妥了，就是“音声乐庆荣”，这些字眼在中国传统中包涵着吉祥的意义，公公盼望从此袁家子孙满堂，家道兴盛。可相忱心里却另有一番想法，他在孩子的名字前面很恰当地加入了一个“福”字，这个孩子的名字就成为“福音”，以后两个男孩的名字按着顺序是“福声”、“福乐”，在此相忱所表明的是他为主奉献的心志，就是把自己和家庭都完全奉献给神。

自从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福音以后，全家人的生活更加融洽。公公更是如获至宝，下班回来经常带些可口的点心给我，每次都把点心放在屋子外边的窗台上，敲敲玻璃叫我自己出来拿；每次我自己只留下三两块，其余大部分都让相忱送回到北屋。更加欣慰的是我们为家人的祷告也初显功效，外婆和公公开始愿意倾听我向他们讲论的福音，也开始阅读我给他们的圣经；并且在相忱和我的耐心劝说下，外婆向我表示她再不拜偶像了，她对我说：“我也知道拜这个没用，我不拜了！”家里就只剩下婆婆一个人还在行拜偶像的事，继续顽固地抵挡福音。凡是拜偶像的人必定是要被偶像捆绑的，在生活中也必定是要表现出各样不合理的事。那还是我带着福音刚从医院回家，婆婆为了避讳所谓的“血光之灾”，所以百日之内说什么也不肯进产房的房间，一天夜里，福音这孩子忽然啼哭不止，下班回来的公公正好听见，就说要婆婆过来帮我看看孩子是怎么回事。我在自己的屋里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听见他们两个人在北屋里为这事大声争吵起来，可无论公公好说歹说，又讲明我并不是在家里生产的，婆婆还是不肯过来，直到最后公公终于生气地命令必须过来，婆婆才从北屋那边出来，不过她只走到东屋的门口，站在那里冲着里面问我：“孩子怎么了？”听我大致说了状况，仍是站在门外对我说：“你拿舌头探探孩子的舌头，看凉不凉，凉了他就是肚子疼。你给他喂点热



奶就好了。”说完又嘱咐了几句就扭身回去了。我照着婆婆教我的一试，发现真如她所说的那样，就赶紧给他喂了点热奶，果然福音很快就呼呼地睡着了，第二天就全好了。说来在婆婆的身上也还是有不少变化的，比如她已经很少再像从前那样对基督教冷嘲热讽，也不再找借口阻拦我们去教会，反而是每到主日的早晨就主动来对我说：“来把孩子给我，你们去聚会吧，我看孩子。”

从我们住的锡拉胡同到地安门有个把小时的路程，相忱平时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只有到了主日和查经会时他就不骑车了，和我一起步行来往。相忱走路的速度很快，而且走起来也不看身旁的人，只顾自己一个人闷着头快走，我在后面只得加快步伐，紧追慢赶的才能勉强跟住他，我说：“你走得那么快啊！慢点啊！”他这才发觉我在他身后跟得如此辛苦，就放慢脚步，很是抱歉地说：“我走路快惯了。”可没过一会儿，就不知不觉地又快起来了，我看这样也就不再提醒他了。相忱一生走路都是这么个习惯，和他一起出去过的同工和信徒都知道他的这个特点，所以我和相忱也从来没有挽过胳膊。

大约在一九四〇年的六、七月间，在远东宣教会的主日礼拜中，我们遇见一位中等身材、能讲一口流利中文的中年白人，相忱为我介绍他是来自美国宣圣会的宣教士裴约翰牧师。聚会结束后，相忱和裴牧师就坐在礼拜堂里很热烈地交通起来，我坐在边上听着他们说话。裴牧师说他正在河北省南部的乡村从事福音布道，这次是专程带患严重痢疾的女儿来北京就诊，他特别向相忱介绍了自己在当地的事工状况，然后紧紧地拉住相忱的手臂，热情地说：“来吧，和我一起去成安吧！”我看见相忱的脸上也按捺不住兴奋，他说：“我的目标也是要到农村去传福音！现在我的孩子还小，等孩子大一点，我就去！”裴牧师高兴地说：“哎呀！那太好了，你快来吧！”相忱也高兴地说：“我一定来！”

在从远东宣教会回来的路上，相忱告诉我：他初次遇见裴约翰牧师是在远东圣书学院开办的一个周日夜校里，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初，那时相忱还在圣书学院读书，裴牧师也是刚来到中国不久，应邀来夜校

教授英文课。相识一段时间以后，裴牧师就曾征询相忱是否愿意和他同工，一起到农村去传福音，相忱虽然也有到农村传道的心志，但因为他在远东圣书学院还剩有两年的课程，就没有能成行。谁也不曾想到，今天在远东宣教会的主日礼拜上再次与裴牧师这样不期而遇。通过这几年的耕耘，裴牧师在河北南部一带的传道已经颇具成效，非常需要同工；而相忱一直以来都有着去农村事奉的托付，神就亲自为他们两人预备了这次奇妙的重逢，使他们所愿的都得以成就。在裴牧师晚年所撰写的个人回忆录<sup>1</sup>中也记述了他与相忱的这两次相遇，他说他在那个周日夜校第一次遇到相忱时，就感受到相忱内心里对于真道的渴慕和事奉的火热，虽然相忱因为学业的缘故没能接受他的邀请，但神的灵在两个人的生命中播撒下合一与尊重的种子。裴牧师也还记得相忱在他的中文学习上给予他很大的帮助。虽然两个人在以后的几年中并没有互通过音信，裴牧师却一直都在盼望找寻到合神心意的同工，所以当他意外地再次遇到相忱时，马上向相忱提出以前的邀请。

当相忱把我们要去农村传道的想法告诉家里人的时候，他们仍是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突然放弃在北平城里的优越生活，跑到穷乡僻壤去受苦。但与以前不同的是此时家人的心里对我们更多的是痛惜和担心；公婆还是像最早反对相忱从“商专”退学时一样，轮流出面劝阻相忱，所不同的是，这时的态度已经和缓了许多，不再似当初那样逼迫和苦待他。公公以为我还不知道相忱的这个决定，有一天趁我带着孩子在院里的時候，走过来抱起福音，对我讲起相忱决定要去农村的事，说了很多关于农村生活的艰苦，又语带关切地劝我：“你在城里生活惯了，孩子还那么小，别到农村吃那个苦啦！”最后，用恳切的语调，望着我说：“你劝劝他吧！”其实，对于公公劝说的这些话我在心里早有准备，所以只是一声不响地听着他说，待他把他的话都说出来了，我才告诉他我已经知道并且完全支持相忱的决定，至于说到农村生活的艰苦，我说：“不要紧的，我还年轻。”家里人固然打心眼儿里还是十分地不情愿我们离开家，但是看到我和相忱在去农村的事上已经有一致的心意，就没有再继续地反对我们。

虽然农村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但我还是对神完全充满感恩，因为从决定去农村传道这件事上，我再一次印证出相忱实在是愿意舍弃一切来跟随主的门徒，正如他自己说的：“我这一辈子，干什么都没兴趣，一提到传福音我就有力量了。神是选召我专门在传福音上服事他，我不能违背天上来的异象。”相忱是这样领受的，也是这样实行的，一生奉献自己为主做工。神使用我和我们的结合，来改变相忱的生活处境，使我们一同在服事主上有份，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和福分。

还有家里也着实令相忱和我放心不下。三位老人都还没有接受主，加之他们又都有病痛缠身……我们却不能在他们身边，唯有在恒切的祷告中向神交托。

相忱还是照常的每天按时去学校上班，我也还是在家里一样地做着各样的家务，一切生活平稳如常。我已经把需要带走的东西收拾妥当，欢喜盼望着神带领我们出发的时刻。转过年，到了一九四一年初，一岁多的福音已经可以走稳了，每次饭前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也会学着我们的样子说：“阿们！吃吧！”过了春节，天气转暖，我们决定就在这时出发去裴牧师所在的河北省成安县。在我们临行前，远东宣教会和圣书学院的同工们专程来家里探访，吴智院长问我：“还有什么需要吗？”我向他道谢，说：“没什么需要。”最后众人在一起为我们祷告，吴智院长还留下一些钱作为我们的路费。

动身的前一天，相忱从外边回来说已经买好了第二天的火车票。我就抱着福音上到北屋去，公公上班还没有回来，只有婆婆和外婆在屋里，我告诉她们相忱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火车票，我们就要走了。一听到这话，外婆泪流满面地拉着我的手，嗫嚅了半晌，才说出：“我实在是不愿意你走啊！到那儿要不合适，你就还回来吧……”我安慰她说：“您放心吧，我们不会有事的。”见我们去意已定，方才一直低着头没有开口的婆婆此刻眼里也噙着泪花，开口说道：“你得小心点儿，外面那么不太平……农村那么苦，吃不上，喝不上……你们去那儿干什么呀！”就摇着头，连连地叹气。外婆摸着怀里孩子，嘱咐我：“你要保护自己，吃饭要吃好

点,不要马马虎虎……”忽然又说:“我怕你过不惯,别走了……行不行?”我轻声地宽慰老人说:“票都买好了。您放心吧。”第二天早晨,相忱又单独去向父亲辞行,然后我们一家三口就赶到位于前门的火车站。

谢绝了所有要为我们送行的好意,只有祥婶一个人坚持要把我们送到车站,她是相忱传福音所结出来的第一个果子。在站台上,她对我们说:“你们去吧,将来我也去跟你们一起同工。”后来在一九四四年的时候,祥婶果然来北皋和我们同工了一段。

我们出发了,朝向神的广大禾场。

<sup>1</sup> *John Pattee of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by C. Ellen Watts BEACON HILL  
PRESS OF KANSAS CITY Copyright 1984 ISBN : 0-8341-0-880

第五章

强暴人備逼人的時候，

端身作事

暴令之外

刑外却人

想元下落，禁止強暴

象想元禮之物，清心。

士道宏書于癸亥



晚上八、九点钟，在大平原上已经奔跑了一整天的火车，终于再一次喘着粗气缓缓地停下来。

只听见火车下面有人拿着用马口铁卷的喇叭筒喊道：“邯郸，邯郸。”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相忱和我连忙抱起已经睡得迷迷糊糊的福音，带好行李，走下车厢。

狭小的站台上，仅有的两盏油汽灯分别挂在两根竖起的木杆顶上，摇曳的灯光映着站台上晃动的人影和不远处勾画在黑暗中的三五间车站的平房的轮廓。随着寥寥几位旅客行色匆匆地消失在站台尽头的黑暗中，一声汽笛，火车也驶离了车站，站台上顷刻间又回复到它本来的昏暗和寂静当中。

按照约定，这一天有附近临漳教会的弟兄接我们当晚先到临漳教会落脚，第二天再由成安教会的同工接我们过去。但是，一直等到站台上不多的几个人都走尽了，也没有看到那些来接站的临漳教会的弟兄，我们只好也走出车站。

外面的城镇和车站里面一样，在狭窄和静谧中，被同样的黑暗所包裹着，没有一盏路灯，也很少有行人来往……

在这样的景况下，要找到几位从未谋面的人，看来是没有什么可能了。相忱和我商量，决定我们自己连夜赶到临漳去。于是，相忱向火车站的人问明了去临漳的路，就带领着我们一家三口向前走。

离开了被黑暗包裹中的城镇，进入的是同样被黑暗裹挟的旷野，只是黑暗在这旷野却比在城镇中显得更加厚重，全无边际，仿佛吞噬着旷野里一切的存在，也把天空、道路，还有行走在道路上的我们，也全然吞没其间。

我从来都没有过在夜间黑暗而又陌生的旷野里行路的经历，甚至在这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神会给自己如此的试炼。我想，在眼前这样的试

炼上，相忱也不会比我有更多的预备。

我们在黑暗里摸索着向前走，看不清脚下的路面上到底是什么样子，只是感觉到到处都是软绵绵的沙土，走在上面真是深一脚，浅一脚，稍不留意，大半个脚都会一下子陷进在沙土里。就是在这样的路上，相忱和我，抱着已经睡熟的孩子，又背着行李包裹，磕磕绊绊地已经走了约莫有三个多小时。此时摆在面前这黑暗里的旷野和其上的道路，对于相忱和我而言，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我们不知道我们此时身在何处；不知道我们已经走了多少的路程，也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路程；不知道前面的路上可能遇到什么；更不知道能否在黑暗里，找到那个我们甚至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的目的地……但是，神的呼召，在我们的心中如同火柱，就是耶和华神曾经在西奈的旷野里，夜间在火柱里指示他的选民所当行的路。

我深情地望着身边的相忱，望着我在主里面的同路人，对神满了感恩。是神赐下相忱这样在主的里面有坚定信心的弟兄，作为我和全家的带领，才使我们在这般黑暗而又陌生的旷野道路上，没有忧愁疑惑，唯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并且行走得力上加力。

突然，一阵唏唏簌簌的声音，由远及近地冲破身后的寂静，听起来似乎是有人正在匆匆地赶上来。在我们错愕之际，黑暗里传出一个急切的声音，“是北京来的袁弟兄吗？”原来是临漳教会派来接站的弟兄，在邯郸车站没能找到我们，就急忙地顺着从邯郸到临漳的路，一直追寻下来，终于在这里遇上了我们。

短暂而亲热的寒暄过后，我们合在一起继续赶路。即使这几位临漳教会来的弟兄，并没有带来任何可供搭乘的交通工具，我们依然需要步行来走完前面余下的路程，但神带领我们在这对面不见人的黑暗旷野里不期而遇，使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为神如此奇妙的恩典而满了赞美。

在黑暗里，又这样走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在临漳教会弟兄的引领下，终于顺利到达我们当晚预备落脚的住处。

走进接待我们的那家院落，里里外外同样隐没在那一片黑暗里，周围的模样也仍然是什么也看不清楚。只有房里的油灯，从房门口透出一丝细弱的光线。

也许是这一丝细弱的光线，让我实在不能看清自己脚前的物体；也许是这大半夜的奔波劳顿，让我的腿脚已经疲软到不由自主，在进房门的时候，我的脚下一卡，几乎绊倒在门槛上。

放下已经睡熟的孩子和行李，相忱和我首先跪在地上，一起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感谢神在这一路上给我们的带领。开始只是各自在心里默祷，因着被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和口都向着神打开，开始口唱心地扬声赞美我们的神，赞美他极大的慈爱，赞美他丰盛的恩典，祈求他亲自带领我们在这里的事奉。

祷告过后，相忱和我才注意到我们的鞋里早就灌满了沙土。我脚上那双布鞋的鞋底，更是被粗糙的沙砾磨得偏向一边，已经没法再穿了，脚上也是生平第一次打起了一串水泡，钻心的疼。

经过简单的清洗，我们就赶快休息。我感觉自己这时却既没有日夜奔波的劳顿，也没有初到一个陌生地方的新奇。躺在床上，我回想着这一天所经过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离家，第一次离开城市来到偏僻的乡村……眼前是似乎看不透的黑暗，心里却仿佛沉浸在一片奇妙的光明之中。听着身边的相忱和福音已然睡熟了，我也在满足的甘美中渐渐地入睡了……

第二天上午，成安教会的同工套了一挂骡马大车来接我们。

坐在大车上的路程虽然很颠簸，但比起昨天夜里的步行赶路要轻省了许多，让我能够用心来观看沿路的景物。地上满是松松的黄土，在我们身后留下两行清晰的车辙，和一股呛人的淡黄色尘雾。虽然已经到了初春的季节，慈爱的神，还没有把他手所造的小草、绿叶、稼禾，还有昆虫，放回眼前这片依旧笼罩在春寒料峭中的世界。田野里的庄稼还没有开始播种，稀稀落落的几棵树木上，还没有长出春天的第一片绿叶，



小草也还没有从土里冒出它的嫩芽，远近听不见一声昆虫的鸣叫，万物都静静地躺卧在一片干燥而单调的黄色之中，渴望着从神口中吹出的气，给这地和地上的生命赐下新的盼望。

## 二

成安县位于河北省的南部，东接山东省，往南与河南省相邻。

自一九一三年起，来自美国的宣教差会“拿撒勒人会”，开始以大名县为中心，逐步在包括成安县在内的河北省南部五县，以及邻近的山东省西北部五县等地区，开拓福音宣教事工。

为了适应中国民众的理解和领受，这一期间，“拿撒勒人会”取中文名称为“宣圣会”。在信仰的领受上，“宣圣会”与相忱曾经就读和事奉过的“远东宣教会”、远东圣书学院，同属于卫理宗。

一九一五年，“宣圣会”的宣教士开始来到成安县，传播福音，建立教会。一九二一年，“宣圣会”在成安县东关购置土地，陆续建立教堂和学校。到四十年代初，东关的教会已经有每周固定的礼拜聚会，大部分乡村里都或多或少的有人受洗归主。一些爱主又热心事奉的弟兄，已经在各自的村庄里建立起家庭聚会。也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到“宣圣会”在大名开办的圣经学校接受初级的神学装备。

二十多年来，神用他丰盛无尽的慈爱、保守和看顾，借着他在地上的教会和他众仆人的手耕种、浇灌，使福音在这片神所亲自眷顾、耕耘的土地上，开始初结果子。

“宣圣会”在成安县东关的教会，是一座用高大厚实的土坯砖墙围成的长方形的大院子，南北方向上比东西长一些。听教会的同工讲，整个大院子的占地面积足有二十四亩半。

教会的正门在院子南边，是两扇对开的中式木门。进门沿路直行，就有三间高大敞亮的平房，是教会的礼拜堂。礼拜堂的东侧是一座有八、

九米高的三层钟楼，与礼拜堂连成一体。礼拜堂和钟楼用的都是当地出产的一种青砖，这种砖在烧制的过程中，用一道淬火工艺来给砖体降温，制成的砖表面呈现青灰色，非常耐用。礼拜堂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起脊式屋顶，顶上铺的却是一种用水泥制成的白色平瓦。因为当时中国基本上还不能制造这种白色的水泥，所以当一大片白色的水泥平瓦出现在成安县这样一座小县城的时候，几乎给当时所有看到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礼拜堂的正门向南，正对着院子的大门。南北两侧的墙上都分别开有几扇宽大的窗户，窗户的上沿用青砖砌成中式的拱形券顶。

礼拜堂向东不远处又有一幢五间的两层楼房，用和礼拜堂一样的青砖盖成，屋顶虽然也是起脊式，上面使用的却换成了中国最常见的青灰色筒瓦。楼门也是向南的，楼的南北两侧墙上也开有宽大的窗户，楼门和窗户的上沿，同样用青砖砌出优雅的拱形曲线。这座楼房比礼拜堂更晚些时间盖成，是教会附设的晨光学校。一楼门道的两侧，各有两间是学校的教室，二楼全部是学校男孩子们的宿舍。楼前就是学校的操场，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器械，比如篮球架子等等。

礼拜堂和晨光学校中间有一条小路，笔直地向北通到大院子的后门。门旁有一间看门人住的平房，房子很大，至少有二十多平方米，房里除了一铺很大的通炕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就显得房间更加空旷。

晨光学校的北边，紧挨着小路的东侧，是一块有一亩多大的菜地。地中间有一口水井，除了作为全教会的日常饮用，也用来浇灌菜地。菜地的出产，主要是供给在教会居住的同工及晨光学校住校的孩子们在教会食堂每日伙食的需要。菜地的一边还有一座菜窖，这在中国北方是一种很常见专门贮存过冬蔬菜的地窖。每年秋末冬初的季节，人们把收获的大白菜储藏在菜窖里面，整齐地码成一个个四方的菜垛，以备在整个冬季和初春食用。

菜地往东一点，有两座各自独立的小院子，是教会为那些家在外地的同工和老师预备的住房。

从菜地再向北，离开小路一段距离，有一栋简朴的西式二层小楼，是教会里的外籍宣教士们居住的地方。信徒们习惯称它为“牧师楼”。

礼拜堂的西边，另有一个小院子是晨光学校女孩子的宿舍。院子外边的一排平房，是教会的厨房和存放粮食以及杂物的地方。

同在教会院子里的“晨光学校”，是“宣圣会”在当地开办的一所小学校，专收成安县各乡村镇当中信主家庭的孩子。学生平时都在学校住宿，在教会的食堂吃饭。学校不收学费，只要求每个孩子，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从家里带两斗小米，自己倒在教会食堂的米缸里，算作各人的口粮。

相忱和我在北京“远东宣教会”遇见过的裴约翰牧师，是“宣圣会”派遣在成安教会的负责人。裴牧师夫妇带着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就住在教会院子里面的“牧师楼”，是当时长住在成安教会唯一的外籍宣教士家庭。裴牧师个子不高，只比相忱略高一点，在外国人当中只能算是中等。但是他的体格非常结实，精力旺盛，开朗幽默，经常以他饱满的热情来感动带领周围的同工和信徒。

裴牧师的中文水平比较高，能操一口相当流利的中文。生活习惯上也已经“入乡随俗”，除了在家里还有时穿着西服，外出到乡村布道的时候，一律穿一件深蓝色或是黑色士林布的中式长衫，脚上也是当地最普通的黑色中式圆口布鞋。

教会中还有一位叫王珩的同工，魏县人，三十多岁，已经在教会服事多年了。他担当的职份有点像教会当中的执事，主要管理教会的日常事务，特别是钱款和粮食，也做主日聚会的带领和讲道。王珩弟兄身材高大，身强体壮，讲起话来声音洪亮，气力充足，看到他常使人联想起“山东好汉”的形象。

“晨光学校”里有两位老师，都是本地的信徒，一位是谢和庆姊妹，一位是张代活弟兄。

教会院子里住着一家姓赵的信徒，全家三口人都在教会里做工。赵

弟兄负责看守教会的后门，兼做打更。他们的儿子赵杰，当时是个才十七、八岁的孩子，负责种植教会院子中间的那块菜地，还要放牧裴牧师圈养的几只羊。后来我们回北京以后，赵杰因不堪忍受被国民党强征入伍，从军队里偷跑出来，到阜成门福音堂找到我们，在相忱的带领下悔改，受洗信主。

在教会的食堂里有一位张姊妹，五十多岁的样子，也是成安县本地人，大家都亲热地称呼她“张大妈”。张大妈是一位在主里满有爱心的信徒，曾给过我很多宝贵的帮助，使我在很多年以后都会经常想念她，感谢她。

教会的同工里还有一位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名叫尚志荣，家住距离成安县城八里远的北散湖村。小学毕业后，作为传道人的父亲尚青梅把他送到“宣圣会”在大名县的“圣经学校”学习四年，一九四零年，“圣经学校”毕业后回到成安教会服事。尚志荣的父亲尚青梅弟兄，带领全家悔改信主以后，也曾在大名、成安的教会里服事，后来成为自由传道人，这时已经在北散湖村自己的家里建立起家庭聚会。

这是神亲自眷顾耕耘的土地。神又亲自呼召那合他心意的工人，差派他们与他同工，在这片土地上，流泪撒种，欢呼收割。

### 三

我们到达成安教会的第二天，相忱就和裴牧师、尚志荣弟兄一起去乡村布道。

裴约翰牧师的中文水平，比起我们前一年夏季在北京遇见他的时候又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可以完整流畅地使用中文布道，就是与信徒的个人交通和日常生活也基本应付自如了。他虽然是当时“宣圣会”中到达中国工场最晚的一位宣教士，但是靠着他对神的信心和火热的事奉，大得神的恩赐和使用，也深受当地信徒的信任和爱戴。

另一位年轻同工尚志荣弟兄，是土生土长的成安县本地人，从小生

长在一个热心事奉的基督徒家庭，熟悉当地的地理和乡土人情，又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初级的神学装备。

当年，裴牧师三十八岁，相忱二十七岁，尚弟兄刚刚二十岁。三位同工，无论从年龄，神学装备，事奉经历以及个人的文化背景，都是神奇妙的配搭，使他们的事工在神的里面大有果效。

三个人外出布道的交通工具，就是每人的一辆自行车。带上圣经、诗歌本、乐器和最简单的个人用品，就出发了。三个火热爱事奉的人的足迹，已经不再局限于成安县一个地方，而是遍布河北省南部五县，甚至远达相邻的山东省西北部一带。

鉴于当时这一带很多村子里都有人信主，有些热心的信徒已经在村里组织起家庭聚会。他们每到一个村子，就到那些乐于奉献的信徒家里，带领奋兴会，牧养和坚定本地的老信徒。这样的奋兴会通常是连续三天或五天，每天都有聚会。清早是晨更，就是祷告会，上午、下午和晚上各有一次正式的聚会，内容包括唱诗和讲道。

每次聚会之前，三位同工还要各自操起自己的乐器，裴牧师的乐器是一面大鼓，相忱当时身体比较瘦弱，是一面小鼓，尚志荣弟兄操一架120 贝斯的手风琴，三人结伴到村庄的街道上游行一周，边唱赞美诗，边向路上的村民传福音，散发福音单张。当时乡村里的人都没有看过西方人，见到裴牧师都感到很稀奇，很多人就聚在周围，他就向他们传讲福音。村民们发现这个穿着一身中式长袍的“洋人”，竟然还能讲一口如此流利的中国话，就愈发稀奇，愿意听他说话，也和他攀谈，裴牧师就抓住机会邀请他们到聚会的地方来听道。遇到有当地赶集或者赶会的日子，因为人流特别聚集，成为传福音的大好时机。他们不仅在集市游行布道，还干脆在集市最热闹的地段上搭起一个大棚，就在棚里唱诗讲道。

三颗心，三颗甘愿为了神的福音摆上自己的心，三颗挚爱中国的丧失灵魂的心，三颗信靠顺服与主同工的心，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合一，一同被圣灵的大能充满。与神一起，在这片渐渐显露生机的土地上，流

泪撒种，欢呼收割。

每次聚会之前，这三位同工都要虔诚地俯伏在神的面前，同心合意地为信徒和慕道友们的祷告祈求；聚会当中，三个人轮换讲道、带领诗歌和守望祷告；晚上最后一次聚会结束后，他们还要和有问题的信徒和慕道友个别交通，为有需要的人代祷；一直等到大家都走了，三位神的仆人，又一次同心合意地来到神的面前，为了一天的聚会献上感恩赞美的祷告。

相忱曾经不止一次地和我讲起过，裴牧师经常彻夜跪在神的面前，为了福音，为了信徒，为了教会，为了同工……流泪祷告。作为一位远涉重洋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宣教士，裴约翰弟兄这颗尽心、尽力、尽意地爱神，事奉神的心，这颗在主基督里面爱人如己的心，时时地感动着我们。

就是这样，他们一个村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县地往返奔波，经常连续三、四十天都在各村各县之间布道。回到东关的教会，往往也只是休息上两三天，就又开始了下一次乡村布道的路程。就是这样，他们几乎走遍了这一带的每个村镇，把神的福音带给每一个灵里饥渴的生命。

也是在这里，神为他的使女预备了第一个事奉的职份，教会安排我在晨光学校担任高小班级的任课教师。

当我怀着兴奋而好奇的心情走进教室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孩子们竟也在用同样兴奋而新奇的眼睛望着我。我当时也才二十二岁，正是风华展露的年龄，脸庞白皙中不失红润，穿着西式的衬衫和毛衣，头发也是剪成简洁的齐耳短发，这在当时的乡村中都是很少见的，再加上生命中洋溢出的喜乐平安开朗活泼的性情，都让孩子们对我这个“外来”的老师充满了期待。

高小包括五年级和六年级，是晨光学校最高的班级，一共有四十多名学生，都在学校教学楼一层的一间教室里上课。教室有宽大的玻璃窗，四面的墙都用石灰刷得雪白，显得格外明亮清洁，墙上挂着四条圣经金

句，还有学生们优秀的作文和图画作业，前面的黑板是用一块有三、四米长的木板刷上黑墨汁做成的，课椅也是普通的中式长条凳，只有课桌是当时新式的，前面装有合页，桌面可以向上打开。

这里所有的孩子都是信主的，学校也特别注意在真理上建立他们的道德品质，除了每周都要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之外，又在校内开设有专门的圣经课程，是由张老师讲授王明道弟兄编著的《信徒处世常识》。因此，这些孩子都非常懂事，有礼貌，也能听从老师的教导，遵守纪律，在课堂管理方面没有让我操什么心。一到了上课时间，就有值日生摇着铜铃报时，学生们全都会安静的在教室里坐好预备上课；下课也是有值日生来摇铃通知，然后他们再负责课后打扫当天的教室卫生。

我任课的高小六年级是毕业班，要预备考中学，所以课业比较重，但当时连基本的课本都缺乏，我就在正常的课业之外，自己动手又为他们自编了一些补充的教材和习题，都抄在那块大黑板上面，由孩子们各自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孩子们的学习都很认真刻苦，很多人后来都考上了中学，这在当时的乡村里还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有一位来自大寨村的学生叫吴瑞亨，以后还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天津工作，最后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几年前他还曾专门到北京来看望我，对我说：“您是我的启蒙老师！”如果不是后来日本人封锁了教会和学校，一定会有更多的孩子在这里完成学业，他们被迫离开学校时那恋恋不舍的眼神，几十年中经常会在我的头脑中浮现。

经过初见时的那种好奇，我和孩子们很快就融合在一起。除了一起上课，我们还在伙房里的同一张桌子上吃着完全一样的饮食，课外活动时也和女孩子们一起在操场上做游戏，跳摇绳。

那个时代，乡村里的孩子上学普遍比现在要晚许多，我的班里年龄最大的孩子都已经十七、八岁了，我这个老师也不过只比他们大上四、五岁的样子，艰苦生活的试炼造就了这些孩子淳朴热情、勤劳自立的个性，甚至能够使我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很多帮助和鼓励。平时他们每天都要轮流到伙房帮厨，周日下午的时间，从来不需要我们这些作老师的来

组织，年龄大一点的孩子都会主动整理宿舍，帮小弟小妹们从井里打水洗衣服。

他们也喜欢有空就结伴到我住的小院子里来，帮我收拾屋子，洗衣服，照看不到两岁的福音。记得有一位四年级的女孩子叫陈爱菊，才十四岁，却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不仅来帮我缝补衣服，我最初的针线活也有很多是从她手里学来的。按那时的习俗，乡村里结婚的年龄都非常的早，特别是女孩子们，一般十八岁之前就会出嫁了，所以她们常常愿意和我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我就用相忱和我在主里面蒙恩的见证鼓励她们，要选择真正爱主的弟兄，不要贪恋金钱和世上的虚荣。

教会的伙房为孩子们提供的只有小米稀饭和窝头这类的粗粮，即使这样，也还比大多数孩子家里的饮食要略好一些，而且能保证他们吃饱。但我仍是为他们的身体担心，遇到有机会我总要尽可能给他们“贴补”一下。曾有一次，裴牧师从外面带回来一些牛肉之类的食品，招待教会的同工们聚餐，等到大家散了以后，我看见还有不少牛肉剩在那里，就去把班里平时饭量比较大的几个男孩子都叫来吃牛肉。

我和孩子们在神的爱中彼此相爱，彼此相连。我在心里完全把他们当成我的亲人，孩子们也在心里把我这个老师当成自己的亲人！

六十多年后，这些学生中间仍健在的乔爱琴姊妹，在回忆我们当年师生融洽和谐的情景时见证说：“梁老师和我们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是老师的心里有神，我们心里也有神！”

## 四

河北中南部一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古以来都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和棉花产地。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这里的农业种植技术仍然极度的落后，加上连续几十年的战乱和频繁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苦，具体的状况，不仅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也是相忱和我在到成安以前所未曾经历过的。



感谢神按照他应许所赐下的丰富供应，也借着在主里面充满爱心的成安的兄弟姐妹对神家和传道人的奉献，我们的生活条件虽然远不如在北京和天津事奉的时候，但是若比起当地普通的生活水平，还是略好一些。

相忱经常到乡村领会、讲道，一走就是个把月；我白天要给孩子们上课，晚上还要带他们晚自习，为了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神的事工当中，我们没有自己起伙做饭，都是在教会的大伙房和大家一起吃饭。

食物一年四季就是小米稀饭、窝头和咸菜。成安盛产小米，金黄可爱，熬成或稀或稠的小米稀饭，真是香甜可口，营养也不错，是大家最喜欢的饭食。就连裴牧师这样习惯了牛奶面包的“洋人”，也不禁对小米稀饭赞不绝口，在各村庄里带领聚会时，他总会用中文对负责饭食的人要求说：“我喜欢小米粥！”听说有一次，当他很快地喝下第一碗小米粥，马上又把空碗递回去要再盛下一碗的时候，一位弟兄就当场送他一个昵称叫“小米缸”，没想到他自己对此颇感满意，在向人作自我介绍时总忘不了告诉人家自己的这个绰号。至于窝头就有各种各样的了，最好的也是比较常见的是玉米面窝头，有时还有高粱面的。高粱面蒸出来的窝头是灰紫色的，必须趁着刚出锅热乎的时候吃，不然凉了就会变得很硬很硬的。为了节省粮食，教会的玉米面和高粱面都是带着皮不筛出去，这样做成的窝头就比一般的还要硬，而且里面掺杂的大量籽皮还经常会塞牙，吃饭时不仅要费力地细嚼，还要不时把塞进牙缝的皮子抠出来。教会大伙房里的几口大缸是专门用来腌制咸菜的，新鲜的蔬菜几乎是从来没有过。咸菜的原料大都是教会自己菜地里种的，也有一部分是附近的信徒奉献的，主要就是大白菜，另外还有各样的萝卜和很少的豆角。调料只有盐和几个辣椒，这样腌制出来的咸菜，又咸又酸，还少带一点点地辣味。吃的时候捞出来，洗洗干净，切成丝或者条就可以了，旧的吃的差不多了，再放些新的进去继续腌。这些就是我们的日用饮食。

在以神为乐的人们心里，这样困窘的生活实在是神的恩典和祝福，

我们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从神而来的真实喜乐！裴牧师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先是故意摆出一付一本正经的样子问：“猜猜今天吃什么？”接着马上又换成另一付轻松诙谐的表情，用英语自己回答道：“又是酸白菜！”逗得大家一阵开心的大笑。有一次，相忱出了一个对联的上联“白萝卜，红萝卜，红白萝卜。”特意来请裴牧师对下联，裴牧师果然不愧“小米缸”的绰号，对出的下联竟是“稀米饭，稠米饭，稀稠米饭。”两个人又一起拟了一个横批“顿顿如此”。

初到教会的那几天，我发现伙房为我们三位老师单独做的是白面和鸡蛋的摊饼，有时还专门给我们炒一盘素白菜。虽然明白这是教会和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特别关爱，但看到其它同工还有那些孩子们吃的都是玉米面的窝头，心里实在是不平安，我就把自己的心思和张老师、谢老师两位交通，又在一起祷告，他们也和我有这样相同的感动。于是，我去伙房找到张大妈说：“请别给我们专门摊饼，我们和大家吃一样的，就吃窝头。”可是下一顿饭，伙房照旧还是给我们做的白面摊饼，我就再一次找张大妈，坚决地告诉她：“请您不要再摊了，下次再摊了我们也不吃了！”从那时候，我就在伙房和大家吃完全一样的饮食，一直到我们离开东关教会。

一九四〇年，华北平原大旱，秋粮欠收。我们到达这里不久，就正好赶上“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人民的生活陷入非常的困苦，教会的粮食供给也发生严重的短缺，不得不把榆荚、野菜甚至是棉花籽，和玉米面掺在一起蒸成窝头。棉花籽要比玉米粒和高粱米硬得多，带着皮子一起磨，很难磨碎，中间很多籽粒大半还是完整的样子，吃在嘴里的感觉和嚼生豆子差不多，把牙硌得生疼，实在嚼不动就只好吐出来。万般无奈之下，才向管理粮食的同工请求：“请磨细一点吧！”有些棉花籽上还带着没择干净的棉花纤维，我们还得一边吃一边把这些丝丝缕缕从牙缝里抽出来。

二〇〇七年，成安县中甘罗村的刘恒昌弟兄来看望我，讲起他的祖父当年曾在家里接待到过村里带领聚会的裴牧师和相忱，吃的是白面做

的面条，裴牧师因为“筷技”不佳，夹不住又长又滑的面条，结果他自己是有劲使不上，别人是有忙帮不上。刘弟兄讲述这个见证的时候，听到的年轻人都在轻松地笑，可我的心里却是沉重得一点也笑不出来。在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眼中，那再普通不过的面条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我的眼中却看到，这些面条很可能就是当时家中最值钱的一点点财产。一九四〇年代的北方乡村，白面属于奢侈品，过年全家能吃上一顿白面是殷实人家的标志，而对于大多数人家来说，这样的饭食从来就只能是一种不可及的奢望。即便在宣圣会这样有美国母会支持的外国差会里，白面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稀罕物”，我们在成安东关教会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刚到的时候吃过的那几次白面摊饼之外，就再没吃过一次白面。也是在那年的夏天，相忱和我曾有一次去大名县的宣圣会总部开会，教会也是用面条款待来自各县的传道人，不过奇怪的是，所有的面条都被截成不足一寸的“面头”，直到捞面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样的“面头”就算用笊篱捞也难得捞上来，不像用筷子捞整根的面条，可以轻易地捞起一大碗。连宣圣会都不得不用这样的“办法”来“算计”自己传道人的饭量，可以想见当时的粮食困难的程度。

## 五

裴牧师和相忱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在乡村带领聚会、福音布道和建立与牧养家庭聚会的事工上，通常一次出去都是连续二三十天甚至更长。那时在乡村里，完全没有任何近现代的信息传递设备，更加上兵荒马乱，匪盗横行，他们时刻都可能遇到各样的急难险阻，可是我们在家里的人却完全不能知道他们身在何方，处于何样的境遇，唯有每每在祷告中记念他们，求神亲自带领和保守他所爱的仆人。

外出的路程都会有大半时间花在赶路上，有时还要在野外露宿，即便是在乡村里住宿也没有最基本的卫生条件。所以每次回来的时候，他们全身的衣服从里到外都已经脏得不像样子，有几次甚至还长了虱子。我也曾经尝试在出门时给相忱多带上两套换洗的衣服，但他们在外边的

时间实在太长，这样的措施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最后只好放弃了努力。虽然裴牧师和相忱他们自己对此到是安之若素，裴师母和我却丝毫不敢怠慢，每次他们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人先“隔离”起来，让他们洗澡和换洗衣服。于是，相忱回来的那天，我都得尽可能先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回我们住的小院，先打水给相忱洗澡，还要烧开水反复烫洗他换下的全部内衣、外衣。

见面的第一句话，我总要问：“这次布道效果怎么样啊？”相忱也总是笑呵呵地回答：“好啊！特别的好啊！”我一边忙前忙后地收拾着他刚刚换下的衣物，一边听着他跟在我边上，笑呵呵地向我讲述各村各镇里聚会的情景。“这次又有多少人得救啊？”我问，相忱依然是笑呵呵地站在我身边，扳着指头数算着告诉我，这村几人，那村几人……一共几人，接着又会兴奋地讲起他和裴牧师下次外出布道的计划。每次他们出去，都会有十几二十多人悔改信主；每次他们回来，相忱都是笑呵呵的。他心里高兴，我心里也高兴，我们同是为着更多失丧的灵魂在神的福音里得救而高兴，而向着神感恩！

相比以前在天津和北平曾有过的服事，相忱在河北的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他一生在神面前事奉的一个重要的开端。从这时起，神把一颗真实而又活泼的爱人灵魂的心放在相忱的里面，在他生命余下的岁月中，神也保守这颗心始终向着神火热地跳动，一刻也未曾稍有懈怠，无论得时不得时，相忱总是以传福音作为他一生最主要的事工。

还有也是从这时起，神开始操练相忱和我为福音而奉献的功课，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把我们个人，把我们的家庭生活和我们的后代，完全地向神摆上。

我们在这里的家，简单到只有教会为我们预备的几件必备的家具，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很少有时间呆在家里。相忱在乡村来往布道，一出去就是个把月，回来停不上三五天就又走了；我自己是白天在学校给孩子们上课，下午要备课，要编写补充教材和习题，有时还要给有需要的孩子个别补习辅导，晚上再带领他们上晚自习，真是忙得只有到了晚上睡

觉的时间才能回到这里。相忱和我都是在教会的伙房和大家一起吃饭，一直没有自己开伙，又把福音托给赵杰的母亲代为照看。

这里的饮食也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过的，相忱曾经既是感恩又是怜爱地对我说：“我真没想到，你能来和我一起受这个‘罪’！”我回答他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是为主，怎么会受‘罪’啊！”其实相忱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放下在远东圣书学院那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放下在城市稳定的生活，放下年迈体弱的父母双亲 and 外婆，更放下自己令人羡慕的才能，为了福音的缘故，顺服在神的心意之中，把自己完全地奉献给神。

在当时那样的战乱年代，乡村间的境况远比城市里更加险恶。神就是这样从相忱和我的身边拿去了那些原有的安定平稳，使我们开始遭遇以前所不曾想象过的诸般艰难险阻和患难逼迫，却又因着他的名，把自己赐下来与他在地上的众儿女同在，引领我们在他奇异的恩典和大能中，察验他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与神更亲近了！”相忱曾经这样告诉裴牧师。作为亦师亦友的亲密同工，裴约翰牧师在这不足一年的共同事奉的过程中，给了相忱很多宝贵的教导和帮助，直至以自己的坚强来担当弟兄的软弱。很久以后，听尚志荣弟兄讲起一次他们之间的宝贵经历。那是他们三个人在永年县正西镇连续三天带领聚会，每天都是三次聚会，聚会前，三位同工还要一起背着各自的乐器沿着镇里的主要街道游行传福音。正西的镇子很大，一圈走下来足有三华里。那时相忱的身体非常瘦弱，饮食营养更是缺乏，再加上连续不停的奔波，这一切都给他的身体带来极重的负担，终于在第三天的时候，相忱疲倦得实在吃不消了，就向裴牧师提出他不能出去了，裴牧师没有说什么，更没有丝毫责备相忱，只是跪在门后不住地痛哭着为相忱代祷……神垂听了弟兄的祷告，使他的刚强在人的软弱上彰显得更加丰盛，使疲乏者在他的里面重新得力，并且靠着他的恩典继续奔走在服事的路上，力上加力！我本人没有听他讲到过这件往事，但我确实看到相忱在以后服事中，再没有因为自己身体上的疲乏和病痛，轻忽过任何一点福音的事工。

裴牧师从日本占领军的集中营回到美国，虽然曾在九十年代两次来中国访问，但出于环境的限制，他再也没有能够继续他在河北这里的福音事工，可是他的心却时刻与他在大洋彼岸的弟兄姊妹们同在！在他晚年病重之际，相忱和我委托萧安娜老师的女儿萧语平去探望他，专门带去他喜欢的中国糕点。当听见萧语平姊妹的口中念出“袁相忱”这三个字的时候，已经久病卧床的裴牧师竟然奇迹般地坐起身来，目光明亮，大声地说：“Allen Yuan（袁相忱的英文名字），我的好同工！他来了吗？他在哪里？我要见他！我要见他！！”摩挲着我们给他带来的中国糕点，极度虚弱的裴约翰弟兄当时已经不能进食了，只是用手把点心细细地捻碎，任凭它们从自己的手指缝里不住地落下来，再落下来……

## 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欧美各国在沦陷区的宣教差会和福音事工，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摧毁殆尽。宣圣会在河北、山东一带的事工也不能幸免。

神借着那恶者夺去教会在世界上曾有的保护，就保守他们在磨难试炼中经历神更加丰盛的恩典。宣圣会被迫中断在河北南部这一地区的福音事工之后，当地的教会开始转入乡村家庭中聚会，神祝福他在中国地上的众教会，在一条自立、自传、自养的道路上，更深地连于主耶稣基督。

在日美开战之前，日本占领军出于对欧美列强的忌惮，对宣圣会这样的美国宣教差会比较少有直接的干涉。从我们到成安以后，基本上没有看到日本兵进入教会，相忱他们来往在乡间布道也没有受到日本兵的搅扰。听学生们告诉我，以前偶尔也有过一两个日本兵，扛着枪，从大门进到教会院子里，在操场上转了几圈，也不说话，就又出去了。

这一年的秋天开始，虽然日本人还没有公开地逼迫教会，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身边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变得凝重。从空中下来的阴霾，裹挟着越来越沉重的寒冷，一天一天地压向神在地上的

教会和他的儿女们。

首先是按照美国政府的命令，宣圣会开始撤离在华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属。裴牧师让裴师母带着三个孩子先期回国，他自己却自愿留下坚持工作，他让赵杰帮忙把一些比较贵重的生活用品，埋藏在牧师楼后面的空地里。这迫在眉睫的患难，丝毫不能阻挡事奉神的火热！裴牧师和相忱依旧一如既往地奔走在成安和周边各县，在乡村的教会中间来往传道。不久，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裴约翰牧师和其他几位同样自愿留在当地的外籍宣教士，都被从他们各自服事的外县教会召回到大名县总会集中。正在这时，尚志荣弟兄也因为要预备神学院的学习，前往大名的学校去补习初中课程。这样，原来一起同工的三个人，就只剩下相忱一人，独自骑着自行车继续在乡村间各处布道。

农村信息的闭塞，使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些在遥远的地方已经发生的重大事件。直到十二月初的一个清晨，大队的日本兵突然涌进东关教会，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明白眼前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不能完全明白这样的事情将要怎样地改变我们的事奉和生活。

那天上午大约九点多钟，我带着孩子们刚刚开始上课不久，就听说教会里来了很多日本兵，王珩弟兄已经被他们叫去问话，因为当时裴牧师和尚志荣弟兄都在大名，相忱也在两天前去山东省曹县的教会带领聚会，这时在成安教会的同工中，就只剩下王珩弟兄一人。

在这样骤然临到的变故之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教室里带领孩子们继续上课，同时也在心里默默地向神祷告，求神赐下平安在我的心中，也能通过我的心，把这平安传递给面前的这些孩子。

到了第三节课下课的时候，来了一个陌生人把我叫到教室门口，他自称是日本人的翻译，说：“你到牧师楼，有人和你谈话。”这时候刚刚上午十一点，本来后面还有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我只得安排孩子们自己在教室里自习，就匆匆地走出学校，独自一人向院子后面的牧师楼走去。

走在路上，周围并没有什么异样，只是多了两个穿着黄绿色军装的

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路边走来走去。这条路是我每天都要走的，此时却让我感到一丝的陌生，不知道在这条路的前面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深冬的天空向我显出它的阴暗，一点令人不安的寒意开始渗入我原本平静的心。我在心里默默地呼唤我的救主，主啊，求你保守我！

一步一步地踏上牧师楼门前不多的几级台阶，进到一层的小客厅，这里也曾经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这一刻却让我感到如此的陌生。小客厅的沙发上迎面坐着三个挂刀的日本军官，脚上穿着马靴，光着头，军帽都放在前面的茶几上，正用凶狠的目光盯视着我。我感受到一种黑暗正在从四周向着我紧紧地压下来，压得我有些透不过气，伴随着黑暗而来的一股寒冷，仿佛正在刺透我的皮肤，深深地刺入我的心。我在心里再一次呼唤我的救主，主啊，求你保守我！

我就这样站在他们的面前。为首的一个日本军官开始问话，“美国人去哪里了？你把美国人交出来！”

我回答：“我不知道。”

“不可能！哪里去了？”

“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一场异常冷酷而严厉的审问，我虽然不能直接听懂他们的问话，但是从他们的语气中就可以感触到那股扑面而来的煞气。到教室找过我的那个翻译，在一旁用并不流利的中文作着翻译。

听到我的回答，为首的军官口里哼哼着，一个劲儿摇头，用更加凶狠的目光盯着我，说：“你不交出美国人，是不行的！”

“我真的不知道，没有办法交。”

“你交出来！你不知道？！不可能！”

我确实不清楚裴牧师他们离开成安以后的情况，就如实地回答他们，说：“我真不知道，他们走时没有跟我说。”

这时，另外一个军官插进来，问：“你要好好想想，你们在一起，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告诉他，说：“虽然同在这个教会，但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我要教书。”



为首的那个军官晃着脑袋想了想，还是不死心，“你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那人看问不出裴牧师他们的下落，就又换了一种狡黠的眼光，打量着我，问：“你是美国人！你像美国人！”

他的问话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也许是他看我的皮肤比较白，把我当成了西方人。我只好向他解释：“我不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美国人的头发是黄的，我的是黑的。”

那军官看起来还是不肯相信，执拗地说：“你就是美国人！”

我只好再向他解释，“我是中国人，我丈夫也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基督徒，他去山东传道了。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实实在在的！”

可能我这样的回答被他接受了，也可能是确实从我这里问不出什么结果，这个军官的语调出乎意外地开始和缓下来，说道：“KIRISTO（日语：基督徒）应该是好的！”

其他几个人的态度也不像刚开始时那样的凶狠了，也允许我在一边的椅子上坐下。接下来，三个人又询问我一些关于教会和学校的日常情况，比如：学校有多少老师，多少学生，每天有几堂课，老师们有多少工资等等，我都一一地按照实际情况作了回答。

终于，为首的那个军官抬起手来看了看表，结束了这场审问，示意我可以离开。

我走出客厅，他们几个人也跟在后面出来。在楼门前的台阶上，还是为首审问我的那个日本人，突然抬手指着旁边我们住的那座小院子，问：“你在那里住？”我回答是，那人接着说：“晚上你要回来！”然后就和其他人径自走了。

听到那个日本人说要我晚上回来的话，我的心里“呼”的一跳，一时顾不上多想，只是疾步向院子前面的学校这边走去。

离开牧师楼不远，赵杰弟兄的母亲从身后悄悄地赶上来，在身边小声告诉我：上午，日本兵还有跟着日本兵一起来的汉奸部队皇协军，到我们住的小院里去了。等这帮人离开以后，她进去一看，屋里被翻得乱

七八糟，我们的东西都没了。她还叮嘱我：听说日本人要占领教会，不许随便出入，晚上还要有日本兵站岗，要我自己特别当心。临走还说小福音在她那里很好，要我放心。

和赵杰的母亲分手后，看看时间已经快下午一点了，正是午饭的时间，我就直接去礼拜堂旁边的食堂。听食堂的张大妈告诉我，上午我走后，日本人没有来骚扰学校，孩子们放学吃过午饭都回各自的宿舍去了。我这才放下心来，在食堂随便吃了一顿午饭。

吃过午饭，心里平静了一些。想想刚才赵杰的母亲讲述的那番情景，又想起我在屋里还存着一点重要的东西，就打算趁着白天回去看一看。出了食堂，看看院子周围四处正好没有日本兵，可能这会儿他们也都在吃饭了。我就一边留意观察四周的动静，一边快步走进我们住的小院。

虽然从赵杰的母亲先前的话里，我已经猜想到家里一片狼藉的样子，但是进门还是被眼前一场浩劫后的景象惊住了。床上的被褥都被胡乱地掀翻在一边，所有的抽屉、柜子和箱子都敞开着，几乎相枕和我两个人在家的所有衣物，我们的毛衣、毛裤，相枕的长衫、夹克、衬衫和皮鞋，就连我的女式大襟长衫都被席卷一空，还有相枕走时留在桌子上的一块怀表当然也不见了。我一眼望见敞开的柜门边上露出的半条腰带，赶紧抓在手里。真是感谢神！原来因为考虑在农村戴首饰不方便，临从北京出发之前，我就特别把结婚时母亲给我的两枚金戒指，用棉花仔细地包裹好，缝在我自己的一条布腰带里，也是预备紧要的时间使用。是神使恶者欲望的图谋落空，那些贪婪的强盗们竟然没有注意到这条普通的腰带。

我不敢在自己的房子里更多地停留，恐怕日本兵和皇协军随时会再回到这里。况且在这已经洗劫一空的家里，实在也再找不出什么可以带走的东西了。把这条藏着金戒指的腰带系在身上，我急忙离开我们住的小院，回到学校。

这天下午，几个日本兵押着王珩弟兄，在大院里各处清点、查封教

会的财产和储存的粮食，教会存放粮食的房子都被他们贴上了封条。

同时，日本人也查封了教室，再不许学校上课，也不许包括孩子在内的任何人离开教会的大院。在人的力量显得如此衰微的时刻，我和另外两位老师领着孩子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向神祷告。我们一起跪在学生宿舍的土地上，跪在永生神的宝座前，迫切地向神祷告呼求，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这样急难的时刻，正是我们最迫切需要向神祷告的时刻，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知道这个正在到来的夜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唯有仰望我们的神，仰望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愈加迫切地向神祷告呼求，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求你保守我们！

孩子们中午从教室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从下午就再也不能回去上课了，所以他们全部的书本、文具，还有圣经都没有带出来，一起被日本人封在教室里面了。那时候在乡村里，圣经是非常难得的，故而那些能够拥有一本圣经的孩子，都把圣经当作他们的宝贝。记得裴牧师曾经在学校里组织孩子们每周背诵一章圣经经文，一年下来一共就是五十二章，岁末的时候裴牧师要有考核，凡是能把这五十二章经文全部正确无误背诵下来的孩子，就可以得到一本崭新的圣经作为奖励。我亲眼看见，为了得到一本圣经，所有的孩子都在一年当中刻苦地背诵经文。现在怎能叫他们忍受就这样失去他们的宝贝。终于，几个在神里面有勇气的男孩子，乘着晚饭时间日本兵看守松懈的机会，钻窗户进入一楼的教室，把所有留在教室里的圣经，一本不落全部取了出来。这些爱主的孩子们，甘心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丢失那本在他们眼中贵重过自己生命的圣经！

## 七

黑暗再一次裹挟着寒冷从空中降下，一分一分地将那光压低，肆意地向人们炫耀它的残暴强横。冬日那短暂的白天就这样匆匆过去了，天很快地黑下来，夜晚来临了，那恶者也借着黑暗的夜晚，四处逡巡，寻

找一切他们可以吞噬的生命。

中午从日本人占据的牧师楼回来，我就一直在女生宿舍和孩子们一起。中间只偷偷地回我们住的小院看了一下，家里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特别是想起上午审问过我的那个日本军官最后说的那句话，更让我的心“呼呼”地跳个不停……相忱又不在家，原来的住处也不能回去了……我带着年幼的福音该往哪里去……还有身边的这些孩子……在这个被黑暗和寒冷所掌控的冬夜，哪里是我们可以安身的居所？谁能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攻击呢？谁又是我们这些孤苦无依之人的亲人呢？

我再一次在心里的最深处，向神呼求，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保守我们脱离那一切的恶者！主啊，求你保守我们！

孩子们大都亲眼见了白天我被日本人叫去审问，听说了我们家里被他们劫掠的情形，也都在为我和小福音晚上的安全担忧。看到我为此而愁苦，就纷纷围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争着安慰我，“老师，您别害怕。咱们一起祷告！”“老师，您千万别回去，就在我们这里住吧！”“对啊，您就跟我们在一起吧！”正说着，张大妈从外边进来，告诉我：日本兵正在外边闹着要找“花姑娘”。她还提醒我，女生宿舍这里距离礼拜堂、学校的楼房和前面的大门太近，日本兵就总在这附近活动，很可能他们随时会进来搜查。教会后门那边周围全是空地，不引人注意，日本人也很少往那边去，后门边上的门房晚上没有人住，你们今天晚上不如就到那里躲避一下。

大家都说这是个好主意，我也觉得张大妈的话确实有道理，可小福音怎么办呀？我抱着孩子正在犹豫之时，刘树林从人群中走出来，稳稳地从我手中接过福音，说：“梁老师，我们替您带着福音，您就放心别管了。”刘树林在我教的班里是年纪比较大的男孩子，平素我就对他的成熟稳重非常放心，这时，他正好和班里的几个男同学过到女生宿舍来看望我。见刘树林已经抱过了福音，另外几个和他同来的也齐声劝我放心，他们几个保证和刘树林一起照顾好福音。

我被面前这些少年人，在主基督里面的爱心所深深地感动。在天上，神是我们亘古也不动摇的坚固磐石；在地上，和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蒙恩而互为肢体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亲人。

容不得我再有多想，一群女孩子把我拥在中间，张大妈在前面引路，远远躲过在路上巡逻的日本兵，从远离道路的空地上，悄悄地摸索着绕到教会的后门。这里果然没有日本兵，我们顿时松了口气。

教会后门边上的这间门房，房间倒是不小，但是里面除了一铺炕和一个灶台之外，什么也没有。张大妈又叮嘱了我们几句，就急忙回前面去了，临走时还用事先预备好的一把锁，把房门从外面锁上，让人看起来就像是里面根本没有人的样子。

这间房子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了，在深冬的夜里，四处都是黑漆漆，冷冰冰的。我们不敢出声，不敢点灯，更不敢生火取暖，生怕招来任何人的注意，彼此搀拉着，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摸到炕边上。黑暗里，手触及到的只有冰冷和坚硬……

孩子们就像事先商量好了一样，把我推进炕的最深处，让我靠着屋角坐在最里面，分不清是哪个稚嫩的声音，轻轻地安慰我：“老师，别害怕，我们保护您！”十多个女孩子就在我的外边，一层一层地围着我，年龄大的坐在里面紧挨着我，年龄小的坐在外边。我到现在还记得，坐在最外边的是年龄最小的薄金荣姊妹，当时才 11 岁，是四年级的学生。

不能点灯照明，屋里没有一线的光亮；也不能生火取暖，屋里更是没有一丝的温暖；除了屋外嘶哑吼叫的北风，周围在没有一点声响，仿佛整个世界已经归入死亡，再没有些许的生气，我们这十几个孤苦无助的生命，完全被抛在黑暗的击打和寒冷的撕扯之中……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我的心随着圣灵的感动，在心里的最深处向神呼求，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求你保守我们！

这样的时刻，岂不正是我们的祷告良辰！“我们祷告吧！”我用几乎只能让自己听见的细微声音，对周围的孩子说：

“我们来向神祷告吧！”

“老师，我们祷告！”

“对！我们祷告！”黑暗中，孩子们在用她们的信心来回应着我这微小的信心。

虽然不能出声，我们都在自己的心里高声地赞美神，赞美掌管万有又满有慈爱的神！荣耀颂赞归于那位至高的主！渐渐的，在我身体的里面涌出一股温暖的源泉，一直地向外流淌。虽然我也不能听见身边这些孩子们祷告的声音，但是我已经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她们呼吸之间发出的生命气息，这气息壮大如基甸在摩利冈下的角声，使软弱者靠着耶和華神的大能刚强壮胆，出去迎战强大的敌人。

我俯伏在公义的神面前，为教会和同工们献上祷告；为晨光学校的孩子们献上祷告；为不知下落的裴约翰牧师和其他的宣教士献上祷告；也为身边这些爱我，愿意舍己和我一同担当忧患的孩子们献上祷告；更是特别的为这一天当中，神给我的奇妙保守献上完全感恩的祷告，是他以慈爱垂听他使女在急难时的呼求，用他大能的右手保护他这卑微的使女，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

这个如此黑暗寒冷的时刻，相忱又在哪里呢……山东曹县的教会和成安教会一样，都是宣圣会建立和牧养的，今天发生在这里的逼迫，是不是也会同样发生在山东那边呢……相忱有没有遇到危险……我为相忱在神的面前祈求，求神保守他的平安！求神的灵带领他尽早回到这里来；求神的灵告诉他，这里的教会和弟兄姐妹需要他，告诉他，我和我们的小福音更需要他。

正当我们在祷告中享受着神与我们同在的平安的时候，突然间，外面的黑暗中由远及近响起一阵“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因为在教会里从来没有见人穿过这样的皮靴，很显然，这是一个日本兵的脚步声。那双沉重的皮靴肆意地蹂躏着脚下冬天坚硬的土地，也振动着我们的心，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我的心也在里面“呼呼”地撞击着我的胸膛。“咯噔、咯噔”的声音已经到了门口，我的心“嗖”地紧缩成一团……但这

个脚步并没有在门口停住，而是径直地走了过去，听着声音一步一步地远去，我的心也慢慢地柔软下来，忽然，这个声音又从远处折了回来，我刚刚放松下来的心又“嗖”的紧缩在一起，像一块石头，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结不动了……这次脚步声经过房门仍然没有停顿，同样直接走过去到了远处又再折回来。我想起白天赵杰的母亲曾经提醒我，她听说日本兵晚上要在教会里站岗巡逻，看来现在外边的脚步声大概就是他们派到后门来的哨兵。

“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这声音由远而近，又由近渐远，似乎永无休止地振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一阵激烈的犬吠打断了日本兵的脚步，从声音可以分辨这是教会驯养的一只看守院子的狗。犬吠声越来越高亢，猛然间，“呃”一声凄厉的惨叫，像黑暗中射出来的一枝利箭刺痛我的心，惊得我几乎失口喊出声来，随着一连串痛苦而无力的哀鸣逐渐微弱下去，寒风嘶哑的鸣叫再一次充斥了外面的世界。只有片刻的功夫，那“咯噔、咯噔”的声音又重新在身边响起……

神啊，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保守你的众儿女！求你亲自在周围为他们树立你的坚固盾牌；求你亲自封闭一切恶者的眼目，使他们看也看不见。

我和孩子们在不住地祷告中，经历着神赐平安的保守。不知什么时候，外边的脚步声已经不再响起了。

## 八

屋子里出奇的安静，没有一点点的响动。感谢神，感谢他赐下这般奇妙的平安在我们中间！虽然没有一个人说话，更没有一个人动一动，但是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和身边的人都不曾进入片刻的睡眠；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和自己一样，都在时时的警醒祷告之中，度过这个

蒙神亲自保护的平安夜晚。

清晨开始给世界洒下星星点点的亮光，在黑暗仍然占据的空中并不那么显眼，但每个人都晓得这正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时刻了……

一阵局促的开门声打碎了周围的沉静，从门口涌入的逼人的寒气，顷刻间把我们身上的温暖扫得荡然无存。张大妈急匆匆地跑进屋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梁老师，早晨他们说要搜查，你可要想办法躲躲呀！”我一时被惊得不知所措，只愣在那里。张大妈把我扯到屋里的灶台旁边提起灶台上的那口大柴锅，翻扣在边上，说“你快把锅底灰抹抹脸，抹黑脸。快！”

我也来不及问个究竟，只是机械地照着她说的，用手把锅底上的烟灰在脸上使劲地抹了又抹。

“老师！老师！……”几个在门口望风的孩子闯进来，手指着外边，焦急地冲着我大喊：“他们来了，你快躲躲啊！”

几乎就是在这同时，“咯噔、咯噔……”昨天夜里曾经无数次的撞击我们心脏肺腑的脚步声，又在离我们不远的地上重重地响起。

主啊，求你保守我！心里再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喊……我不顾一切地冲出房门，只为要躲避那恶者的脚步。

这时候，大约有六点钟左右的样子，绵长的冬夜还不甘心就此退去它的势力，仍在用它那已经露出破败的黑暗，顽梗地抵挡着光明的临到。光明和黑暗绞杀在一片弥漫着寒风和雾霭的空中，地上的一切都只勉强地显露出一丝迷茫的轮廓。

顺着那皮靴的响声传来的方向，一个黄绿色的影子正往这边飘过来。我身上一瞬间被一股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大力量所充满，向着那影子相反的方向拔腿飞奔。那影子“哇啦”一声怪叫，朝我追来，皮靴声“吭吭吭吭……”地响成一片。

奔跑的脚如快鹿的蹄，不论是道路还是荒野，轻捷地跨越地上的一切坑洼坎坷，我身上的力气仿佛真的永远也不会用尽，只是凭着信心，向着神奔跑。我是多么的渴望张开口，大声地向神呼求，主啊，求你救



我！求你搭救我！可喉咙却被扑面而来的寒风严严地压制着，发不出一声声音。我唯有拼尽全身的每一点一滴的力量，从心底里的最深处向着神不停地呼喊，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搭救我！

那野兽疯狂的吼叫声就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刺刀的寒锋也在不断向我逼近……心在我的里面“咚咚咚”的剧烈跳动，几乎时刻就要撞破我的胸膛。我唯有拼尽全身的每一点一滴力量，从心底里的最深处向着神不停地呼喊，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搭救我！

不知道已经跑出了多远，也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不知道还要这样再跑多远，更不知道最终要跑到什么地方……只是凭着信心，向着神奔跑。身后的野兽仍在不断的吼叫，但它那撕咬人的牙齿却没有追上我。我脚下的步子没有疲劳，身上的力气没有衰减，仍然满怀信心，全力地向着神奔跑。

眼前的地上出现一个黑乎乎的洞口，那是菜窖！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过丝毫的怀疑，那一时刻，若不是神亲自的带领，我如何能像归巢的鹰，飞一样地直扑进那个洞口。

把自己藏在菜窖最深处的菜垛子后面，我的心还在里面“咚咚咚”地猛烈冲撞着，仿佛也要奋力地跳出胸膛的束缚；滚烫的血液在全身激荡，好像要从每一个毛孔眼里喷涌出来；我虽然尽力张大口，但喉咙仍被说不清什么东西严严地压制着，不能呼吸，也不能出声。我真是想尽情地向着神大声呼求，主啊，求你现在就来速速地搭救我！求你速速搭救我！

一直在身后追赶我的日本兵也到了菜窖门口，站在那里“呜哩哇啦”地大声嚎叫着。菜窖原本只有用几片残破的木片钉成的半截子木门，无论怎样也绝不可能阻挡野兽狂野的践踏冲击，菜窖里面总共也就是二十平米见方，除了这个门再也没有其他的出口，我也实实在在已经再无路可退……人的道路已经尽了，唯有神才能为我开辟新的道路！主啊，求你垂听孩子在这最急难时的切切呼求，求你作我的帮助！至高的全能者，求你将我隐藏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求你以大能的手，救拔我脱离恶者的

网罗和牙齿！慈爱的主啊，求你搭救我，求你速速地搭救我，求你不要耽延……

过了一会儿，那个日本兵并没有下到里面来搜捕我，菜窖门口的叫声也没有了。菜窖内外都是静悄悄的，我却还是一动也不敢动，更不敢向外面探头张望，只是安静地向神祷告。

这时，时间在我的意识中真是既漫长又急促，也不知又过了多久，那个日本兵并没有回来，也再没有其他的人来过菜窖门口，四周是这么安静，一切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似的。刚刚还在猛然跳动的心，这会儿也进入了安息，让我甚至忘记了她在跳动，不眠的一夜和那阵奔跑已经倒空了我身体里的所有力量，我就这样依在菜垛子上，身体一动也不能动。透过菜垛子的间隙，一缕光明从门口照进来，温和而坚定，虽然我身所在的菜窖深处仍是幽暗阴冷的，但这光分明告诉我，天已经亮了，黑暗和其中的一切必定要退去，这里已经是光明的世界。我全部的身心，还有我周围的一切，都满足在得神保守的平安之中。只在心里更加迫切地向神祷告，赞美，感恩，祈求。

不知又过了多久，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在门口低低的唤着我，“老师，老师……”是我的学生！我手扶着菜垛子从里面一步步地走了出来，“老师，给您饭！”已经到了午饭的时间，递到我面前的是已经失去了大半热气的一碗小米粥，还有一个玉米面窝头。顾不上已经是又饥又渴，我先急急地问来的学生：“孩子谁看着呢？”

“刘树林，还有大家轮流看着呢，您就放心别管了，赶快吃点东西吧！”看着我吃完了送来的饭，那学生临走时又嘱咐我说：“日本人还没走呢，您先在这里躲着，到时候我们给您送饭。”

送走了这个学生，我又摸着菜垛子回到原来藏身的地方。吃了些东西，身上恢复了一些力气，又知道有刘树林他们在照看着福音，心里更是平安了很多。仍是靠在菜垛子上，我开始一点一滴地回想着正在发生的事：那个追赶我的日本兵一直就跟我身后两三百米远的地方，枪上的刺刀离我的身体也就差一米左右，可就这样从后门到菜窖跑了这么远，

他竟始终没有追上我；大概这家伙从一开始就没看清楚我是谁，也可能是害怕菜窖里太黑，他既没有自己下来，大半天过去了，也没有回去叫来更多的同伙。记得从前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就热爱体育锻炼，尤其喜欢跑步，想不到今天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刻派上了用场，原来神就是这样为我预备的呀！我在心里高声赞美神奇妙的恩典！

菜窖是在平地上挖成的一个两米多深的大坑，上面用木材担着横梁，铺上芦席，再覆上土。里面贮存的是供教会和学校一百多人过冬食用的大白菜，都整整齐齐地码放成一人多高的四方垛子，垛子和垛子之间的空隙只能容下一个人侧身站立。我侧着把一边身子倚靠在菜垛子上，阴冷潮湿贪婪地吸食着我身体内的每一点热量，很快这边身子就被冻得僵硬难忍，我不得不使劲地拉扯开已经和白菜粘在一起的衣服，吃力地转过来，再把那半边身子倚在另一边的菜垛子上，同样很快，那边也冷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再换回这边……

晚饭的时候还是有学生给我送饭，只是这次的饭食换成了白面和鸡蛋做的摊饼。手里捧着这饼，我含着热泪向神作感恩的祷告，感谢仁慈的神，以他完全的信实保守我们日用的饮食永远也不缺乏！也感谢这些如此恩待我的弟兄姊妹！教会的粮食早在昨天就被日本人查封了，这个时候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宝贵的白面粉和鸡蛋。虽然食物到我手里只剩下一点余温，但我捧着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同为肢体的火热爱心！我明白这些十多岁的孩子是在冒着极大的风险，避开日本兵们的注意，穿过整个教会的院子，才把这些食物送给我。

晚上送饭来的孩子还特别告诉我，日本人今天还在教会里四处寻找我，追问‘花姑娘’呢？美国的！’大家要我这时一定不要出去，他们会按时把饭给我送下来，也会照看好福音，要我一切放心。以后的几天，孩子们都是按时把饭送来。

夜晚的菜窖里更加寒冷潮湿，已经在这里站了一整天的我，到了这会实在是虚弱得再也站立不住了。可即便是我把自己纤细的身体硬塞进两个菜垛子之间的缝隙，也只能是艰难地半蹲半倚着……

虽然身体几乎已经和旁边的菜垛子一样冰冷僵硬，祷告的心在我的里面却更加火热燃烧。我赞美神，因他以伸出的右手作我在急难时的避难所！赞美神，因他以大能的盾牌为我抵挡一切的恶者！我感谢神，因他在这样的患难中试炼我，又亲自保守我，更是带领我在生命中领受他的真实！

我不知道还要这样躲避多久，就愈加思念相忱，盼望神能够带领他早一点回来，这里的教会和弟兄姊妹需要他，我和孩子也需要他。求神使他听见我此时的祷告，求神让他看到我此时的心，也求神保守他回到这里的道路。

就这样在菜窖里度过了三天三夜，直到第四天早上，大队的日本兵和皇协军都已经离开了教会，只剩下少数几个把守大门的卫兵，大家看到局势确实已经平稳下来，才让学生把我叫上来。

这三天三夜，我时刻在阴冷潮湿中，不能坐卧，也不能有一时片刻的睡眠。但是神却在我的祷告中亲自陪伴我，保守我安稳在他的怀抱里。

## 九

虽然大部分日本兵和皇协军都已经离开教会，可大家为了我的安全，都不让我再回我们原来住的小院子。于是，从菜窖里出来的当天晚上，我就仍是留在女生宿舍。

第二天，我正在女生宿舍里休息，快要吃中午饭的时候，听见屋外一个声音问：“梁老师在哪儿呢？”是相忱的声音！马上就有一个欢喜的声音回答：“在女生宿舍这头呢！”我猛地站起来，相忱那熟悉的笑脸已经在我的面前：“感谢主，你们都平安！”

啊！是相忱回来啦！真是他回来啦！见他身上只穿着一件粗布的短衫，外边的长衫和帽子都不知哪去了。

我正惊喜得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相忱却看着我，呵呵地笑出了声，边笑还边指着我的脸问：“你脸上怎么了？这么黑啊？”

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笑了起来，说：“锅底灰！”听了我的回答，相忱笑得更厉害了，问我：“你干吗抹锅底灰呀？”我摸着脸，说：“人家都说我白，像美国人。张大妈说让我抹点锅底灰吧，好躲一躲日本人！”

从菜窖里上来，因为原来放在我们屋里的肥皂都被日本兵们抢走了，我就用清水简单地梳洗了一下，也没顾上找个镜子照一照。哪里想到那锅底灰是这么难洗，真不知道当时自己的脸上是个什么样子……

年轻时的相忱真是爱笑，脸上时时都带着喜乐的笑容。即使在这样的患难时刻，还是笑得这么开心，使我们在他身边的人，也一同被神借着相忱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平安所感动。感谢神，真是他奇妙的大能，在一瞬间完全地驱除了几天以来压在教会和众弟兄姊妹身上的幽暗，把绵延的忧愁换成在他里面无尽的喜乐和盼望。

相忱回到成安，就忙着和同工们商量安排教会的善后事工。以后才听到他讲起在这些天的经历当中神给他的带领。我们现在都知道，日本对美国的开战原本就是他们蓄谋已久，显然他们对沦陷区内欧美宣教差会的接管也是早有计划的。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裴牧师和其他美国宣教士就在大名被捕，关押进日本占领军在山东省潍县开设的集中营。直到一九四三年，由于美日双方交换彼此扣押的对方公民，他才得以回到美国。几乎在日本人占领成安教会的同时，宣圣会在这一带的各个教会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日本的侵占。那一天，相忱正在与河北紧邻的山东省范县（现属河南省）带领聚会，晚上就住宿在宣圣会在范县当地的一所小教堂里。夜半时分，日本兵突然冲进来强占了教会，宣布那里所有属于美国人的财产都由他们接管了，命令教会的中国传道人带着个人物品马上离开。

相忱马上想到此时其他教会必定也都难以幸免，特别是神感动他，把对成安教会和弟兄姊妹的托付放在他的心上，同时也是惦念独自在家中的我和福音。天刚亮，他就急忙地告别了那里的同工，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赶回成安。等他经过几天的跋涉，回到成安东关的教会一看，教会的大门口已经站上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虽然相忱恨不得马上就进去，

但他还是强忍着焦急先在大门附近谨慎地观察了一会，想着碰上个熟人或者里边正好有人出来，就能了解一下教会里的情形。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动静，相忱不愿再继续等下去，就把自行车推到旁边一个僻静处，脱下身上穿戴的长衫和礼帽，把这些都暂时放在外边，只穿着里面的短衫走到门口站岗的日本哨兵面前，告诉他自己是这里教会的传道人，现在要进去和里边的同工商量尽快解决教会的善后事情。日本兵听不懂，就把翻译叫了出来，相忱就又把同样意思的话向他讲述了一遍，这个翻译是个东北人，看相忱说得挺有道理，又见他是这一身普通当地人的衣着打扮，就同意相忱进来了。

相忱平安回来了，我就更有“主心骨”；又看到神如此眷顾他卑微的婢女，心里也更被由他而来的平安所完全充满。我把我们原先的住处重新收拾干净，虽然绝大多数衣物和日常用品都被劫掠一空，好在被褥什么的大多还有，相忱回来以后我们晚上就还在那里住。

相忱和王珩弟兄他们商量，看到教会的礼拜堂和学校的教室都已经被日本人查封了，大门口还一直站着日本哨兵，既不许信徒们在这里聚会，也不许晨光学校上课；并且教会原来储存的粮食也都被他们运走了，就决定劝同工和老师们返回各自的家乡，继续事奉。王珩弟兄拿出教会剩余不多的一点存款，按照路途的远近分给要回家的人作路费，分到每个人手里的钱确实很少，可是谁也没有半点抱怨。

晚上，相忱回来，把白天和同工们商量的结果讲给我听，还特别提到他谢绝了王珩弟兄专门给我们全家留出的一笔路费，告诉他：“我来农村传福音是神的呼召，所以我不走，我还要留在这里继续事奉！”说到这里，又笑呵呵地看着我问：“你说怎么样？我们走还是不走啊？”因为神在我的心里本来有着与相忱完全合一的感动和带领，所以我对相忱这样的选择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也就平平安安地回答他：“我当然也不走！”听到我这样的回答，相忱更是高兴不已。

但是，东关这里的教会已经被日本人侵占了，我们该如何继续在这里的服事呢？这确实是个难题，一时也没有明确的方向。于是，相忱

和我就同心合意地俯伏在神的面前，迫切地祷告，相信神既然带领我们在这里与他同工，就必定亲自为他的工人们打开通达的道路。

就在相忱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尚志荣的父亲尚青梅老弟兄出乎意外地来到东关教会，他是才在家里听说日本人在几天前占领了这里的教会，就急忙地赶过来探望。尚老弟兄见相忱还留着没走，也以为是我们回去的路费上遇到了难处，就掏出带来的五元钱交给相忱，说：“你拖家带口的也很不容易，家又那么远，我给你五块钱作路费吧。”没想到，相忱却向他表明了自己继续留在这里服事的心志：“我来农村是顺服神的呼召，是来这里传福音的！现在这片广大的禾场正需要工人，工作好不容易有了些起色，我怎么能离开呢！”尚老弟兄原来以为相忱只是跟着裴牧师来这里工作的，现在教会和裴牧师都不在了，相忱自然也不会留下了。现在他看到眼前这位瘦弱的年轻人，真正是完全顺服神的呼召，甘心情愿地在这里奉献服事，就被圣灵感动，马上毫不犹豫地说：“既然你有这样的心志。明天我就套车来接你们，你们就住在我家吧，我们还能一起同工！”

果然，第二天，尚老弟兄就自己套了一挂牛车来，把我们一家三口还有王珩弟兄都接到他在北散湖村的家里。

深冬的季节，四周的田野在人们的眼中只是一片苍茫。但是，神却让他的工人们在心里看到：

经过那春天的撒种，  
夏天的守望，  
秋天的收割，  
到了现在，  
神家的粮仓里已经满有了初熟的新谷。

感谢神为他忠心的工人们预备下更广阔的新禾场，在心心里期待下一个流泪撒种的春天，使这些仓中的新谷，都成为田野中的籽粒，成为田野中的祝福，成为田野中全新的盼望！





第六章

強暴人備過人的時候，

牆壁像他。

暴風之外。

判外邦人。

想，元下，落，禁，止，強，日。

象，想，元，禮，云，物，清，化。

去，這，家，書，十，年，或，三。



我们一家三口被尚青梅弟兄接到他在北散湖村的家里，同车的还有王珩弟兄和我的学生陈爱菊等人。

尚青梅弟兄那年有五十多岁的年纪，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识字又很喜欢读书，就有了一些传统文化的根底。一九一七年，他悔改信主以后，教会发现当时还是年轻人的尚青梅弟兄非常热心，又有一定的文化，就推荐他到宣圣会在大名开办的孤儿院教书，可是尚弟兄却常常在课堂之上滔滔不绝地传讲福音，这时教会觉得这个心里火热又很有些口才的青年人其实更是个作传道人的材料，于是又把他派回宣圣会在他家乡成安县的教堂担任传道人。他很擅长在乡村中布道，因为他看过不少古典小说，所以和当时大多数的乡村传道人一样，他们的布道在语言风格上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说书人。听尚志荣弟兄说：有一次，他父亲曾经在戏台的对面搭了个棚子布道，结果硬是把大批的观众从戏台那边吸引到他这边来。早在我们来到成安前，尚青梅弟兄就已经离开宣圣会，成为一名活跃在乡村间的自由传道人，但他仍然常到东关教会来，我也有好几次在东关教会的主日聚会上见过他。记得有一次，尚老弟兄来东关教会，正好碰上两岁的小福音跟在我身旁，他故意装作很神秘地捂住自己的衣袋，笑嘻嘻地问福音要不要吃糖，引得福音瞪大眼睛盯着他的时候，他却突然像变魔术一样从袋里掏出一块窝头，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

尚青梅弟兄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儿子全家都是信主的。一九三七年，他还把刚从小学毕业的小儿子尚志荣送到大名的圣经学校，后来也和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传道人。尚老弟兄在成安县和周围几县的信徒当中很有影响，在他家里也很早就有了固定的聚会。

在信心上质朴单纯，有事奉和传道的火热，又能熟悉和适应本地信徒的牧养状况，这些是以尚老弟兄为代表的本地传道人所共有的特点；但是同时，他们又都普遍缺乏比较正规的基础教育和系统的神学装备，

所以，教会还是缺乏有训练的工人来牧养。因此，裴牧师和相忱他们曾经做的在福音布道以外的另一个主要工作，就是轮流在各个村镇之间带领聚会。

北散湖是个有着百余户人家的村落，村里主日的聚会有八九十人，地点就在尚家的三间北房里。我们来到以后就由相忱承担起主日的讲道。聚会前先是由我带领大家唱诗，这里的信徒们绝大多数都不识字，更不能识谱，虽然相忱和尚志荣弟兄两人都会拉手风琴，但他们以前用的手风琴都被扣留在东关教会里不能带出来，乡村里也找不到合适用于伴奏的乐器，所以就只能靠我自己一句一句地反复为大家教唱；唱过诗歌后就是由相忱来讲道。主日的聚会之外，开始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信徒三三两两地到我们的住处，最多时有十多人，他们有的只是来看望我们，有的想要学习唱诗，有的是来求教一些有关圣经的疑问，还有的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遇到的难题……于是，相忱又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家里建立起了查经聚会。相忱在家时，都是他带领大家查经，后来他外出不在的时候，就由我来带领村里的姊妹们学习。来的姊妹们主要是些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几乎都不识字，我就找来一块小黑板和识字课本从教她们认字入手。姊妹们学习的热情很高，我第一次所教写的生字，下一次考试时大家都能写出来，过不多久这些姊妹就从起先的不识字到慢慢地能自己读圣经。弟兄姊妹都尊称相忱为“袁先生”或是“袁弟兄”，称呼我“梁老师”。

自从日本军队封闭了宣圣会在大名、成安等处全部的教堂，抓捕了所有的外国宣教士之后，在这一带城乡当中原有的各处聚会，很多因为失去牧养再加上世道的混乱而陷于停顿。待等到外面的形势稍微安定下来，相忱就和同工们商量恢复到各个村庄去带领聚会，帮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

和相忱一起外出去带领聚会的同工主要有尚青梅、尚志荣父子和王珩弟兄。王珩弟兄家住在与成安相距五十多里的魏县，这时也常来往在两地之间，来到时他和我们同住尚青梅的家里。首先是北散湖附近的

村庄纷纷来邀请相忱到他们那里带领聚会和讲道查经，随后很快就扩展到邯郸、永年、大名、广平和邻近的魏县。相忱和同工们还是采用和从前一样的方式，在一个村子里连续停留三五天带领那里的奋兴会，然后再赶到下一个村庄，参加聚会的都是已经信主的“老信徒”为主，沉睡的灵被重新唤醒，冷淡的心再次火热起来；摇动的得到坚固，丢失的再被寻回。

相忱他们的交通工具就只有自行车，出发以前，同工们都把一面中间绣有十字架的三角形的小红旗挂在各人的车把上。主亲自在前引导他的工人，在乱世中为他们打开平安通达的道路。那时在华北南部一带，日本军队和皇协军占据着城镇和道路，八路军、游击队等抗日军队则时时在远近各处出没，乡村中间还有各类名目的地方武装甚至土匪。相忱他们几个人在路上最多时候是被日本军队和皇协军截住盘查：“你们是干什么的？”同工们就照实回答，说：“我们是基督教传道的。”通常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刁难。还有为了应付路上可能遭遇的各种盘查，相忱他们出门时身上总会同时带有日本军队发行的钞票和八路军通用的钱票，因为遇到日本军队或者是皇协军，倘若你身上只有八路军的钱票，他们就会以为你是八路军，后果可想而知；但如果只带日本军队的钞票，碰上八路军或游击队时又会被误当成是汉奸，结果同样危险。裴约翰牧师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经提到，他本人就有一次在邯郸火车站被日本卫兵搜出身上带有五元中国的纸币而险些遭遇不测。所以相忱和尚弟兄就使用所带的这两样钱来达到各自不同的用处，但不管面对任何人，他们都会坦然地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传福音的。”

相忱他们遇上八路军的时候并不多，只有一次他和尚志荣弟兄两个人正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猛地听见前面不远处传来一阵枪声，他俩连忙跳下自行车，一边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一边赶快把身上带着所有的钱都扔了出去，因为他们一时摸不清前面来的属于哪一方，不知道该是拿着哪一种钱，为了保险起见就干脆把钱全都扔掉算了，走到近前才看出对方原来是八路军，真是虚惊一场。八路军对他们很和气，听说他们把钱

全扔了就挺同情他们的，还特地招待相忱他们俩人吃了一顿饭，相忱看到八路军的生活也非常的艰苦，吃的也是小米稀饭，当时有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相忱听士兵都叫他“郭司令”，但不知道他的名字。饭后，这位郭司令还派人护送他俩上路，关照他们在路上务必要多加小心。其实，相忱是对自己非常节俭的人，外出时大多并不带什么钱，即使带钱也很少花。

相忱一向不太关注时局的变化，我发现自打我们从县城东关的教会搬到北散湖村后，相忱就很少再进城。原来，第一是因为城门那里都有日本卫兵把守，强迫所有进出经过的人都必须向他们鞠躬，相忱当然不愿意，所以搬出东关的教会以后除非为了事工非去不可的时候，他都绝不再进城去了；第二个原因是相忱平时来往的信件较多，可有一次他去县城里的邮电局取信时，一位在那里做事的信徒很紧张地把他拉到一旁，悄悄告诉相忱今天在他的信中发现有夹带了八路军宣传抗日的传单，幸好是被这位弟兄看到了，要是被其他人发现去报告给日本人，可是个相当严重的大事情。相忱接过信一看，里面确实夹着一大沓抗日传单，再看信的落款和寄出的地址自己根本不认识，但那个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又确实是他的。这位弟兄对相忱说：“最近日本人对抗日传单查得非常紧。您最好不要来了，免得惹麻烦，弄不好还得耽误神的工作。以后再有您的信我想办法托人给您带过去。”相忱一听觉得他说的确实有道理，谢过那位热心的弟兄，自己便更少进城去了。

要说相忱不去城里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太忙了，他已经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各处乡村教会的牧养之中。农村的信徒们渴慕神的真道，可是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识字，这就需要相忱他们这些工人在话语的服事方面付出最大的辛劳；此外对于相忱这个“外来户”传道者，他还需要下更多的功夫来了解和把握农村教会牧养的规律，使自己的服事能够产生合乎神心意的果效。他还是和在东关教会时一样，出去一趟就是二三十天，回家休整上三五天就又走了，如果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和裴牧师一起还能有几分安全保证的话，那么到了这时相忱几乎是全无

遮拦地敞开在这个战乱的时代当中，但他却毫不顾及周围的环境，忘却一切的劳苦，心里只想着为主传福音。相忱每次从外边回来脸上总是笑呵呵的，那是圣灵在他生命中结出的喜乐之果，看着他这个样子我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故意开玩笑问他：“打胜仗啦？凯旋回来啦？”听到这话，相忱更加笑个不停。有人得救，他就会高兴；有人被坚固，他就会高兴！

神口中的气息，使他早已预先撒在地下的种子得以苏醒，又借着他的工人們的耕耘浇灌而成长，使这片田野成为收获的禾场！

成安本地教会中最重要的活动莫过于每年五旬节的奋兴大会，一年一度的农历三月初六，成安以及附近各县的两三千名信徒赶着大车，拉着各自预备好的粮食、被褥等等，齐集到尚家所在的北散湖村，在村子的场院里进行连续七天的聚会。参加聚会的人们每天都是跪在土地上祷告，席地坐在场院里聚会听道和查经，夜间也露宿在那里。众人同心合意地向着神祷告，追求被圣灵充满，几乎所有的会众都向神痛哭悔改。圣灵如火，复兴了神的教会。

在苦难中撒下的福音的种子，也在苦难中结出丰满的果子。在后来的大逼迫中，当地有很多信徒因为对神至死忠心而坐牢，甚至殉道。尚青梅老弟兄就是一九六〇年五月份在监狱里为主殉道的。然而狂暴的风雨终究不能吹灭圣灵的火，成安乡村的教会即使是在最严酷的逼迫中也没有停止他们的聚会，有的信徒设法秘密地聚会，有的信徒因为坚持聚会遭到捆绑殴打和批斗示众，但他们一被释放回到家马上继续聚会，有的少年人因为坚持信主而宁愿被学校开除。从那时到今日，将近七十年过去了；从那时到今日，基督的福音和教会也已历经了三、四代人；从那时到今日，神的荣耀在那地之上彰显。

## 二

我们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在东关教会时就已经被日本军队和皇协军劫掠一空了，一家三口几乎是两手空空地来到北散湖村。我们刚在尚青梅

弟兄的家里安顿下来，北散湖和附近村里那些我曾教过的学生听说相忱和我来了，马上都赶到尚家来看望我们。孩子们看见我们缺少日用品，就纷纷从各自家里为我们送来被褥、衣服、鞋子还有食物等等，有家境稍好的学生甚至给我拿来了肥皂。感谢神，我们一家人的缺乏就是这样在弟兄姊妹的爱心中，顷刻间成为丰富并且有余。夜晚，我躺在孩子们送来的被褥当中，虽然这些被褥和衣物都是农村家纺的粗布做成的，但她们让我感觉到格外的厚实，格外的温暖。

尚家的生活比较富裕，有属于自己的场院和石磨，有小牲口，还有自己家的粮囤，算是当地的小康之家。尚青梅夫妇俩和三个儿子都信主，而且都是热心事奉，父亲尚青梅和小儿子尚志荣都是传道人，平时家里的生活主要都是靠尚青梅的大儿子在田间耕种劳作来维持。初到尚家的那几天，尚老弟兄热情地坚持要我们和他家人一起吃饭，但是相忱和我也觉得不应该这样麻烦人家，相忱就对尚老弟兄说：“我们长期在这里住着，我们还是自己开伙吧。”尚老弟兄推让再三，也只好同意了。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熬小米粥，蒸窝头，也自己腌酸白菜。窝头不像馒头那样容易蒸熟，因此需要在底下做一个拇指大小的孔洞，这样蒸汽从内外同时蒸才更容易熟。我从前在东关教会伙房里向张大妈学得的技艺这时终于派上了用场，我在一个瓦盆里用水和好玉米面，然后捞起一个面团托在左手的掌心里，右手的拇指从侧面插入面团中间，接下来左手在外面托着面团一边颠着一边转着，右手随着面团的转动在里面不住地按压出一个洞，最后把有空洞的一边朝下放在蒸锅的屉上，再蒸熟就算完成了。相忱并不知道我早就学会了怎样蒸窝头，从外边回来一眼看见桌上的这盆窝头还以为是哪位乡亲送来的，就略带惊喜地问我：“这窝头是人家送给你的？”听他这样说，我强忍住心里的兴奋，微笑着一字一句地对相忱宣布，说：“是……我……自……己……蒸……的！”

“你会蒸窝头啦！”这下相忱吃惊得几乎叫了出来，两眼瞪着面前的这些窝头，就好像他是第一次看见窝头似的。吃饭时，相忱一边嚼着我做的窝头，一边对我说：“我真没想到，你能来和我一起吃这个！”我明白相忱此时并不是在简单地夸赞我，他实在是赞美德神所成就的一切

的奇妙作为，我也愿意和他一起将这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愿意作主手中卑微无用的使女。

虽然我们自己开伙做饭，但是生活需用的口粮主要都还是由尚青梅弟兄为我们预备，另外村里的乡亲和我的学生也常送些粮食和蔬菜给我。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艰苦状况是今天的人所不知道的，即使如尚家这样的殷实人家不是一年到底都能吃到玉米面的，可是给我们的供应却没有轻忽过。与父亲和弟弟相比，尚志荣的大哥显得质朴少言，但村里的人都一致说他真是“好信主的”。因为在当时小米稀饭是比较好的饭食，所以尚大哥常在吃饭时为我们端来一盆自己熬好的粘粘的小米稀饭，或是两块热气腾腾的红薯，进来一声不响地放在桌子上，出去时再顺手打开盖子看看我们缸里腌的酸白菜还有多少，如果少了就从自家拿一些来加在里面。我们日常的饭食中仍是小米稀饭或玉米面粥，窝头除了玉米面的以外，还有高粱面的和掺榆荚的。榆荚窝头就是像菜窝头一样，只是用榆荚来代替了菜，和玉米面掺在一起做成窝头上锅蒸。因为榆荚有一种很特别的香气，很好吃，所以这种榆荚窝头就是我最喜欢的。做窝头用的玉米面也经常需要我自己拿着玉米到村里公用的石磨上去加工，磨好了再用一个大号的竹筐筛把其中的糠皮筛出去。石磨很重，我不得不用腹部顶住轱辘上那个胳膊粗的木柄，上身尽力向前探出去，靠着全身的力量推起石磨向前走。村里有的姊妹看我推得实在太吃力，就提醒我说：“你可以去找村里家境好一点的人家，借一头小驴来推磨呀。”可我觉得还是自己推比较好，所以仍旧还是自己推。相忱在家时也会来帮我，要和我轮换着推，说：“我推点吧，你歇会儿。”但我却舍不得让他上手，只叫他抱着孩子坐在一边看着。相忱虽是常在外奔波劳碌，但他的饭量还是和从前差不多，身体也一直很硬朗，只是还是和从前一样的瘦。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这时的饭量却比以前大了很多，一顿饭能吃下一大碗稀饭和两个窝头，以后都再没有吃过那么多的时候。

要自己开伙做饭就还得有烧的，这又开始令我犯难了。距离成安县百多里外就有一个大煤矿，煤在当地人家的日常生活中只是一种很平常



的东西，乡村里人都是去外边买来煤面，自己打成煤饼作为烧饭和取暖的燃料，可是我们哪里有钱买煤呀？我不愿意因此事拖累弟兄姊妹，就私下向老乡打听，说：“我没有烧的，我该烧什么呀？”有的老乡教我说：“早晨四五点钟，你去地里捋高粱叶，回来晾干了就能烧。”高粱的叶子可以用来烧火，但是只有在每天的凌晨时分，被夜间的露水所充分浸润的高粱叶才能捋得下来，等到太阳一出来，被晒干的高粱叶就硬翘翘的捋不动了。

清晨四五点钟，我就起身离开家。独自一人走在村外田间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天与地之间仍然被充斥的黑暗所阻断，然而我却望见前面最遥远的地方正有一道光显明出来，把天地重新拉近，再拉近……

下到地里我才发现原来高粱真的很高，高粱叶包着高粱秆向上一直长到顶上，我必须尽力踮起脚才有可能很勉强地够得到最上面的叶子。我伸手把高粱叶从顶上直捋到底下，使劲地撕扯下来放在一边，再接着去捋旁边的那一棵；等到差不多够数了就把刚刚捋下来的那些叶子从地中间抱到田埂上，码放成为一摞，用从家里带来的那根拇指粗的麻绳从中间拦腰捆住，再用力扎紧，背回村里去。宽长的叶子包着茎秆密密实实地向上长，就像一个个矗立在地上的巨大的高脚杯，整整一个夜晚的露水都会顺着叶片汇聚到禾秆的交接处。当把叶子往下捋的当口，里面盛满的露水就哗哗啦啦地洒落在我的头上、脸上和身上，这一捆叶子捋完了，我已经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从头到脚全都湿透了。

每一个清晨都要这样为当天预备所用的燃料，村子近处地里的高粱叶渐渐地被捋完了，一天过去又是一天，路也随着时间向前方延伸，最后甚至要到离村四五里以外的地里才能找到可以采摘的高粱叶。在弥漫着灰暗晨靄的大平原上，极尽四顾之内似乎每一天就只有我一个人来来往往，但我确实看见有一位称为以马内利的主正在天边的那一线光明中与我同在，他不仅注视我，也用大能的手臂帮助我，如果去时空手还算作轻松的话，那么回来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湿漉漉的高粱叶压在同样湿漉漉的身体上，步子越迈越小，前面的路却仿佛是越走越远……怎么

还没有到家啊！那捆背在我身上的高粱叶也像是越来越重了，正把我的力量从身体中间一点一滴地挤压出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帮助我！主真的帮助了我，因为我真的相信我手所能做的并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我的主；我肩所能担的更不是依靠我，而是依靠我的主！我一切手所做成的，肩所担起的，都是主所为我成就的恩典！

待到了秋后，“麦茬”就是小麦收割过后留在土里的残根成为另一种可供我使用的燃料。我身后背着一个柳条编成的大筐子，用手里拿着的耙子把麦茬从干硬的土壤里一个一个地扒拉出来，捡起来，抖落掉上面带的土坷垃，扔进背上的筐子里。虽说高粱叶和麦茬都是可烧的，却实在是很不经烧的，日常做饭需要很大的数量才能将将够用，这样我几乎天天都不得不出去捋高粱叶或是拾麦茬。偶尔有个机会和村里的姊妹们一起到附近的碳场去捡拾一点点人家选碳剩下不要的“碳末”，回家来加上点水，在一个用三块砖头围出来的简易的“模子”里做成湿“煤饼”，放在高粱叶上一一起烧。

农村里“住的”和“吃的”一样艰苦。来到北散湖以后，尚青梅弟兄安排我们住在他家的两间西房里，一明一暗的里外间，每间各有大约十平方米上下，外边还另外有一间灶房。房子只有从底下起的那一米左右是由青砖砌成的，再往上直到房顶就都是由碎草秸和黄土混合在一起打制成的土坯砖了。尚家院子里的房子都是这样的，这已经是村里最为像样的住房了。屋子里只有炕边上的那一小块地面铺了一些砖头，其他的都是夯实的黄土地，平时倒也看不出什么分别，可要是不小心撒上点水就难免一片泥泞了。

乡下连个像样的油灯都没有，我就学着别人家的样子，先在一个粗瓷的小碟子里放上一些灯油，然后搓一个棉线放在里面当作灯芯。因为河北省的南部盛产棉花，所以这里用的灯油都是从棉花籽里榨取出来的，这种油灯的光亮特别小，即使点着灯屋子里也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楚；而且棉花籽油的油烟尤其的大，燃烧时总是冒着黑乎乎的烟子，到处都弥漫着那么一股呛人的烟味。

像这样洗衣做饭之类的家务已经是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可就在转过年（一九四二年）的三月二十日，当时我又一次怀孕已经七个月了，那天我一口气连着洗了四条被单，这些土布做的被单经水浸湿以后越发的厚重，不成想在我挺直身子，举起被单正往那条高高的晾衣绳上挂去的一刻，竟然动了胎气，我意外地在这时早产了。

一切都来不及准备了，临时为我接生的是住在尚家东边院子里一位被称为薄三奶奶的老姊妹，她也是一位爱主爱人的敬虔人，已经寡居多年，平时一贯很照顾我。我被送进薄三奶奶的院子，这里除了她一个人独住以外没有其他人。在薄三奶奶的屋里，按照当地的一种说不清由来的怪异习俗，我被安排不是在床上而是直接在土地上生产，身子下面铺垫了几层粗糙的黄草纸，但我已然无力顾及这些了。可能是因为不足月的缘故，所以胎位不正，孩子的腰先出来了，只好又推回去……村里的姊妹们知道消息都来在我身边和薄三奶奶一起为我和孩子迫切地祷告。在生下这个孩子之前，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地上已经躺了很久很久，并且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平安中心里就没有一丝的惊慌和惧怕，我没有感到异常的痛楚，也没有异常的出血，因为神按照他怜悯的应许在生产的事上赐福与我！

我生下一个女儿，这是神赐给相忱和我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我们俩的第一个女儿。相忱为孩子起名叫袁安湖，“安湖”两个字分别取自成安县和北散湖村这两个地名，以此纪念这个我们曾经事奉神的工场，也纪念这里的教会和弟兄姊妹们曾在主里面给予我们的真诚厚爱。直到过去了许多年，每当再提起女儿的名字，相忱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讲述起神在那个岁月里给我们留下的见证。

孩子平安地生下来了，可毕竟是七个月的早产儿，体重还不到四斤，要是换到现在一定会在医院的育儿箱里放上几个月，可那时我却什么也没有，唯有把孩子放在主温暖慈爱的怀抱中。安湖刚出生时连喝奶都不会，我就只好做面糊糊一点一点地喂给她。神真是怜悯我们，这段时间虽然孩子不能吃，我的奶水却丰富如常，正好村里有位缺奶的产妇，我

就叫人把她的孩子抱过来给我帮她喂奶，一直过了四个月以后安湖才开始能像正常孩子一样的吃奶。好在除了瘦以外，这孩子竟然从来没有生过什么病，唯一让我操心的就是她不好好吃东西，一看见吃的就哭，每次只能让我勉强地用调羹喂上几勺奶，就哭闹着无论怎么哄都不肯再多吃一口了。我们俩当时谁都不懂得坐月子的重要性，我不懂，相忱就更是懂，相忱的精力都放在主的事工上，我也根本顾不上心疼自己，都是出于神的保守与眷顾，我的身体很快就完全地恢复了。

虽然在这里的生活条件和遭遇到的意外困难，与三年前我在北平生第一个孩子福音的时候完全不同，但是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神的恩典，即使环境有着诸般变化，我的心里也满有真实的平安。同时，弟兄姊妹们在主里的爱心也给我莫大的安慰和帮助。离开东关教会进入乡村以后，作为传道人的相忱再没有了任何稳定的供应，完全是弟兄姊妹在艰苦穷乏中供应我们一家人的日用饮食。安湖出生后，相忱都没有力量为我们母女预备什么，是乡亲们从各家凑了一盆鸡蛋还有不多的一点红糖送给我们。我在学校教过的那个叫袁温的男孩子，从他母亲那里要了家里仅有的三个鸡蛋，步行十多里路送到北散湖给我。袁温弟兄今天依然健在，还住在成安县，也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再讲到当年这件事情，他就笑呵呵地伸出三个手指说：“那时老师生小孩，我送给她三个鸡蛋！”

我自己已经和这里的乡亲们完全地打成一片，我和她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食；我们一起聚会，敬拜；一起祷告，唱诗；也一起去田间做工。一到棉花丰收的季节，全村能劳动的妇女们都要下地去摘棉花，姊妹们经过我的门口时就会大声地叫我：“梁老师，一起去摘棉花呀！”我就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和她们同去。和大家一样地系上一个白粗布的大围裙，把下边长长的两个角往上一叠，掖在腰间，摘下的棉桃全都塞进围裙里。我们同声唱起赞美神的诗歌，一同收获着神赐给的福分。我都没想到自己摘得这么快，一会就跑到她们前面去了，收工回来的路上，姊妹们都夸奖我能干，说：“梁老师，你真行！手真快！”我回答说：“我其实什么都不会，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你们教会我很多生活上

的学问。”北散湖的村外有一大片枣树林，让我感受到最为惬意的就是秋天刮过风以后，我和村里的姊妹们在欢笑中结伴去那里捡枣子，可以捡到很多很多，回来大家一起洗了吃。

是神借着变化不同的环境，把那曾经无知任性的小女孩磨练成他心意当中的婢女！把那原本无用的雕刻成他手中合用的器皿！

### 三

相忱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讲道和带领聚会，即使在家的时候，白天他也要去本村那些有需要的信徒家里探访，晚上的时间或是带领查经，或是他个人灵修，家里的各样事情他都是一概不管，自己一味的就是为主传福音，那是他心里第一个要紧的事情，所以在外人的眼中相忱对家庭的责任心远远不如他为主服事的热心。

我生下安湖的最初两天，相忱留在家里伺候我。他也不会做什么，其实我们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做的，除了天天为我熬小米粥，再就是把乡亲们送来的那三四十个鸡蛋每次放两个在粥里一起煮。第三天，相忱到炕前对我说：“我要走了，主的工作挺要紧的。”我明白正有教会迫切地期待着他的服事，就对他说：“你放心走吧，没关系。”临出门前，他又回身望着我，嘱咐说：“你多休息吧。”相忱走了，我就只有勉强自己下地为自己熬粥和给孩子洗尿布。幸好薄三奶奶和村里的姊妹闻讯赶来，从我手里把活计抢下来，什么也不要我动手，硬把我推回炕上休息。我理解相忱，他不是不关心家人，更不是不关心我，他是始终把主的事工放在第一。他为了主的福音的缘故能够舍得下一切，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完完全全地奉献给主。后来他从东北回到北京，那时常常有慕道的人到我们在白塔寺的家里找他，相忱从窗户看见有人走进来，不管自己正在吃饭也要马上放下饭碗去和人家谈道，我劝他吃过了饭再去，他不仅说：“不行！”还反过来问我：“吃饭要紧啊，还是传道要紧啊？”

早在结婚那时，我曾和相忱约定：“你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家里的

事你什么也不用做。”所以，比如捋高粱叶这样的工，即使相忱在家我也从来没有要他承担过一次，只是让他安心地读经和休息。有一天早晨相忱正好在家，见我从外边捋高粱叶回来，就赶紧给我倒了一碗水，关切地问我：“你累不累呀？歇会儿吧，喝点水吧。”我接住他递过来那碗水，说：“反正，有点累。”想了想，又接着说：“也不算累吧！”说实话，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我的右肩已经变形，比正常的左肩低下了有好几公分的样子，背也驼了，那正是这么一大捆又湿又重的高粱叶日复一日在我身体上留下的印记。眼看着自己才二十岁出头的身体就成为了这副样子，心里真有点伤感，也有点委屈，我把身体指给相忱看，说：“你看呢，都驼背了！”相忱微笑着安慰我，说：“没关系，有主呢！”被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顿时轻松了，也微笑着回应他说：“对啊，有主！没关系！”

月子过后，我照旧每天一大早出去捋高粱叶，回来借薄三奶奶的院子把叶子摊开来晾干，有当天烧火没用了的就码放在一个棚子里。以后不久，我又花十五元钱买了一只产奶的“瑞士羊”，也用高粱叶喂养，所出的羊奶由一家人分着喝用以补养身体。每天临出门以前，我都会把还在熟睡中的安湖放进蚊帐上面，就好像把她托在摇篮里那样的放在里面，我觉得这样的安排能使我很放心，不料有一次，当我晒好高粱叶回到屋里的时候，发现原来放着孩子的蚊帐里竟是空的，炕上也没有，我不知所措中慌忙四下寻找，一低头刚好看见安湖正一声不响地躺在土炕前边的黄土地上。抱起孩子才觉察出她身上裹满了一层已然半干的泥土，地面还有水湿的痕迹，我推测大概是孩子自己从蚊帐里滚落到地上，又连哭带尿，流在身上的泪水还有尿水和着地上的黄土滚了一身，却没有人听到她……不知再过了多久，已经哭闹得没有了力气的安湖，终于躺在地上的这片泥水中又自己睡着了。我马上舀来水，边流着泪边给孩子洗澡，洗了一遍再一遍，连着洗了四遍才算把孩子洗干净。孩子再不哭了，可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我不是在用水，而是在用我的眼泪，为我的孩子洗去身上的泥污。

相忱并非不爱自己的父母和家人，相反他对我们爱得如此深切，如

此真实。他不是用他自己的爱，而是用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身边的人，热切地关爱他们的生命，对待自己的家人更是如此。我们到北散湖没多久就正好赶上中国旧历的新年——春节，这是中国人合家团聚的重要日子，却是我们离开家和亲人以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三十这天，外边其他的人家都在忙活着剁馅包饺子，屋外是不断的鞭炮声和喧闹声，而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屋里却是异常的安静，我侧身在炕上哄着孩子睡觉，看着相忱跪在地上流着热泪为父母祷告，他一直非常惦念父母还没有悔改得救，也惦念他们的生活和身体。这个夜晚我们是在为父母家人的彻夜祷告中迎来黎明的，虽然恒切的祷告已经有了四个年头，父母在这上却依旧没有改变，我们也不知道还要再祷告多久，但是神在从窗口显现的那一抹明亮温柔的光中告诉他的孩子们，我们的祷告他已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必应允。

我们来到成安县以后，一直都和北平的家里保持有通信联系，无论他自己内外的事工有多忙，相忱都会按时给父母写信。一九四二年的秋天，相忱突然接到婆婆寄来的一封快信，信里说：公公因患肺病，此时已经病危了，要我们全家见信速回北平。相忱把信拿给我看，他想的是：自己的父亲因为常年的吸烟和酗酒，加上生活不规律，原有的肺病确实是越来越严重，可他毕竟才刚五十岁，还年轻，只要及时地医治，病情应该可以很快地好转；所以我们应该速去速回，不会在家里停留太多的时间，这样我们就不必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路上往返奔波。因此相忱和我商量：公公已经见过了孙子福音，但还没有见过孙女安湖，所以我们两人这次只带安湖回去让老人看看，而把福音留在北散湖托给乡亲照看。

我也觉得相忱这样的考虑很周到，就安顿好福音，和他一起带着安湖匆匆赶回北平。

回到家里，相忱和我看到公公的病情远比我们原先所想象的严重得多。当时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加上日本占领时期医药物资的极端匮乏，公公的肺病已经很难得到有效的治疗了，医生只是嘱咐家人好好照顾病

人，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们病人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了。由于相忱在农村服事，不能接济家里，所以我们回来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已大不如从前，难以维持公公住院治疗的昂贵费用，无奈之下我们只得把他从医院接回家调养。

但是相忱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百般设法花很高的价钱买来在当时是奢侈品的鱼肝油。当我在床边把鱼肝油喂给公公的时候，他冲我无力地摇了摇头，说：“别买了，那么贵！我吃什么也不成了，不久于人世了。”我说：“那您更需要好好地悔改信主了！”公公点点头，说：“是！”

相忱也是趁着父亲身体稍好一点的时候向他传福音，他对父亲说：“爸爸，有一个最好的消息，您还没有接受，就是我们这些罪人都要悔改信主。”他问父亲：“我们都是罪人，您知道您有罪吗？”

公公没有出声，只是默默地点点头。相忱接着说：“您知道有神吗？您知道神的存在吗？”

公公又点点头，说：“有！”相忱继续说：“您要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作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还有您这一辈子，吸烟，喝酒，这些都是伤害您身体的，您要祷告，求主看顾，求主医治您，但首先是要求主赦免您的罪！”

公公躺在那里，两眼仰望着自己头顶的上空，静静地听着相忱对他说话。我相信此时公公一定开始懊悔他年轻时荒唐放荡的生活；懊悔他常年酗酒又不肯听人劝告；更懊悔他曾经顽梗地抵挡福音，又粗暴地逼迫过自己的儿子……

相忱也利用我们在家的时机向母亲还有外婆传福音，他特意当着母亲的面前为父亲祷告，说：“妈，我们祷告，您听着啊！”有时也劝母亲说：“您和我们一起祷告吧！您将来也要接受主！”但是我看婆婆却始终不吭声，只是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地听任我们在她身边的祷告。

公公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甚至连讲话都越来越困难了。我看得出



他很满意相忱在这个时候能够回到身边陪伴他，我把小安湖抱到他的眼前，老人的脸上满是笑意。转眼我们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忽然有一天相忱接到成安教会的一封来信，信中催促他尽快返回工作。相忱和我商量：以公公现在的状况，家里确实需要人照顾。最后决定把我和安湖留下，他独自一人先回成安，去把那里的事工安排妥当再尽早赶回来。

没想到相忱刚离开几天，公公的病情突然恶化，我一面急忙给相忱写快信，要他马上回来；一面又和婆婆赶紧把公公送进医院。

此时，公公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我在他临终前带领他做了决志祷告。我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公公说：“我说一句，您说一句。”

虽然老人已经奄奄一息，但他的神志却很清醒，言语上也是格外的清晰。“主啊，求你救我！”

我唯恐他听得不清楚，特别俯下身公公的耳边又向他重复了好几遍。“我要相信你，我要接受你作我个人的救主！过去我不肯认识你，就犯了很多的罪，求你赦免我！今天，我要决志，接受你作为我个人的救主！”

公公袁禹庭的祷告很真诚，他流着眼泪跟着我祷告，我的每一句祷告，老人都特别地重复上两遍，好像生怕自己说错了似的。我轻轻替老人擦去从眼角淌下的泪水，柔声安慰他说：“您今天接受主耶稣，主必要擦干您的眼泪！我们有天堂的盼望，将来我们还能见到您老，我们现在只是暂时的离别。”老人边听边流着泪点头，从心灵深处回应我，连声说：“好！好！”。

## 四

公公终于没有等得及相忱再回来就过世了。和婆婆一起料理过了公公的后事，我就带着安湖赶回北散湖村与相忱和福音父子重新团聚。

说来我在河北的这四年多里，也没有给在天津家里的父母写过一封

信。相忱经常外出去布道，本村教会的姊妹事工和料理家务已经够我忙的了，古人曾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得到远方亲人的平安书信确实是异常宝贵的，但我又恐怕父母会为我和相忱过度担忧，就一直没给他们写过信。一九四四年某月的一个夜晚，我忽然看见父亲衣冠整齐地走到我的面前，满怀慈爱又带着一点埋怨，开口对我说：“你这孩子，怎么也不给我们来个信……”我吃了一惊，猛然醒来，才发觉刚才是一场梦。第二天，我把昨晚梦中的情景告诉了相忱，他听完我的讲述，想了想，慢慢地走近我的身旁，柔声地安慰我说：“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你不要担心。”听他这样的开导，我的心里逐渐回复了平静。

有一天，相忱从外边回来就对我说：“今天有人劝我‘现在世道这么乱，农村又这么苦，你还不不如回北平去算了！找一份好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工作之余再事奉，不也是挺好的嘛！’”说到这里，眼睛望着我，故意问道：“眼下有人劝我们回北平去呢，你说怎么样？”我说：“我不走！”听我这话，相忱笑了，说：“对！我也不走！”神在异象中呼召相忱在地上传他的福音，也在这异象中为他的工人指明了福音的道路，就是唯独听从主的心意，而不随从世界的潮流；唯独依靠圣灵的大能，而不借助任何机构的势力和才能；唯独在信心中仰望主，而不接受任何从人手而来的好处。神既拣选我和相忱在他的面前一同领受生命之恩，我也甘心愿意和相忱在福音上一同竭力事奉；甘心愿意和相忱在他的异象当中一同有份。

一九四四年的秋天，相忱决定转到邻近的魏县的教会去服事，我们一家四口就从河北省成安县的北散湖搬到六七十里外的魏县的北皋镇。北皋是一个交通便利的繁华小镇，古老的漳河就在镇外幽然流淌而过；镇子的中心有一条十字街，四边有不少店铺；教会就在离街中心不远处的一所临街的独门小院里。原本在北皋教会服事的传道人不久前刚离开去圣经学校任教，因为相忱以前也曾在这里带领聚会和讲道，和当地的信徒早就已经彼此熟悉了，这时他们就提出邀请相忱来带领北皋的教会。

相忱考虑到自己已经在北散湖留住和服事了将近有三年时间，那里的教会已经逐步成熟起来了，可以由本地的同工来带领，就接受了北皋教会的邀请。

对于自己的事工，相忱是这样说的：“我这个人只适合做传福音的差事，世道乱，更要赶快把福音传开。神既然呼召我为他传福音，我就只对传福音感兴趣！”北皋镇每个月都有一个“大会”，所谓“大会”就是当地定期举办的一种大型的商品贸易集市，届时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要到北皋镇里来买卖交易，俗称为“赶会”，相忱就抓紧这个机会来传福音。和乡村传道人们惯常使用的方法一样，相忱也带领信徒们在镇中间的空地上搭出一个大棚，每逢“大会”的日子，他们就聚集成队，先是手里举着各样写有圣经金句的标语横幅，唱起赞美诗，在小镇热闹的街市上游行几周，边走边向路人派发福音单张，把想听福音的人引到大棚里，最后由相忱在棚里布道。当年镇里一位全家信主的宋文庆弟兄，现在他的大儿子已经七十三岁了，回忆起儿时和相忱他们一同在“大会”上游行传道的那番火热的情景，仍是记忆犹新：“我老是站在袁先生的左边，挑着白布做成的横幅，上面用墨笔写着圣经的金句。”另一位住在附近的江岗村，如今也已经是七十八岁的常文清弟兄还记得一条横幅上写的是“人若不信主，不能得永生。”这样的福音布道非常有果效，北皋教会的信徒人数很快就从我们初到时的六七十人增长到一百多人。主日的聚会越来越火热，会众不仅从镇里甚至从周围一二十里的村庄赶来敬拜神，富裕的人家是套车拉着全家大小一起来，更多的是结伴步行，就连缠足的老姊妹都会步行赶好几里路来聚会，教会的三间大北房里坐得满满当当的。那时的主日聚会是全天上下午都有的，一大早信徒来时各人都用一块包袱皮儿做成的兜子提着各自的午饭，中午在教会的大锅里蒸熟了吃，教会也为他们烧一些开水或是熬上一点稀稀的小米粥，夏天就熬绿豆汤。

这里教会的另一项重要事工是我带领的主日学，每逢大人们主日聚会的时候，我就同时在西屋里教导孩子们唱诗和背诵经文，我还自己动手画了一些圣经内容的小画片，对凡是积极学习的孩子就作为奖品发给

他们。因为到教会来的人都喜欢福音和安湖，所以每到主日我就把他俩放在我们所住的西屋的炕上，用被子围起来，不到聚会结束，谁也不让进去抱这两孩子，以免影响聚会。还有我们刚来时，见到他们原来在聚会所在的北屋当中砌起一堵一米多高的矮墙，聚会时男女信徒分坐在墙的两边，这边坐男信徒，那边坐女信徒，相忱看了以后认为这不合圣经的教训，就告诉弟兄姊妹把分隔他们的这道墙彻底地拆掉了。

主耶稣既然把传福音的差遣亲自交给他的门徒，传福音就成为相忱事工的全部。他奉献自己为主传福音，二十岁那年，正是为了预备为主传福音的缘故，他毅然从即将毕业的“商专”退学，忍受着家人的拦阻，甘愿成为一名没有文凭的“旁听生”；毕业后，他又主动地放弃了在神学院里待遇优厚的职位，把自己放在乡村的旷野中；就在有机会可以问心无愧地返回北平的时候，他却反而把自己的脚步更深地踏进前途莫测的茫茫黄土地中……在每一次面对选择的路口，相忱所顺服的是神的心意，所抵挡的是世界的诱惑，这是神在异象中为相忱指明的一条道路。

相忱在异象中所领受的另一条道路就是只依靠圣灵的大能，而绝不借助任何机构的势力和才能。

相忱虽然和裴约翰牧师同工，但并没有加入宣圣会，除了日用的饮食之外也没有从那里领受其他的供应；这以后，无论是在北散湖还是在北皋，他不辞辛劳地奔走，所要做成的无非就是尽力帮助那些分散在各处乡村一间间独立的大小教会，而从没有试图把他们联合成同一间更具规模的教会，虽然这样一间联合的教会可能为他带来诸多的益处和声望。来到北皋以后，相忱马上与以往一样去各处带领聚会，这次就真的只有相忱独自一人出行了，而且他对这一带的道路又不很熟悉。在出发前，我有些担心，问他：“你认识路吗？”他却反过来问我：“我不会问吗？”从相忱的回答里我看得出来，他从来也不曾顾虑过我所担心的这些事情。神也奇妙地感动教会中的肢体们，在各样的事上帮助相忱。有一次，常文清弟兄看见相忱骑着自行车出镇朝漳河的方向去，就追上去询问，才晓得相忱是要到河对岸的村子里去带领聚会，可当时这段河上没有桥梁

需要徒涉才能过河，常弟兄生怕相忱不熟悉地形，不知道河水的深浅缓急，就亲自把他引到河边水浅的地方，又手拉着相忱，一步一步地淌水把他送过河去。其实我和孩子们留在家里又何尝不是靠着神的保守呢！我们刚一住下，在教会对面的街上开药铺的董日新弟兄就来告诉我，北皋镇还是郭清、金明子等当地几股大土匪的据点，这一帮四处打劫，无恶不作；他提醒我平时尽量不要外出以免惹起土匪的注意，有什么日常需用的东西可以要他送过来。曾经有好几次，凌晨时分我被街上人和牲畜的响动惊醒，在院子里透过大门上的缝隙我依稀看见，土匪的头目穿着乌黑锃亮的大马靴骑在高大的骡马上，后面的牲口驮负着他们抢来的粮食财物等，大摇大摆地从街上走过去。好在这些土匪并没有骚扰过教会，我也没有听说当地的信徒受到过他们的劫掠。

在北皋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我们的日用饮食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可以得到固定的供应。作为神的工人，他要求我们从这时开始学习如何在他面前过一个完全凭信心的生活。这里的教会和传道人的生活需用都是来自信徒们的奉献，但是农村生活的本身就已经困苦不堪，加上正饱受连年战乱与灾害的折磨，信徒们的奉献很有限。但相忱对这些困难仿佛是浑然不觉，依旧像以前一样从不过问生活上的事情，教会里收到奉献了，他就一声不响地有什么就吃什么；供应不足的时候，他就自己少吃，甚至连着几顿饭吃不上也不吭气，宁可挨饿从不开口向人恳求什么。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有时我不得不去街上捡“碎菜”，就是卖菜的小贩丢弃的烂菜，即使这样我们吃得仍然非常甘甜，因为我们虽然吃苦却是神的恩典。后来一次，附近刘岗村的信徒刘大妈正碰上我在捡“碎菜”，大吃一惊地赶忙拦住我：“哎呀，你怎么捡这个呀？”当天她从家里给我们拿来三棵白菜和一小兜子胡萝卜。我把这点菜当成宝贝一样，一个菜叶都舍不得丢掉，一棵白菜要吃上五六顿。那会我们吃菜全都是凉拌，因为油太少太宝贵了，实在不能轻易用来炒菜。

在百般的缺乏中坚定地持守一个在信心中仰望神的生活，不接受任何从人手而来的好处，这是神在他的异象中为相忱指示的第三条道路。

经历过这四年多的磨炼，相忱在传福音上的事奉开始步入成熟，他对神赐给自己的这个异象更加清晰，也在神显明的道路上更加努力奔跑，不随从世界的潮流，不借助任何机构的势力和才能，不接受任何从人手而来的好处。

第七章

强暴人僭逼人的时候。

墙壁像就

暴令之外

判外邦人

想元下落，禁止强暴

象想，气稜云物清似。

去道宏书于冬武



我们和乡村里的弟兄姊妹们更深地打成一片，相忱外出时穿的是和他们完全一般的粗布裤褂，甚至学会了他们惯用的本地方言，还主动护送患急病的信徒去邢台就医。村口路边，树荫底下，田边地头，都曾经是相忱和乡亲们一同聚会和交通的场所，大家就像对着自己的邻舍那样亲热地称他作“福音他爹”。相忱每要离开一个地方，信徒们都会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地说：“你下次再来的时候可要多呆上几天啊，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呢。”相忱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小院子里办起了一所小小的学校，学生是几位愿意学习文化的姊妹和另外几位镇里的妇女。上课使用的是《圣道初阶》、《救主画传》之类的主日学课本，一方面教导她们识字，一方面也帮助她们更加认识信仰。

从这时起，相忱要我和他一同从使徒行传入手来查考圣经中为我们启示的教会的蓝图。他在家的日子，我俩就每天一起研读经文；他出门在外的时候，我们就各人按照计划查经，待他回家再分享彼此的领受。相忱不顾在外带领聚会的繁忙和路途的劳累，必定要抽空完成查经计划，回来总先要问我：“你查到哪里了？”也就在这时，“家庭聚会”成为相忱思想中所划出的一个重要的“亮光”。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在北皋顺利生下我们的第三个孩子——福声。眼前的生活繁忙而充实，我的心里却总有一丝挥之不去的牵挂，那就是在北平家里的婆婆和外婆。自从公公去世后，婆婆屡次来信催促相忱回去。相忱当然坚持以福音的事工为重，还在回信中劝说母亲要信主。我在心里时常为此很过意不去，觉得按情理我们确实应当回去照顾这两位无依无靠的老人，可当我看到相忱忙得几乎天天都不着家的样子，又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神的工作确实比家事更重要。这时相忱最为挂念的仍是母亲得救的事，从他自己接受福音开始，相忱为母亲的祷告已经整整有了十三个年头。他是传道人，在外面传福音使别人的灵魂得救，而自己最爱的亲人却正在走向死亡的边缘……



一九四五年五月间，相忱又收到外婆亲笔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相忱的母亲因患上严重的水臌症已经卧床不起，外婆自己年老体衰，小妹年幼，目前家里亟需人照料，要求相忱务必尽快回来。相忱看过信后心中不免有些疑虑，他想：母亲一向都极力反对自己到农村传福音，自父亲病逝后，更是不断在来信中以各种理由催促他回去，这次会不会又是母亲编出来的一个借口要诓自己回去呢？为了弄清实情，相忱暂且没有急于马上给家里复信，而是先给在北平的王明道先生写了一封信，直言托付王先生，说：“我家里来信，说是我母亲卧病在床，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是实情，还是她们想让我回去，所以不好答复。希望您能派人去我家里看一看，再写信告诉我，我也好尽快做出决定。”信发出后不过几天，王先生的回信就来了，他在信里告诉相忱：他接信后立即派教会的同工去我们的家里探望，看到婆婆确实卧病在床，而且病得很重，全身浮肿得非常厉害。王先生也认为眼前病重的老人和家中的生活实在是需要人来照料。

相忱马上着手安排好这里教会的各样事工，随即又托人带信给在成安的尚志荣弟兄，得知消息的当天尚弟兄就从家里赶来北皋。他见我们两个人带着三个小孩子，就主动替我抱着最小的福声，一路把我们送进北平的家里，自己才返回去。

我们走时仅仅带上了不多一些随身的衣物用品，而把更多的留在了北皋，因为相忱和我都想的是只在不久的将来便能够再回到这里，可我们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次的离开就成为我们在农村四年事奉的结束。只有在八年以后的一九五三年，相忱独自一人重新来这里走访过一次，还特别为了纪念这次行程而撰写了一篇文章《八年回忆》，可惜经历过几十年的变乱，这篇文章至今已经遗失了。再过几年之后，这里公开的聚会即被强行终止，教会的房屋也被没收改成学校，但是在信徒们的家庭中重新建立起的聚会却一直延续至今，许多当年那一代信徒的后代已经成为今天当地教会新一代的领袖。

## 二

我们全家六月初回到北平，看到婆婆终日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肚子胀得高高的，头发已经差不多全脱光了，原本一向清瘦的脸庞现在也因为浮肿显得胖乎乎的，脸色蜡黄，甚至连眼珠都成为了蜡黄色。

相忱和我看着自己的亲人竟病成这个样子，心里都非常难过，相忱强忍着眼泪在床边安慰她，可是婆婆回答相忱说她已经感觉自己没有希望了，不想去医院，也不想请医生了。最后，婆婆无力地转动她那双浑黄的眼珠，在泪水后面望着我们，满怀哀怨地说：“都是你们……也不管家里，就走了……”就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婆婆所说的确是实情，自从公公去世之后家里就完全断了收入，相忱在农村传道又没有薪水，四年间没有给家里寄过一文钱，等到我们回来时，家里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住的地方也从原来的锡拉胡同十四号搬到了东城猪市大街的达升木场，所以婆婆患病后不仅没有能力去医院就诊，而且连像样一点的药都没吃过。

相忱思想起自己这些年都不曾照顾过母亲，实在是亏欠了母亲。虽然母亲在病痛和穷乏中看似绝望了，自己又不名一文，可相忱相信他所依靠的是神永不改变的恩典，况且他亲眼见证过这恩典在自己身上彰显出何等丰盛而奇妙的大能。相忱和我一起有神面前迫切地祷告，祈求神医治我们的母亲的身体，更祈求神拯救我们的母亲的生命。达升木场对面的路东不远就有一所神召会的教堂，相忱每天都去那里为母亲祷告。教堂的姚志辉牧师和同工们很快发现相忱的身份，也知道了婆婆的景况，都加入到为婆婆的代祷中。有一位叫王哈拿的女传道还同几位热心的姊妹到家里来探望婆婆，以后她们就常来家里和我一道祷告。

这时对于我们来说，不要说是给婆婆看病吃药了，就连一家人的吃饭都成问题。结婚时家里为我陪嫁的那七百块银元已经所剩不多，我从其中又取出几块来兑换了，甚至把在成安时学生送的那四匹土布都卖掉了，用所得的钱照着中医的偏方买些猪腰子和杜仲，每天拿这两样东西

一起煮水给婆婆喝，还再专买一点肉末或猪肝熬在稀饭里给婆婆补养身体。我们当然也担负不起为婆婆请医生的出诊费，有一位在同仁医院作医生的于弟兄听说了情况，就主动每天来家里免费为婆婆检查病情，我常见他拿一条皮尺量婆婆的腹围，有时也带些药给婆婆，从他脸上凝重的表情中，我看出婆婆的病势恐怕是日渐沉重了。

婆婆卧病在床，一切生活都需要别人伺候，需要我天天在她身边为她喂饭喂药、端屎端尿，还要为她擦洗身子。婆婆过去常年拜佛，到这时床边不远的地方还摆设着佛龛，我见她病恹恹地躺在那里一个人不时地喃喃自语，就问她：“您还念啊？”婆婆费了很大力气才转过头来看着我，有气无力地说：“念不动啦，我没劲儿……”可是从前婆婆甚至还夸口自己身上很有“佛力”，火红的煤球都能用手从炉子里拿出来，而且手还不受伤。这期间凡是到家里来探望的弟兄姊妹都劝婆婆要相信主耶稣，可一说到这话上面婆婆就闭着眼睛一声也不响，任人怎么说她都不肯回答一个字。相忱和我看着这种情况，就愈加恒切地为母亲祷告，祈求神亲自在母亲的心里动工，做那人手所不能做成的工作，拿去母亲心中那颗刚硬的石心，为她重新换上一颗柔软的肉心。

一天傍晚，外婆忽然进来说她刚去喂婆婆吃药的时候，婆婆说她吃过药了，外婆问我们是不是刚刚给她喂过药，相忱开始很诧异因为我们谁也没有给她喂过什么。我们赶快到婆婆床边，眼见她很是安静地躺着，才算放下心来。相忱俯身轻声地问：“您刚才吃过药了吗？”婆婆睁开眼睛，答道：“是啊！刚有一个穿白大褂的，我不认识的人，给我一包药吃，我就吃了。”“他给您吃的什么药啊？”“是一包黄色的药面。”好像还怕我们不信似的，又说：“我真的已经吃过药了，不用再吃了！”说完就闭上眼睛睡着了。相忱转身对手里还拿着药的外婆说：“我妈不吃就算了。”然后就返身回到里屋，跪在地上向神祷告：“神啊，感谢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一切！刚才的事如果真是你施行的奇迹，就求你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好让我们能更好地行，为你作见证。”我也用祷告在心里向神默默地求问：“神啊，是你借着这个神迹让婆婆亲自体验到你医治的大能吗？”

第二天，我再看见婆婆时觉察到她身上的浮肿似乎正在消退。下午于大夫来给婆婆做检查，他照例用那条皮尺在婆婆的腹部反复地量了半天，终于抬起头带着满脸的不解告诉相忱：今天婆婆的浮肿明显比昨天好了不少！相忱听罢立即开口归荣耀于神，他对于弟兄讲述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大家都同声赞美神。

于弟兄走后，婆婆对我们说：“我吃了那药面，心里特别舒服，感觉肚子慢慢都软了。我刚要睡着，我妈就叫我吃药，我说刚有人给我吃过了，我不吃了。”又在惊喜中问相忱：“那个穿白大褂的就是天使吧？是耶稣派他来的吧？”从这天起，婆婆什么药都不吃了，但身体却一天一天地好转起来。我也学着从前大夫的样子每天用皮尺给她量腹围，结果发现婆婆原本胀大的肚子竟然很快地消去了，吃东西有胃口了，头发又长出来了，眼睛也重现出光泽和活力，没过多久就可以自己扶着拐杖下床走路了。痊愈以后，她的全身都整整地脱掉了一层黄色的表皮。

婆婆所患的是黄疸性肝炎，并且已经引发了严重的肝腹水，这样的情况放在今天都算得上是疑难病症，但在神医治的手中，一夕之间即被化为无有！婆婆以后常对人作见证，说：“感谢神！我这病是神医治的！我过去老不信有神，现在神就亲自医治我，让我看到他的大能。我现在信了，再也不会去烧香念佛，拜那些假神了。”在相忱和我帮助下，婆婆亲手把家里那些曾被她顶礼膜拜的佛像通通打烂，扔进了垃圾箱。

身体康复以后，婆婆和外婆母女俩在猪市大街的神召会教堂由姚志辉牧师为她们施行洗礼；婆婆虽然身体还虚弱，但还是施行了浸洗，外婆年纪大了，用的是点水洗。神借着他的神迹医治了婆婆的疾病，挽救她的身体脱离此时的死亡；更因着他的恩典赦免了罪人的过犯，赐给这蒙恩的人在基督里领受永远的生命。她对相忱说：“你讲了那么多年我都不信，现在才转变过来，我要是早点信就好了！”老人在主里异常地热心，对来家里的弟兄姊妹都是一味地款待，可在以前她对这些信主的人则是一概不加理睬。

一个已经在死亡路上的人，被神所医治，被圣灵重生，在耶稣基督

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举一动有了新生的样式。婆婆罗孝纯悔改信主以后，不仅热心传福音引人信主，而且自己的病蒙主医治就从主领受了医病的恩赐。我们搬到福音堂以后，附近有位信徒李太太因患阿米巴氏综合症而长年腹泻不止，医院对此也束手无策，婆婆去为李太太按手祷告，她的腹泻就止住了。

整整十三年，相忱都是在信心中向神祷告！他对神说：“主啊，你应许我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主啊，我信你的应许，但我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信心正在渐渐微弱。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心真是太小了！求你赦免我这小信的人，求你坚固我这弱小的信心，相信你必定施恩拯救我的全家。”

整整十三年，相忱都是在信心中向神仰望！相忱在祷告中，以泪水向神表达自己难以言表的感恩。十三年当中，他已经数不清自己曾经有多少次在神面前为了自己的家人流泪地祷告，祈求神拯救自己深爱的亲人们；祈求神拆除自己和亲人们之间因为信仰的缘故而有的那些隔阂；祈求神借着亲人们的信主，为自己预备一个完全在主里面成为合一的家庭；祈求神赐下他的爱，因为相忱相信唯有在神的爱里才能医治这个家庭中长久以来的种种裂痕和创伤。

整整十三年，相忱都是在信心中等待神成就他的应许！相忱对我说：他也曾在痛苦烦恼中求问神——为什么神让我遇到如此不理解我的父母？为什么这逼迫竟是首先从自己家里出来的？为什么家里原本就已淡漠的亲情，不仅没有因自己的信主而稍有弥合，反倒如同雪上加霜一般？

十三年来的祷告，十三年来的仰望，十三年来的等待，今天终于有了结果。相忱明白了，他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亲人们的逼迫是神许可的试炼，为的是要成就神对他无比的恩典，末后又要从他身上成就神对全家的恩典！

### 三

婆婆病愈以后，相忱开始筹划尽快带领全家重返远在农村的禾场。婆婆重生得救后对福音也大有热心，对相忱说：“有机会去，我和你们一起走！”但是外婆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老人虽然从来不反对我们去农村传福音，可她毕竟已经是八十多岁的年纪，身体也已衰弱了，就对相忱表示：“我那么大的岁数了，还去农村干吗呀！要走你们先走吧。”外婆的这番话着实让相忱感到为难，他知道年迈多病的外婆确实无力再承受这份奔波劳累，可我们在北平这里再没有其他的亲属，如果我们执意要走，就得把无依无靠的老人独自撇下，这一点是相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这时家里的状况固然不允许我们马上出走，外边的局势也在阻拦我们成行。日本战败投降后不久，国共两方就在邯郸周围首先爆发出大规模的激烈冲突，随后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的冬天，表面的战斗虽然暂时停歇下来，但是河北中南部一带仍旧大大小小的摩擦对抗不断，铁路公路等各样交通也时断时续。一九四六年，国共和谈最终陷于破裂，双方相继在各地展开连番的恶战，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共产党武装拆毁了河北省内的大部分铁路，而且不断压缩其对城市的包围圈。

相忱仍然一如既往地渴望着重新回到他曾经热切事奉的农村去，渴望着重新继续他在那里的传道事工，最渴望的则是一家老小都能和他一起到农村去。相忱太想回农村去了，那段时间他时常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话：“哎呀！什么时候走呀！什么时候走呀！”眼看着他那副心急火燎的样子，我提醒他说：“祷告吧，神叫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吧！”相忱差不多每天都去猪市大街的神召会和那里的同工一同祷告，我却是因为要照顾家务，祷告多是在家里；晚上等老人孩子都睡了，我们俩就能一起同心祷告。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着神说：“神啊，你若允许，就叫我们快走；你若不许，我们就等待神的时间。”神没有按照我们心里的意愿回应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返回农村去的道路依旧不能畅通，况且即使交通恢复了，我们手头的不多的那点钱也远不够全家人的路费。然而我在祷告中却始终满有平安，虽然心里还不能明白，但我相信我们

前面的道路是神已经为我们命定的。我看相忱还在时时为了不能马上回农村的事情焦急，就再次提醒他，说：“神有神的时间，你这样着急没有用！”相忱听懂了我话里的意思，笑呵呵着冲我比划一下胳膊，说：“没有翅膀，有翅膀我飞回去啦！”在我们的心里是同样的无奈，农村那边有那么多的工作，我们想走却走不了。其实当时无论相忱还是我都还不了解，由于共产党已经开始在其所控制下的农村实施一整套包括“土地改革”和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等在内的高压政策，因此那里已经不可能再如以往一样的自由聚会和传道了。

农村那边一时回不去，留在北平的生活也是难上加难。达升木场是内外两个大杂院，我们回来以前，婆婆已经在外院租下了这两间破旧的小东房。两间小房是里外间，各自只有十余平米，挤住着我们全家八口人；外婆、婆婆和小妹住在外间，相忱和我带着福音、安湖、福声三个孩子住在里间。一九四六年，在这里，我又怀了我们的第四个孩子。自从三年前公公去世，家里就失去了固定的收入，加上民不聊生的战乱年代，婆婆原来的二房东也做不下去了，就只好从锡拉胡同十四号搬到现在这里，搬家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们，相忱和我是在回来时才知道了搬家的消息。我们回来一看，家里原来的那些硬木家具都已不见了踪影，代之的是一些普通的木质桌椅和木床；后来才听说在那几年里，婆婆经常自己推着小独轮车，把家里的硬木家具还有其他能够换钱的物品，一件件地运到附近隆福寺的地摊上出卖，以此来勉强度日。可是相忱在农村服事的这四年多里也没有薪水可以用来供养家里的生活，甚至我们回来的时候也没有带回一点积蓄。

外婆年迈多病，婆婆身体也弱，一家老老小小需要吃饭；农村那边却又回不去……事奉和生活加在相忱和我身上的压力是如此的沉重，倘若在心里看不到希望，就足以使人灰心丧志，离开以前曾经所持守过的，去寻求另外的出路。

抗战的胜利使北平城一扫在日本占领时期的恐怖压抑，久违的人们重新开始彼此走动联络，离家在外的人们也纷纷重新归返故地。相忱的

那位老同学陈业也从美国回来了，而且找到了我们在这个乱糟糟的大杂院里的新家，当那双锃亮的皮鞋“咯噔、咯噔”地踏进门槛的时候，狭小的屋子里立时弥漫了一股子呛人的香水味。眼前的陈业，一身簇新笔挺的呢子大衣，头发齐整光亮地向后梳起，胳膊底下还夹着一个大皮包，只有在依旧白净的面孔和那不变的伶俐中，才能看到当年的那个陈业的影子。他和以前一样，客气地称我“大嫂”；和以前一样，兴高采烈地和相忱聊了大半天；虽然困难，我还是专门为客人加了几道菜，有炒牛肉、烧茄子还有凉拌苜蓝，他也和以前一样毫不客气地吃了个“风卷残云”。陈业自己说他这些年一直都在做着珠宝、古董生意，这次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要扩张他的业务；还说他刚在美国那边新置了房产，临走时还邀请相忱，说：“袁哥，你去美国可一定要抽空去我那儿看看啊！”我听这位也曾立志为兴旺主的福音而奉献自己的门徒，今天口里竟然再不说一句主的话，滔滔不绝就只剩下他自己的那一套“生意经”了。送走陈业，相忱一脸茫然地对我说：“他说的什么，我都听不懂！”

昔日同道挚友的归来并没有在相忱心里激荡起丝毫的波澜，他还是每天在家里安心读经灵修和去神召会祷告；还是热切以致略带着焦急地期待早日重回乡村里的工场；更是借着信心全无惧怕地持守着从前向主所立定的心志。

既然我们还要在北平呆上一段时间，我就得操心来安排家人的生活。因为我们的衣服大多没有从北皋带回来，这时相忱和孩子们都没有了换洗的衣服，我就向婆婆要了一块布料，在缝纫机上昼夜赶工给他们做了几条西式裤子。我们六月份回来的时候，日本还没有投降，北平还处在日本军队的占领之下，人们赖以维生的粮食就只有所谓的“混合面”，其实还不如平时用来喂牲口的糠秕、麸子。我们的大儿子福音至今还能记得当年他们几个孩子从这些“混合面”里吃出满嘴头发渣子的经历。但即便是这样的粮食也未必就可以买到，买粮的队伍天天排成蜿蜒的长龙阵不说，还常常排到半截粮食就卖光了，现场的日本兵更是个个凶神恶煞，才七岁的福音有一次不小心排到了队伍外边，就被看守的日本兵不由分



说地一脚踢进队里。光复以后的生活虽然大有好转，但家里人口多，平时最多吃的是白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的“两样面”，一碗白面里掺上两碗玉米面，有时是蒸成馒头，有时是蒸丝糕，再熬上一锅同是“两样面”的稀粥，就是一家老小的主食；下饭的菜不过就是用点菠菜之类的青菜煮上一锅稀溜溜的菜汤了。虽说鸡蛋在当时并不算贵，但我们也买不起太多，只能偶尔专买几个给两位老人。碗里有什么，相忱就一声不吭地吃什么，从来不挑，更不抱怨；全家人，上至外婆和婆婆，下到我和孩子们，都甘心愿意跟随相忱一同忍受穷乏的生活。我把连孩子在内每人每天的口粮都预先计算好定量，以免搞成“前松后紧”。福音他们三个也很懂事，都是给什么吃什么，从来不曾向我张口要过“好吃的”；我给三个孩子定的口粮都是一样的份量，只有一次吃饭时，福音用眼睛比量着自己和弟弟妹妹碗里的饭，向我要求：“我大，我要多吃点！”我告诉他，说：“都一样！”就从我自己的碗里分出一些给他，说：“把我的分给你点，快吃吧！”听我这么一说，福音赶紧埋下头吃自己的饭，再不吭气了。孩子们个个都很瘦，尤其是安湖，回北平以后我带她回了一趟天津，已经四年多没有见面的母亲一看到我们娘俩又黑又瘦的样子，就心疼得哭了：“怎么那么瘦，那么黑呀！乡下吃得不好吧？没有钱吧？”又拉着我和小安湖一个劲儿地问我们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边问边止不住地掉眼泪，我在一旁也陪着落泪了。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于一年多前因病去世了，时间正好就是我在河北梦见父亲对我说话的那一天，母亲说父亲临终前最挂念的就是我。因为惦记着婆婆和相忱他们，我只在娘家住了两天，临走前母亲哭着送我，又把一包钱塞进我的手里，我知道父亲去世后家里生活也不宽裕，弟妹又多，母亲自己也很困难却在尽力地帮助我们。除了母亲的一点资助以外，全家的生活来源就靠相忱在外做一些兼职的翻译工作，这份微薄不定的收入竟然足够我们一家老小七八口人的日用饮食，还有房租、水电等等开销，遇到不够的时候我就拿出从娘家带回来的钱贴补。每当我计算家里的费用时，我明白我正在数算着的是神的恩典！我在眼泪中向神感恩，慈爱的神啊，你赐给的够我们用！

猪市大街的神召会教堂知道相忱是一名传道人，而且在农村事奉过

多年，姚志辉牧师就邀请相忱主日在那里讲道，神召会的《信胜月刊》也向他提出约稿，相忱经过考虑都接受了。这样，从一九四五年六月到当年的冬天，相忱就一边等待着重回农村，一边在神召会聚会和讲道，同时为《信胜月刊》撰写和翻译一些稿件。相忱的同工姚志辉牧师，在一九五五年时与相忱同样是为信仰的缘故被捕，家人也与他“划清界限”，结果姚牧师在狱中因冻饿交迫而为主殉道。另一位曾到家里和我一同为婆婆祷告的女传道王哈拿姊妹，在文革当中，因不愿忍受被当众“批斗”和打骂的人格侮辱，含恨自尽了。

就在我们住的达升木场对面还有一个“救世军”的会堂，一九三〇年代，宋尚节博士曾在这里开过布道会。“救世军”在传道时，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演奏西式军乐；受洗时也不使用教会通常的洗礼方式，而是排好队，用“救世军”的军旗在大家头顶上挥过就当作是完成受洗了。

一九四六年初的一天，相忱从神召会祷告回来，告诉我说：刚才在神召会有一位中文名字叫作冉约翰的丹麦籍的年轻人，主动向他表示愿意推荐他到军调部去作翻译。相忱提到的这位冉约翰，我以前在神召会也曾经多次见过，他的父亲就是神召会的传道人，早年来华传道，冉约翰本人就出生在中国，因而能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冉约翰所说的“军调部”就是军事协调处执行部的简称，是由国共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专门负责调停当时国共双方武装冲突的机构，地点就设在距离猪市大街不远的北平协和医院。抗战胜利以后，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急剧增加，各方面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量大增，刚成立不久的军调部就更需要高水平的中英文翻译，在那里工作不仅待遇好，而且有很好的个人发展前途，故而当时在军调部里担任翻译的很多都是一时的精英人物。冉约翰本人正在军调部当翻译，平时常到猪市大街的神召会来参加主日的聚会和祷告，他听过相忱的讲道，对相忱的印象很不错，又听教会的人说起相忱的英文相当不错，而此时家里的生活正遇到困难，就把军调部正在招收翻译的消息通报给相忱，并且反复强调在军调部作翻译的待遇相当优厚，还说他愿意充当相忱的推荐人。

讲过这些，相忱平静地对我说：“我以后不再做任何全职的属世上的工作！有机会也不做！”我也同样平静地回答他：“我极力地支持你！你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家里的事情你什么都别管。”记得还是在我们婚礼后的第二天，相忱就郑重地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我以后不再做任何全职的属世上的工作了！”我当时用的也是和今天完全一样的话来回答他：“我极力地支持你！你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家里的事情你什么都别管。”相忱和我，在我们结婚时凭着神加给我们的信心，共同立下这样的心志；此时，我们还是凭着神加给我们的信心，忠诚持守这样的心志；一直贯彻于我们毕生的事奉中间。

我很愿意，凭着神加给我们的信心，用这话劝勉年轻的传道人：你为主做工，主必定负你完全的责任！不要为生活忧虑，传道人没有挨饿的。

相忱说他当下就是这样的答复了冉约翰：我是传福音的，这就是我的工作，我不会再考虑做其他全职的属世上的工作。冉约翰听了后很是钦佩相忱的心志，就又问他是否愿意在不妨碍传福音的同时，做一些兼职的工作以帮助维持生活。冉约翰告诉相忱：他以第三国代表的身份暂时接管了一座战前原属美国人的学校，并且已经把它改装成临时的旅馆，专门接待来往北平的外国人，地点就在东四，目前这所旅馆的生意虽然不错，但冉约翰自己在军调部那边的工作很忙，抽不出时间来打理他的旅馆，就想物色一个可靠合适的人去帮他打理。相忱考虑了一下就提出：自己可以去，但每天只能去半天，因为下午他经常还要出去带领聚会和个人灵修。冉约翰爽快地答应了相忱的条件，安排相忱每天上午在旅馆为来住宿的客人登记和收账，还特别告诉相忱如果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在那里灵修。第二天，相忱就去旅馆上班，每天上午半天在那里边工作边灵修，吃过午饭就回来。

在旅馆工作后不久，相忱就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属于挪威神召会的苏朝生牧师。苏牧师是在河北省北部的新保安一带传道，这次来北平是为了治疗牙疾，就住在相忱工作的那所旅馆里。开始他和相忱互相都不知

道对方的身份，后来苏牧师出入时发现相忱经常在工余阅读英文圣经和其他的属灵文章，就主动来和相忱交通，才发现原来彼此竟然都是传道人，而且都有着在农村事奉的经历。

和苏牧师相熟后，相忱就对我说他下午也不回来了，要在苏牧师那里帮他编译一些赞美诗。原来，苏牧师有一本“耶稣家庭”编写出版的诗歌集，他听人家唱过，很喜欢其中的歌曲，但因为集子中的曲谱都是用简谱来标记的，而苏牧师又不识简谱，想学着唱一唱都没办法。当苏牧师得知相忱不仅英文水平高，而且通识简谱和五线谱，简直高兴坏了，就请求相忱帮他把这本诗歌集中他喜欢的歌曲转译成五线谱。于是，相忱中午下班以后就在苏牧师的房间里和他一起编译诗歌集。相忱一直都记得他那时翻译的第一首诗歌就是《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随着两个人更为深入的交通，相忱和苏朝生牧师开始更多地了解到对方的信仰和事工的情况，相近的经历更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两个人在一起畅谈各自事工中的得失，也更多地谈到了如何在目前的情况下，更好地开展工作的一些想法。在交通中，苏牧师对相忱说起他自己有感动，要在北平开展事工，询问相忱对此有什么想法。相忱回答苏牧师，说：“北平已经有许多传道人，这里不需要我们了。我这次回来是因为母亲生病，我将来还要回农村去，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但农村的教会太少，传道人也少，我的呼召是在农村。农村的生活虽然苦，但做神的工作却是甘甜的。等过一阵时间我母亲的身体稳定以后，局势稍微好转一些，我就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到农村去。”

## 四

一天傍晚的时分，我正在屋里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看着圣经。相忱突然骑着车从外面回来，风风火火地一进屋门就兴奋地大声冲着我说：“我看了个好地儿！阜成门内的路南！”我一下子被他说得摸不着头脑，等他平静下来才讲出刚刚碰上的一件让他感到兴奋不已的事。下午原本是相

忱和苏牧师在继续编译那本诗歌集，临近傍晚的时候，苏牧师要相忱休息一下，提议出去透透空气。于是两个人放下手头的事，骑上自行车来到街上，漫无目的地向前骑行，边骑边聊着天，不知不觉竟从住的地方骑到了西城的阜成门内大街。苏牧师无意之中一抬头正好看见路南的道边上有座三开间的中式建筑，门口上方的牌匾上写着“福音堂”三个大字。相忱也看到了，两人下车走近了再一看，却见门上贴着国民政府的封条。相忱趴在窗户的玻璃上往里瞧，见里面的厅堂有几十平米足足坐得下二三百人，尤其令他们俩惊喜的是屋子里凡教会所用的各项家具什物一应俱全。相忱笑呵呵地扳着手指在我面前数点着他所看到的各样物事，长椅子、风琴、黑板、讲坛……还有一块写着“万有真源”的匾额。说着相忱又兴奋起来，搓着手说：“全套的，什么都有！也许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呢？”

接下来的几天里，相忱都时时处在往常少有的兴奋之中，老是放不下那间“福音堂”，自己在屋里转悠了几圈，终于走到我面前说：“我再去看看！”说罢出门骑上车走了。第二天忍不住又说：“我还得去看看！”就又走了。这样连着看了好几次，每次回来都兴奋地反复为我描述着“福音堂”的样式，还有他所看见的那些长椅子、风琴等等，真是巴不得每天都去看上几趟，不住地说着：“我看不够啊！”看着相忱那副火急火燎的样子，我就劝他，说：“这事你先别急，要好好祷告，你要确实清楚是否神的旨意，再考虑具体的细节。如果真是神的旨意，他不仅要为你预备事奉的地方，更为你预备事奉的平安道路。我们还是先祷告等候吧。”相忱很同意我的话，我们就天天为了“福音堂”的事情向主祷告。一连几天的祷告，相忱和我的心里都同样感受到平安。相忱又耐不住性子想再去“福音堂”那里看看，这次还特意带上七岁的大儿子福音同去，临出门前回头对我说：“我带福音去看看。”我笑着说：“去吧”，话音未落，父子俩已经不见了踪影。

没想到回来的时候，福音也和相忱一样的兴奋，一进门就连蹦带跳地对我讲说起他刚看到的情景：“娘，那离白塔寺特别近，可热闹啦，人

可多啦！”我就问他看见“福音堂”了没有，福音说：“爹带我到那儿，我问爹这是什么地方，爹说是传福音的地方。爹还说以后我们全家就住在这里传福音，问我好不好，我也看不见，爹就把我托到窗户上往里头看。娘，我觉得那地儿真好，将来我也要帮着爹一起传福音呢！”相忱和我都高兴地听着孩子讲话。离“福音堂”不远处就是北平很有名的白塔寺，相忱带福音去的这天正遇上寺里的庙会，来赶会的人很多，相忱看到这情形就开始计划着等到“福音堂”开堂之后一定得置买几个大鼓，他还要像在农村时那样去庙会上传福音。

相忱决定这几天就抽空去找那里的房东谈谈，此前相忱早就找了住在“福音堂”后面小屋的看门人，看门人叫郑雪樵，是个医生，他说自己也是信主的，一直以给“福音堂”看门的名义借住在后院的小屋里，以后我们租下这里他就搬走了。相忱从郑医生那里了解到原来在这个“福音堂”布道的是一位名叫织田金雄的日本牧师，日本投降后，织田牧师和其他的日本人一样都被关进东单的集中营里等待着被遣返回日本去，房子也就被国民政府给查封了。但是据那位看门人说，“福音堂”这座房子实际上并不是日本人买下的，而只是织田金雄从中国人手中租来的，真正的房主是一位叫作李少鹏的中国人。但是现在国民政府却不问青红皂白地把它当作是日本人的产业给查封了，搞得房主也大呼冤枉，好好的房子空了这么久，一文钱的房租也拿不到。织田金雄是一位日本牧师，曾在美国学习过神学，后来又到中国传道，算是在中国比较有名气的日本牧师，作过“中华基督教团”的领袖。相忱这次回来后听人说起过他，但没过多久日本就宣布投降了，织田牧师也被集中关押了，所以两人彼此都不曾有过交通。相忱已经从看门人那里打听到房主李少鹏住在前门附近的兵部湾十九号，而且正急着想要把房子租出去。

我也想去“福音堂”看看，就照着相忱说过的地址自己一个人找了过去，很容易地就凭着门楣上“福音堂”三个字的牌匾找到了我要找的地方。这是阜成门内大街路南临街的一处中式平房，门牌上标着“阜成门大街一百六十号”。我走近前，见大门上确实贴着盖有国民政府大印的封条，从

粘满灰尘的玻璃窗上望进去，同样在厚厚的灰尘下面压着的是讲台、风琴，还有几十条横七竖八的长椅子。回来的路上，我也越想越觉得相忱的想法不错，在这里传福音的确是再适合不过了。且不说这个“福音堂”原本就是个聚会的地方，必定还会留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和会众；加上会堂门口就是人来车往的繁华街道，对面的白塔寺每月还有三次大庙会，所以这里只要一开堂，就一定会有不少人来聚会；更想不到的是看起来屋里还预备有现成的各样设施……想着想着，不由得自己也兴奋起来了。

我到家时相忱也从房主那里回来了，可带回来的消息却一点也不乐观。虽然没费什么周折就在前门兵部湾打听到了房主李少鹏，他证实阜成门内“福音堂”的那处房子确实是他的产业，确实曾经租给过日本人，他现在也是很乐意出租那处房子。可他又说，他也没想到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竟然会把他的房子误当作是日本人的产业给查封了；这半年多，他几次托人找门路去向市政府的官员们说情结果却都没有下文，白花了许多的冤枉钱，白跑了许多的冤枉路，还白受了一肚子的冤枉气，至今房子依旧被封着。李少鹏是个性格直爽的人，他明确地对相忱表示：他已经不愿意再去为这事和政府那些人打交道了，若是相忱打算租用阜成门内的房子，就得要相忱自己去和市政府办理启封的手续。在这之前，李少鹏要相忱先和他说好一个房租的价钱，如果政府能给这所房子开封，就一定如约把它租给相忱，即使事情办不成也是两不亏欠，免得相忱费钱费力地从政府那里办下来开封的手续，最后却谈不拢价格；倘若双方现在就谈不拢，相忱也就不必再费事去找人开封了。

相忱和我都认为房主的做法很公道，我告诉相忱我刚去看了“福音堂”，也觉得那里真是一个很适合传福音的地方，是主预备的地方，但我提醒相忱还要继续为这事祷告：“祷告吧！一切都交托主吧！”接着几天的祷告，我感到心里有真实的平安，相信“福音堂”确实是主预备的地方。相忱在祷告中也很受鼓舞，又去和房主谈了几次，最后把“福音堂”的房租谈定为每月三百斤小米的价钱。

房租谈好了，下面就该是设法给“福音堂”启封了。抗战胜利后的各

级国民政府更加的腐败，贪污贿赂公行；特别是沦陷区的日伪产业很多都被政府派来的接收人员霸占瓜分了，甚至许多本不属日伪产业的也被他们乘机强夺；“福音堂”所处的阜成门内大街是北平城的繁华地段，被无故查封，难保不成为觊觎的目标。何况房主李少鹏在北平城里还有不少的产业，也算得上是个有钱有势的人，以他的财势上下活动了半年之久尚且不能有丝毫的效果，我们这样无依无靠的平民又能怎样呢？相忱心里着急，恨不得立刻就把“福音堂”租下来才好！我又再次提醒他最要紧的是迫切地为这事祷告：“祷告吧！一切都交托主吧！”相忱的一个弱点就是脾气很急，平时手边的书找不见了，都非得要我放下正在做的事先来帮他找书不可，这会儿虽然我劝了几次，可他还是急。我就自己先安静下来，为“福音堂”也为相忱向主祷告。相忱以往一直都是在教会里学习和事奉，与教会以外的人少有交往，在这之前又在农村服事了四年多，在北平城里几乎是到了“举目无亲”的地步；加上他实在就是一个全心为主传福音的人，心思意念都放在了传福音上，和人的交往也大都是建立在传福音上；至于世上的那些门道，他就一窍不通了，更不会按照世上的规则来与人打交道了。苏朝生牧师也是刚到中国的年轻人，对此也和相忱一样的一筹莫展。

世界上的道路都已经穷尽，唯有在主里面的道路是畅通。相忱开始从急躁中安静下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向着神祷告祈求。在祷告中，相忱深深地责备自己，忘记了自己事奉的本源，真是亏欠了神！传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工作，神必定会负完全的责任，以他的大能打开一切通达的道路。相忱把自己身上的重担交在神的手中，把“福音堂”这件事情完全地向神交托，求神在他至高的心意中成就。同时相忱又求告神，把启封这件事作为神允许他开设“福音堂”和在北平事奉的一个凭据。

既然没有关系人情，也就不必设想通过关系人情来为“福音堂”开封了，相忱和苏牧师商量后就决定自己直接到市政府，去找管理这事的部门交涉。临走前，我对相忱说：“出于主的，他必赐给通达的道路！”相忱微笑着回答：“那我相信！”就出去了。



我从没想过要如何找关系托人情来为“福音堂”开封，所以也想不出相忱他们去市政府的结果会怎样，但是我相信“出于主的，他必赐给通达的道路！”我正预备晚饭的时候，相忱回来了，一进门就直接冲我奔过来，把手里捏着的一张卡片直伸到我的眼前，用激动的语调几乎向我喊了出来：“看，快看，看这个地点！”我先看了看他脸上的惊喜，再看他递给我的那张硬纸片上印的地点“北新桥一巷十号”，我心里一动，这不是王克忱先生家的地址吗！王先生是相忱在青年会读书时的数学老师，也是一位敬虔的信徒，在王明道先生的基督徒会堂担任执事。相忱和王克忱先生多年来都保持了联系，以前常带我去王先生的家，所以王先生家的地址我非常熟悉。原来相忱手里拿的是一张名片，上面的地点就是王克忱先生家的地点——“北新桥一巷十号”，可地点上面的人名我却不认识。我抬起脸诧异地望着相忱，他却把这张名片又往我面前伸了伸，说“就是这个地点，你看对吧？”我接过名片，又仔细地看了看，没错，正是“北新桥一巷十号”，就对相忱说：“这和王先生家是一个地儿啊！”听到我说的这话，相忱从我手里拿回名片，抑制不住兴奋地一连声地说：“对！对！”

相忱给我讲起刚才他和苏牧师驾着一辆由美式旧军用吉普车改装的“福音车”，径直开到当时北平市政府所在的中南海西花厅，找到负责管理查封日伪产业的办公室，大概是因为“二战”胜利后，西方人士在中国比较受到尊重的缘故，那里的人一看进来的是一位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马上便显出格外的恭敬。听苏牧师讲完事情的原委，一位主管此事的人再三地向苏牧师表示他们一定会尽快查清和处理好此事，之后又递上了他自己的名片，请苏牧师有什么事尽管找他联系，还客气地把他们两人送出门外。离开了市政府，相忱拿出那位主管送给他的那张名片一看，不由得一阵惊喜——这位姓刘的主管的住址，竟然和他的老师王克忱先生家是同一个地点！真是想不到，难道有这么巧的事！相忱回来和我一商量，就决定现在就去王克忱先生家，把为“福音堂”开封的这件事和他交通一下，看看王先生是否认识名片上的这位刘主管。

说起苏牧师驾驶的那辆“福音车”还有一段奇妙的故事。原来抗日战

争结束后，驻华美军部队开始撤回回国，许多军用物资就被就地折价出售，一辆吉普车只要五百美金，非常的便宜。苏牧师听说这一消息，就赶去天津买了一辆这样的旧吉普车，价钱低廉却相当好用，乐得他使用刚学会的中文说：“真是物美价廉！”车开回北平，苏牧师和相忱一起动手对这辆车进行了一番改装：原本绿色的车身被重新涂成白色，车的前后和两侧都分别用中英文写上了“福音车”的字样。前段时间，他们两个人就经常在下午驾着“福音车”到北平城内外各处去传福音；去市政府时，这辆“福音车”无意中又帮了他们的大忙，所到之处门卫不加阻拦，一概畅通。

相忱从市政府回来的当天就去找了王克忱先生。王先生听了他的来意，很赞同相忱开“福音堂”的想法，也认为阜成门一百六十号是个合适的地方。他还告诉相忱，今天在市政府给过相忱名片的那位刘先生正是他家的房客，平时和他关系挺不错；他会找这位邻居说一说实情，估计如果那所房子真是中国人的产业，应该很快就能得以启封。王克忱先生特别劝相忱一定要安静祷告，清心等候。

从王先生家里回来，相忱感慨地对我说道：“又一个想不到啊！想不到王老师同院的就是管开封的！”这一天的晚上，待到家人全都睡下了，相忱和我肩并肩地跪在地上，向神献上同心合意的祷告。言语无法诉说我们心中的赞美和感谢，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这一连串的际遇绝不是什么巧合，而是神在他心意中的预备。

苏牧师听说“福音堂”即将被启封的消息也很高兴，特地把他的“福音车”开进达升木场，开到我们住的房子门口，用他那很生硬的中文，笑呵呵地指着车问我：“你瞅，好不好？”我向他报以点头微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苏朝生牧师，他挺年轻，胖胖的，个子比相忱略高一点，脸庞白净，一头金色的头发，只会说不多也不熟练的中国话。他站在我们那间小屋的门口，探头向里张望了一下，就没有进来，说：“你们就住这儿？！”边用手比划着，边对我说：“那边妥了，赶快搬家。我们很高兴，又有车子，将来还有房子，你们可以去，搬过去住。”我微笑着回答他：“感谢

主！也谢谢你！”他听我的话很高兴，说：“主……主……”想了想，笑着眨眨眼睛，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主……给……的……！”我们也一起笑着回答他：“阿们！阿们！”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的样子，房主李少鹏的儿子来了，他告诉相忱：“房子批下来了，你们可以租了，按着原来商定的那三百斤小米租给你们。”

## 五

相忱和苏牧师拿到了房主送来的钥匙，就一刻不停地去“福音堂”开门。让相忱高兴的是他没有想到“福音堂”里各样所需用的真是一应俱全，一样也不缺，甚至就连各个房间里的电灯泡都是完好无损的。相忱前几次从窗户上向里看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屋里有浸洗的池子，就以为没有这样设施。因为相忱在受洗的问题上也是主张施浸，所以当时他还准备要买些材料自己动手砌一个浸池。可他今天开门进去，就见讲坛的前方有一个用木板盖着的像是个地窖，掀起木板才意外发现底下原来就是个施浸用的大水泥池子！更加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他还从尘封的橱柜里找出来好几个中式的鼓，有大也有小。相忱回来对我说：“神真是格外地体恤我们，知道我们没有钱，所以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不需要再买用具或装修的地方，现在我们就只要把它打扫干净，写一些宣传标语就行了。”我说：“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动手做就行了，我来负责打扫卫生和写标语吧。”

第二天，我就带上福音，又从家里拿上扫帚、抹布等来打扫“福音堂”。阜成门一百六十号门上原有的封条已经被撕开了，进到里面，只见四处都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各样家具器物等等也全都是东倒西歪，一副散乱不堪的样子。我前后用了几天的时间才把“福音堂”的内外全部打扫和规整干净，七岁的福音像个大孩子一样，天天跟着我跑前跑后地收拾东西，非常卖力气；因为这时我正怀着我们的第四个孩子，所以有些高处的和较重的活计，就等着相忱下午从冉约翰的旅馆下班回来再做。

房子初步收拾停当，我们全家即刻搬了过来。神为我们一家人在这

里预备的是如此的完全，以致我们来时只需带着被褥和各人的衣物。“福音堂”的后面有三间不大的房子，一明两暗，中间的房子用作接待客人，相忱和我住左手的那间，婆婆和孩子们住在右边。

看着屋里屋外重新变得整洁一新的“福音堂”，相忱正式对全家人宣布：“我们现在不用跑了，就在北平坐堂传道。”全家人都很高兴，当然最高兴的还是大病初愈的婆婆。白天，相忱站在“福音堂”的门口注视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晚上，我们在一起祷告时，他和我分享对白天景象的感动，说：“我们为路上的这些灵魂的得救向主祷告吧！等开堂了，我要上街去敲鼓传福音，还要到庙会去。”当时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里的传道人，在特定的日子以外并不经常到会堂以外去布道，即使上大街布道的也很少有人会采用“敲鼓”这样的方式，但是这些对于相忱而言都算不得什么，只要能把神的福音传出去，他都会毫不犹豫地采用任何可能的方式，更不在乎自己被人讥讽甚至遭遇排斥。

一天下午，相忱和我正在前面的堂里忙着收拾东西，苏牧师满面春风地从外边进来，先是高兴地这边摸摸那边看看，随后就从身上掏出一条皮尺来到门口，爬上爬下地来回量着门上那块牌匾的尺寸。相忱走出来，问他这是做什么，苏牧师边量着边说：“量牌匾啊！不量尺寸怎么去做新牌匾啊？”

相忱抬头，诧异地望着门上的牌匾和正在忙着丈量牌匾的苏牧师，问道：“这上边不是有一个现成的牌匾吗？牌匾还能用，就不要花那些钱了。”

苏牧师指指牌匾，反问相忱：“你看看那这个牌匾还能用吗？上面写的什么啊？”

我记得挂在门上的那块写有“福音堂”三个字的木制牌匾固然是有些旧，但前两天相忱刚用布给擦干净了，上面的文字也算端正得体，没什么不能用的呀！苏牧师大约是看相忱没还明白他的意思，就对相忱解释说：“我们是神召会，要挂神召会的牌子，不挂这个‘福音堂’的牌子啦。”闻听这话，我也不由得停住手，眼睛望向正站在门口的两个人，四周一

下静了下来。相忱首先打破沉寂，一字一句地说：

“不要挂神召会的牌子！就用这个‘福音堂’的牌子！”

苏牧师一听就好像有点急了，说：“那不行！如果不挂神召会的牌子，房租也没有机构替我们出，你的工资问题也解决不了，教会的零散开支更是没有着落。袁弟兄，你想想，现在这里刚开堂，没几个信徒，仅靠着信徒的奉献是绝对解决不了这些需求的，更不要说再往大扩展了！”

话说到这儿，我终于明白了苏牧师的心意，在他的计划中这个“福音堂”是要以神召会的名义来开办，堂里的租金和各项费用包括相忱的工资等等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由神召会总部来解决。相忱也一定听懂了苏牧师话里的意思，他对苏牧师说：“我非常感谢你为我所设想的这些，但是我不想加入任何一个机构，尤其是外国的差会，我也不拿任何机构的固定工资，如同外邦人上班做工一样。我只愿意在这个‘福音堂’里做主托付我的工作，主给我一个羊，我就牧养一个，给我两个我就牧养两个，传福音的当靠福音养生。工作少，奉献少，我就可以用带职事奉的办法维持家庭生活；工作多，奉献够我们的基本开销后，我就专心全时间完成神的托付。我不求名声响，也不求排场大，只愿意作一个忠心的小仆人。主托付我一份工作，我就努力做好一切，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话说到这里，两个人彼此都有点僵住了，苏牧师就要相忱先好好想想，这么大的事上不要急于做决定，他过几天再来。送走了苏牧师，相忱回到屋里继续做他自己的事，仿佛刚刚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样。

一个教会刚开办，仅仅靠信徒的奉献连维持房租都不够，如果能找到一个机构来提供支持，确实能立刻解决很多实际困难。所以苏牧师提出的办法是既简单省事又最有把握，也是很多中国的教会和传道人所求之不得的。而且当时国外的一部分宣教差会常在教会内提供一些经济上的供应来扩大影响，结果造成一些人来“出席”聚会只是为了能按时领取钱粮，里面没有真实的信心，成为“吃教”的，这样的人在信徒中有，甚至于某些传道人也是竭力钻营到薪金丰厚的外国教会里去。相忱却最不同意这种事奉的方式，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传道人既然在他的事奉上必须完全依靠神，那么在个人生活上也同样需要单单地仰望神，因此就有

必要操练在各样的困难中完全地依靠神；在事工上与其他教会和传道人的合作是应当的，但在接受供养上就一定要很慎重，否则一旦养成了在生活上依赖机构供应的习惯，就难免会由于金钱的缘故而受到很多出于人的左右，以致在事奉上不能合神的心意。

一九三八年，相忱完成神学装备后，完全可以留在远东圣书学院服事，但他不满足于那种不愁吃穿的稳定生活，而是选择了去天津圣会所作一名生活清苦的普通传道人。一九三九年，因为我即将临产，我们回到北平生活的那段时间里，相忱虽然应吴智院长的邀请回到远东圣书学院工作了一年多，但他时时都在祈求神为他预备前往农村的禾场，所以一遇到裴约翰牧师，相忱马上放弃了在北平已经相当安稳和富足的生活，带领全家来到陌生而又艰苦的河北成安。这时，相忱虽然和裴牧师同工却没有加入宣圣会，除了接受日用饮食上的供应之外也不从教会中领取薪金，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忱初次尝试不完全依靠机构供养的生活，成为他以后在事奉上和生活上更完全地依靠神的重要开端。随后四年在农村辗转的服事期间，再没有任何固定的供养，相忱在信心中单单地仰望神，真实地体验到直接从神手中领受恩典的甜蜜，神的信实也更加坚固了他的信心，确认了神给他的带领。我既然和相忱在主里一同领受生命之恩，也愿意一同在主里凭信心领受神的恩典与应许。

几天以后，苏牧师果然又来了。像往常一样打过招呼，我带着孩子进到咱们住的里屋，中间的客厅里就只有苏牧师和相忱，看得出两个人的表情上都比平时多了一份严肃。外边沉静了好久，还是苏牧师先开口说道：“袁弟兄，这里这么大的一处房子，光是租金就够你受得了！你不挂神召会的牌子，自己工资也没有，一家老小可怎么生活？你可要仔细地想清楚再做决定，免得以后后悔！我说这些全是为你好啊！”只听相忱接着他说：“我不用再想了，这个问题我从读神学院毕业起就开始想了，我一辈子都不准备加入某个机构，也不准备领这种工资，但我相信，神绝不会让我缺乏，他必定负我完全的责任。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意见，抛开机构，抛开金钱，大家就在这里彼此同工，牧养这个教会的信徒，

共同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苏牧师还在继续试图劝说相忱：“我是挪威神召会的牧师，我不会脱离母会的。并且你看现在不拿现成工资的传道人有几个呢？这也是神供养我们的一种方式！再说有教会在背后支持我们，对以后的事工开展会很有利，至少免去了你在筹措经费上的问题！我劝你还是不要匆忙做决定，挂神召会的牌子对你会有很大好处的！你再考虑考虑吧！”面对这样的劝说，相忱仍是不为所动，他说：“我相信神对每个人的带领方式都不一样。使徒时代的工人从来没有固定的工资，但是他们传福音的火热和果效是无可比拟的！我们今天要把主的福音传出去，也应该像当初的使徒们一样，使徒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我们的典范。大家都传一个基督耶稣，不要设立什么派别，更不要以派别而划定范围，我不同意挂神召会的牌子，就是这个意思。我不加入任何宗派，也不领任何机构的钱。”

外边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不动了，两个人谁都不再说话。我在里屋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留心听着他们的话。我从心里的深处赞成相忱的话，但我也从苏牧师的话里感觉到他确实始终都在耐着性子劝说相忱，我更了解相忱的那个脾气，不知道这两个人之间的争论继续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唯有在听着他们谈话的同时默默地为这两位神的仆人献上代祷。在接下去的交通中，苏牧师和相忱在挂牌子的问题上分歧依旧，两个人谁也不能说服谁，气氛也越来越紧张，苏牧师终于忍不住说出：“弄了半天，你不跟我同工啦！那我走了！如果你以后有困难了，再来找我吧！”我一听苏牧师要走，赶快抱着孩子出来想要送送他，刚迈进客厅就见苏牧师紧绷着脸，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正要往外走，我心里对这位年轻又满有热心的传道人很有些愧疚，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安慰他。苏牧师见我从屋里出来，只略微冲我点点头，说了句：“再见，我走了！”就朝外走去，相忱陪着他一起走到“福音堂”的大门口，两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苏牧师就径直出门去了。以后听说他回张家口去了，再以后他也和其他国外传道人一起退出了中国。

当时谁也不曾想到苏牧师这一走就要四十八年才回来。在中国重新

开放以后的一九九四年，苏朝生牧师才得以再次来到中国，并走访他曾经服事过的教会和同工。临行前，他专门委托挪威驻华使馆协助他寻找过去的同工和信徒，十多人的名单中第一个人就是 Allen Yuan。久别重逢之际，苏牧师和相忱都欣喜地发现对方与四十多年前一样的没有改变，来华前苏牧师刚获得挪威王国政府为他颁发的一枚奖章以表彰他传道四十年，相忱也在被迫中断二十二年后重新开始带领家庭教会。苏牧师向同行的人介绍相忱，说：“这是我最好的同工！”又激动地对相忱说“是主带领我再次见到你！”相忱也热情地两次邀请苏牧师在宝塔寺教会的聚会上证道。两位一同在主里忠心服事却没能有机会同工的仆人，终于在主里了却了各自曾有过的那份遗憾。

## 六

“福音堂”果然很快就在经费上遇到了第一个困难。

“福音堂”外面临着阜成门内大街是三间宽的门面（“间”是中国北方计量房屋数量与面积的传统方式，具体的标准略有不同。这三间的宽度大致相当于 12 米。）里面也是三间的进深，所以整个礼拜堂有九间的面积；从礼拜堂后面的穿堂门进去是一个长条形的小院，再往里去对着穿堂门的是那一明两暗的三间南房。礼拜堂里还有几组雕刻有精美花纹的，可以活动的木隔栅，卸掉这些隔栅，礼拜堂就合成一个大的厅堂；遇有需要时，可以方便地用隔栅在厅堂的边上分隔出几个单独的小空间。没想到后来这些隔栅还真派上了大用场，教会内外的不少人都曾在这些单间里居住过。“福音堂”的房屋年久失修，待到我们租下来的时候已经十分破旧了。前面堂里地面上的方砖由于多有破碎而变得坑坑洼洼，不少地方的木结构也已腐朽不堪，几乎所有的门窗都不能关严，大门下边还露出一条大缝子。我们在使用这里聚会布道的十二年当中，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也没有进行过什么像样的整理装修，只有一次是由左弟兄夫妇奉献了一些蓝色的油漆，我们自己动手把礼拜堂的门窗重新漆了一遍，

可以想象，这样一所大房子的租金肯定不会是个小数目，三百斤小



米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可租金为什么不直接用货币来计算，而是要用“小米”的价钱来折算呢？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然在旷日持久的内外战争中被彻底摧毁，国家的前途也不明朗，政府所发行的法定货币也在人民心目中完全失去了信用和交易的功能，通货膨胀，物价简直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似的飞涨，谁也无法预测出货币贬值的速度，于是大家不得不把小米这样一种有广泛需要的商品，在某一特定时间的价格定作表示其他商品交易价格的标准，甚至连人们的薪水都不得不用当天小米的价格来计算。所以相忱与房主商定的那三百斤小米的房租，并非真的要交小米，而是要按着交租当日小米的价格，交给房主相当于三百斤小米的货币。相忱和我都恐怕在房租这事上亏欠人家，可是最严重的时候，每天的早晨、中午和晚上都要各报一次小米的价格，一天三涨，我们不知道交租那天小米要涨到多少，更不知道一个月里辛苦积攒的钱到了那天还够不够交上房租。

“福音堂”最初一个月的租金是苏朝生牧师和我们一同承担的。自从刚听到相忱决定要租下“福音堂”的时候，我就马上留出了相当于一个月房租的钱，到了交房租的那天，苏牧师也拿出了他自己的一百多元钱，执意要求和我们一同负担房租。苏牧师曾经的担心并非是多虑，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实际情况竟远比他所担心的还要严重得多。开堂布道前，相忱估计因为这里是老“福音堂”，应该会有一些老信徒因“福音堂”的重开而回来，结果却不是这样的。我们后来才听说，前几年织田金雄在这里布道的时候，他的那间“福音堂”里根本就没有多少中国的信徒；再有就是，相忱从神学院毕业到现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在北平以外的地方事奉，和北平的信徒接触不多，同样，信徒们对相忱也不熟悉，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叫袁相忱的传道人新近在阜成门内开了这间“福音堂”。

看到“福音堂”一时还不能从信徒的奉献中得到支持，相忱除了继续在冉约翰的旅馆工作半天以外，又另外接了文字翻译的工作回家来做，差不多每天都要夜以继日地工作到深夜。但即使这样，相忱一个月所有

的收入加在一起都还不够“福音堂”的房租，到了该交房租的那天，我从那笔已经所剩无几的嫁妆中又拿出几块银元交在相忱手里，才算凑足了那个月的房租。

困难虽说比我们预料的大，但是神的恩典更大！神亲自为我们预备下了这间“福音堂”，又在其中预备下了应有尽有的各样器具，连相忱传福音时想要的鼓都预备下了，使“福音堂”在困难中却能够一无所缺地开堂布道。神的恩典是如此丰盛，远超过我们所能有的筹划和想象，让我们在神的应许中满有信心——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无论相忱还是我，谁都没有想过“福音堂”会不会真的有一天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我们都相信神必负我们完全的责任。

神的恩典，使属他的人向他充满着感恩；又使在他恩典中的人，因着所遭遇的诸般困苦就更加地寻求他，依靠他。苏牧师临走时曾要相忱有困难去找他，但相忱却没有那样做，没有去要那份现成的支持，而是迫切地向神祷告。相忱对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一定要等候神！自己生活苦一点没关系，这是神对我们的试炼，要看我们能否坚持到底！”我也赞同相忱的这个选择，愿意和他一道在困难中信靠等候神。为了不要在房租的事上亏欠房主，我每天都要借着祷告，在神的面前仔细算计手头的每一个铜板……神也果然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保守我们在“福音堂”事奉的十二年里，一次也没有拖欠过房租。

房租的负担就已经够重的了，更不要说再有全家老小的日常开销了。粮食天天都在不停地涨价，市场上能见到的只有玉米面，况且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够买得起的，一家人都靠着每顿饭一碗玉米面粥充饥。当时正有一批来自美国的救济物资在北平的各大教会中发放，我就曾经亲眼看过满载救济物资的大卡车开进马路对面宫门口东廊下的神召会，车上装着黑色的铁皮箱子，箱子上写有“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字样，也看过神召会的会友们抱着领到的东西从里面出来。有人也为相忱送来一份，有面粉，还有铁桶装的奶粉，可相忱却说：“从神来的我才要，从人而来的救济，我不要！”把人家已经送上门来的东西硬是又推了出去。那面粉是

外国进口的，精细雪白，而我们家就连中国生产的黑面粉也已经有很多日子没有见过了，正在长身体的几个孩子也真需要奶粉补充营养，可相忱却丝毫不为所动。宫门口东廊下的那间神召会曾请相忱在他们的聚会上担任翻译，会后所有在场的神召会的同工和会友，每人都领到一份教会分发的奶粉和油脂等。教会也同样送给了相忱一份，他还是不肯接受，对人家说：“我不是神召会的人，我不要！”神召会的传道人培保罗牧师看着这样的情形实在感到过意不去，自己掏钱买了十二个鸡蛋送给相忱。相忱回家把这十二个鸡蛋交给我，无可奈何地笑着说：“呵呵，我都不要，他硬塞给我的！”相忱绝非不清楚全家人生活的困难和需要，但既是他认为这些东西属于人的救济而不宜接受，我也愿意顺服神借着他在“福音堂”和我们全家中的带领。

每一个与主同工的人，都不免会在各自的事工乃至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很现实的难题，同时在你身边也往往正有着一个可以直接解决问题的捷径，似乎要比祷告和等候神更实际。这就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一个选择，要么依赖人手里的帮助，要么信靠神的应许，你的选择将决定你一生所行的道路是怎么样，或是与世界为伍，或是行在神的心意之中。

一年多过去了，“福音堂”在缓慢而坚定地成长。转眼到了一九四七年的下半年，相忱看到“福音堂”的事工上需要他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并且这时堂里也开始有了不多的一些奉献，就果断地辞去他在外面的一切工作，全心全力地传道和牧养教会。

相忱和同工们商量以后，决定把“福音堂”的奉献分成两个部分。每月前三个主日聚会所收到的奉献款归给教会，主要是用于支付房屋的租金；最后一个主日聚会的奉献则用来供给传道人，也就是我们这一家人的生活需要。因为在“福音堂”聚会的信徒主要是城市中的平民，还有不少是来北平躲避战乱的外地人，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不富余，所能交纳的奉献其实是很有限制的。用于我们生活的那一份奉献中，整个房子的水电费还有冬天取暖用的煤钱就已经占去了大半，余下可以用在一家人生活上的钱很少，需要我时时地精打细算才能维持；而且前三个礼拜的奉献

合在一起也常常还不够那三百斤小米的份量，我必须另外再拿出钱来补足其间的差额，我的那笔嫁妆里的最后几块银元就是在这时一块一块地用去的。家里生活遇到的事情，我不仅从来都不告诉给相忱，免得他从事奉上分心，反而安慰他，说：“你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家里其他什么都别管。”

即使生活艰难匮乏，我们仍是尽我们所能地款待那些来“福音堂”寄居的人，他们有的是因为事工的需要暂住的，有的是因为路途远或者碰上坏天气就临时住一两天的，还有的则是因着各种困难来这里借住一段时间的。当初曾在“福音堂”住过的杨津广弟兄，直到他八十多岁了还记得他那时吃过我烧的菜，说：“师母烧的那一手粤菜真是地道极了！可我后来看到师母给我烧菜，可她和孩子们顿顿吃窝头就咸菜，我就再也吃不下去了。所以快要吃饭的时候我就躲出去，到大街上买俩烧饼吃了回来，就跟您说我在外边吃过了。”后来每周有十几位盲人信徒来聚会，相忱怕他们赶回去不方便，中午就留他们在“福音堂”里吃饭，我也尽力使他们吃得可口。几十年后，很多在“福音堂”聚会过的弟兄姊妹回来找到我们，要求回报自己当年在教会里曾接受过的款待。

在家里受到特别照顾的是相忱，他是为主辛勤做工的传道人，又是我们这一家的头，所以我在生活上首先要照顾好他的身体。比如家里吃面条的时候，我总是买两角钱的羊肉单独为相忱做“卤儿”，我们吃素面条。条件好了一些的时候，就买一点鸡或骨头给相忱煲汤，有多余的再依次给婆婆和几个孩子，我自己真是一口也没有喝过。直到一九五八年相忱被捕的那天晚上，家里的火上正炖着鸡汤，进来搜查的警察看见锅还问我：“这是什么呀？”我回答说：“这是鸡汤。”

## 七

相忱认为“福音堂”最大的难题不是来自经济上的，而是在于传福音的果效上。

一九四六年三月份“福音堂”正式开堂。第一个主日的清晨，全家人

一起动手把“福音堂”里里外外打扫得一尘不染。随后，相忱带领我们开始唱起赞美神的诗歌。尽管三月份的北平仍然是春寒料峭，相忱还是毫不犹豫地吧“福音堂”朝向大街的门窗全部打开，为的是在大街上走过的人们都可以看到听到我们的聚会。

我们一家人在屋里高声唱诗，门外渐渐有人被诗歌的声音吸引，停下来远远地向里面张望着。相忱看外面已经聚起了不少人，就走出来主动和他们搭话，邀请大家进来聚会听道。可人群中不但没有一个人进来，反而纷纷后退像是在躲避着相忱，最后又都各自走散了。倒是有一人探身进来，好奇地问了一句：“你们这么热闹，是卖药的吗？”原来旧时药铺的字号中大多都带有一个“堂”字，所以这位根本不知“福音堂”是做什么的，只看到也有一个“堂”字就把这里也当成是一家新开张的药铺，当他听说“福音堂”是传福音的基督教会后，马上就转身离开了。

如此忙活了一大圈儿也没有见到一点儿的效果，相忱一个人回到堂里，走上讲台，开始他当天的主日证道，台下的听众只有他自己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我坐在下面，眼睛一刻不离正在讲台上神采奕奕的相忱，他和我以前每次听他讲道时完全没有二致，我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祷告，祈求神大能的手扶助他所爱的仆人，也希望相忱能从我的眼光中看到我们全家对他的支持。相忱那次讲的比较简短，但我一直都记得他的题目是“如何把你所求的告诉神”。讲道过后，我们全家一起为“福音堂”的工作向神祷告，祈求神为“福音堂”打开福音的道路！

下一个主日的时候，相忱又前进了一步，除了还是像上一次主日同样地打开门窗之外，他把在“福音堂”里找到的那个大鼓也抱了出来，摆在大门外边。一大早，全家人就在门外的台阶上站成一排，相忱亲自打鼓，我们老少几口人和着他的鼓点唱起了诗歌，所唱的内容是相忱预先选好的，词曲简洁明白，“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有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要救罪人。”这一招果然奏效了，鼓声响亮，路上的行人呼拉一下子就围了上来，要看这边发生了什么热闹。直等到人群围聚得差不多了，相忱才停住手里的鼓，开始向面前的群众传讲福音：“我们是传福音的，想

得永生的人请进来听我们详细地讲！”可是众人你看看我，我瞅着你，却没有一个人肯向前挪动脚步，相忱见状又接着说：“这福音是白白送给我们的，不要花一分钱就可以得着，得着的人就有永生，就能上天堂！”大家一听说不要花钱就放下了心，终于有几个爱热闹又胆子大的人带头走了进来，随后又有几个人跟了进来。相忱也回到屋里的讲台上，开始对台下这不多的几位听众详细地讲述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没听上几句，就有人不耐烦地离去了，即使勉强留下听完的几位也没有回应的表示，以后也再不来了。

虽然没有任何一位原来“福音堂”的信徒闻讯回来聚会，也没有任何一位进来听道的人能够悔改接受福音，但是所有意想不到的困境并没有使相忱产生气馁或是抱怨。虽然最初的一两个月当中，在“福音堂”里聚会的就只有我们这一家几口人，但是相忱依然在一丝不苟地带领每次的聚会，唱诗祷告讲道，从来不曾有过丝毫的轻忽懈怠。因为相忱明白，传福音不是靠人的热情和才干，而是要完全地仰望神的大能和智慧！他不断地提醒自己：“等候吧，我只是撒种的，真正能让种子生长的是神！我现在应该只问耕耘，不求收获，因为还不到收获的时候！”并且越是在看不到任何果效的时刻，就愈发需要自己的谨慎自守和恒切祷告，他一方面照旧坚持带领全家每周三次在“福音堂”大门外边打鼓唱诗，另一方面借着每天的祷告，向神切切地祈求，求神的灵亲自做工，感动听道之人的心悔改信主，同时相忱也发现自己的不足，求神赐给“福音堂”合适的同工。

这段时间，相忱每天上午还是去冉约翰的旅馆里工作半天，下午回来就从堂里搬出两条长板凳放在门旁，自己坐在那里读经，遇到有路过的人驻足观看门上的标语和图画，他便会主动上前去与人攀谈，请他们坐下，借着这个机会就向他们传福音；没有人时，他就独自一人安静地看他自己的书，直到天色暗黑才进来。

一天下午，相忱照常坐在门旁读经，我在后面的屋里忽然听见好像外面有人在扣打门环的声音，就赶快走出来一看，只见“福音堂”的门口

有一位身穿长衫，留着一副长胡须的老者，正和相忱站在一起。听他边捋着胡须边笑呵呵地开口问道：“谁是这个‘福音堂’的牧师啊？”相忱很客气地回答说：“是我，小姓袁，叫我牧师不合适，叫我牧者，或者就叫我袁先生吧。”那位老者对相忱说：“我也是信耶稣的。今天刚好路过这里，看到这个‘福音堂’开了，很高兴，就进来看一看。”相忱见这位老者也是信主的，又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儿，就问：“老先生贵姓？听口音像是北京人吧？”老者哈哈地笑了起来，慢悠悠地捋着他的长胡须，答道：“鄙人姓夏，夏天的夏，名露川，北京人，信主好几年了。”原来这位夏老先生已经信主有好几年了，今天他碰巧从“福音堂”门口路过，见大门开着就走近来，相忱坐在门旁低头看书却没有觉察到他，故而才有礼貌地轻扣了几下门环。相忱连忙把夏老先生让进堂里，夏老先生一边随着相忱往里走，一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堂里的各处。

我见这位夏老先生约莫有六十多岁的年纪，腰板挺直，宽宽的额头，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脸上总带着慈祥的微笑，最与众不同的是，老人的胸前留有一副引人注目的美髯。落座以后，夏老先生对相忱说他很高兴看到现在像相忱这样服事主的传道人越来越多了，主的福音越来越兴旺。相忱也向他详细介绍了“福音堂”目前所面临的状况，两个人真是越谈越投机，夏老先生是北平人，熟悉本地的情况和特点，他对于怎样在北平展开福音的事工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比如应该如何同北平人打交道，应该如何向北平人传福音等等。相忱听得非常认真，还把其中的要点一一地记录下来。他们俩一直谈到快要吃晚饭的时候，相忱请夏老先生留下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老先生婉言谢绝了相忱的邀请，临走时他告诉相忱：“下一次开堂的时候，我一定来帮忙！”

到了下一个主日，夏老先生果然早早地就来到“福音堂”。他和相忱一道站在门外对着过路的人传福音，引他们进堂来听道，直等到聚会结束人们都散去了，他自己才回家。从那以后的每次聚会，夏老先生都是这般的早来晚走，笑呵呵地从里到外地忙个不停。“福音堂”终于有了宝贵的第一位同工。

北平人在夏天的晚上有外出乘凉的习惯，直到一九八〇年代还可以在闷热的傍晚见到那些老北京人三五成群地坐在胡同里聊天的情景。夏老先生就和相忱商量要在夏天的晚上开布道会传福音，于是“福音堂”就开始有了在夏天晚上的特别布道会。聚会开始之前，相忱不仅像往常一样地打开“福音堂”全部的门窗，还将堂内外的十多盏电灯也一同打开，把里外照得一片通明，夏老先生则习惯地捋着他的长胡须走出来，把散布在“福音堂”周边街衢中间纳凉的人们请进堂里听道。相忱在台上布道，台下的听众摇着手里的蒲扇听道。有一次，我见一位老太太用自己带的小板凳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就去请她进来坐，可她说什么也不肯，可是没过多一会，我不经意的一转头却发现她正坐在我的身后聚精会神地盯着台上的相忱，会后这位老太太遇见我，很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坐在外边听不清楚。”我高兴地鼓励她继续来聚会，不久她就悔改信主了。几乎每次布道会后都有人悔改，男人就由相忱带领做决志祷告，妇女们大多是由我来带领她们祷告。神就是这样，一日一日地把得救的人加给他的教会。

相忱自己在布道会上讲道，也请夏老先生和其他的同工轮流上来讲，以后主日聚会上的讲道也是如此。相忱常说：“讲台的事奉是‘敞开的门’，而不是由一个人来霸占讲台。”为此他特别鼓励同工和信徒上台讲道，只要你愿意讲，他都会主动帮助你预备讲章内容。因为“福音堂”的讲台是敞开的，所以当年很多传道人都在这里讲过道，也有很多人慕名前来“福音堂”同工。“福音堂”不仅敞开了事奉的门，相忱更主动耐心地引导大家在传福音的道路上与主同工，很多人都曾有过和相忱一起上街传道的经历。有一位名叫张家麟的年轻弟兄，随父亲张子园先生在“福音堂”聚会。张子园先生早年做过东北军的少将军官，悔改信主以后热心事奉，也曾是基督徒会堂的执事。但那时张家麟弟兄正在北京大学上学，只是随着父亲每周来聚会，对福音并不热心。相忱看在眼里，多次邀请张弟兄参加街头的敲鼓传道，虽然当时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但是经历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之后，神的灵带领张家麟弟兄重新回到教会，他成为白塔寺教会最热心传福音的同工，常饱含激情地对年轻人见



证自己当年跟随相忱传福音的情景，激励他们为福音献身。

相忱和同工们不仅在真道上彼此建立，也在生活上互相关心。来“福音堂”参加聚会的人渐渐多起来了，牧养的事工也随之增加了。相忱知道夏老先生的住处虽然离此不远，但担心老人早晚来往奔波挺不方便，就用隔栅在堂里隔出一间，请夏老先生和老伴两人住在堂里。相忱诚恳地对夏老先生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足够的地方，我们就享受兄弟和睦同居的福分吧！”另外一位当时和相忱很亲近的同工李遵道弟兄，家里生活非常困难，我见他缺少衣服，就在给相忱买衣服的时候也同样为他买了一件。

神是信实的，依靠他的必定不致羞愧，等待他的必要收获丰盛。“福音堂”的福音事工也一步一步地显出果效。一九四七年夏天，“福音堂”第一次为二十多位信徒施浸，从那时起，以后每年夏天都固定有一次施浸，得救的人数逐年增加，一九四八年为三十多人，一九四九年有四十多人，一九五〇年达到五十二人。到一九四七年的下半年，“福音堂”每周的主日聚会已经从最初的只有我们一家人增加到有近一百人。也是从这一时起，相忱决心辞去他在教会以外的一切工作，全心传道。到一九四九年时，每逢聚会，“福音堂”里的二百多个座位都坐得满满的。以后，“福音堂”每年受洗的人数都有数十人，即使在一九五五年教会承受最大压力的时候，相忱仍在这里继续公开为信徒施浸，最后一次洗礼是一九五七年的夏天，直到第二年的春天相忱从“福音堂”被捕才停止。

相忱并没有只满足于“福音堂”信徒人数的增加，而是更加注重于信徒生命的成长，把它当作事工中的重中之重。每年夏天的施浸之前，相忱都要与每一位要求受洗的人详细交通，了解对方的信仰根基和是否真正地清楚得救，重点了解他们在信主以后，个人生命上的更新与改变。

“福音堂”的信徒主要是从事手工业和经营小生意的城市平民，还有一些是从外地来北平躲避战乱的人，大家虽然文化程度都不高，许多人的家庭生活还很困难，但各人在敬虔爱主和追求真道上常有很好的见证。我记得有一位家住在附近，被人称为“李老头儿”的老弟兄，原来就是信

主的，听说“福音堂”开堂以后每周主日都来聚会。他见到堂里那块写有“万有真源”的木匾已经陈旧不堪了，就主动说：“我也没有什么力量啦，我给教会绣个新匾吧！就绣‘万有真源’，这个词好啊！”没过几天，老弟兄果真送来一块白缎子上绣着黑字的绣匾，镶在绛色的木框里，替换那块旧匾挂在“福音堂”的中央。仔细端详，这块新匾绣得实在精致极了，若不是出自神的恩典，怎么能想象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能够做成如此美妙的工！当时还有好几位从外边来北平避难的信徒，在城里无处栖身，相忱也把他们安排暂住在“福音堂”里。后来有一位台湾省籍的信徒慕名来“福音堂”聚会，当时他正在近处的新街口开办了一家“丙寅酱油厂”，他见到那几位借住在堂里的弟兄很有感动，对相忱说：“你这里的弟兄都这么好！上我那里干去吧！”就把这几位弟兄接到自己的工厂里做工，还在厂里为他们解决了食宿。这位从台湾来的弟兄很爱主，每周都来聚会，来时总不忘带两瓶酱油送给我，那酱油的味道很鲜美。一九四九年时，这位弟兄忽然丢下工厂不辞而别，以后再没有过他的消息。我忘记了这位弟兄的名字，以后每念及这件事，心里总是感觉很亏欠他。

相忱没有因为“福音堂”已经结下的这些果子而让自己的脚步稍有放缓，我看得出，他的头脑中始终在一刻不停地琢磨着怎么才能把福音更有果效地传出去，以使更多的人在基督的福音里悔改得救。“转回吧，何必死亡呢？”相忱请人用铁皮把这句话制成八个一米见方的大字，树立在“福音堂”的房顶上，从很远的地方都能清楚地看见它们。看见的人常常会吃惊地找到“福音堂”门口来询问：“这是什么意思呀？”就连相忱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几个字竟然真的挽救了一个走向死亡的年轻生命。有一天，我在穿堂门看到相忱正在堂里和一位陌生的青年人谈话，那学生模样的青年人泪流满面，哽咽着对相忱讲述了自己的苦难遭遇：他是一个因为战乱失学而流落到北平的东北学生，感到人生没有了盼望，就在今天想到阜成门外的护城河投水自尽，正在这时他抬头看见了“福音堂”上的这八个大字“转回吧，何必死亡呢？”他想这句话不正像是对我说的吗？我难道真的只有死亡这一条路了吗？神的灵感动了这个年轻人的心，他彷徨良久，终于下决心要看写这话的人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解除

自己的苦难。年轻人坐在相忱的对面泣不成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打动了心扉的那句话“转回吧，何必死亡呢？”相忱望着面前的年轻人，温和地对他说：“年轻人，你来对了！我也许不清楚你到底有多大的难处，非要走自杀的路，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权力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是上帝创造了你，给了你生命，你只能好好地珍惜生命，并且要知道是谁创造了你，好好地信靠上帝，你就不会觉得生活是多么苦了！”这个青年人从此悔改信主，每周都来“福音堂”聚会。过了一段时间，他要回东北去了，行前专门来向我们告别，他说自己有钱就执意不肯接受我们给他准备的路费。从他离去的身影中可以看出，生命的喜乐平安已然完全代替了昔日死亡的悲观绝望。

传福音的事工对于相忱来说是不存在任何界限的，只要是传福音他都会不计代价地去做。还在一九四六年的秋天，当时北平国民党政府开办的广播电台开设了 850 和 770 千兆的福音广播频道，每个星期日的中午都要请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和一位基督教的牧师去讲道，每人每次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王明道先生和相忱都在被邀之列。这样，相忱主日的上午先要带领“福音堂”的聚会，讲完道以后还要和信徒个别交通，等到电台的汽车来了就要马上赶去电台播音，常常连午饭都顾不上吃。还有宫门口的神召会要举办专门对青少年传福音的“青年归主运动”，神召会的培保罗牧师来邀请相忱担任布道大会的翻译和讲员，相忱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布道大会开得很成功，印有培牧师和相忱两人照片的宣传海报贴遍了北平的大街小巷，很多年轻人在大会上悔改信主，虽然如此巨大的果效几乎并不能为“福音堂”带来任何看得见的增长，但相忱始终是全心全意地把自己投入其中。

为了福音的缘故，相忱敢于去做，也甘心愿意去做许多别人不敢做也不愿意做的事情。自从“福音堂”开堂以后，他和同工们每周三次在“福音堂”门口敲鼓向路上的行人布道。每逢大街对面的白塔寺有庙会的日子，相忱他们都把堂里的大鼓抬到庙会里，敲着鼓向那些来赶庙会的人传福音。这样的“街头布道”可说是一种直接而有果效的传福音的方式，

但也许是上街去布道太过辛苦，又恐怕这样做了会有损于传道人的身份，总之在北平的各大教会中很少采用“街头布道”，更少有能够常年坚持实行的。甚至神召会的培保罗牧师都被这里的传福音的热忱感动，多次主动来参加“福音堂”的街头布道，相忱敲鼓，培牧师就站在大街上用英语布道，相忱再为他做翻译。

传福音的鼓声在被拦阻前已经坚持响过了四年的时间，有数不清的人在鼓声中被吸引到主的福音面前。最后一次在街头敲鼓传福音是在一九四九年末的那个冬天，那天相忱和几位同工又像往常一样抬着大鼓去白塔寺庙会上传福音，可我却见他们回来的要比平时早了很多，各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些不太自然的表情。相忱向我讲述了他们刚刚遇到的事情：他们在庙会附近的街上一边敲鼓一边传福音，相忱正向人群布道的时候，忽然从人群外面传来几声呼喝：“都散开了，不要围在这里！快点散开，别站在马路上！”随着这声音，众人一下子散开了，有几个穿军服扎皮带的人出现在相忱面前，相忱马上明白来人是解放军。其中领头的一个人问他：“你们怎么回事？在大街上敲打到底干什么？谁让你们在这里的？”相忱照实回答：“我们是传福音的，以前就一直在这里传。”那人把相忱上下打量了一番，才说：“不许在这里聚集！跟我们到军管会去！”军管会就是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简称，是在当时新旧政权交替变化的初期由军队代行政府管理职能的机构，成员大多由军人组成。于是就有几个穿军服的人上前收拾起相忱他们刚用过的鼓和钹等等，把他们带到军管会在西四附近的一个办公室。到了军管会，刚才领头那个人的态度比在街上的时候要好了许多，他问相忱：“你是干什么的？”相忱回答：“我是阜成门‘福音堂’的传道人，我叫袁相忱。”那人点点头，说：“以后不许在大街上布道，明白了吗？”相忱就说：“你们共产党不是说有宗教信仰自由吗？”因为相忱觉得既然有自由，那为什么又不许在大街上传道呢？那人听相忱这话，先是愣了一下，口气更加和缓了下来，解释说：“宗教信仰的自由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刚解放，外面比较乱，所以现在最好不要在外面聚集。你们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拿回去了。”相忱看这个干部模样的人态度还好，也不再说什么，抬着鼓就回来了。相忱并没把这件事情看

得有多么严重，虽然从那以后他再没去过街上布道，但并没有丝毫改变对传福音的信念，每逢聚会，他都把“福音堂”的门窗全部打开，让堂里唱诗和讲道的声音能够清清楚楚地传到外面的街上。

相忱忠心于传福音的事工而舍弃了他个人的恩赐和才能。他一生中常对人说：“我这个人除了传福音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但了解相忱的人都知道实际并非尽然，相忱从小受教于传统的中式私塾，长大后又在青年会的学校中接受过正规的西式教育，在中西学识上都有相当的基础。首先，相忱在文字方面是有相当功底的，在“福音堂”时就常常见他撰写和编译一些文章在主内的刊物上发表；一九五三年，相忱又去过一次成安，回来后还专门写了一篇《八年回忆》的长文作为纪念。相忱并没有过于看重他的这些作品，一向也不曾对人提起过他的写作，我当时也没有留意加以保存，时至今日已经一篇原文也找不到了，实在令我惋惜不已。其次，相忱的英文也是非常出色的，在“福音堂”时也常应邀为国外的宣教差会担当翻译。记得在一九四七年前后，与相忱多年相熟的德国宣教士陆亨理（H. Ruck）和计志文牧师等人，在北平建国门内的方巾巷十六号设立机构，翻译“国语新旧库译本”圣经，相忱在空暇时常去那里和陆教士、计牧师等人一起交通研经。虽然在这间小小的“福音堂”里根本用不上鸿篇大论地发表证道，娴熟的英文更全无发挥之处，但相忱却安之若素，从没想过要按照自己的恩赐和才能来设计自己的事奉以及生活的方式。

## 八

我们刚搬到“福音堂”的时候，相忱就听人说过在离阜成门外不远的西八里庄那里有一所由外国福音机构开办的盲人学校，专门接收盲人信徒。相忱曾对我说起他很想去看那所学校，但是一时还没顾得上。

可过了没多久，在一次主日聚会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堂里的长条椅子上坐着两位手持盲杖的年轻人。相忱显然也注意到了他们俩，结束了讲道，从讲台上刚一下来就直接去和他们交通。他们告诉相忱：他们两

人名叫王锡成和张永和，是西八里庄那所盲人学校的学生，听人说阜成门这边新开了一间“福音堂”，所以专程赶来参加聚会。相忱很感动，就向他们询问了一些盲人学校的具体情况。原来这所盲人学校的实际情况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学校差不多，都是以信仰为名，行社会福利为实，徒有福音的外表，却缺少真实的信仰。盲人为了达到入学的目的就都说自己是相信主的，但他们当中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却不多；学校里甚至连固定的聚会也没有，校内几位真心追求的学生只有自己出来四处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真正能够接纳他们的教会。相忱听到这些情况，就问他们：“我能为你们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呢？你们这样走来走去不是很方便，有没有其他的聚会的方法？”这两位盲人青年想了想，说：“我们现在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等我们回去和其他人商量一下，下次再来告诉您。”谈完话后，相忱要我为他们俩预备午饭，饭后自己亲自送他们到阜成门外的汽车站，又反复叮嘱他们路上小心，一直把他们送上车才转回来。

一个星期之后，“福音堂”的主日聚会里新多了四五位盲人青年。对于他们的到来，相忱非常高兴，聚会后请他们留下交通。他们告诉相忱：为了赶来“福音堂”聚会听道，他们几个人一大早就从学校出来了，但相忱今天的讲道使他们大有收获，他们很希望相忱能够每周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带领他们查考圣经，而且恨不得立刻就把这事定下来。相忱看着这些盲人青年在主的真道上有如此渴慕的追求，心里也非常感动，当下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的要求，约定在每星期二晚上和他们一起查经，又问他们：“我去你们学校方便不方便？应该能找到一个地方一起查经吧？”盲人中有一位名叫王德明的小伙子说：“这样麻烦您，多不好意思啊！还是我们来吧，我们一起到这里来，免得您跑来跑去，耽误您的时间。”相忱当然很感谢这些盲人弟兄对他的体贴，但还是坚持说：“如果你们学校中有地方聚会的话，我还是在每星期二去你们那里吧，星期天上午如果你们时间方便的话，就来我们这里参加崇拜，这样大家可以一个星期中有两次见面的机会！”

从此，相忱每星期二都会准时来到八里庄的盲人学校，和这些盲人

青年们一起查经。八里庄，顾名思义距离阜成门约有八华里，一九四〇年代，北平的城外既缺少像样的道路更没有路灯照明，查经聚会的时间定在晚上，相忱都是独自骑自行车摸黑往返。盲人们来“福音堂”聚会时曾经对我讲过，有几次星期二晚上正赶上天降大雨，大家都在惴惴不安中等待，以为这样的天气袁牧师大半是不会来了，谁也没有料到，相忱带着满身雨水准时来到盲人学校，擦一把脸就开始带领他们祷告查经。整整十年，相忱每个星期二都会风雨无阻地去和这些盲人弟兄一起查考分享神的真道；主日到“福音堂”参加聚会的盲人信徒也从最初的四五人增加到二三十人。

虽然这些盲人都是身有残疾的人，但相忱并没有忽略他们各人身上的恩赐，更加引导和鼓励他们运用自己的恩赐来荣耀神。相忱发现盲人中有一位名叫陈邦恒的青年人极富赞美的恩赐，他的嗓音洪亮，音准极佳，而且乐感和记忆力也非常好，任何一首新歌，只要是有人先弹唱一两遍，他就能准确地重复下来，这样他学习一首新歌的速度远比其他人都要快。相忱就主动问陈邦恒有没有感动出来带领大家赞美敬拜，陈弟兄起初不好意思站出来领唱，相忱就鼓励他说：“这是神给你的恩赐，你要充分地利用发挥！主所赐的要为主所用！”陈邦恒在相忱的鼓励下，在“福音堂”每星期的主日敬拜上带领唱诗，他从一个性格比较内向害羞的人，逐渐成长为一位非常出色的崇拜聚会的带领者，生命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后他常对人说：“是袁牧师培养了我！”但相忱却告诉他说：“是主赐给你这样的恩赐，又亲自培养了你！我从你的身上都看到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你要更加地依靠主，主就会更加地使用你！”后来在一九七〇年代初，陈邦恒在一次外出游泳时不幸溺水，相忱从东北回来以后听说了这个消息，深为他痛惜不已。

相忱非常尊重这些盲人弟兄，在外人面前都称呼他们为“瞽目人”。他作为牧者，不仅关心他们的生命成长，也在生活上的各个细微之处尽心尽意地关爱他们。一个星期日，相忱发现一位姓何的盲人满身满脸的灰土，一问才得知是刚刚在来聚会的路上不小心掉进路边新挖的一个大

坑里，幸亏蒙神保守，何弟兄没有跌伤，只是落了一身的泥土。见此情景，相忱非常自责，责备自己没有照顾好这些盲人弟兄，没有为他们想得更周全。从这以后，相忱就安排九岁的大儿子福音在星期日的早晨去城门外的汽车站上迎接他们，在前面拉着盲杖把他们引到“福音堂”，聚会结束后，再同样把他们送回车站，这样的迎送，十余年间从未有过一次间断，以后孩子们一个一个地慢慢长大了，几乎每个孩子都参与过这项工作，相忱和我有空的时候也和孩子们一起出去接送他们。

相忱和我又恐怕盲人们星期日聚会后回学校会赶不上午饭，就每次都留他们在“福音堂”吃过了饭再回去。刚开始时，这些盲人青年说什么也不肯吃，因为盲人在吃饭时难免会有许多不便之处，需要有人从旁帮助他们端饭、挟菜等等，每一件小事都离不开别人的照顾。他们的眼睛虽然看不见，心里却能感受到相忱和我的忙碌，就不好意思再多增添我们的负担。可相忱用温和却不容置疑的语气对他们说：“不要回去！先在这里吃饭，然后再利用一点时间，如果有疑难问题就可以问。”等到盲人们在桌子旁边都坐定了，我把盆和肥皂挨个端到他们的前面，招呼他们每个人洗手，盲人王锡成打趣说：“师母你就是我们的脸盆架子啊！”吃饭时，我怕他们自己找不到碗碟里的饭菜，就把各种菜肴一份一份地分到每个人的饭碗里，再把饭碗递到他们各人的手上，看着谁碗里的饭菜快要吃完了就赶快过去给他们加上，直到他们都吃好了，我才吃自己的饭。那时我们的钱确实很不宽裕，但是我在饭菜上尽量想办法为他们调换花样，在有限的开支里面使他们吃得饱、吃得好，夏天还给他们预备解暑的西瓜。饭后，这些热心的年轻人就把一些不明白的圣经问题还有他们生活中遇到的难处都来向相忱请教，趁相忱给他们解答问题的时候，我抓紧这个时间为他们浆洗和缝补衣服。由于这些盲人缺乏生活自理的能力，日常在学校里又很少能够得到悉心的照料，所以他们一来我就发现他们的衣服大都很久没有洗过了，粘满各样的污垢已经失去了衣服本来的颜色，还有不少破损的地方。看他们穿着这样的衣服我实在心疼，就找出相忱的衣服先给他们穿上，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去洗。他们换下来的衣服，摸着感觉就像没干的浆糊一样的粘手，放进盆里都是浑浊的



泥汤子，连着换了五六遍水才见到清水。洗晒干净之后，还要把上面的破洞一一补好，才让他们穿回去。见盲人周慧珍姊妹的衣服太破旧了，就在给家人做新衣服时也为她代做一件。直到后来，盲人们为了要我们同意接受他们的特别奉献，还说：“您一定要收下，这是给师母的洗衣肥皂钱！”

我们和这些盲人弟兄彼此都把对方当作自己“至近的亲属”，真实地体验到共同连于主耶稣基督的肢体之情。一九七〇年代初，那时相忱还没有被释放回来，一天，我正在家里做饭，突然进来一个人指名要找我，说外边救护车上的人等着我去签字。我出来一看是盲人弟兄李文义挂着吊瓶躺在车上，原来孤身一人的李弟兄心脏病发作，需要紧急住院，却没有亲属为他签字，他就想到了我。我马上跟着救护车把李弟兄送进医院，为他签字办理好一切的手续，又照顾他直到他康复出院。

我们和这些盲人弟兄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建立起真实的彼此相爱，相忱和我真心爱这些盲人弟兄，盲人弟兄们也全心全意地爱他们的牧者。他们盼着星期二相忱去学校探望他们，盼着星期日来“福音堂”聚会听道；相忱被捕后，这群盲人弟兄真如失去牧人的小羊一般的伤心，时时盼着相忱早日回来带领他们。一九七九年，相忱从东北回来，最先想到的就是去探望这些已经分别了将近二十二年的盲人弟兄们，在那里的聚会也重新恢复起来，相忱依然像从前一样每周一次去带领他们查经，这样又持续了二十多年，一直到相忱归主。相忱去世以后才有同工告诉我，相忱每次去八里庄带领聚会总要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一会儿，先去几位没有亲人的盲人弟兄的宿舍里探望他们，同工们说这几位年老体衰的盲人弟兄已经基本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又少人照料，他们的屋里脏乱得几乎无法下脚，里面的气味呛得其他人实在不愿进去，相忱却全不在意地和他們坐在一起，拉手谈心。每当回忆起这些事，亲身经历过的同工常会感叹道：“袁伯伯真有爱心！”可是这件事，相忱在世的时候却一个字也不曾向我提起过。

神把这些盲人作为他所特别拣选的肢体赐给教会，相忱也因此从神

领受了这个特别的托付。在前后近六十年当中，以他不变的忠心和爱心，和盲人弟兄们一道成就了荣耀神的最美好的见证。

## 九

“福音堂”的同工和信徒中，有许多人和他们在主里面的见证值得我们特别的记念。

第一位在“福音堂”重生得救的人叫梁德芳，三十多岁，他本是河北省武安县人，为了躲避战乱才带着妻子儿女从老家来到北平，家里生活很贫困，平时全靠在街上做些兑换银元的小买卖为生。他们全家就租住在阜成门内的南顺城街，距离“福音堂”不过几百米远。“福音堂”刚开堂时，相忱的鼓声一响，他也过来和人群一起看热闹，后来就进来听相忱讲道，连着一个多月，每次聚会梁德芳都来听道。

一天，相忱讲完了道，见梁德芳还坐在那里没走，就走过去和他谈话。相忱简略地问过了梁德芳的个人情况后，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吗？”因为在以前的听道中，梁德芳已经多次听相忱讲到过“人的罪”，坎坷的人生经历促使他开始在心里认真地思量相忱的话，虽然纯朴又不善言辞的性格使他难于主动地表达自己的心意，但是当相忱这样问到他的时候，梁德芳并没有任何逃避，而是很诚恳地说出自己心底的话：“您说的没错！人心不是性本善，而是性本恶！我知道我有很多罪，这些罪有时算不得法律上的罪，但人的良心常常会提醒人。”

相忱听梁德芳这样说，在心里默默地为他向神献上感恩，若没有神的灵的感动，谁能在神面前悔改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呢；若没有神的灵的感动，谁又能承认耶稣基督是自己的救主呢！相忱郑重地问梁德芳：“你既然承认自己有罪，那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你个人的救主，让他除去你一切的罪呢？”

梁德芳眼睛紧紧地望着相忱，一字一句地回答：“我愿意，我现在就愿意！我已经找了很久了，总找不到归宿，现在终于找到了！”

相忱当即就和梁德芳一起跪下，带领他作决志祷告，相忱说一句，梁德芳也跟着说一句。祷告完成以后，梁德芳抬起满是泪水的眼睛，问相忱：“我还想自己再做一个祷告，您能陪着我吗？”

相忱说好，两个人依旧跪在那里，堂里一片寂静，沉默了良久，梁德芳终于在痛哭中开口祷告，虽然言语上有些不够流畅，但这是一个悔改的罪人发自内心的倾诉。那天临走的时候，梁德芳还特别对相忱说：“下次我来的时候，一定也把老婆孩子都带来，让她们也得着这个福分！”

梁德芳再来的时候果然把妻子女儿也一同带来了，此后“福音堂”的各次聚会梁德芳一次也没有落下过，每次都是带着全家坐在最前面的一排长椅上聚精会神地听道，很快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信了主。梁德芳还是“福音堂”最特殊的一位同工，没有人差派他，他就主动承担起接待的工作。聚会开始前，他就早早站在大门口招呼着来聚会的人，还注意把初来的人专门引到前面的位置上就座，等大家都坐好了，他才回到自己在第一排的座位上。信主以后，他也自愿放下原来在街头上倒卖银元的生意，转到丙寅酱油厂做工去了。

梁弟兄一直不太善于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想法，你若请他讲话，他就只是用手摸着自己的光头，一个劲儿地呵呵笑。但他对自己的罪有深刻的认识，衷心地愿意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信主以后生命也有真实的改变，又能带领全家信主，这一切确实给予相忱极大的鼓舞，他向别人介绍梁弟兄时，总是说：“他是我敲鼓敲来的第一个神所赐的礼物！”

相忱被捕以后，梁弟兄一家并没有疏远我们，而且力所能及地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当梁弟兄的妻子听说相忱要被转到东北去服刑需要皮袄的时候，就主动对我说：“我给你做！”后来寄给相忱的那件皮袄就是她亲手做的。

另一位让我们难忘的是赵杰，就是当年在成安县东关教会里种菜、放羊的那个小伙子，他虽然不是“福音堂”得救的，却和“福音堂”有着特殊的联系。记得大约是一九四八年，一个深冬的夜半时分，猛然外面

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打开门一看是几年不见的赵杰和一个陌生人，我看到这两人神色惊慌，身上都穿着黄绿色的棉大衣。进到里面，赵杰焦急地告诉我们：“我们是逃出来的！”原来，抗战胜利以后，赵杰从家乡被国军“抓壮丁”，过了两年牛马不如的黑暗日子，近来军队连打败仗，大家都人心惶惶，不断有人在逃亡，他们也趁机会跑了出来，和他同来的人叫窦玉亭，是他在军队里的伙伴，家在河北省的玉田县，因为不敢回家就想到来投奔我们。赵杰求我把帮他们的军服换下来，正好我还留着相忱父亲的旧衣服是比较肥大的，就赶忙找出来给他们俩换上，为了怕人看到这些军服，我又把它们仔细地捆成一卷摸黑扔到“福音堂”的房顶上，天亮后我站在院里没有看到房顶上的衣服才放心，后来知道我那晚刚好把那卷衣服扔到两行房脊之间，下面看不到。

其实相忱和我都见过街上搜捕逃兵的，知道这些从军队上“开小差”的一旦被抓回去很可能就要被处极刑，当然也知道像我们这样收留逃兵的一旦被发现后果也是同样的危险，但我们把弟兄的生命看得比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相忱安慰他们不要担心就留在这里，平时就呆在屋里不要出去，还特别嘱咐他们要参加聚会。过了有十来天，赵杰来对我说：“你们传道人的生活实在是苦，给我们住已经很不容易了，吃饭上我们自己想办法，不能再麻烦你们了！”于是两人每天到前门一带去拉“小排”，就是一种为人送货的双轮小车。这样，两人白天出去拉车做工，晚上回来住在堂里，星期日在“福音堂”参加聚会，不久，窦玉亭就悔改信主，待到形势平稳就回老家去了，走后一直和我们保持书信来往。赵杰继续留在“福音堂”，后来也到丙寅酱油厂做工，因为工作诚实努力，很快就担任小组长和车间主任，又在北京成了家。他结婚时，生活有困难，我们借了一间小房给他们夫妻当作新房，我又亲手给他们做了全套的衣服和被褥。

相忱回来以后，赵杰也在“白塔寺”教会聚会，向大家讲过他的这段见证。晚年他们夫妇住在养老院时，相忱和我还常去探望他们。赵杰去世前，我们最后一次赶去看他，他紧紧握着相忱的手，流着泪说：“感谢

主！我不能见你们了，天家再见了！”

虽然“福音堂”的信徒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但相忱却十分注重在其中发现和培养知识青年，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张家麟弟兄就是一位。另外还有一位是杨津广弟兄。杨弟兄毕业于辅仁大学，也是广东人，与相忱和我还算是老乡。当时他正在国立北平高等工业职业学校任教，因为学校距离“福音堂”不远，早年曾资助相忱去厦门鼓浪屿参加全国查经大会的郭孙惠卿太太的女儿郭静华正好与他同学，就介绍他到“福音堂”来聚会。杨弟兄第一次来到“福音堂”的时候，相忱就和他单独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长谈，我印象中这是相忱与人个别谈话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相忱问杨弟兄的都是关于生命之道的的问题，那时杨弟兄信主时间不长，很多真理还不太明白，相忱就对杨弟兄说他很愿意和杨弟兄更多地交通，希望杨弟兄有时间就到“福音堂”找他，杨弟兄也欣然接受了相忱的邀请。

从那以后，除去星期日在“福音堂”参加聚会，杨弟兄还利用平时晚上没课的时间来找相忱，两个人谈话晚了，相忱就留他在“福音堂”的隔栅里住。在相忱的带领下，杨弟兄在真理上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生命上也大有成长，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相忱又开始鼓励杨弟兄上台讲道。杨弟兄讲的题目是《浪子回头》，我们都在台下听，他讲得很好，历数了浪子身上的三十多种罪。相忱对杨弟兄的讲道也很满意，对他说：“你很有恩赐，你能够讲！”勉励杨弟兄在神的真道上有更多的追求，也要在多样服事有更多的热心。这是杨弟兄第一次上台为主证道，更是他六十年为主服事的开端。杨弟兄也成为“福音堂”的同工，以后相忱又邀请他参加夏天晚上的布道会，安排他与自己和夏老先生在会上轮流布道。这些都是在一九四六年“福音堂”刚开堂不久时的事情。

一九四九年，杨弟兄因为在他工作的学校内组织福音团契而被迫离校，后来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因为在清华大学参加学生聚会，到“福音堂”的机会就比较少了。以后杨弟兄在“北平基督徒学生会”担任同工，经常进城来参加聚会、查经，赶不上回校班车的时候就像以前一样的来“福音堂”里留宿。相忱也是像以前一样地热情接待他，也是像以

前一样地关心他的生命成长，只要见到杨弟兄来，必要放下自己手里的事，先和他交通。

杨弟兄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和刘淑洁姊妹结婚，安家在东城区的史家胡同，就在王明道先生的基督徒会堂聚会，也是那里的重要同工。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晚，与王明道先生一同被捕，第二年被释放，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再次被捕，一九七九年方获得平反出狱。杨弟兄现在仍在为主传福音，是当年“福音堂”的同工中至今尚健在的一位。

今天，杨弟兄夫妇还与我们常有交通。有一次，二女儿平湖代我去看望他们，杨弟兄对平湖讲起当年在“福音堂”时的生活，他说：“我把‘福音堂’当成我的家，那就是我的家！袁先生接待我，我去我走他都是非常欢迎的。那时我在清华大学上学，晚了没车了，回不去了都是到‘福音堂’去住，我一进屋说我不回去了，袁先生就说不回去就在这儿住吧。会堂里的两条长椅子一并，袁先生再给我拿个褥子就在那里睡，说实话那时家里要个富余的褥子都没有，就凑合一条褥子给我。第二天早晨我和他一起晨祷了就回学校去。那时我最敬爱的就是袁师母，她的爱心就没法说，尤其对我，她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家每次到那准留我吃饭。我知道他家的经济状况，他们自己的生活还有问题呢，可尽给我做一些焦溜肉片、溜肝尖之类的菜肴，可她自己就吃窝头啊！我忍心吗？所以后来我就在外面吃两个火烧再去。现在想起来师母做的广东菜，味道非常好！”这些事我自己都忘记了，可杨弟兄竟然还记得。

一九五〇年以前，有很多外国的宣教差会和宣教士在中国的各地传福音。因为相忱的英文比较流利，以前又在外国差会的神学院接受过装备，所以和很多外国宣教士都有过交通，在事工上也常有合作。

一九四七年，相忱的朋友、在陕北榆林地区宣教多年的瑞典传道人费约翰和费安得生夫妇，委托相忱照顾一位刚刚到达中国的年轻宣教士——艾喜德姊妹（Asta Nilsson）。艾喜德教士也来自瑞典，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年纪，个子却比相忱还要高出半个头，她在十五岁时由费约翰夫妇带领信主，以后也蒙神的呼召立志来中国传道。

和其他大多初到中国的宣教士一样，艾教士也首先必须要经历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这一难关。相忱告诉艾教士：“迅速学会一门语言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与当地人交谈。”相忱把这位初次踏上东方土地的北欧姑娘带到“福音堂”参加聚会，请她用中文向会众介绍自己，积极鼓励她与信徒们互相交通，以此引领她通过学习中文的同时增进对中国教会和信徒的交流与了解。艾教士也喜欢上了“福音堂”，没有其他安排的日子她每天一大早就到“福音堂”来，向相忱学习圣经，也学习汉语，一日三餐也都在家里和我们一起吃，像我们家庭的一员一样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在家里，艾教士非常喜欢跟着我学习如何做各样的家务事，我们两人真如同亲姐妹一般的无话不说，我也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帮助她矫正中文的发音。艾教士是位好学用功的青年人，她的中文水平进步很快，相忱就鼓励她站上讲台，用她那尚不熟练的中文向信徒布道，又做她自己得救及蒙召的见证。相忱在和她谈到中国教会的发展前景时说：“中国基督徒应该建立自己的教会，并且是自立的教会。我现在就是靠翻译来维持生活和补贴教会的开支。中国教会应该向‘自立、自传、自养’的方向发展。”艾教士谦卑温柔，生活简朴，全无一丝“外国人的架子”，是我所见过的外国宣教士中与中国信徒的关系最为亲密无间的一位。相忱和我还在生活上悉心关爱这位独自身在异国的女孩子，我对她说：“你就把我们的家当作你自己在中国的家，有什么难处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客气。”相忱知道艾教士有志去榆林为主传道，还专门领她上街去买了两只樟木箱子，预备她在那个贫瘠荒凉、气候恶劣的地方放置个人衣物之用，这两只箱子艾教士一直带在自己身边，直到她去世。

因为时局的变化，艾教士终于未能去到榆林。一九五一年，艾喜德教士随母会撤离中国大陆。临别前，相忱与她谈话，劝勉她要继续努力学习中文，最重要的是要回应神的呼召，作一个“在中国人中间传道的传道者”，艾教士也向相忱表示自己要坚持在中国传道。一九五四年，艾教士从香港给我们来信，告诉我们她已在香港的华人教会中服事传道。这以后，我们的联系就被迫中断了。

一九七九年底，相忱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接到艾教士从香港的来信，信中说：“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别高兴。我马上要去看你们，请告诉我你们有什么需要。”一九八〇年初，艾教士来到北京，相忱和我去她的住处看望她，在半路上遇到出来迎候我们的艾教士，她赶上来和我紧紧地拥抱，我们都为二十九年后的重逢流下了感恩的热泪。这时的艾教士，中文已经相当的流利，从一九五〇年代起，她一直在香港的华人教会和建道神学院服事，五十多年中造就了数不清的中国信徒和传道人。她没有离开过中国。以后她继续在香港服事，几乎每年都来看望我们，直到二〇〇五年与相忱同年归主。艾喜德教士用她的一生成就了她在主面前所立下的“一辈子坚持在中国传道”的誓言。

艾喜德教士敬虔爱主，终生独身事奉主。在我们都进入晚年以后，有一次，艾教士向我说起她自己一辈子没有结过婚，没戴过戒指，我很感动，对她说：“我送你一个吧！”就拿出我的一个金戒指，亲手为她戴上。

这些都是主基督耶稣的福音在“福音堂”——他的教会——留下的见证。

## 十

我们一家人在“福音堂”这十二年的生活，与此之前的生活相比也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

相忱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地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每天早晨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到前面的堂里去晨祷。有时堂里还住着其他的人，相忱也不去叫醒他们，只是独自跪下祷告，借住在隔栅里的人觉察到相忱在祷告，就赶快起来和他一起祷告，后来所有住在“福音堂”的人都在相忱的影响下养成了每天早起晨祷的习惯。自从辞去在旅馆那里半天的兼职工作后，除外出带领聚会和去街上敲鼓布道之外，相忱把白天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去信徒家里的探访上，经常是吃过早饭就出去，到午饭的时间才回来。为了不增加别人的负担，相忱规定自己从来不在信徒家里用饭，所以有



时下午两三点钟才回来，却还没吃中午饭。通常午饭后他会休息一会儿，下午太多也要出去，所以一般日子相忱在家的时间很少。夏天的晚上有布道会，平时的晚上还有祷告会，每个星期二的晚上要去带领盲人查经，时常又有信徒来访，没事的时候他就回到屋里独自灵修。

我自己当然也还是与以前一样地管理一家人的生活，好让相忱专心传道，而不会为了家里的事情分心。早晨我自己在屋里做一个比较简短的晨祷，然后就要赶紧预备早饭。白天的时间已经被各样的家务事占得满满的，除了家里正常的早中晚三顿饭，还要为在堂里暂住的人也预备饭食，倘若碰上来访者还没吃饭，也要马上给他们做，有时一天之中要开好几顿饭，当然还要出去买粮买菜。“福音堂”前后的地方不算小，除了聚会的日子有同工负责清扫前面的礼拜堂以外，平时整个里外的打扫整理主要也是我一个人承担。还有全家老老小小好几口人的衣服、床上的铺盖等等也要按时换洗，所以天天都会有几盆衣服等着我去洗。“福音堂”的信徒中姊妹多，老年人多，我见有几位老太太不识字，阅读圣经有困难，就也在白天约她们到“福音堂”来教她们识字，帮她们解除了读经上的障碍。孩子们当中，福音他们年纪大一些的白天去上学，几个小的围着我身边团团转，离不开我的照顾。晚饭后，已经上学的孩子需要我指导他们写作业，我自己也要在这个时候抽空灵修读经；一起晚祷以后，相忱就先去休息了，我还得给孩子们洗洗涮涮，再打发他们都去上床睡觉。到这时我才能稍稍地松一口气，但我的事情还远没结束，相忱和孩子们有该添置的衣服，我就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缝纫机上为他们一一地缝制。再有就是无论早晚都可能有教会的姊妹上门找我，或是要我帮她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或是要求我为她们祷告，这些我都要随时接待。虽然一年又一年的奔忙劳碌，天天所做的也不过是些人看作琐碎的事情，但我却相信这些都是在为神做工，必定不是徒然无益的；也相信我是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去做，所以也不觉得有多么辛苦劳乏，反而在心中常存着感恩和喜乐。

若说家庭生活上的变化，就是神在这十二年中又接连赐给相忱和我

三个孩子，我们的第四个孩子福乐、第五个孩子平湖和最小的爱湖都是在“福音堂”出生的。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福乐出生。那时正赶上“福音堂”刚刚开堂不久，正是我们经济上最为困难的时刻，我就决定不去医院生产，而是请了一位主内的崔大夫在“福音堂”后面我们住的屋里为我接生。神的怜悯，在生产的事上赐给我们平安，竟然连当晚正住在外面堂里的夏老先生都没有丝毫察觉，第二天早晨他听见孩子的声音还不敢相信，站在门口吃惊地睁大眼睛望着我和孩子，说：“你真的生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停了一下，才又呵呵地笑着说：“你真行！”家里的生活需要有人操持，相忱的事工又忙，我也顾不得坐什么月子，产后的第四天就下地出门去买粮食，邻居看我就这样出来了，惊讶地说：“哎呀，你怎么出来啦？怎么也不蒙着点头啊？”经别人这么一提醒，我才想起来应当找块头巾围上。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我生平湖的时候，也是同样由崔大夫在家里接生的。只有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我生小女儿爱湖的时候，因为家里的条件已有了一定的好转，我才到附近的北大医院就诊。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感觉到自己可能就要临产，就提前把晚饭先做好，相忱在家也没有要他送我，一个人提着应用的各样物品和一个暖瓶步行去北大医院。看我提着东西要出门，最小的那两个孩子追着我问：“妈，去哪儿呀？”“妈，我也去！”我只好把他们哄着交给相忱照看。等我出院回家的时候，几天不见妈妈的孩子们一下子就把我围了起来。

孩子多了，六个孩子，每一个都需要我的照看，特别是三个最小的。从那时，我学会了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做各样的家务；一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炒菜；洗衣服时也是一样的，一手抱着孩子坐在这边的腿上，只用另外的那一只手在搓板上洗衣服，累了就把抱着孩子和搓着衣服的手对换一下。家里只有后面客厅里的那一张桌子，福音他们放学回来只能在礼拜堂里写作业，坐在小凳子上，把堂里的长椅就权且当成是桌子了。孩子们都很听话懂事，常帮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大一点的孩子要各人洗自己的衣服，还要照顾几个小弟弟小妹妹。

我们的生活是和谐的，但是偶尔也发生过一些小插曲，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有趣。记得曾有一次，相忱说他有事工要去天津，我当然很高兴，就出去买了一盒糕点托他带给母亲。谁知他忽然生起气来了，说：“我们基督徒不讲究这些，你要带糕点我就不去了！”说着自己坐在桌子边上，打开已经捆扎好的糕点竟自吃了起来。我看着相忱只顾自己大吃大嚼的样子真的很生气，孝敬母亲是人之常情，况且买糕点的那点钱是我平日自己节省下的，可他就这样不问情由的乱发脾气。但我还是忍耐住想要和他理论一番的情绪，转身走开了。我觉得相忱是一家之主，我应当尊重他；他脾气不好，我就更应当用爱心来包容，凡事都不应当和他争吵。想到这里自己心里就更平静了。过后我再一想，那天相忱吃了糕点也没去天津啊？我相信相忱绝不是因为个人意气就荒废主工的人，那么一定是他去天津的事工遇到了阻拦，心里急躁才发了脾气，想到这儿我自己忍不住偷偷地乐了。这也算是生活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吧！

这个时期在我们家里发生的最不平常的事，莫过于福乐的突然患病了。那是在一九五三年，六岁的福乐被诊断患上了脑膜炎，孩子已经昏迷不醒，脖子都僵硬得不能动了，情况非常危急。脑膜炎在当时算是一种恶性传染病，几乎就是不治之症。我把医院的诊断告诉相忱，相忱坐在那里沉默了良久，才从绷紧的嘴唇里一字一字地说出：“不……看了，靠……神……吧！”虽然我对相忱的回答并不感到意外，但这话还是像冰凌刺进我的心。我很早就听相忱讲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远东神学院所着重宣讲的四个教义，其中之一就是“神愈”。“神愈”的教义对相忱触动很大，他想起自己从小就吃了那么多的苦药，结果身体却依然这么瘦弱，既然神已经在他丰富的恩典中应许要医治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在信心中向着神祈求呢！就这样，还在神学院读书时，相忱就凭着信心祷告：“主啊，我把我的身体交给你！从今以后我不愿再吃药，只愿让你来医治我！”从那时起，相忱就很少生病，有时即使是生病了也不吃药，只借着祷告向神交托，神就一次次地医治了他。这些也是我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亲身见证过的，况且我自己信主以后，再遇到患病的时候大多也是借着祷告求神来医治。相忱和我既然因着相信神的医治而把自己的身

体交托给神，更亲身领受过神的恩典，所以相忱这时提出把孩子交托给神，我不仅没有感到意外，而且是同意他的意见。但是同时，我也在相忱的话里听出一丝的无奈，我想他当然知道孩子的治疗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而这确实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我们确实没有钱为福乐看病！为人父母者，如此轻易地放弃，我相信相忱的心里与我有着同样的刺痛。

怀着一点点朦胧的希望，我带福乐去三座门的儿童医院做检查。正好主治的钟院长也是广东人，我向他原原本本地讲了情况，钟院长虽然不信主，但他对我说：“信主是好的，但有病该吃药也要吃药。”做过检查之后钟院长认为孩子还有治愈的可能，就告诉我：“你要坚持打针。如果化验的白细胞数目降低，就一定要坚持治疗！”

从医院回到家里，我放下个人心里的一切思虑，把自己完全安静在神的面前，迫切地向神祷告，求神为我做出这个至关重要的抉择。神让我看到：神也会借着医生和药物来医治人的病患，这也是神的恩典，与“神愈”的意义并非抵触；现在既然医生的建议是要求积极治疗，我也觉得应该尽力为孩子治疗。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给相忱，他也有同感，就点头同意了意见。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治疗脑膜炎的唯一特效药物就是盘尼西林。可是那时这种药国内还不能生产，完全要靠进口，价格异常昂贵，即便这样也很难买得到，幸好我的一个弟弟在北京铁路医院工作，还有一位在医院作护士的姊妹知道了我的需要也愿意帮忙，才算解决了药品的困难。为了筹措药费，我把自己所有能卖的都卖了，连我结婚前珍藏的几个金手镯、金戒指也拿出来卖掉了，那时政府收购黄金的价格相当低，但为了给孩子治病也顾不得这些了。

按照医院的要求，福乐需要住院治疗，但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支付这笔住院的费用，我只能每天抱着福乐从家里步行去医院检查和打针。和福乐在医院里同时治疗的还有二百多个孩子，都是同样患脑膜炎的，听说治愈率只有百分之二、三，我在心里默默为他们代祷，求神怜悯医治孩子。

每天例行的检查就是从福乐的腰椎部位上穿刺，抽取脊髓来化验白细胞的数量。每天我站在病床边上等着，望着从福乐身上抽出来的液体一滴一滴地缓缓地流进小瓶子里；标本终于取好了，我从护士手里接过这个小瓶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一路小跑地赶去化验室；站在化验室的小窗口外面，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当天的检验结果，仿佛每一处身体都在被火所煎熬着；结果终于出来了，我一把抓过化验单，两眼紧紧地盯住上面的那一组数字，800，600，400，300……白细胞的数目真的在逐步降低……

腰椎穿刺对于一个才六岁的孩子是一种难以言表的痛苦。福乐几乎天天都要蹣着腿，侧身躺着，一个很粗的针头从他的腰部刺进去，直到抽够一小瓶才能结束。我每次都坐在旁边为他祷告，轻轻地抚着他的头，鼓励他：“耶稣爱你，医治你！不要怕！”虽然福乐每次都疼得满头大汗，但他从来没有哭过，以至医院的大夫护士都这样对别的孩子说：“你们学人家袁福乐！”这真是神的奇妙恩典的见证。

神医治了他的孩子！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福乐终于痊愈了。



第八章

强暴人僭逼人的时候，

墙壁依然

暴令之外

刑外却人

想无下落，禁止强暴

泉想，气被云物清化。

上通家书于岁或



“福音堂”最初的几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八年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尽，遍地疮痍依旧，内战的烽火又一次重新燃起。围绕国共争斗的是是非非一时成为国人热议的话题，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关心国事”的时候，相忱却对时局的变化毫不在意，只一心一意地传福音。

早在一九四八年间，中共的胜利即已初现端倪，人们普遍担心新政权成立后的前景，而基督徒便较其他人更多了一层忧虑的理由，因为这是一个信奉无神论，并且曾有过迫害教会记录的政权。因此，从这年底起，一部分外国的差会和他们开办的神学院、福音机构以及宣教士就已开始安排撤离。

一天，相忱从外边回来就对我说：“有一件事……”我问他：“什么事呀？”他笑着说：“你想不到的，刚才吴智院长把我找去了。他要我去印度尼西亚！”原来吴智先生得知圣公会正在招收牧师的新闻，要求是会英文和广东话，计划派遣到印度尼西亚去开展福音工作，吴智先生觉得相忱的条件非常适合，所以就来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吴智先生最了解相忱，就特别对他说：“这件事你要好好祷告神，如果是神的心意，你就去；如果不是神的心意，你就不要去。”讲完事情的原委，相忱接着对我说：“神给我的呼召在中国！中国有这么广大的禾场，有这么多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我要踏踏实实在这里把神的工作做好。我不去那边！”我从心里完全支持相忱的选择，就鼓励他说：“那你就忠实你的呼召！不去是对的！”得到我的支持，相忱显然更加高兴，说：“我不去，我没答应他。”我也同样高兴地说：“没答应就对了！”

局势越来越紧张，离开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远东宣教会也很快要撤走了，临行前，芮牧师也找到相忱，劝他说：“共产党掌权后，恐怕福音工作就不好开展了，并且极有可能会受到逼迫。你如果想离开中国的话，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带你全家一起走。你英文那么好，在国外照样能事奉。”芮牧师曾是相忱的老师，也是我们的证婚人，他一直都很喜爱相忱。



可相忱却回答他说：“我的托付是在中国，到外国去干吗呢？共产党在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做得太离谱。再说，神既然呼召我在中国传福音，他一定会为我负责到底，会为我开出路！”

不仅很多外国的宣教士走了，不少国内的传道人也在此时纷纷离去。面对这样一种光景，相忱的心里并没有不安，更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仍然一如既往地坚守自己事奉的职分，聚会讲道、传福音和探访信徒。正像他自己经常说的那样：“神给我的呼召在中国，中国禾场大，收庄稼的人却少，我要留下来做主的工人！”前面的道路固然变幻莫测，但他早已把自己的一切全然向神交托，相信纵然是在各样的困境中，神都是我们的依靠。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即将入城，许多教会的传道人立时陷入不知所措的惊慌状态，大家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策略一无所知，然而如何与这样一个奉行无神论的政权共处，并继续进行福音事工，却成为教会眼前无可回避的课题。相忱却和原来一样，对于身边的一切变化都安然处之。遇到有些同工同道来和相忱交通他们心中的这些忧虑时，相忱总是笑着安慰大家，说：“你们太过忧虑了。首先，我们传福音的与政治没什么关系，谁掌权我们的工作都一样，谁掌权我们的工作都照样做，因为我们是为神工作，不是为某个人或政权；第二，共产党也并非像传言中说的那样，‘共产共妻’，纯粹是没有的事儿，并且共产党的政策中有一条‘宗教信仰自由’，解放军进了北平城，一切都很好，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也不会乱来的，你们大家放心好了！”

二月三日，解放军首批军队开进北平城，事先地方上的保长就已布置各户把纸条按照米字形状贴在门窗上，谨防玻璃被震碎。这位保长也姓梁，叫梁华庭，是附近修理眼镜的。另外，我还多买了一些粮食以备不时之需。相忱看见家里储存的粮食，很不以为然，只说一句：“咳，这有什么必要！”看着从阜成门入城的解放军队伍，军容整齐、纪律严明地从“福音堂”门口经过，相忱感到更加放心，因此也对共产党有了些好感，他想：有纪律的军队是不会乱来的。再说自己不过是个传道人，教会和

政治也没有什么关系，不管谁来掌权，只要自己不犯法就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地传福音。

现实似乎证实了相忱的判断，新政权出于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力量的需要，对宗教暂时以执行统战政策为主，所以教会在一九四九年全年并没有呈现紧张的气氛。偶尔也有从外地传来教堂被侵占、工作遭遇干涉的消息，但北平的各个教会依然平稳如常。虽然就在这一年的年底，相忱和同工们上街敲鼓传道首次遇到了阻拦，但他对此却并不在意，只说：“人家不让上大街传福音，咱们就在屋里传。”政权变了，环境变了，而相忱为主传福音的心志却始终没有改变。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大会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这次会议上，吴耀宗先生等五人因其“进步倾向”得以被政府选派为基督教界的代表。吴耀宗先生也是广东人，早年曾往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过神学，回国后长期供职于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专门从事文字出版的工作。在这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吴先生所秉持的自由派神学也就是所谓的“新派”神学思想，随着他的著作的不断发表，已经在基督教会内颇为引人注目，大致简单说来，“新派”神学不信神创造万有；不信耶稣基督是神，不信他是为童贞女所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和升天；当然更不信基督还要在末后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还有在他们看来，福音也根本不是使人灵魂身体得救、得享永生的恩典，而不过是可资推行“社会改造”和“人格重塑”的一个工具。于是，“新派”神学并不为众多福音教会所接受，而直接被称为“不信派”。

我对“新派”的了解也是来自相忱。我曾见过他在读书的时候，突然愤怒地脱口而出：“这是什么‘新派’！根本就是不信！”后来他也在我们两个人一起灵修中，详细地为我剖析过“新派”神学是如何地背离了福音真道，从而带领我对这一派信仰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吴先生比相忱年长二十岁，虽说同为广东老乡，又一同在教会事奉，但彼此素无来往，只

是知晓吴先生的大名而已。唯一一次可算得上交往的事情，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但可以肯定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那是另外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广东同乡到“福音堂”看望我们，因为他第二天要急着赶路，就把一件给吴耀宗先生的物品托相忱代为转交。客人走后，相忱把留下的物品递给我，说：“你给送一趟得了，我不去他那。”我知道相忱就是这样一副耿直的脾气，从来不会转弯儿，可是客人托付的事情总要完成，他既不肯去，就只有我去了。吴先生常年住在上海，但同时在北平也有一个家，在东城帅府园附近的一栋楼房的三层。房间很宽敞，摆设也很讲究，吴先生不在，接待我的是他的儿子。他发现我注意到了桌子上正摆放的一些烟酒，有些不太自然地解释说：“那是招待客人的。”我问他：“你信主吗？”听到这话，他显得更不自在，迟疑着回答说：“我也信。”“你聚会吗？”“我没功夫聚会。”“你在哪里工作呀？”“我在市政府工作。”这个年轻人急于想要岔开话题，就说：“我们还是同乡呢。”我回答他说：“但是同乡却不同路啊！”他讪讪地笑着，不做声了。

吴耀宗先生原本在基督教界并不出名，也不是教会的领袖，但此时却借着“政协委员”的身份一跃成为政府在基督教界的代言人。政协会议结束后，以他为首组成的基督教访问团前往全国各地，向教会传达政协会议的精神和政府有关的宗教政策等。一九五〇年五月，吴先生的访问团和其他一些教会领袖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三次接见，九月，吴先生又根据周的指示，发表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从内部为政治势力开始侵入中国基督教会打开了门。

相忱也并非对教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全然漠不关心。由吴先生主编的杂志《天风》此时已成为指导这场“教会革新运动”的重要喉舌，相忱也请在上海的陈本伟弟兄为他代订了一份。最初收到杂志的时候，相忱每期都认真阅读，他看过后我也拿来看。连着看了几期之后，相忱终于忍不住拍案而起，把手里的杂志往桌上一摔，气愤地说：“什么《天风》啊，这是‘地风’！讲的都是地上的事！不看啦！”又吩咐我说：“从此以后，别看啦！”

从宣言和《天风》的文章内容不难看出，“教会革新运动”的矛头最先指向的是那些依靠外国差会建立起来的大教会，似乎与“福音堂”这样一些与外国差会毫无瓜葛的自立教会没有关系。然而不久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瞬间就把整个中国的教会都抛入惊涛骇浪之间。战争的爆发使中美两国迅速交恶，一九五一年四月，政府假借处理美国在华资产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教会代表不仅有接受了外国津贴的教会，也包括基督徒聚会处、耶稣家庭这些没有接受过外国津贴的自立教会。会议通过的《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竟把基督教指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教会作为“侵略的据点”也很自然地被当成“改造”的对象；会议的另一个成果就是产生出基督教新的全国性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先生成为筹委会的主席。自此，举凡政府在社会上所号召的任何政治运动，“三自会”都必定表示拥护，并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发动各地教会在行动上予以追随，甚至不惜歪曲圣经来为他们的行为罗织依据。教会内部也被强令开展各样的政治性运动，礼拜堂内被要求悬挂国旗，教会的讲台也要配合宣讲“爱国、爱教”的道理；原有的查经班被新进的“政治学习班”所取代；持守真理的信徒很可能在教会里的“控诉会”上遭到揭发检举，甚至被打成“反革命”。“三自革新运动”的真实目的绝不是真正要建立一个“自治、自传、自养”的中国基督教会，而是从所谓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问题入手切断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联系，进而背离神的真道，把本属于基督的教会变为专一接受和顺服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通过“三自革新运动”，政治的权力已经冠冕堂皇地侵入并企图掌控中国的基督教会。

形势至此已经逐渐明朗了，无论是接受了外国差会津贴的大教会，或是与差会根本无关的自立教会，无不清楚地意识到只有站在“反帝爱国、三自革新”的立场上，才是获得生存的唯一出路，因此，不少教会纷纷主动加入“三自会”的行列。当时北京有六十四个分属不同宗派的基督教会和团体，其中十一位福音教会和团体的带领人公开明确表示拒绝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这些教会和团体有：基督徒会堂、东城交道口的基

督徒聚会处（由王镇主持，与阎迦勒带领的聚会处无关）、东大地福音堂、香山灵修学院、香山恩典院、基督徒会堂分设的南城布道所、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和阜成门“福音堂”等，十一位带领人是：王明道、王镇、吴慕迦、彭鸿亮、杨润民、张周新、陈善理、武文蔚、毕咏琴、刘秀瑾和袁相忱。因为这些教会和团体都是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外国津贴的自立教会，他们公开回应的理由是：“我们早就是自治、自传、自养了，所以没有参加的必要。”但他们做出如此选择的信仰根基却正如相忱所表达的：“教会是主基督的新妇，我们要为主持守教会的圣洁；为了真理的缘故，应当预备付上代价！”

## 二

相忱向“福音堂”的信徒们阐明不参加“三自会”的原因时是这样说的：首先，“福音堂”从一九四六年开立之日起，既没有加入过任何外国的差会，也没有作过任何机构、团体的附属，更没有领受过外国的津贴；“福音堂”的房租等等开支和传道人的生活，完全都是由本堂信徒的奉献，加上他自己做翻译工作的收入来支持的；同时，“福音堂”还是北京六十多所教会当中唯一一个租房子聚会的教会。因为“福音堂”早已实践了真正的自治、自传、自养，所以没有必要加入“三自会”。其次，我们所坚持的福音信仰与“三自会”领导人所宣扬的“新派”信仰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所信的神，是有生命、有位格的神，是赐人救赎恩典的神，绝不是“新派”信仰中那个只有抽象概念的神；圣经既然教导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林前 6：14）所以，我们不能和“三自会”合作。最后，也是最要紧的，教会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是童女，我们要持守教会的圣洁，教会不能与一切属世的联合，“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 22：21）教会不能依靠政治势力，政治也不应该利用宗教，宗教和政治应该完全分开；还有，唯有主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现在政府用宗教事务处来领导教会，把教会当作人民团体之一，也要在

“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就在我们还未察觉的时候，争战已经来临。有一天，“福音堂”的主日聚会时忽然一下子少了十多个人，在相忱去这些人的家里探访时，他们告诉相忱说：“我去三自聚会了。”说完了可能心里觉得不好意思，又补上一句解释说：“那边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拒绝加入“三自会”的教会中。相忱对此毫不介意，他对我说：“主托付我多少羊，我就牧养多少。至于参加不参加‘三自会’这是个人的事，由他们个人选择。总之，我的选择是不参加！”那些去了“三自会”的人，有的没过多久又回来了，也有的是“两头跑”。

这期间，“三自会”通过歪曲圣经所散布的许多错误信息也在信徒当中造成疑惑。一次，有一位信徒询问相忱有没有看过“三自会”筹委会的书记刘良模一九五一年五月发表在《天风》第二十期上的文章。刘在这篇名为《划时代的大会》的文章中，把一个人政治思想上的转变，从想不通到想通了，也就是他所谓的“大彻大悟”，说成“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这位信徒问相忱：“圣经中，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讲的‘重生’是这样的吗？”相忱态度严肃地明确告诉他：“这种说法不对！‘重生’是指我们信耶稣后获得的新生命，与政治学习毫无关系，只有耶稣的宝血有赦罪的功效，只有信耶稣才能使人借着圣灵的重生获得新生命。”相忱提醒大家：“不要看这些对属灵生命毫无益处的文章！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去多读读王明道先生写的文章，王先生的文章都发表在《灵食》季刊上，这样的文章才值得读。”为了能让“福音堂”的信徒在真理上更得造就，也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相忱特别邀请王明道先生每月到“福音堂”讲道一次。我记得王先生大多数的时候是骑着摩托车来的，到了把车推进后院就直接去讲道，讲完了就走，并不多做停留。他说话不多，更从来不说闲话。虽说王先生总是来去匆匆，但给人的印象却是那么稳稳当当的。后来在北京“三自会”控诉王先生的大会上，这辆摩托车竟成了指控他“追求舒适生活”的一大罪证。

“福音堂”没有举行过一次“控诉”活动，也没有组织过任何形式的“政

治学习”，但相忱也没有在教会公开批评过那些加入了“三自会”且进行了“控诉”和“政治学习”的教会以及传道人。每次的讲道还是和以前一样，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在讲道中对于这些情况一概不提。平常外出都是去探访信徒，并没有见他和几位同样拒绝参加“三自会”的传道人之间有过密切的来往，连王明道先生那里也很少去。即使一九五四年，王明道先生和“三自会”之间展开激烈论战的时候，相忱也没有撰文声援王先生。对于各种政治运动，相忱一贯的态度是：“我们基督徒与政治没有关系，政治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也不提。”后来听人传说，当时有关方面曾给北京各教会下过指示，不得请王明道、王镇和相忱三人讲道，但我没有听相忱本人对我说过这件事。其实，相忱从来不对我提起他的困难和压力，都是他自己默默地承受，却经常鼓励我：“咱们是为主活的人，咱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从一九五二年起，就有更多的关于教会受到逼迫的消息传来，震动最大的莫过于两位国内最有影响的自立教会的领袖——倪柝声和敬奠瀛先后被捕，“耶稣家庭”教会也被强令解散。压力不仅仅是针对教会，也直接指向信徒个人。也是在同一年，杨津广弟兄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但没想到的是包括科学院、教育部和几间医院在看过他的档案后都拒绝接收他，最后人事部门只得破例要他自谋职业。这样的情况发生在那个急缺人才的年代是匪夷所思的。另一位与他有过同样遭遇的弟兄，三十多年后有幸看到了自己的人事档案，上面赫然写着“此人不可信用”。可能由于“福音堂”不过是仅有一间会堂和一两百名信徒的小教会的缘故，到这时为止，还没有太多的压力直接临到我们，但相忱和我都明白眼前这相对平静的日子已经不会维持太久了，一场属灵的争战已经迫在眉睫。也是从这时起，相忱常常这样对我说：“为了真理的缘故，应当付上代价！”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灯市口卫理公会召开，“三自革新运动”更名为“三自爱国运动”，并成立了全国性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由吴耀宗担任主席。“三自会”正式成立以后，政府也随之加强了对所有尚在拒绝参加“三自会”的教会

的争取力度。九月卅日，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处受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委托，邀请北京所有拒绝参加“三自会”的教会负责人及其同工等，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后的议事厅开会，这是政府的又一次争取活动。到会的有王明道先生、王克忱先生等，相忱也去了，参加者一共有一百多人。会上先由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处的李处长讲话，劝说大家参加“三自爱国运动”。教会代表中第一个发言的是王明道先生，王先生慷慨陈词，他说：我们基督徒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一切爱国运动应当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参加，不能以教会的名义去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教会必须与政治活动分开。其他几位代表也发言支持王明道先生的意见。会议当然又没有达到政府预期的效果。

第一次的争取没有达到目的，政府马上再提出一个新的方案。中山公园会后，政府分别致函十一位负责人，告知他们：你们十一个教会既然在信仰上与“三自会”不一样，不能在一起学习，那你们就另外成立一个学习小组，由政府专门派人来领导你们进行政治学习。为了回答政府建议的事情，东大地福音堂的彭鸿亮先是给相忱打了一次电话，过几天又亲自来“福音堂”找相忱，对相忱说：“咱们聚一聚，约个时间大家到王明道先生那里聚齐，看看我们参加不参加那个学习。你给每个人发一封明信片吧。”相忱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就动手给其他几位负责人各发了一张明信片，写明在某个约定的时间请大家都去基督徒会堂，商量最近政府要求组织单独学习的事情。其实，相忱在最初接到政府的信件时，就已经决定不参加这个学习班了。

他们的聚会是在下午三点钟开始，但相忱在晚饭前就回来了。他一进门，我就赶快迎上去问：“你们会开得怎么样？谁先发言啊？”相忱轻松地笑了笑，说：“当然是我了，我给大家发的明信片嘛。”坐下喝了口水，相忱把会议的过程源源本本地为我讲述了一遍，他说：

“开始，我先说：‘我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谈谈我们是不是参加政府为我们单独组织的学习，请大家提意见吧。’”

我插话问道：“那接着第一个发言的是谁呀？”



相忱说：“王镇，我说完，王镇马上就站起来说：‘我的个人看法，我们不能参加这个学习，如果参加了，难免以后不会和‘三自会’的走在一起。比如吧，两群鸽子在天上飞，飞来飞去就变成一群了。’他拿天上的鸽子作比喻，还表演呢。”

相忱边说边为我学起了王镇在会上讲话时模仿两群鸽子在天上飞的手势，把我们俩都逗乐了。我曾在对面宫门口的神召会听过王镇牧师的讲道，知道他是位很有口才的传道人，讲道非常生动。相忱接着又说：“第二个发言的是毕咏琴，她说：‘我同意王弟兄的意见，我们不参加他们的学习。’下面就是一个一个的发言，一致认为：如果要参加学习，每个人就以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份，更不代表教会参加；既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就不必政府特别派人领导了。既然大家都有同样的看法，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就这样通过了。会议最后也没有人做总结，也没有做出正式的决议，各人回去分别答复政府就是了。”

这次聚会原本是由彭鸿亮提议，相忱负责召集。会议中也没有主持人，议程简单，时间也不长，并且这样的聚会前后总共也只有过这么一次。参与此次聚会的十一位传道人当中，只有王明道先生和武文蔚牧师在“福音堂”讲过道，另外与相忱个人交通比较密切的也只有王镇和吴慕迦两位。同样，除了曾有过一两次去到香山恩典院退修之外，相忱也几乎不去别人的教会，平时就连王明道先生的会堂也很少去。

虽然十一位传道人委婉地拒绝了政府的争取，使政治势力控制这些教会的企图再次归于徒劳，但政府仍在继续变换着不同的策略压迫他们就范。一九五五年初，相忱收到一份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处发来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一月二十六日在新侨饭店举行的聚餐会。相忱没有多想，到时就去了，可回来的时候一进门就念叨：

“糟糕，糟糕，真是糟糕！怎么就我一个人去了？”我忙问他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到了里面才发现，不仅“三自会”的人都在座，而且拒绝参加“三自会”各个教会中竟然只有他一人到场，去以前他听说已经退出“三自会”的宽街基督徒聚会处的人也去，可在现场却没见到他们。相忱说：

“我一进去，李处长就主动过来和我握手，连说欢迎欢迎，还把我拉到他的旁边坐下，详细地询问我们家里的情况。吃饭时又是给我挟菜又是和我碰杯，还说：‘大家是有信仰的人，喝酒或者不喝酒就请自便。’他喝的是白酒，我就用茶水和他碰了一下。”

说到这里，相忱叹一口气：“唉，我坐在那里，想来想去，他们怎么都不来呀？怎么就我一个人来了呀？这个饭吃的窝心，我都没吃出什么味来。你知道我这心里好受不好受，吃也不行，可走也不对。‘三自会’的人对我也很热情，大概他们还以为我是来向他们靠拢的呢。唉！”说着又是一声叹息。

我连忙安慰他：“算了，去已经去了，就别想那么多了。”过了几天，相忱一打听才搞清楚，原来其他的人预先都知道这次聚餐会政府也邀请了“三自会”的人，所以就没有去，基督徒聚会处的人也在听到消息以后半路上折回去了，结果只有相忱一个人单刀赴会了。对此相忱很有些后悔，一个劲儿地说：

“我自己的脑子怎么没有多想想……人家都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呀……”我劝他说：“你已经去了，后悔也没有用。下回要仔细点！”参加聚餐会这件事，十一位传道人没有预先商议过，相忱自己也没有想过要和其他人统一行动，可见这些人从来不是一个所谓的“集团”。

### 三

中国基督教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考验，并且借着这样的压力，迫使传道人向政府作出下列的三个表态：第一，是否签名支持“三自革新宣言”，签名支持者是“爱国”，拒绝签名者则是“反动”；第二，是否参加由政府组织的政治学习和“控诉会”，参加者是“靠拢政府”，不肯参加者则是“与政府为敌”；第三，是否加入“三自会”，加入的教会被承认为“爱国宗教活动”，拒不加入者则被定为“打击的对象”。

这是每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的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都不能回避的考验。

在严酷的威逼之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选择了向世界妥协，很多教会和传道人抱着委曲求全的苦衷参加“三自会”的，但是委屈的结果，并没有使他们得以保存自己事奉的工场；余下拒绝签名支持“三自革新宣言”，不肯参加由政府组织的政治学习和“控诉会”，拒不加入“三自会”的教会，已经被贴上了“反动、与政府为敌”的标签，注定成为“打击的对象”。

我们不是在向着“三自会”说“不”，也不是在向着政府或某个人说“不”，乃是在向着整个世界说“不”，因为我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来书 11：38）。我们选择与主同行乃是选择了那条主耶稣曾经走过的十字架之路，前面等待我们的是被侮辱，被鞭打，被监禁，甚至是流血，舍命。

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晚，王明道先生和其他十多位同工一同被捕。第二天，相忱对我说：“王先生出事了！”刚才有信徒来送信，告知了相忱有关王明道先生等人前晚被捕的情形，逮捕的人是跳墙进入会堂院内的，王先生被带走的时候曾有过激烈的挣扎，在门口大叫王洁泉的名字。王洁泉是王先生的邻居，是一位很有名气的牙科医生，也是基督徒会堂的会友。另外，当时也住在史家胡同的杨津广弟兄与王先生同时被捕。讲过了这些，相忱停了一会儿，屋里很静，只听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也跑不了的。”王先生他们在此时被捕的确出人意外，因为据我所知此前教会内部存在一种比较乐观的想法，很多信徒以为政府不会因为信仰抓人，更不会轻易逮捕王明道先生这位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传道人。不久陆续有消息传来，王镇、吴慕迦、张周新、陈善理和彭鸿亮等人也先后被捕。其中吴慕迦是在回家路上被捕的，他正骑着自行车走到自家所住的机织卫胡同路口的时候就被人迎面截住，戴上手铐，装进囚车。其他没有被捕的人如毕咏琴等，已经公开宣布加入了“三自会”。

此时，北京没有加入“三自会”，而且仍在坚持聚会的教会就只剩下一个“福音堂”。“福音堂”照常是每周三次聚会，一次也没有减少。相忱自己也是照常每天祷告、灵修、读经和讲道，我没有见到他有过愁眉不展的样子，我做的饭菜，他也是照常拿过来就吃，没少吃也没少喝。

有信徒悄悄来告诉相忱，政府已经注意上了“福音堂”，正在暗地收集这里的教会活动和信徒的详细情报，很可能要对“福音堂”动手，相忱听了只说：“管他们那套呢，逮我就得去！”但有些出乎意外的是逮捕并没有马上到来。也许是年初相忱那次无意之间的“单刀赴会”使得宗教管理处和“三自会”错认为是他有意“向政府靠拢”的，加上他们认为相忱比较年轻，以前也没有太多的公开反对“三自会”的言论，还是可能被“挽救”的，所以在年初那次聚餐会上，李处长特意拉着相忱的手，对他说：“你才四十多岁，年轻得很，要好好学习，追求进步。”这样，政府又给相忱多留了一段时间，只是为要继续争取他。

这段时间政府很少来找相忱，一切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平静当中，以致我偶尔会想到或许相忱和“福音堂”可以一直这样继续下去。

一九五六年的“十一”国庆节过后，有消息说王明道先生夫妇和前年一道被捕的人已经陆续被放了出来，其中也有杨津广弟兄。之后不久，我在一位信徒家里听到了王先生“自白书”的录音，王先生在讲话中承认自己此前的言行是“借着宗教形式进行反革命活动”，还表示要“感谢政府的教育帮助……带领信徒热爱祖国，拥护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措施”等等。听声音和语调，那确实很像是王先生的讲话。我回来立刻把刚才听到的告诉给相忱，但出乎我意外的是相忱对此表现得很平静，看来这些事情他早就知道了。听我讲完，相忱坐在那里凝神思忖了良久，才略微地摇摇头，缓缓地说出：“恐怕不真。”以后再没有听他提起过王先生自白书的话题。相忱也去史家胡同的会堂看望过一次王先生，回来对我说：王先生那里人很多，也没有机会和王先生多做交谈，只好问候了一下就出来了。此外，我也没有见相忱再去找过谁，也没有见到有被释放出来的人这时来“福音堂”找过相忱。

但是，以王先生此前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这份“自白书”的确在这些仍在把他作为带领人的教会和信徒当中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冲击。在此后不久，相忱第一次参加了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处领导的政治学习班，和“三自会”的人在一起学习。地点在米市大街的圣经公会，每周两次。临

要出门的时候，相忱对我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看着他简直像个委屈的大孩子，知道他真是不愿意去，心里也为他难过，可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安慰他。学习回来，我一边给他倒水，一边问他：“学的怎么样？都学什么呀？”相忱答道：“也没什么，就是政治挂帅吧。响应政府号召……教会要支持政府……”说实话，相忱对政府从不曾抱有过任何敌意，政府不允许上街布道他就不去，外面没有过对抗，心里也没有存过怨恨；每到十一国庆节，“福音堂”也和周围铺户一样在大门外悬挂国旗，以致庆贺；还有我到街道上担任妇女主任的工作，他也从不反对。唯有要他把当归给神的归给该撒，把神的教会置于政权的领导之下，是他宁死也不愿意做的。

我眼见着相忱一天一天地沉闷下去。管学习班的人都是安排他坐在最前面，可他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每次学习回来，总是说：

“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真听不下去！”

“他们总让我发言，可我对学习的内容根本就想不通，我能有什么可说的？！”

我看出他在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更看出他里面正在进行着的争战，我对他说：“你要好好地祷告，愿神的心意成就！”

这时，我所能做的也唯有为相忱祷告，我对神说：“神啊！把你这个人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心意成就，而不要随我们自己的意思。如果是主你的苦杯，就求你让相忱这样喝下去吧！”

终于有一天，相忱在祷告后满有欣喜和平安地告诉我：“我已经决定了，再也不去参加学习了！”那天他果然没有去，整天都高兴得很，像个小孩子一样不停地哼着歌。参加政治学习的前景，真如王镇牧师曾经描述的那样，天上的两群鸽子，飞着飞着就合在一起，成了一群；但是参加学习可以从世界上得到一个最基本的安全保证。而不参加学习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呢？亲身经历过那个“政治”统治一切的社会环境的人都还记得，任何人，不论任何原因，即使是偶然没有参加所在单位的政治学

习，后果都是极其严重的，更何况是已经被划入打击对象的基督徒呢。

相忱退出学习班没过几天，久违的祁廷铎牧师忽然来访。祁牧师比相忱年长五六岁，身材高大魁梧，以前常来“福音堂”和相忱交通，两人谈得很是投机。祁牧师曾经在“福音堂”做过见证，讲述自己是在宋尚节博士的布道会上悔改信主的。但是自从一九五一年祁牧师积极加入“三自会”以后，成为很“红”的“进步分子”，和相忱的来往自然就很少了。这次他来的时候正好快要中午了，我们就留他一起吃午饭。我一边打发孩子们赶快吃完饭后去上学，一边两眼看着相忱他们两人的表情。只见祁牧师端起碗吃了两口，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犹豫了一下，他终于开口说：

“袁弟兄啊，我还是要劝你几句，也许你不爱听，不过我还是要来劝你。我听说你没有去参加政治学习，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下，你就把个人的脾气忍一忍吧，装装样子，主动去向他们要求参加学习吧。”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忙拿一张纸递给他，他放下碗，接过纸擦擦眼泪，靠过来拍着相忱的肩膀，说：

“弟兄啊，你现在这样，既不参加学习又不加入‘三自会’，后果不可想象啊，你家里有老有小，这么一大家人，你若是有个什么不好的结果，他们可怎么办啊？”

说到这里，祁牧师的眼泪又流了出来，他一边擦着眼泪，一边不住地叹气。可我看祁牧师说话的过程中，相忱始终沉着地像平常那样吃着饭，一点不动声色，一句话也不说。等到吃完了饭，相忱才平静地回答：

“我不是因为个人的脾气才不参加的。我不敢糊弄神，也不愿意糊弄人！”到这时，祁牧师又提出要为相忱做一个祷告，祷告中的意思还是要劝相忱加入“三自会”，他说道：

“求神让我的弟兄看清形势，这是大势所趋。盼望我的弟兄能够站稳

立场，靠拢政府，参加学习，不能固执己见。”我在旁边听着，觉得这个祷告很不对头，他明显是说给相忱听的，哪里是说给神听的？相忱也没有参加他的祷告，只是一脸严肃地坐着，眼睛直望着前方。祷告完了，祁牧师就起身告辞了。等他出门走了，相忱自言自语道：

“这都是什么呀！？”就起身回后面去午睡了。我知道相忱的心里一定也很反对这个祷告。

过了几天，相忱去附近一位患病的老弟兄家里探访，回来时刚进门就气愤愤地甩出一句：“真是笑话！你是在人矮檐下，我才不在呢！我没什么好低头的！”

我吃惊地看着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等我开口问，相忱就接着说：

“刚才正在王老弟兄家里的时候，祁牧师也来了，我就说你们谈，我先走了。结果他也推着车跟我出来了，还是劝我加入‘三自会’。他说共产党要我们加入‘三自会’，我们就不得不加入。最后竟然说出‘既在矮檐下，岂敢不低头。’”只见相忱越说越激动，大声说道：

“你说我在谁的矮檐下啦？我不在谁的矮檐下，用不着低头！你低你的头，我不低头！”

说起相忱去探访的这位名叫王化南的老弟兄，真是让我们向神感恩。他是一位孤老，常年卧病在床，却亲眼看到了相忱从东北回来以后，才被主接走了。

相忱和我，并不知道祁牧师是“三自会”派来的说客，还是他自己主动来的，其实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所传递的都是同样的信息——严酷的考验已经来到了。

## 四

虽然乌云以为自己已经遮断了天空，但总有几缕刺透层云的光辉，

在彰显出天上那位至高者的荣耀和权能，使地上心存盼望的人们深得安慰。

“三自会”派人来通知我们，说一九五七年五月日本基督教问安使团访华，作为成员之一的织田金雄牧师要来“福音堂”参观。

织田金雄牧师，早年曾在美国读过书，以后长期在中国传道，是在华传道的日本牧师中比较有名的一位。日本占领时期，他曾出任过“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特邀委员，并在那时从房主李少鹏手中租下阜成门大街一百六十号，作为他的布道场所，以至于抗战胜利后，此处房产由此被错当作“敌产”而遭到当时国民政府的查封。

相忱带领我们全家从河北农村回到北平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的六月，距离日本的最后投降只有两个多月；而相忱从房主那里租下“福音堂”已经是一九四六年的三月了，那时的织田牧师正被关押在东单的集中营里，等待被遣返回日本。所以，在此之前相忱只是听说过他，但两人之间并无来往。

“福音堂”开堂以后，相忱考虑到堂里使用的许多器具如大椅子、风琴还有大鼓等等，都是织田金雄留下的物品。虽然他现在作为战败国的公民被集中以等待遣返，并且这些器具当初是和房子一起被查封的，又一起被交还给房主，将来他被遣返回日本的时候也不大可能把它们带走，但东西毕竟是织田牧师的。相忱觉得应当趁着他还在中国的时候去和他打个招呼，就在“福音堂”刚开堂后独自去了一趟织田被关押的东单集中营。

从东单回来，相忱带着一脸无奈的表情，呵呵地笑着对我说：“这个日本人的脸耷拉着，还真不好看啊！”原来相忱到了设在东单的集中营，向看守提出要见织田金雄，看守问相忱和织田金雄是什么关系，相忱答说是认识的朋友，看守进去不一会儿就把织田带了出来。相忱说：

“我告诉织田，我已经去市政府开了阜成门大街一百六十号的封条，并且向房主租下了房子，已经在那里开堂布道了。你的那些椅子、讲台



还有风琴等等，暂且没有其他用处，所以我就先用了。我来是向你打一声招呼，告诉你这些情况，也是来向你致谢。没想到织田听完我的话却生气了，用中国话对我说：我用他的东西是小事，那些东西又不值什么钱，他也不在乎。但关键是我用他的福音堂要先征得他的同意。我只好又向他解释：第一，这个福音堂不是我私自打开的，而是国民政府开了封条，房主给了我钥匙才打开的；第二，你虽然租过这个地方，但后来你被集中，房子先是被查封，后来又归还给房主。不管你当初与房主是如何签约的，现在这种情况下，房主完全有权利处理自己的产业。可织田听我这话还是不高兴，还是一再说我应该先找他，经他同意后才能使用这里。”

说到这儿，相忱和我都笑了。我们当时以为，织田被集中关押了这么久，可能心情不大好；相忱去看望他也是尽了我们的本份，他不理解就算了。这是相忱和这位日本牧师唯一曾有过的一次交往。

为了接待客人，我们把礼拜堂里的大椅子搬开，在中间清出一块空地，摆上一张铺着台布的大方桌，桌上是预备好的点心和茶水，还为此专门买了几盆鲜花。织田牧师进来的时候，先在门口略停了一下，朝堂里四处查看。但他并没有到已经准备好的桌旁就座，而是撇开陪同的人群，直接走近相忱面前，拉起相忱的手，轻声说：“请你跟我到里面说话。”说完就领着相忱径直穿过礼拜堂和小院向后面走去，我没想到织田对阔别十多年的“福音堂”依旧谙熟如故。织田牧师这个意外的举动令在场的人都陷入尴尬，一时显得不知所措。这天“三自会”派来陪同的人正好是祁廷铎牧师，他一身标准的干部打扮，已然没有了前不久的那种亲近感，坐在桌边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过不多一会儿，织田牧师和相忱一前一后从里面出来。这时，织田牧师仍然没有走近桌边，桌上预备的糕点、茶水也没有动，就直接出门去了。

等众人都走了，相忱告诉我刚才在里面，织田金雄牧师对他说：

“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福音堂’还在不在。我没想到‘福音堂’还开着，看到你还在使用这个堂，还在为主做工，我很高兴！为你工作的进展感

谢主！这个‘福音堂’是主的，愿主加给你力量，好好使用这个地方！”

分手时又说：“看到你，我心里很高兴！请为我祷告吧！”

作为一位曾在中国事奉和生活过多年的传道人，织田金雄牧师大约已经了解到一些当时中国教会所面对的境况，特意借此机会来安慰和鼓励相忱。织田牧师临走时，站在“福音堂”门外的台阶上拍了一张照片，因为后来这座房子在城市扩建时被拆除了，这张照片就成为“福音堂”现存唯一的留影。从照片上能很清晰地看到“福音堂”大门两侧的两幅大字，左边写的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的路。”，右边是“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的恩赐是永生。”那还是开堂的时候，我亲笔写了贴上去的，旁边的窗户上还有一些圣经的图画。

正是这一缕缕穿透层层乌云的阳光，给正在乌云笼罩里的人们送来真爱的温暖。

一年之后，相忱被捕定罪时其中一项罪名“汉奸嫌疑”，所指的就是“福音堂”以及与织田金雄牧师的两次交往，硬说“福音堂”是相忱从织田牧师手里接受的日本产业，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北京“三自会”还有人在她出版的小册子里重复这项莫须有的指控。相忱本人却从来不曾为此分辩过。

与“汉奸嫌疑”同时的还有另外一项罪名——“里通外国”，也是因为我们在这时帮助过陈业的妻子胡荣德姊妹去美国。新政权建立之前，陈业自己已经先回美国去了，留下他的妻子胡荣德姊妹和一对双胞胎儿子在国内。胡姊妹原是同仁医院眼科的护士长，一九五一年中美关系恶化以后，因为信仰和“美国关系”的双重原因，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通县从事农业劳动。她到“福音堂”来的时候，面黄肌瘦，身体憔悴不堪，衣衫褴褛，头上戴着烂草帽，脚上的鞋露着脚趾头，一见我就哭了。我赶忙找出自己的衣服和鞋给她换上，又给她做饭吃。无论我做的什么，她都吃得狼吞虎咽，吃完了在泪水中呜咽着对我说：“添麻烦了。”看着她这样的情形，我也哭了，安慰她说：“不要紧，我们是一家人！”以后她每

次来，我都是先要安顿她吃饭。

一九五七年，胡荣德姊妹决定带着孩子去美国和陈业团聚。她当时的生活非常困窘，甚至连拍证件照片的钱都拿不出。那时中美还没有外交关系，去美国必须要经从香港中转，她们一家从北京去广州的火车票也是由相忱垫款代买的。相忱本来只是去火车站送她们，可却打来电话说她们的行李太多，还带着两个孩子，所以只得当场临时决定把母子三人送到广州。到达广州的当天，相忱他们在大马站林猷羔弟兄的教会里住了一夜。林弟兄和他的几位同工也曾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因为拒绝参加“三自会”而被捕，一九五七年一月才被释放出来，这次相忱和林弟兄只是匆匆地见了一面，没有来得及交通。第二天，相忱把胡姊妹母子送上去香港的火车，自己就回来了。

有一位叫苏玛丽亚的姊妹，是在一间外国教会开办的慈善机构里长大的。她和她的丈夫、公公全家都是“福音堂”的会友。大约在一九五一年年末，我发现玛丽亚有好几次都没有来聚会了，询问她的公公才得知原来她已经随工作调动的丈夫去了山西省。我很惦记他们离家在外的境况，就向她公公要来了他们的地址。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总是有一种难以放下的感动，想着玛丽亚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一定会遇到很多难处。于是，我拿了十元钱，按着地址汇给了在山西的玛丽亚姊妹。钱汇出之后，我并没有收到玛丽亚的任何音讯，只听说没过多久她的公公也去了山西。谁也没有料到，这件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玛丽亚夫妇忽然来到北京看望我们。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玛丽亚的丈夫何帮俊弟兄对我说，我当年寄的那十元钱竟然挽救了他们一家人的生命。原来何弟兄被调到山西的第二年春季，他就在“三反”运动中遭受诬陷而被捕入狱，又被停职停薪。本来没有工作的玛丽亚带着两个小孩子断绝了生活的来源，顿时陷入了绝境。玛丽亚告诉我，正当她面对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走投无路的生死关头，邮递员给她送来了那份汇款。她就是靠着这十元钱买来的一点粮食维持三口人的生活，直到她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们应当以感谢和赞美，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和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世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困苦劳乏，但正如大卫颂赞神时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依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撒母耳记下 22：2-3）

在这场还看不到尽头的大逼迫中，疯狂的迫害几乎是来自各个方面的，那些足以致人于死地的压力既来自我们的社会生活、工作生活，也来自每个人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等等，但是，神的灵却感动又呼召这些真属基督的人，在患难中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彼此相爱，因此就见证出我们真是主的门徒；这个世界固然已经弃绝我们，但神的爱永远与他的儿女同在。“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撒母耳记下 22：4）

## 五

从一九五六年的下半年起，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意思就是“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来为党和政府提意见”。“三自会”也随之在教会内搞起了“大鸣大放”。但是，这样看似宽松的形势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在一九五七年时突然被另外一个名为“反右”运动的高压政策所取代，几乎所有在前一个运动中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的人都受到严厉的追求。

就在“反右”运动即将开始前，相忱又被宗教事务处叫去和“三自会”的人一起开会。会议还是由李处长主持。开始的很多天，虽然领导一再动员每个参会的人都要大胆“鸣放”，积极提意见，相忱却仍是像从前一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后来李处长直接点到了相忱的名：“袁相忱，你也该发发言了，怎么老是坐着不说话啊？”相忱回答说：“我不用发言了，听听大家的就行了。”李处长并没有就此放过相忱，他说：“不要害怕嘛，有什么话就畅开了谈，有什么意见也要说出来，没有关系的！”

李处长应该看得出来，此前相忱一直都不愿意参加学习，在各种场合更是极少发表意见，所以很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相忱心里的真实想法，或者他还期待着相忱的态度在压力和争取的双重作用下正在有所松动。看相忱还没有说话，李处长就继续鼓励相忱：“没关系的，有什么话就说出来，你们要多给我们提意见才能促使我们把工作做好。不论大家提出什么样的意见都欢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相忱后来告诉我，他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是你们让我说，那我就说说也无妨。况且他自己的心里已经着实憋闷很久了。

相忱思考了一会儿，终于在会上开口说：

“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首先，对各宗教存在不平等的待遇，就拿基督教和回教相比，二者同为宗教，但宗教政策却极其不平等，对回教的政策很宽松，对基督教却很紧，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再有就是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根本不是三自的人，这些人可以说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人的津贴，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了‘三自会’的人，其实他们是最不三自的。他们只不过是基督教队伍中混饭吃的人，也就是‘吃教’的。”

相忱的话音一落，整个会场的空气马上陷入一片肃静，连先前极力鼓动相忱发言的那位李处长此时也不做声了。这些年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运动的整治，教会上下业已变得噤若寒蝉，甚至那些明白人早就看清了当下的大势，虽然政府表面上还在鼓励人们提意见，但气氛已与“鸣放”之初大不相同，就连官办的“三自会”的人物们都已经三缄其口，相忱却在这时提出如此尖锐的意见。

会议结束的当天，相忱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的组长王毓华宣布说：

“遵照政府的要求，每个小组要产生四个右派。根据大家的发言记录，袁相忱被划为右派。”随后王毓华又解释说：“右派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希望被划为右派的人不要灰心，而要积极地参加学习，常常反省自己。”

这位王毓华其实并非教会的信徒，而是从外面派进教会的“宗教工作

者”，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在这次开会中才和她有了第一次的接触。此后，这人不仅长期在基督教会内活动，甚至还经常往来于包括佛教寺庙在内的各处宗教场所。

在被宣布划为“右派”的当时，相忱并没表示什么。回到家里，他告诉我：“你想不到吧，从今天起给我戴右派帽子！”

听到这话，我不由地心里一紧，连忙问他：“有什么处罚吗？”

相忱平静地答道：“闭门思过。我真的需要好好在神面前安静地反省反省了。”在这以前相忱也曾在外边遇到过困难和压力，但他回家却从不提起那些事，以后也没有讲过类似的话题，只有这一次他被划为“右派”的时候。望着相忱冷峻的面庞，我知道他此刻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试炼，心里很为他感到心疼，就轻轻地安慰他说：

“戴就戴吧，主没给你戴就行了。”

相忱冲我笑了笑，抬手指着自己的头顶，说：“我将来还得升级呢——反革命！”

打从相忱被划为“右派”之时起，街道上的人就开始频繁地光顾“福音堂”，言谈话语之中无不在转弯抹角地探听我们的口气。“三自会”的人也来找过好几次，要他继续去参加学习，他都没有去，后来那些人也就不来了。也正是从这时起，相忱不再像以往那样坐在大门口读经，而是改到了后面的屋里。他读经的时间明显比以前更多了，读过以后就长时间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里屋走到外屋，又从外屋走回里屋，一声不吭。走了一阵子，就回去坐下，拿起圣经接着又读，经常一个人读经到深夜。

我可以看得出相忱的神情和心态和通常不一样，变得闷闷不乐，常常一个人沉思。我知道他有心事，虽然他跟我一个字也不说，我却从他每天的祷告中听出他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且这压力本是他所担负不起的，因为我听见他在迫切地向主呼求，迫切地向主交托自己身上的重压。我也尽可能安排好手上的家务事，每天晚上陪着他一同祷告。

相忱已经明白地知道他自己即将要走的这条路是一条怎样的路。此时在我们心中涌起的是主在客西马尼园流汗祷告时的景象，门外那恶者的仆役正在走近，我们唯有不住地向主大声祈求：“主啊！你若许就会临到，你若不许就不会临到！愿主的心意成就！”

相忱照旧每天早起祷告，照旧每天读经灵修，照旧每周带领聚会和查经。为了使众弟兄姊妹能在这个紧要关头站立得稳，相忱有意识地带领大家把面前的形势放在圣经当中加以查考，着重讲论了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教会、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工人等题目。他用神的话语作指南，向大家指明：

“基督是教会的头，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和‘三自会’以及任何个人等等都不是教会的头。现在政府设立的宗教事务局通过‘三自会’来管理一切的宗教事务，我们有真信仰是不能加入他们的。这是出于教会应当为主持守圣洁，不参加政治的缘故，并不是出于对政府或党有什么不满。政治和宗教是两码事，爱国和加入‘三自会’也是两码事，不应该扯在一起。信徒以公民的个人身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都是可以的，但不应该以教会的名义做什么。教会不是人民团体，教会是属天的，是属灵的。”

很多次聚会结束后，都有信徒关心地提醒相忱：“袁先生，您以后还是稍微小心一点，今天聚会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很陌生的人。”相忱当然很感激大家的好意，但他却反过来安慰众人说：

“没关系的，我们传福音就是要传给陌生的人，只要他想来听，我们的门是敞开的。我讲的这些都是圣经上的，有些人正是因为不知道圣经是怎么讲的，所以才会走偏了。”

其实最近聚会当中突然多出的那些个陌生人，相忱自己肯定也看到了，就连十七岁的福音都发现总有几个一身蓝制服，脚穿绿色胶鞋的人在大门外徘徊（蓝色制服和绿色胶底球鞋，是当时公安人员的标准着装），不时地朝“福音堂”里张望。对于这一切，相忱全不在意，无论在教会里还是在家里都是平静如常。

转眼已经进入了这一年的秋天，飒飒的秋风一扫压抑已久的闷热，令人顿时神清气爽。这正是北京一年当中最美丽动人的时节，京西的群山上覆满了灿烂如血的红叶。

一天中午，相忱午睡起来，端着一杯水坐在桌子旁边，边喝边对我说：“我们两个还没有去长城玩过呢，这两天天气正好，我们去一趟长城吧。”

我刚收拾好厨房，正要出门去街道上开会，没顾上多想就回答他说：“要不以后再去吧，我还要赶时间给孩子们做棉衣呢。”

相忱看着我，诚恳地说：“你陪我去吧！你嫁给我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带你出去玩过呢！”

我很诧异相忱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个想法，就问他：“一天这么忙，我真觉得时间不够用，怎么你现在倒有玩的心了？”

相忱仍然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就要离开家了，以后说不定想陪你玩都玩不成了。”

我怔住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好轻轻地朝相忱点了点头。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就这样在沉默中间彼此对望着……

接下来的日子里，相忱和我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有关出去玩的提议似乎被逐渐淡忘了。一天晚上，我收拾好所有的家务回到我们的屋里，相忱还没睡，正躺在床上给爱湖讲圣经故事。我们住的这三间房子，当中一间是客厅，相忱和我带着三个小一点的孩子住在左手这间，福音他们三个大孩子跟着婆婆住在右边那间。相忱最喜爱六岁的小女儿爱湖，带着她和自己一起睡在一张床上。相忱见我进来，故意笑呵呵地对身边的爱湖说：“赶明儿咱们上颐和园玩去，上万寿山啊！”又转过来对着我说：“说去长城一直也没去成，我真是亏欠！这次咱们都去吧，连孩子一起带着。”

相忱此时重提要出去玩儿的建议，让我再次想起他几天前曾说起自己



将要离开家的话，于是就含糊地答应道：“哪有时间呀！”说来全家人能出去玩当然好，可一想起相忱的话心里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好像隐隐地生怕他的预见真的会成为现实。

快到年底的一天，忽然隔壁看守公用电话的老太太喊我的名字：“袁婶儿，电话！”我连忙赶过去，来电话的是一位宗教事务处的工作人员，他说要我和婆婆两个人明天上午九点钟到宗教事务处，李处长要找我们谈话，并且反复地强调这次谈话很要紧，要求我们务必要去。

放下电话，我慢慢地走回家。想了想，先进到婆婆的屋里，对她说：“宗教处李处长找咱们，不知道什么事，您和我一起去吧。”，老人一脸疑惑地问我：“用得着我去吗？”我说：“处长说要您也去。”婆婆轻轻地哦了一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会是什么事呢？”婆婆年轻时上过学，是有文化的人，可以读书看报，在教会的姊妹们中间也常有交通，以前相忱一切的事情包括拒绝参加政治学习和被划为“右派”等等，她都知道。我和婆婆商量好，暂时不把李处长召见的事情告诉相忱，我们娘俩先去看看有什么事再说。

从接过那个电话之后，我脑海中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想——李处长找我们是什么事呢？既然李处长亲自找我们谈就一定是有事，而且还指名要婆婆也一起去，可见这不是一般的事！我可以想到一定是关于相忱的事，已经有那么多人被捕了，只剩下相忱……整个晚上，我都是在一边做着手里的活计，一边不住地向着神祷告：“主啊，我把这事交托给你，求你为我们保守！”相忱却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不安，家里的气氛还是和往常一模一样。

我收拾好回到屋里的时候，相忱和孩子们已经睡了。这时我的身体劳累，而灵里却是比往常更加警醒，即将到来的压力驱使我来到神的面前，急切地向他祷告，我求问主：“主啊，明天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是不是相忱的事啊？我应该怎么样来应对这事呢？”主的灵带领我思想起从一九四一年在成安直至今天我们所遭遇的各样患难，和主在患难中给我们的诸般恩典和保守，主的话语临到我——“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

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 5：4-5）”在主的恩典中，我已经从最初被动地承受患难，学会了把今天所遇到的完全地向主交托——“主啊，一切都交托给你！相信我们眼前所遭遇的都是出于你，如果没有你的允许，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我久久地向主祷告，不住地向主诉说……大约两三点钟的样子，对面床上的相忱醒了，看我还在祷告，抬起头问我：“你还不睡觉啊？”

我说：“我祷告呢。”相忱没有说什么，就又睡着了。我望着熟睡的相忱，心里真如主在客西马尼园中那般的伤痛，默默地向主大声呼求：

“主啊，倘若这是你的杯，就求你让我们喝下去！我们只有在你的面前，听从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就这样成就在我们身上！”

第二天一早，我和婆婆一起出门去，临走时我告诉相忱：“我跟着老太太，我们出去有点事。”到这时相忱依然全无察觉。一路上，我和婆婆都没有说话，经过昨天祷告中向主的交托，我已经有了轻松的感受，可还是免不了在心里翻涌着或这样或那样的猜测，忍不住去想：“等一下会有什么事儿呢？虽然知道肯定是为了相忱的事，可他们会怎么说呢？”

来到位于东长安街的北京市政府宗教事务处，一经工作人员的通报，李处长亲自从门里迎出来，笑容满面地和我们握手。李处长有五十多岁，中等个，按照当时干部的标准，齐整地穿着一身四个口袋的中山装。这位李处长过去长期主管北京市的宗教工作，教会内的人大都熟悉他，相忱就曾和他打过不少次交道，我也常听相忱讲起过他，但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这位领导。

李处长把我和婆婆引进他的办公室，请我们落座以后就开门见山地首先对我说：“我找你们来是有很要紧的事情，是关系到你们切身利益的问题。袁相忱没有参加学习，也没有向政府靠拢。我请你们来就是要你们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要他悬崖勒马，赶快向政府靠拢，不然我们再也无法容忍他了。我们看他还年轻，才四十四岁，还有挽救的可能，所以

就找你们来，你们是他家里最近的人，回去要好好地劝劝他。你们家有六个孩子，有老有小，他出事了你们怎么办呢？”李处长的态度虽然和蔼，可在我听来他的话真犹如字字千钧。说到这里，李处长的态度开始严肃起来，继续说道：

“我们给你们一条出路，要袁相忱赶快悔改，向政府靠拢，参加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对他放心！不然的话……”他的话锋陡然一转，“我们怎么收拾王明道，照样怎么收拾袁相忱！我们一直在给他机会，等他回头，不过我们的线不能拉得太长，我们也不能等他太久了，他要再不悔改，不向政府靠拢，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对他我们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们不信就等着瞧！”这一阵的疾风暴雨扫过之后，李处长的态度又重新和缓下来，重新露出和蔼的笑容对我说：

“我们收拾他很容易，但他要是进去了，你们家一堆孩子怎么过呀？你是他的妻子，所以你要多劝劝他，不要和政府作对，否则的话会自食其果的。”

和我谈完以后，李处长又转向婆婆，把刚才对我所谈的话意再对婆婆讲了一遍，只是态度上更加客气。他说：

“老太太，我知道您就这么一个儿子，您也要想一想，如果没有儿子，您怎么生活呀？您回去要好好劝劝他，让他好好参加学习，向政府靠拢，回头是岸啊。要不然，你们这一大家子怎么生活呀？我是为你们好，所以才把你们找来，你们要记住我的话，回头是岸。要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谈话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其间一直是李处长在对我们讲话，我和婆婆都没有说什么。直到握手道别时，我才对李处长说：“好吧，我回去照着您的意思，原本跟他说。”

李处长非常严肃地最后叮嘱我们：“你们要好好地做他的工作，把他的思想打通了。别固执己见！”

从宗教事务处出来，一路上我和婆婆谁都没有说什么。李处长刚才

的态度虽然还是很和平，话语中并不直接带有那种赤裸裸的恐吓威胁，但整个谈话的指向却相当明确，那就是相忱之前没有和王先生他们一道被捕，并不表示政府已经放过了我们；相反，如果相忱不立刻按照他们的意思改弦更张，完全靠拢政府，等待他的也将是同样的结果。快要到家的时候，我和婆婆商量要不要把李处长和我们谈话的事告诉相忱，婆婆说：“还是告诉他吧。”这也正和我的想法。经过了昨天在彻夜祷告中向主的交托，此时我的心里并没有感到焦急，我知道我要做的只是把这件事传达给相忱，我相信相忱一定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因为我相信主已经命定了要相忱走上这条他自己曾经走过的道路。我对主说：“主啊！倘若这是你的旨意，就求主教相忱遵行。只求主的旨意成就在相忱的身上！”

我和婆婆回到家时已经快到中午时分，我先要赶着做全家的午饭。饭后，几个大孩子都去上学了，小的也睡午觉了，我才来到相忱身边。这天相忱并没有照通常的习惯午睡，而是独自坐在桌边看书，好像正在那里专心地等候着我。

看着相忱，我心里哽咽着一时说不出话。相忱抬头看见我的样子，就问：“你怎么了？”

我低声说：“李处长今天找我和妈去谈话了。”相忱一下子怔住了，眼睛盯住我，问：“谈什么？”

我回答他说：“要我们劝你向政府靠拢，参加学习。”

相忱马上又追问一句：“是政府叫你们去的吗？”我轻轻地点了点头。相忱的目光缓缓地从我的眼前挪开，过了一会儿，又问我：

“你和妈都去了吗？”我还是点点头。

相忱不再问我什么，眼光重新落回到面前的书面上，一动也不动。不知什么时候，婆婆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这时她对自己的儿子说：

“人家说的对不对，你自己好好考虑。如果对，你就照着做，不能按

照你自己的意思。”

相忱抬头望了望母亲，目光还是回到自己面前的书桌上。我们三个人都不再说话，周围静得连每个人的呼吸和心跳都能清晰地听到。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声音如同滚滚而过的春雷，打碎了包裹着我们的寂静——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参加就是不参加，这条路我是走定了！”

我和婆婆一前一后地从屋里退出来。我听见婆婆微微地叹了口气，轻声地像是对我又像是对她自己说：“他有主心骨，是不听劝的人。谁劝他也不会听。”

我们没有回复李处长，政府和“三自会”的人也没再找过我们。大概因为他们以前只看到相忱没有像王明道先生那样站出来与“三自会”进行论战，也不参与和联络他人，所以就多留了相忱两年。可是他们只看到了相忱表面上并不激烈，却不知道他的心里是那么坚定，已经作好了被捕甚至殉道的预备。把他自己当作活祭，永远浇奠在神的祭坛上。

## 六

一个主日，相忱请武文蔚牧师在“福音堂”证道。聚会结束时已近中午，相忱陪着武牧师从礼拜堂回到后面的客厅，两人刚在方桌的两旁坐下，我也赶快倒了一杯水递给武牧师。就在武牧师端着水正要喝的时候，忽然从外边涌进来一伙人，穿过礼拜堂，直接闯入到客厅。当时我正站在院子里的厨房门口准备要去做午饭，这伙人就从我身旁走过去。他们有穿警察制服的，也有穿便服的，为首的一人厉声叱问：

“谁是武文蔚啊？”

武牧师放下杯子，站起来，很从容地回答：“我是！”

那人冲着他喝道：“武文蔚，告诉你，你现在被捕啦！”然后不由分

说就给武牧师戴上手铐，前呼后拥地把他带走了。

他们出去的时候，我也随着他们走到大门口，亲眼看着他们把武牧师押上一辆车开走了。

来抓捕武牧师的人没有宣布逮捕他的罪名，虽然在“福音堂”里抓人，却没有和我们有任何正面接触。我回到客厅，见相忱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手里端着水杯，脸上既没有一点惊慌也没有一丝愠怒的样子。看见我进来，相忱轻轻地喝了一口水，说：

“他们这是做给我看的，要教育我啊。你看着吧，将来早晚我也是走这个路！”说完就催我快去做饭。

事后我去武牧师在东四的家里探望他的妻子，给她送去一些大米和钱。武师母为丈夫的被捕非常悲伤，我也唯有尽力地安慰她。

武文蔚牧师以前曾在内蒙古一带传道，大约在一九五〇年前后才回到北京。是公开拒绝参加“三自会”的传道人之一，因而和相忱来往比较多，常被邀请来“福音堂”讲道。武牧师被捕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不久就在监禁中为主殉道。常来“福音堂”讲道的还有一位名叫李光荣的自由传道人，他原籍山东，早年曾作过绿林好汉，讲道时嗓门洪亮，粗犷有力，很受信徒们喜爱。同样是因为拒绝加入“三自会”，李弟兄也在这段时间里被捕，也死在监狱中。

然而让我们最为感恩的是，那个主日，堂里至少有一二十位尚未离开的信徒亲眼目睹了武牧师被公安人员带走的这一幕，但是下一个主日，“福音堂”聚会的人数竟是一个也没有减少。

在我们一起祷告的当中，相忱告诉我：“在神的真道上懦弱是一种罪。人在软弱的时候，就是被这种罪所捆绑。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華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 1：9）我们也应当刚强壮胆。以前那么多苦日子神不也带领我们走过来了，我相信神不会加给我们承受不起的重担。我们若恒久祷告，一心靠主，主就必定保守我们！”我相信在此之前相忱

肯定有过各样的软弱和彷徨，我更相信在今时主已经使他重新刚强起来。

从这时起，相忱把灵修的时间都用来读经，他手上的那本圣经很快就被他翻得散了架，他就找我要块布说要给圣经做个封皮。我说：“我给你弄吧。”他看我忙，就说：“你甭管，这我能做。粗活。”他拿着我给他的一块蓝布包在原来的书皮上，东一针西一针地缝了起来，我瞧那针脚横七竖八的实在不好看，可他却不介意，缝好了回去接着读。那时他读得最多的是《约伯记》，神的话语给了他极大的安慰，我常见他口中反复吟读着神感动约伯说出的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约伯记 19：25-26）

一九五八年，北京的春天姗姗来迟；清明节后的第一场春雨给大地染上了朦胧的绿意。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一岁，尤其是六岁的小女儿爱湖更是显得活泼可爱，相忱每天晚上都把她带在身边，给她讲圣经故事，哄着她睡觉；早晨起来又抱着她去街边的小摊上吃早点。以前很少过问家事的相忱，这时也开始主动地关心起孩子们的学习和身体。他知道自己离开家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他是以一个最珍惜的情怀在——地体味着为人父母的欣慰。因为身体疲劳的缘故，我是常有失眠，可相忱从来都是祷告以后就带着孩子睡觉了，每晚都睡得非常安稳。

天暖和了，一家人都纷纷脱掉棉衣，开始穿上了毛衣。我也抽空把这些已经穿了一冬的棉衣拆洗干净，准备收起来待到来年再穿。相忱看我正在收拾衣服就走过来，对我说：

“你别把我的棉衣收起来，就把它放在我枕头边就行了。”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问：“你还穿吗？不穿就收起来吧。我刚洗过了，放在外面会落上灰尘的。”

相忱略微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你就放在外面吧。用块布包起来，放在我枕头边上就行。”我没有再追问什么，就照着他说的把他的那套棉衣棉裤从一家人的衣服里挑出来，仔细地单独叠好，找了一块干净的布

包起来，我做的时候，相忱一声不响地站在旁边看着我。等我把包袱放在他的床头上，见他还在盯着自己的棉衣发愣，又过了好一会儿，相忱才用低沉的语调说：

“我走以后，你有主。我也放心。”我明白相忱是在为他走后一家人的生活担忧，婆婆快七十岁了，下面还有六个孩子，老大福音刚满十八岁，最小的爱湖还只有七岁，五个孩子在读书，我又没有工作，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他是一家之主，如果他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等着他还要再说些什么，他却不说了，转身出去了。我走到外面，见他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沉思不语。

正是在这个暖意融融的春天里，却传来一个冰冷刺骨的消息——郭相惠卿太太也被捕了。郭太太从一九三四年就与相忱相识，一直很爱护我们，相忱和我结婚时，郭太太的儿子就作过我们的伴郎。郭太太的丈夫在国民政府时曾作过盐务局长，家境富有，她出资在香山建立过一所专门接待信徒灵修的伯大尼院，相忱也去那里退修过。郭太太虽不在“福音堂”参加聚会，但她每月都来看望我们，和我们一起交通祷告。

又过了两天，相忱忽然对我说：“你出去给我买双新布鞋吧，要合脚一点，耐穿一点的。”相忱的话让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他平时经常登台讲道，所以穿皮鞋的时候比较多，况且他一向最为节俭，除非衣服鞋子穿破了才肯叫我去买，否则即使我买了他也不会穿，反会怪我不该随便浪费钱。这多年的生活，我早就摸透了相忱的这个脾气，可这次他怎么会主动提出要我为他买鞋呢？我心里不解，忍不住追问了他一句：

“怎么想起来要买新布鞋穿了？”

相忱没有马上回答，沉吟了一下才说：“买双布鞋，好在以后劳动的时候穿。”

刹那间我呆住了，原来这是相忱为自己被捕预备的啊！我的泪水几乎就要夺眶而出，只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望着相忱，我看见相忱的眼里好像也被什么东西充满着，也在强忍着自已，他没有再说什么就从我



的身边走到外边去了。

这是相忱又一次明确地对我说出自己将要被浇奠的话。我终于明白前些天相忱要我把他的棉衣留在外边，也是在为自己即将被捕预备的。我知道我理当为相忱预备，也要为自己作好预备，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亲人即将遭到捆绑，与我们分开，仍然抑制不住满心的酸痛。

## 七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是相忱和我终生铭记的日子，因为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日子。

这一天是星期六，先是街道通知我晚饭后到街道所属香家园派出所开会，布置第二天“打麻雀”的活动。原来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运动最高峰的时期，人们被这股火热的潮流裹胁着，身不由己地被投入到一连串的“跃进”当中。其中利用春季时节开展的一项运动就是“除四害”，“四害”就是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打麻雀的方法也很奇特，政府命令全国各个地区在规定的一段时间里全体行动，运用各种方式极尽所能地惊扰麻雀，迫使这些小鸟在地上无处落足，直至疲劳坠地为止。北京市的打麻雀也是由全市统一行动，时间定在四月二十日的上午九点，政府要求由市到区，再由区到街道，各级都要开会落实。所以我作为街道主任也要参加香家园街道的会议。

上午，我抽空上街去为相忱买了他要的布鞋。回来的路上，我边走边问自己：相忱真的就要走了吗？虽然我自己也在心里朦朦胧胧地感觉到相忱的预见是正确的，但又实在不愿意相信他就要这样地走了……“难道他真的就要走了吗？”……我在心里不住地问着这个问题，可又恐怕它真的会有答案……我自己对自己说：“主啊，我不敢再想了！一切都出于你，一切都在乎你，我不想了！”我不再想什么，只是加快脚步，好像生怕我回去时相忱已经不在……

我赶到家时见相忱正在坐着看书，心里微微地闪过一丝欣慰，就近

前去把新买的鞋交给他，说：“你先试一试，看看合适不合适？”相忱头也没抬，接过鞋顺手套在脚上。在脚落在地上的那一瞬间他的肩头一颤，抬起头望向我，我猜他这时一定是想起了这双鞋乃是为他自己将要离家预备的，就故意岔开话题，说：“这鞋很结实的，花了四块八毛钱。我刚才拿十块钱出去，找回来五块多，这五块多零钱就搁你兜里吧。”说着就把钱塞进相忱的裤兜里。

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双鞋在这天夜里就派上了用场，相忱就是穿着我新给他买的这双布鞋，带着我亲手放在他口袋里的五块多钱离开家的。

此时此刻，我也愈加真切地预感到相忱离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不敢想象那注定会临到的事将要怎样地在我们面前发生，唯有在祷告中交托主。我也思想起那个已经思想过无数遍的问题——“主啊，我是不是也要和相忱一样呢？”这绝非我无故的多虑，因为这以前已经有多位传道人的妻子被捕了。我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相忱，恐怕加添他本已很重的负担，只有借着祷告把自己也交托在主的手里，我对主说：“主啊，如果你许可，我就跟着相忱一起去；如果你要留下我，我就在家里照顾好老人和孩子。”我曾有一次在夜里忽然醒来，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告诉我：“你不会被捕的，你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把这声音深藏在自己的心里，时常反复地思想这话中的意思。

四月十九日的白天和往常一样地过去了。晚饭后我去街道开会，会议的内容是安排第二天打麻雀的具体工作，散会时已经是十点半了。

我回家时，孩子们都已经睡了，相忱正躺在床上看书。另外还有盲人陈邦恒弟兄这天正好来找相忱请教问题，因为第二天是主日，所以当晚就留在外面礼拜堂的隔栅里过夜。

我洗漱完毕回到屋里的时候，相忱已经搁下书睡着了。我也正要上床休息，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喊着我的名字：“梁主任，开一下门！”我听出那口音是香家园派出所一位专管户籍的警察，以为还是为了明天

打麻雀的事情，看时间已经十一点多了，也纳闷他们会有什么要紧事这么晚来找我，就出来打开大门，问道：“有什么事？”那位民警说：“不是找你，找老袁，我们所长要请老袁谈话。”这时我才看清门外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我认识的那位民警，另一个是我没有见过的陌生人，旁边还停着一辆绿色的吉普车。我顾不上多想赶紧返身回到屋里，见相忱还睡着，就揪了揪他的上衣，相忱睁眼问：“有事儿？”我说：“派出所来人所长找你去谈话。”相忱应道：“好吧，等我一会儿。”就起身在床边穿上那双新布鞋，又从衣架摘下外衣穿上，向外边走去。

我紧紧地跟在相忱身后，望着他那消瘦的背影，心里不由得涌出一股酸痛。相忱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在迈出大门的最后一刹那转头向我这边望了一眼。我跟着他一直走到大门外，一时也忘记了该和他说点什么或是该给他带点什么，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上了吉普车，那车“砰”地一声关上门，右转弯开入了锦什坊街。这时，婆婆也跟了出来，但车子已经不见了，只留下在寒风中漆黑寂寥的长街。我见婆婆扶着大门，一动不动地望着相忱离去的方向，就对她说：“您回去睡觉吧。”老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朝远处的黑暗中望了望，才蹒跚着转身回去了。

我关好大门，见陈邦恒弟兄正站在礼拜堂中间，努力地眨动着他那双失明的眼睛，仿佛想要看清眼前发生的事情。他分辨出我的声音，就压低声音急切地问：“袁牧师被带走了？袁牧师被带走了？”我强忍着心里的伤痛，尽量用平安的语调说：“是的。”他也同样在惊愕和悲痛中间安慰我说：“袁牧师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我拖着满身的酸痛回到屋里，孩子们都还睡着。我明白相忱肯定是被逮捕了，心里乱糟糟的，左思右想也没有个头绪，虽然相忱和我都确知这一天即将到来，也为这一天做过了预备，但当此刻终于到来之时，我的心里还是感觉空落落的……我跪在床边向神祷告，可口中就如同那干涸的泉眼一般，发不出一点声音；整个人也像是堕入一团团雾霭之间，完全失去了方向。我何等渴望着向神祷告，却又不知要对神说什么，也不知该怎样对神诉说自己的境遇，只有这样茫然无助地跪着……

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门外再次响起汽车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阵敲门声。刚才他们临走时，那个派出所的民警对我说：“你睡觉吧。”另一个人却马上接口说：“等一会儿我们可能还要来。”我听他们的话觉得很奇怪，一个说让我睡觉，另一个又说过一会还要来，意思似乎是说还有事情没办完，两个人的话怎么不一样呢？我从地上站起来，走出来准备去开大门，路过婆婆的屋门，看见婆婆一个人还在桌边坐着。门外站着几个身穿制服的警察。领头的一个对我宣布说：“袁相忱已经被捕了，这是逮捕证。”说完拿出逮捕证举到我面前，我强忍住心头的剧痛，对自己说：“要挺住，一定要挺住！”那人又接着说：“我们现在要在这里彻底搜查！”说罢也不容我回答就一挥手，示意其他的人开始行动。

从门外一下冲进来四个人，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手里拿着工具，分别在礼拜堂和后面的屋子里开始了搜查。福音已经起来了，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院里眼睁睁地看着一群陌生人正在四处乱翻东西。我来不及叫醒还在睡着的孩子们，搜查的人已经在他们的屋里动手了，我急忙跟进去时只见几个先被惊醒的孩子正在推醒还睡着的。我让他们赶快起来，站在墙边，孩子们看着那些人稀里哗啦地把被褥和床板掀翻在地上，几个小一点的已在不住地抹着眼泪，却不敢哭出声。这些警察不仅打开了里外各屋所有的箱柜抽屉，翻出里面的东西，甚至连礼拜堂的长椅子和后面屋里的床都掀了起来，用木棒捣遍了地上的每一块方砖，听见有空洞的声音就把砖撬开，结果才发现那下面不过是下水道的管子。

进来的人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折腾到凌晨四点多，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把“福音堂”的书籍、通讯簿和相忱的来往信件都搬上车带走了。最后，那个领头的人才拿出一张搜查令，对我说：“你觉得我们的搜查合理不合理？如果觉得合理就签个字。”既然已经搜查完了还说什么合理不合理呢？我看也没有看就在那张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四月二十日凌晨四点半，警察结束搜查走了。可这个家已经不像家了。

我先收拾了好床铺让婆婆和孩子们能够接着睡觉，再来回头收拾其他的東西。禮拜堂和家里被翻得凌亂不堪，我一个人，一边整理一边默默地祷告。



第九章

強暴人備過人的時候，

端時

暴令之外

判外邦人

想元下落，禁止強日

象想，元禮之物，消能。

去遠宏書十卷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夜十点半，相忱离开家以后，当夜就从香家园派出所被带到草岚子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里又经过了半年的预审，十月份正式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转到自新路的北京监狱开始服刑。其间除去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曾被送去黑龙江兴凯湖的劳改农场以外，前后共有五年多的时间是在北京监狱。一九六六年，相忱再次被送到黑龙江的监狱，在那里又度过了十三年多，直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得到“假释”，共计是二十一年八个月。

这将近二十二年的时间里，我带着孩子们生活在北京。虽然他在北京监狱时我们能去探望他，多数时候也能和他保持通信，但当时我们对他在监狱里的情形几乎一无所知。相忱回来以后，也很少对家人讲起他在监禁中的生活，我只有把他在教会作见证中所曾讲述过的各个片段慢慢串联起来，加上一些与相忱曾有过同样遭遇的弟兄姊妹的讲述，才逐渐了解到相忱在这将近二十二年里的一些经历。

相忱在被带去派出所的半路上，同车的一个警察忽然问他：“喂，你是什么反革命？”相忱不由得一怔，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反革命，我也没有反革命。”相忱后来告诉我，本来在路上他正想着，叫我去干什么呢？是不是就回不到家里了？听了这个警察的话，他开始明白政府已经把自己的罪名定下了，自己大概已经被捕了。相忱说当他想到自己已经被捕，就后悔刚才出门之前没有去和母亲道个别，也没有去看看孩子们，甚至还应该交待一下“福音堂”的事工。

到了香家园派出所，相忱刚刚坐下，就从屋里出来三个人，都是相忱不认识的。来人中的一个冲着他喝道：“站起来！”相忱就站了起来，那人把手上拿的一张逮捕证朝相忱一晃接着就开始宣读，读完又取出印泥叫相忱在逮捕证上的一个空白处按了手印，马上就有人过来给他戴上手铐。相忱在这一时刻正式被逮捕了。



完成了逮捕的手续，相忱马上被押上一辆汽车拉到西安门草岚子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里，相忱被摘掉手铐，命令蹲在墙角，等着押他来的人和看守所的人办理移交手续。

约莫凌晨两点多钟，相忱被看守带到一间监舍，吩咐他在这里睡觉。相忱看到这间大约只有十多平米的监舍里面已经住了十来个人，每个人都睡在一条很窄的木板上，一动身就会掉下去，看守要相忱也睡在一条这样的空木板上。屋里的人本来都已经睡着了，被开门的声音惊醒后，看到又新进来了一个斯斯文文的中年男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

相忱和衣躺在那块木板上，却根本没有睡意。面对早已在自己的预见之中、却在此时突然临到的这条捆索，相忱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迷惘。不知道家人现在是否知道自己的情况，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孩子将会怎么样，不知道“福音堂”和信徒们还能不能继续聚会礼拜，也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一切都是不知道。他想了很多，但同样也找不出答案，他怀着的是和去往耶路撒冷路上的使徒保罗同样的一颗被深深地捆绑着的心。

第二天早上的七点钟是看守所每天开早饭的时间，有人用一个大筐子把饭菜端进来，每人一个窝头和一碗白菜汤。相忱原本不想吃，可转念想到如果被审问的话还得要有足够的精力来应付，就决定要勉强吃上一点。他近前一看，才发现每个碗上都只有一根筷子，感到很奇怪，心想这怎么能吃呀？但看到别人都是这样狼吞虎咽地吃着，相忱也就拿着那一根筷子，挑起白菜，把汤都喝了，窝头则剩在那里没动。不待相忱说话，早有人把他的窝头抢过去吃掉了。相忱说他直到后来都不明白为什么每人只给一根筷子。

按照当时公安局预审股的规矩，草岚子胡同看守所里的犯人每天早晨洗脸吃饭之后，就要准备被提讯。提讯时点名，被叫到的人就跟着看守走，没有叫到的继续留在监狱里。每天早晨八点钟开始叫号提讯，天天如此。

二十日一早，第一个被提讯的就是相忱。提讯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领路，后面还有一个拿枪的人跟着，相忱走在中间。院子的另一边有一个单独的地方，是专门用来审讯犯人的。相忱被带进一间屋子里，里面已经坐好了三个穿制服的预审员，他们用冰冷的目光把相忱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以后，才让相忱坐到对面的一张硬板凳上，开始问话。

问过姓名、年龄、籍贯之后，相忱首先被问到的就是他写信召集人开会的那件事。坐在中间那个年纪大一些的人先发问：“你有没有写信给其他人，召集他们到史家胡同王明道的会堂里开会？”相忱正在心里默祷：“主啊，求你赐给我当讲的话。”听他们问的是这个事，就点头承认。三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大概是没想到相忱竟会这么痛快地就承认下来了。那人接着又问：“你是什么时候给他们写信的？”相忱想了想，说：“忘记了。”这次审讯的人却不认为相忱是真的忘记了，以为他是在有意抗拒，就喝令他坦白交代，其实他们不知道相忱说的是实话，他确实完全想不起这个细节了。因为相忱一向只专注于传道，向人传福音时随口可以背诵圣经中的许多章节，但他对于生活中的琐事反倒从不挂心，现在硬要他讲清楚三年前的某个细节，一定会令他颇感为难，况且他写那几张明信片的时候根本不会料到有一天会被当成大事翻了出来。之后，他们问相忱是否承认写“黑信”召集人开会的罪行，相忱就照实向他们解释说：“我写的是明信片，连邮递员都能看到上面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可以让人看的，不是‘黑信’。再说，写信让大家来聚一聚，纯属基督徒之间的肢体联系，根本不是罪。”

一听这话，审讯他的那个中年人立刻暴跳如雷，威胁相忱如果不认罪就让他等着瞧。相忱以为他们会动粗，但那几个人只是吓唬了他一通，就放他回监舍去了。

相忱回来以后曾经告诉过我，在所有的审讯中他都是在说他自己的事情，而绝口不提任何其他的人。当然他没有说出这次开会起初是由彭鸿亮提议发起的，明信片也是彭要他写的，这样就有意把写“黑信”完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在那种情况下，“揭发检举”他人是洗脱自己的最好

方法，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方法得以被释放的。“检举”的内容无非就是教会内的事奉和信徒间正常的交通，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可以控告神的儿女的罪名，就只好把这些统统都定为“反动言论”，成为“不是罪行的罪行”。杨津广弟兄在一九五五年被捕前，曾对一位在路上遇到的姓刘的弟兄说：“现在形势很紧张，我每天在禁食为王明道祷告。”不想他的这句话以后就被人检举出来，成为杨弟兄的“反动言论”之一，罪名竟然是“为王明道祷告就是支持王明道”。另一位传道人吴慕迦后来曾写信向杨弟兄认罪，承认自己在监狱中检举过杨弟兄。

相忱回到监舍，同监那些没有被提讯的人都来问他刚才提讯的情形，相忱没有说什么，但那些人却纷纷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训他，有几个老犯人还对相忱说：你要认罪，认了罪就能判得轻。相忱却说：我没犯罪，认什么呢？

相忱被从家里带走后，香家园派出所一位认识我的民警告诉我，被带走的人要是过了两个星期还不回来，就得给草岚子胡同送被子。我明白相忱这次既然被捕就很难再回来，所以一听他这样说，就从家里找出一套厚实的被褥。那位民警还特意提醒我：褥子别做得太宽，一尺八就行。可家里哪有这么窄的褥子啊！只好赶快用现成的褥子改做了一条。我当时不知道相忱在里面睡的是一条宽度仅有六十公分的木板，只能想象他在那里的条件一定相当艰苦，所以没有等到两个星期就把被褥送去了。我把写有相忱名签的被褥送到草岚子胡同的看守所，一走进胡同就有一股阴森森的感觉，门口的人只是冷冷地问过姓名，就把东西收走了。当然这时我是不可能见到他本人的，因为根据政府的规定：被收审的人在长达半年的预审期内是禁止接见家属的。

在接下来的漫长审讯中，大部分讯问都是集中于追究各样事件的枝节上。这样的审问着实令相忱为难，因为他过去实在不曾留意过那些琐碎的事情，这并非是他的记忆力不够好，而是他这么多年以来已经养成了从来不去为这些问题操心的习惯，家里家外大小事情甚至他的个人生活全有我来一手打理，他只管一个心思地传道。所以每次提讯时，预审

员问什么，相忱都如实地回答，但答案却总是“不知道”或“忘了”。人家问他为什么想不起来，他就说自己不习惯记这些事，但那些预审员说想不起来就是“抗拒”，相忱就只好沉默了。三十年后相忱再次回忆他被审问的情景时，甚至连他当时被问过的问题大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们曾要他复述自己的“右派言论”，相忱说：

“我只记得两个观点，一个是宗教政策不平等，另一个是‘三自会’中有人是最不三自的。”

他们就说：“还有一个你为什么老老实实交待？你说过‘老和尚为什么不说话’又是什么意思？”

相忱觉得莫名其妙，他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可预审员却说他这话是指着毛主席说的，相忱说：

“我真的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你们现在定我为‘右派言论’，但开始全是你们让我发言，让我说的，我本来是不发言的。”

预审员说：“不让你发言怎么能了解到你的反革命思想呢？还有人揭发你，你曾说过共产党是‘大红龙’，多次在讲道中煽动信徒不要爱党爱国。”

相忱说：“我讲道的时候，讲的都是圣经上的道理。”

预审员又问到所谓“污蔑‘三自会’领导是‘三朝元老’”的问题。这话倒确实是相忱说过的，他就把自己记得的原话不加隐瞒地对审问的人又说了一遍：

“我确实是说过这话，不过我说的都是事实。王梓仲是公理会的一个牧师，原是美国教派的，日本人来了后又作了‘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负责人，在‘三自会’时又作了副主席。这些事，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是事实就不是罪。”

还有相忱前一年送胡荣德姊妹去广州的事情也被提了出来，罪名是“里通外国”。相忱解释说：

“我只是帮助人而已，并且大家以后并无任何联系。”

预审员对他的回答却是：“这就算是你勾结外国人。”

最令相忱不解的是他们还要他交待在阜成门“福音堂”时与日本牧师的关系。相忱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只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一遍：

“一九四六年开办阜成门‘福音堂’的时候，日本牧师织田金雄已被集中，我是直接从房东那里租的房子，与织田金雄没什么来往，并且织田金雄一九四六年秋就被遣返日本了。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他随一个访华团来到北京，并且去阜成门‘福音堂’参观，‘三自会’还派牧师陪着织田金雄。我都不知道他要来，怎么能说我和他勾结呢？”

问话的人说：“我们说你和日本勾结，是在一九四六年之前。”相忱更是摸不着头脑：“我是一九四五年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才回到北京的，当时我母亲病重，我在家里忙于照顾她。两个月之后，织田金雄就被集中了，我怎么可能有机会和他勾结呢？”

但审问他的人却说：“不管你怎么狡辩，我们认为你有汉奸的嫌疑。”

相忱愕然了。公安局的人强迫相忱承认他们给他列出的那一连串的“罪行”，相忱当然想不通，就坚持说自己没有犯什么罪。最后，他们给相忱下的结论就是：“你对任何问题都不肯老实回答，不肯认罪。回答问题时要不就说‘忘记了’，要不就说‘这不算罪’。你的行为就是公开表示抗拒。”

相忱自己从没提起过他在被审讯时曾受到何等形式的威逼，但审问杨津广弟兄的人不仅连续多日命令他整夜“面壁”，甚至把手枪拍在桌上威胁要枪毙他。更为奇妙的是若干年后，杨弟兄在监狱里竟然遇到了这个审问过他的人，当时那人也因个人生活问题被判刑，杨弟兄质问他：“当初为什么那样逼迫我们？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那人很难为情地会回答他说：“唉，老杨，别说了！就是因为你们太顽固了，必须用点手段压服你们！”

为了惩罚相忱，他们就决定把他交给其他犯人去“教育”，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所谓的“教育”和“反省”指的是监狱中的“犯人斗犯人”，就是有意识地把那些他们认为“抗拒认罪”的人，交由同监舍中其他的犯人施行暴力侵犯，以达到迫使其尽快认罪的目的。实际上，这是一种监狱当局自己不出面，却由他们在背地里所操纵的恶行。相忱说他在监舍里亲眼目睹过的“教育”内容有三种：一是开“批斗会”，众人群起在口头批判直至谩骂，然后被“批判”的对象还要被罚做一些替人叠被子、倒尿盆之类的差事，这是最轻的；再有一种是被勒令盘腿坐在硬木板上“反省”，至少要一动不动地坐上一个小时，有时甚至要这样坐上一夜。坐的人两腿麻木酸痛得失去了知觉，时间长了还会不由自主地从板子上摔下来，但只要那些“帮助”你的人不点头，你就还得爬起来再接着坐。最严厉的一种被叫做“坐飞机”，就是要被“教育”的人低头弯腰地站着，同时还要把他的两臂从身后使劲往上拽。这种体罚最令被斗争的人痛苦不堪。

相忱刚进来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能听见从隔壁监舍里传出来的惨叫声，看守虽然听见但从来不会去管，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授意的。现在他自己也成了这个监舍的“重点帮助对象”，监狱的领导虽曾多次明说或暗示其他犯人可以对他实行更加严厉的“帮助”，但神却保守他，没有让他在这时受到太大的伤害，所受过最严重的“帮助”也就是被勒令盘腿坐在木板上。相忱后来在教会做过这个见证，说他自己对此也颇感意外，相信唯有出于神的保守。

看守所本是个龙蛇混杂的地方，所以相忱平时在监舍里很少说话。没过多久，相忱发现和他关在一起的人当中有一个小伙子是天主教的信徒，只有二十多岁，河南人，也是因为不肯参加天主教爱国委员会而被抓的。相忱对这个小伙子有一份很自然的亲切感，见他每次被提讯前都紧张得惶惶不安，回来也是独自坐在一边唉声叹气，就主动过去安慰他。相忱问了小伙子的情况，得知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信徒，并不是教会的负责人，就告诉他可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你这么年轻，他们了解了解就会放了你的。还鼓励他说：“其实我和你一样，我们同是在为主的义受逼

迫，不过就是信仰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神只是用这个试炼来监察我们对他的忠心。”这个小伙子在被提讯过几次后，也从审讯他的人的口气中觉察出自己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情绪就渐渐平稳下来，开始筹划出狱后的事情。相忱怕他担心出去以后没有回家的路费，就告诉他：“你出去后如果有困难的话，就上阜成门‘福音堂’找我的内人。她姓梁，你告诉她你是天主教徒，她一定会帮助你的。你可以从我内人那里拿钱作路费回家。”相忱还给他讲了基督教与天主教在信仰上的区别，劝他要认真思想。不料到这个小伙子第二天就把这些都汇报给管理犯人的队长了，说相忱拉拢他，在监狱里还继续传道。于是，相忱又多了一条新的罪行——气焰嚣张，在监狱里继续“反革命”，而那个小伙子则因揭发有功，不几天就被释放了。

尽管相忱开始只和那个小伙子说话，但后来还是被出卖了，所以就更加谨慎自己的口舌。他一般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思想或是默祷。令他最为挂念的还是“福音堂”，他在想着教会是否还在正常聚会，想着同工们是否还能坚持事奉，也担心他们会因自己受到牵连。相忱并不知道，在他走后的第二天早上还有三十多位信徒来参加主日聚会，大家见不到相忱都问我袁牧师去哪了，我只好告诉他们相忱被派出所叫走了，我也不晓得是什么罪名。因为没有人讲道，大家就在一起祷告唱诗，但是“福音堂”正式的聚会从这天起就被迫停止了，信徒和同工却再没有人被捕。

在面对眼前生与死的抉择之际，相忱所承受的最大的试炼还是来自家庭的压力。我听相忱讲过，在关押他的监舍的高处，有一个小小的窗户，窗外就是居民住的地方，他虽然看不到外边，但是每到傍晚，小孩子们在街上嬉闹的声音就从那扇小窗传进来，相忱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我们的六个孩子，担心他们会因自己受牵连而被人欺负，担心他们的生活问题如何解决，担心他们将来的成长和教育……还有看到监狱的饭菜时，就想家，想我做的一手好菜……孩子的嬉闹和饭菜的香气是一个家庭的象征，可是他现在却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了。相忱说，当这些对家庭的

思念涌上心头的时候，他就在这矛盾中变得犹豫——母亲需要儿子的奉养，妻子需要丈夫的照顾，孩子们需要父亲的呵护；然而，一面是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境，一面却是监狱的高墙铁门……每次当相忱在这样的犹豫，以至濒于软弱中，向主切切祷告时，总有主的话临到他：“**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加福音 9：62）他也每每在神的话语中蒙神的保守和安慰，得以重新在神的面前站立。

## 二

相忱被带走的第二天清晨，我放下已经忙碌了一夜的活计，离开里外仍旧一片凌乱不堪的家，按着头一天晚上街道会议的部署，照常出来和大家一起参加打麻雀。

派出所和街道的干部都已经知道了“福音堂”刚刚发生的事，所以大家对我的出现很感到意外。因为在这之前，街道也有人因为“反革命”被逮捕，他们的家人出于羞耻和惧怕而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也不敢和人接触。但我相信相忱的被捕乃是为了主的缘故，我没有什么可羞耻和惧怕的，虽是一夜没有合眼，心里也依旧没有理出个头绪，但别人都晓得我是基督徒，我就理当显出从主而来的刚强。我默默地向主祈求：“主啊，唯有你能帮助我！求你帮助我！”周围的人私下议论，这个说：“家里被翻得那么乱，她也不拾掇，就出来顾着工作，还真不错。”那个说：“梁主任比别人还真不一样。”我没什么可回答的，就干脆不吭声，装作没听见。

我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担任街道主任，主要是负责妇女的工作。因为在旧传统中，妇女大多没有受过教育，只在家里操持家务，所以新政府就号召妇女学习文化，参加社会劳动。办事处的人看到我有文化，先是邀请我作妇女夜校的教员，后又要我作街道主任。当初作这个主任时，我问过相忱，他看我在家里这一大摊子已经够忙的了，就说：“由你吧，你要能做得过来就作吧。”这件事我自己已经反复考虑过，就将我的想法告诉相忱：“我觉得，我应该在人群中为主发光，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传福



音。总之，要做就要做好，要不我就不做。”相忱听了这话，点头说：“对，你这个见解是对的。”作为街道主任，我挨家挨户地劝说妇女们参加扫盲，几年下来，我在妇女夜校的工作得到了西城区长亲自颁发的“优秀教员”奖状，所负担的街道也从开始的一个，扩展到香家园办事处所辖二十五个街道中的十二个，更有许多妇女因此走进“福音堂”来听道。相忱走后，办事处并没有停止我街道主任的工作，在工作中也没有对我另眼看待。

相忱走后没过两三天，这事就在街坊邻里之间传开了，说得简直是天花乱坠，说相忱是日本特务，说那天晚上从“福音堂”搜出了电台和密码本等等，可当时警察们明明只拿走了一大包圣经和属灵书籍而已。最离奇的还要算他们竟然把我说成是日本人。福声放学回来告诉我，他看见外面的墙上新帖了很多告示，说相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

以前在“福音堂”聚会的人，这时也不敢来看望我们，只能在门口经过时向里面望一望，或者在路上向我点点头，偶尔有人在门外停留一下，问候我几句就匆忙离开。说心里话我一点儿不怪他们，因为我们如果说话交通，就会被认定我们又是在搞串联什么的，对我对他们都不好。还有人看见我走过来，就马上躲到路的另一边去，或者故意扭头装作看不见，甚至在暗中监视我们一家，我觉得这也是必然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认识就不认识吧，只要主认识我就行了。以后凡是碰到这样的事，我就都往神那里想，自己就平安了，心里既不感到难受也不存着怨恨。

有一位姊妹，年纪比我略大一点，也是个传道人的后代，很热心的时候曾为王明道先生抄过大字圣经，和我们也有来往，但后来她却加入了“三自会”。王先生为此气得直拍桌子，相忱也曾当面劝说过她，不要加入“三自会”。相忱被捕后，这位姊妹生怕受到牵连，竟不敢承认认识我们。当被人问到：“你认识袁相忱吗？”她回答：“袁相忱啊……我听说过。”别人又问她：“那你认识梁惠珍吗？”她才吞吞吐吐地说：“梁惠珍……我认识。”时隔四十年后，再有人问起她“你认识袁相忱吗”的时候，这位姊妹才终于说出：“认识，但袁先生因为我去‘三自会’，就不理我了。”同样的问题，却有截然不同的答案，从中不难反映出在不同的环境中人

们的心理变化。

然而，神也让我看到他在这看似充满黑暗绝望的世界中，为自己所留下的七千人，是属于他的真选民，“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是未曾向巴力亲嘴的”（列王记上 19：18），是真正寻求主名的。一天上午，盲人陈邦恒弟兄忽然来了，一进门就急切地四下寻找，他一辨认出我的声音就冲过来，兴奋地说：“袁牧师回来了吗？袁牧师回来了吗？昨天晚上我梦见袁牧师回来了，又站在讲台上讲道了，所以我今天就请假赶来了！我特别高兴！”我被他说得心头一热，但马上又陷入更深的凄楚之中。陈弟兄看不到我的表情变化，还在继续说着：“我特别高兴，我的牧师回来啦！我的牧师回来啦！”望着他脸上那孩童般灿烂的笑容，我实在不忍心打断他的美梦……过了一会儿，我才轻轻地说道：“没有回来。”陈弟兄愣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泪水霎时充满了眼眶，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仿佛整个人都被冻结了，只有嘴唇还在无声地翕动着，半晌才喃喃地说：“我……做梦……梦见……袁牧师讲道了……”神既拣选了这瞎眼的，就叫那些有眼却不能看见的抱愧；拣选了这愚拙的，就叫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蒙羞。

在当时那般景况下，除了“三自会”之外，已经不再有教会公开存在了。坚持真理的信徒也大多已经和相忱一道被捕了，包括王明道先生夫妇和杨津广弟兄也在这时第二次被捕，其余没有被捕的也有不少已经向政府妥协了。我们熟悉并且仍然能够信任的人中，只剩下王克忱先生一位了。王先生不仅是王明道先生共事多年的重要同工，而且担任着基督徒会堂的执事，可以在会堂主礼圣餐。他因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腰部严重弯曲，神就以此保守他没有遭到逮捕。我去王先生家里告诉他相忱被捕的消息，没等我的话说完，王先生就拖着病残的腰颤巍巍地跪下去，流着热泪，为相忱不住地祷告，还勉励我：即使在患难中，神也必不撇弃我们。过了几天，王克忱先生又把我找去，给我一位弟兄在美国的地址，要我和他通信联系，以后这位弟兄就常常为我们寄来一些挂面之类的食品。

由于相忱作传道人，我们一家在十多年间都是完全过着信心的生活，加之“福音堂”的奉献也只够维持教会的基本开支，故而我们从来不曾有过任何积蓄。可相忱一走，“福音堂”也不能再开了，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年幼的孩子们，既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还要继续负担每月那三百斤小米的房租，这一家八口人的生活立刻陷入窘境。我们先是靠着变卖一些衣物等度过了最初的一段日子，后来全家人就一起动手做一些零工来维持生活，我们糊过纸盒，剥过云母片，拆过棉纱，还挑过榨菜丝里筋，以此来换取一些微薄的收入。我自己是夜以继日不停地做，孩子们都很懂事，一句话也不说，放学回来也都动手和我一起做。一天，过去曾在“福音堂”聚会的盲人张永和弟兄独自一人背着一个大麻袋来了，里面装的全是橡胶垫圈。张弟兄告诉我用剪子剪去垫圈边缘的毛刺，这样加工一个可以得一分钱，他过几天再来取。果然过了几天，他又背来一袋子新的，把我们已经加工好的收走。原来，外国宣教差会撤走以后，他们所在的那所盲人学校被改成一所福利橡胶厂，他是从厂子里把自己的活拿来给我们做，所得的计件工费他也全数交给我，自己一分钱也不留。我几乎无法想象，像张弟兄这样一位双目失明的人，是靠着怎么样的力量，才能背着这么重的大麻袋，还要往返这么远的路，来帮助我们。

倘若仅仅是身体上的劳乏，尚不能使我感到压迫，那么心灵上的空虚才成为我这时真正难以承受的重担。从前相忱是这一家的主心骨，也是我的主心骨，可现在他走了，全无一点音讯，而且我的心告诉我相忱这一走恐怕就再难回来了，这老老小小八口人的生活全都交给了我，我该怎么办？倘若先知还可以逃到旷野去躲避，那么我又能去哪里呢？在人面前，我没有哭泣过，因为我知道我需要刚强，眼泪不能救我，更不能搭救身在圈套中的相忱，但我却被那数不尽的烦恼和忧虑所重重包围着，只有在祷告中向神流泪。每天晚上，我都一个人跪在床上祷告，可我又实在想不通，“神啊，我的丈夫为你传道，你怎么能让他到了这个地步啊？”我也实在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我在祷告中跟神讲理，我对神说：“神啊，他是为你的缘故被捕入狱的，这八口人的生活，这个担子放在我的身上，实在是太重了，我实在是担不起！”就这样，一连好多天，我的

心里没有丝毫平安，总是不住地追问主：“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总是不住地向主抱怨：“这么难担的担子，我实在担不起了！我实在担不起了！”可我越是这样跟神讲理，心里的担子就越发加重，一直在心中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天又一天过去了，相忱走后的两个月里，我就是这样不断地与神摔跤当中，蹒跚地走过来的。前途就好像是一片漆黑。

直到有一天，我正在祷告时，一个声音忽然临到我，“这是出于我！”这声音好像是响起在我的耳朵里，又真实地响在我的心坎里，这是神在向我说话！我顿时得着了安慰，刚刚还在烦躁不安的心也顿时安静下来；“这是出于我！”这声音是我以前不曾听到过的，可我的心里却分明认识这声音，这是神在向我说话！“主啊！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从此我依靠主的心重新被坚定，感觉与主格外亲密；“这是出于我！”这声音仿佛领我进入一片奇妙的大光之中，又仿佛带给我生生不息的力量，这是神在向我说话！那曾经重重地压在我身上的担子，此刻已经全然脱落了：

“主啊！若是出于你，就求你保守我和我家里的每一个人，不要从我和孩子们的身上羞辱你的名！”

我的心降伏在神的面前，心甘情愿地接受他在我们身上的雕刻。相忱离家的这二十一年八个月中，主的话语就是我的生命，更是喂养我们的灵粮，我们就是这样真实地生活在主的话语中。

现实的困难依然摆在我的眼前，虽然我竭力地精打细算，每顿饭的粮米都用秤称过了来吃，但家里仅有的一点存粮还是很快就如同基立溪的水一样干涸了。一天吃过了晚饭，我刷完了碗，看到那存粮食的小缸已经空了，婆婆这时也走过来，看见了就对我说：“明天我到我姑娘家去躲躲饥荒吧。我太拖累你了，我儿子不在家，我还得吃你……我太不落忍了……我给你添麻烦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但还是对婆婆说：“咱们有主啊！您吃的是主的，不是吃您儿媳妇的！”婆婆一边抹着眼角，一边不住地点着头说：“那我就哪儿也不去了！我儿子在家，我也不是吃酒

席；我儿子走了，你还管着我吃，我就知足了！我哪儿也不去了！”婆婆原来抱养的那个女孩，这时早已成家了，虽然她和她的丈夫都受过洗，但自从相忱被捕后，她和丈夫一次也没有再登过我们的门。

晚上，大家都睡了，我独自一人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婆婆年纪大了，饿不得；孩子们都还小，也饿不得，可家里一丁点粮食也没有了……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明天我该怎么办？我唯有把我的难处向神倾诉。不知静默了多久，那个祈盼的声音又一次在我心头响起，“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马太福音 6：26）这明显不是从我自己里头来的声音，我也不知晓这声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但它却是如此的真实，让我的耳朵能够听到它，更让我的心能够触摸它。我的心深深地被这话语感动，自然地心里生出回应：“主啊！是的，我相信你！”这样的经文，以前在读经时也曾无数次地看到过，现在听到的时候却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亲身体会到神的话语是可以依靠的，好像带着能力融进我的生命里：“主啊！求你看顾我！”我把自己心中的重担交托在主的手中，也把一家人全然交托在主的手中：

“主啊！如果明天你没有给我们预备粮食，我们就喝点暖壶里的水！”

第二天一早还不到六点钟，就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外面站着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她看着我，问：

“你家是姓袁吗？”

我回答说是，她又问：“是袁弟兄家吗？”我也回答说是。

看来这一定是位主里的姊妹，要知道当时敢于以“弟兄”来称呼一个被捕的人，是需要何等的勇气。我问她：

“请问您怎么称呼？”

老姊妹笑了笑，说：“你让我找得好苦啊！这几天，圣灵一直催逼着我到你家里来！”我请她进来坐，她却不肯，说着把手里握着的一个小纸

包塞给我，就转身走了。

目送这位不知名的老姊妹走远了，我回到屋里，打开小纸包一看，里面竟是五十元钱！在那个年代，这五十元钱足够我们一家八口人两个月的粮食钱啊！我捧着这钱，禁不住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主啊！你是信实的主！你从不误事，而我却是如此小信的人啊！”

神就是这样用他奇妙的恩典保守我们，也感动弟兄姊妹的爱心来帮助我们，虽然一家人几乎每天都是在以稀粥和窝头度日，却从来没有断过粮，也没有拖欠过房租。

经历过了相枕离家后最初两个月的争战与软弱，我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被重新坚固。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真实，又是如此的满有力量，不仅是我口中时时诵读的，更是我在患难中的安慰和缺乏时的依靠。

那时，我最常读的是《诗篇》第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旁；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脂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中描写的，也是我个人生命和生活中无比真实的经历与见证。

这一年的九月份，也就是相忱被捕五个月后，派出所的人来找我，说：“国家要用这个房子办工厂。再说，你们一家人没有收入，住着这么大的房子，也挺费劲的。”我说：“要用可以，正好我也住不了这么大的房子。”于是，他们就给我找了对面白塔寺里西夹道的两间房子。白塔寺这时也已不再作为寺庙，而是全部被腾出来改成了居民住宅，寺里原来的喇嘛也被赶走了。分给我的这两间房子原来是白塔寺的西配殿，在大殿的中间打了两个隔栅分成了三间，后来他们又说：“你们家没有男人，挤在一起怕什么？”就叫我再让出一间来，我也同意了。这样，我们全家老少八口人就住在西配殿最北边，一间十九平方米的屋子里。好在房租也从两间房的十九元减到十二元，我的负担也轻了不少。这间房子质量很好，我们住了四十多年，从没漏过雨。这都是神的恩典。

搬家以后，“福音堂”的风琴和几十张大椅子没有地方存放了，这些物品本来是属于教会的财产，我不应该私自据为己有，可又不知把它们送到哪里才合适。思考再三，我决定把它们交由“三自会”来接收。为此我找到位于米市大街原圣经公会的北京市“三自会”，向那里的人说明了来意，负责财务的工作人员当着我的面翻遍了所有的登记簿，也没有找到这笔物品的记录，我就向她解释说：“我们是阜成门‘福音堂’的，不是属于‘三自会’的。我们自己的东西，没有登记，在你这儿没有账。但我要搬家，这些东西没法搁，交给你们吧。”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位已经当上了北京市“三自会”主席的王梓仲一直站在工作人员的身后看着，这时他发话说：“拉过来吧。”第二天，“三自会”派来的汽车把风琴、椅子还有大炉子等都拉走了。过了两天，“三自会”又派人来“福音堂”，问我：“你们还有什么东西呀？”我回答说：“东西我都交了，没有了。”我清楚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所以我全都交出去了，连一条椅子也没留。那人看看堂里确实已经空荡荡的了，没说什么就走了。听说后来这些东西都被转给了“少年之家”。

搬家那天，我从街道借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可我不会蹬，就只好推着。好在两个地点相距不远，斜穿过大街就到了。派出所还找了一个“积

极分子”，说是来帮忙，其实是想趁机察看我家里是不是还藏着什么东西。说来那天夜里搜查的人并没有拿走我们的生活用品，可本来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东西，三张铁床在“大炼钢铁”的时候就捐掉了，一些稍微值钱的东西当初都变卖了，教会的物品也给“三自会”拉走了，这时带过来的就只剩下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一个五屉柜和几只旧衣箱，再有的就是锅碗瓢盆这些家什了。那位“积极分子”把我的东西查了一遍，我看在眼里却不理他，只是由着他查，最后大概他也觉得失望了，说：“你就这点东西啊？”可就是这么一点点家当，还在卸车时不小心把家里唯一的那只水缸打破了。

我用砖头垒起来作床脚，上面铺上木板，做成一铺连山炕，我带着孩子们就睡在上面。另外用教会原来的一块旧黑板，在屋子的一边给婆婆单独搭了一张小床。我们全家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开始了新的生活。

### 三

在长达半年的审讯期里，相忱过的是一种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没有任何家人的消息，没有任何教会的消息，也没有任何关于时事的消息。有的只是不停地被勒令回忆和交待，不停地被别人揭发，又在不停地被强迫揭发他人。相忱只好干脆对审问他的人说：“我的记忆力不好，自己的事都记不清，能记清的我都已经说了。至于别人的事情，你还是去问别人好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同一监舍的人，有不少比他迟关进来的都一个个地结案了，唯有相忱一个人总是拖着结不了案。之所以结不了案，是因为他们认为相忱始终拒不认罪，而不认罪就不能结案。尽管那些审讯相忱的人一次又一次地严厉警告他：“抗拒是要从严的！”可相忱却坚持说：“我没有不认罪，因为那些根本就不是罪。我也没有抗拒，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直到一九五八年的十月，相忱被捕整整半年了，已经到了结案的最后期限。法院的人给相忱拿来一份承认自己“罪行”的供词，要他另外照抄一份，相忱明白，这就表示政府终于要为自己结案了。其实个人认罪



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定罪量刑和审理程序上当然是无法可依，全凭主观的决定和形势的左右。抄写过这份“供词”后，相忱被转到自新路的北京监狱，在那里一边劳动，一边等待着法院的最后判决。

这一年的十一月份，我们从“福音堂”搬到白塔寺已经有一个来月了，天也已经渐渐地冷了。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就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我见这时大约才有六点钟的样子，就连忙起身开门，门外是两位穿着蓝色制服的陌生人。来人问我：“你姓梁吗？是从阜成门大街一百六十号搬过来的吗？是袁相忱的家属吗？”我口里连连答是，心里明白大概是相忱有消息了。那两个人说：“我们是从法院来的。袁相忱的判决书已经下来了，我念，你听着，最后我会问你听明白了没有。”说着他们就开始念了起来。判决书前面的内容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当念到“判处无期徒刑”时，我的心里如同被什么沉重的东西猛地撞了一下。尽管除了“判处无期徒刑”这一句以外，判决书中其他的内容我都不记得了，但他们最后问我的时候，我还是回答：“听明白了。”法院的人就把相忱的判决书交给我，又按着例行公事告知我：“如果你要上诉的话，还有机会，十天之内你可以向高级法院上诉。”，我想也没想，就回答说：“我不上诉！”法院的人说：“那好吧。”他们还通知我，相忱现在被转到北京监狱，因为已经过了预审期，可以每月一次接见家属，到时相忱会从监狱中发明信片给家里，我们按着其上写的日期去就可以接见。说完就走了。

等法院的人走后，我才仔细又看了一遍判决书，上面一共列出相忱的七条罪状：第一，“右派言论”；第二，反对、破坏“三自爱国运动”，污蔑“三自会”领导人是“三朝元老”；第三，策划开“黑会”，对抗政治学习；第四，“污蔑政府”，说信仰没有自由，与回教不平等；第五，是在监狱里继续“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第六，是有“汉奸嫌疑”；第七，是“里通外国”。有位以前曾在“福音堂”聚会的信徒听说了相忱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就劝我说：“这样的判决太重了，你为什么不上诉呢？”我回答说：“这一切都是出于主。我丈夫又不是偷又不是抢，这些事情的发

生都是主所许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想主动打官司，既然判的是无期徒刑，我也只有认同了。”

比我早几天，相忱在北京监狱也接到了同样的这份判决书。当时他正在干活，法院来的人叫到他的名字，他就站起来听他们念判决。先是宣布了他的罪状，然后是“依法判处无期徒刑”。相忱只记得判决书中特别强调，他是属于“反革命的首恶分子”，加上在审讯期间“态度恶劣”和“抗拒交待”，所以要“从严处罚”，至于那上面其他的具体内容，他早就忘记了。法院的人也告诉他，如果不服判决，十天之内可以上诉，相忱对此的回答也是：“我不上诉。因为基督徒从来不主动打官司。”在相忱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同他一起在监狱工厂劳动的犯人，每天都有人接到法院的判决书，他们中有的哭，有的笑，有不少被判了“无期”一类重刑的人，一听到自己的审判结果就当场晕倒了，但相忱却没有有什么异样的感觉。相忱后来曾说：他当初听到宣读别的犯人的判决书时，就用别人的罪名和判决来估算过他自己可能的刑期。他没有想到会判处他无期徒刑，但当真的被判了无期他也没有感到难过。尽管被定罪判刑已经成了残酷的现实，相忱依然坚持认为他的问题不过就是信仰上的问题，自己没有犯罪，更没有“反革命”。文革中间，大儿子福音工作的首都钢铁公司曾派专人先后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和自新路北京监狱调查过相忱的问题，那里的人都说：“其实袁相忱这个人没什么事，就是宗教信仰的问题，他老是不悔改，问题就没法解决。”

依靠神的保守，虽然经历过火的试炼，相忱丝毫没有改变初衷，他把自己作为活祭完完全全地献在神的祭坛上，相信自己的未来在神的手里，是永生。被判无期徒刑后，相忱觉得自己没有日子回家了，必定是死在狱里，为主殉道了。他连牙也不刷了，从此二十多年没刷过牙，只预备着随时回到主那里去了。相忱根本没有料想到，主会如此奇妙地带领他平安脱离这看似无望的枷锁，而且回来时牙齿竟然还挺好的。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望眼欲穿的一家人终于盼到了相忱从北京监狱发出的第一封明信片，上面写着本月探监的日期。看着亲人熟悉的笔迹，

我的眼泪忍不住就往下掉，可我又怕婆婆和孩子们看见了心里会更难受，就强忍着。因为监狱规定，每次只允许三名亲属探监，我就决定这次先和婆婆带小女儿爱湖一起去。相忱走了以后，孩子们都很懂事，从不向我问什么，只有最小的爱湖想爸爸的时候就哭，老是一个劲儿地问我：

“我爸爸到哪去了？我爸爸到哪去了？”

我怕孩子幼小的心灵不能明白眼前的现实，就告诉她说爸爸去学习，于是她就天天眼巴巴地盼着爸爸早点学习完了就回来，好带她到街对面的小店吃炒肝。爱湖本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过了很久还见不到爸爸回来，又开始追问我：

“我爸爸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学习这么久还不回来？别人的爸爸为什么总在家里，我爸爸为什么要出去？”

每到这时，我只能忍着自己心里的泪水，强作欢颜来安慰孩子。爱湖非常喜欢爸爸，每天晚上都要让爸爸给她讲故事；相忱也最疼爱这个最小的女儿，每天晚上都把她抱在怀里，一边给她讲圣经故事，一边摇着她入睡，等她睡熟了才轻轻地放回到床上。

探视那天是一个星期日，我一大早起来，赶着到街上买了一些相忱最爱吃的点心，就带着婆婆和爱湖一起坐公共汽车来自新路。我们来到监狱外面，小女儿好奇地问我：

“妈妈，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有这么高的墙呀？”

我说：“这是爸爸学习的地方。”走近跟前，孩子看见了高高的岗楼，顶上还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就有些害怕，我就把她抱起来走。在大门外，我把相忱寄来的那张明信片交给站岗的士兵，那士兵看过后，就让我们三人从一扇黑色的小门进去。进到监狱里面，才发现一个很大的空场上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许多人，老老少少的，都是来等着探监的。因为探监的人太多，就只能分批进去，每一批半个小时。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在凛冽的寒风里排着队，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才轮到我们去。

进到接见的屋里，就有人把我手里的明信片收去，指示我们祖孙三人坐在一张铁皮桌子后面等着。监狱的狱警在里面的一个门边高声叫着各人的名字，被叫到的人在门外答一声到，然后依次从门口进来。我们都睁大眼睛望着那扇小门，当听见叫到相忱的名字时，我的心一下子被揪得紧紧的。只见一个身穿蓝色囚服，身材消瘦的人，低着头走了进来，和其他进来的人一样，先向那个念名字的人鞠一个躬，才朝着我们这边抬起头来。是相忱，他的头发已经被剃成了刺眼的光头，面孔更显消瘦，脚步也有些摇晃，好像没有力气似的。我感到自己的鼻子开始发酸，全身都在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相忱也看到了我们，快步走过来，坐在桌子的对面。

相忱、婆婆和我，三个人几乎是同时伸出手去，紧紧地握在一处。一旁的小爱湖眨巴着眼睛看了半天，终于认出面前这个光头的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爸爸，高兴地一下子喊出了声。相忱轻轻地爱抚着小女儿的脸庞，大家一时抑制不住激动，竟都不知该说什么。隔了一会儿，还是婆婆先说话，她告诉儿子：

“家里现在一切都好，你不用惦记着。你在这里要吃好，穿暖，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我强忍住自己的眼泪，等婆婆说完了，才对相忱说：

“你在这里一定要多保重，自己要学会照顾自己。我给你带了些衣服和吃的东西，有什么需要，就写信告诉我。”

相忱说：“我在这里很平安，你们别惦记着。肉体受点苦没什么关系，我现在精神很喜乐，肉体是算不得什么的，最要紧的是心里好受。我现在心里很平安，分配我在毛巾厂工作，不是很累，你们就放心好了。”

我本想借着这个机会告诉相忱一些外面的消息，因为他一定在关心着自己被捕这半年多来教会所处的光景，但那个站在相忱背后监督我们谈话的看守，使我不得不放下了这个念头，只讲一些家里的情况。我告诉相忱：我们已经搬到了白塔寺里的西配殿；老大福音小学毕业了，考

上了首钢，现在钢铁学院代培学习，三年之后就可以正式上班了；还有我自己也在房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家里生活没有问题。相忱关心地问我：“你在建筑单位工作会不会很累呀？不要累坏了身体！”

我说：“没关系的，我没觉得太累！你不用担心。”边说着，边拿出带来的几包点心递给相忱。

相忱却说：“监狱里规定不让带吃的东西，这些东西还是你们拿回去吃吧。”接着又对婆婆说道：“妈，我不能在您身边孝顺，您一定要多保重自己！”

婆婆说：“你放心。我和你在的时候一样，惠珍对我很好。你倒是要多保重自己啊！”趁着那个看守在注意相忱和婆婆的说话，我从纸包里取出两块点心藏在手里，贴着桌面往前一推，悄无声息地把它们塞进相忱手中。虽然这么一两块点心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能让相忱多吃上一点也是好的，我也高兴。突然，一阵哨音响起，半个小时的接见结束了。看着相忱和其他人排成一队，同进来时一样地低着头走了出去，我的心都要碎了。

这是相隔半年多后第一次见到相忱，他的身体是瘦了，但精神还很好，更重要的是他对神的信心依然坚固。从此，监狱每个月探视的日子，我一次不落地都去，每次去时都带上一个不同的孩子，这样就能让相忱见到所有的孩子。

一个探视的日子，我在另一队等候接见的队伍中看到了相忱的老师萧安娜太太。萧太太的大女儿萧语中因为参加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事工，当时也被判刑，关押在这所监狱里。相忱后来回忆起他在北京监狱中也曾看见过萧语中。因为监狱规定，犯人包括干活和吃饭在内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严格限制在各自监区的范围内，不同监区的人平时几乎没有机会见面，但是监狱里每月有一个休息日，是犯人们专门洗澡、洗衣服的时间，就是在这时，相忱远远地看到萧语中和王太太端着洗脸盆站在等待盥洗的女犯队列中。另外一个机会是监狱放电影的时间。那时监狱为了

“配合犯人的思想改造”，每周给他们放映一次“革命题材”的电影。放电影的地点在监狱的操场上，前面露天挂起一大块白布，犯人就集体坐在下面看。一九五九年有一次看电影的时候，相忱正拿着马扎跟队往前走，忽然看见王明道先生坐在那里，到这时相忱才知道王先生又被捕了。王先生也认出了相忱，但出于监狱规定不允许犯人之间自由交谈，他们两人只能彼此对视了一眼，相忱仰头望天，以示“要仰望主”；王先生随之也向上看，意思也是“要仰望主”，两个人都读懂了对方的心意，互相点点头。相忱和张周新弟兄在“放茅”中也曾有过一次很奇妙的碰面。监狱里犯人上厕所，都要按着房间号排着队逐个进去，一个房间的都出来了，再轮到下一个房间的人进去，这就是所说的“放茅”。“放茅”时，厕所里面已经解完了手的人，出来之前先要喊：“XXXX号报告。”后面的人才能接着进去。一天，相忱正和同监舍的十几个人在外面等着，忽然听到有人喊：“十三号报告。”相忱一听这声音就想：难道这么巧，正碰上张周新了？因为相忱一九三八年从远东神学院毕业前后，有两年多的时间在天津圣会所与张周新同工过，对张弟兄那浓重的福建口音相当熟悉，况且在北京监狱中有这么重的南方口音的人并不多。相忱注意看时，果然出来的正是张周新弟兄。两人见面都愣住了，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对方，相忱向张弟兄点点头，张弟兄在走过相忱身旁时的一瞬间，故意用胳膊轻轻地撞了相忱一下，顺手塞给相忱一卷手纸，然后就匆匆地离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得以遇上主内的肢体，非常难得，所以印象就异常的深刻。张周新弟兄和他的妻子陈善理大夫以后都在监禁中为主殉道了。

由于政府当时也在广泛开展打击“一贯道”等会道门的运动，所以在一般人眼中，根本分不清什么是迷信，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把基督教也划入迷信当中。一天，监狱的管教干部拿给相忱一些宣传“破除封建迷信”的小册子，对他说：“你要好好看看这些书，这些书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相忱看了一会儿，就把它们还给那位干部，说：

“我的信仰不属于这些迷信的东西，所以我不看。”

相忱的这番话着实令所有在场的人大为震惊，在监狱里管教干部让犯人们干什么，大家至少都要唯唯诺诺，照章奉行，绝对没有人敢于轻易顶撞他们。没想到那个干部听了相忱的话，思索了一下，就说：“你既然不是这些迷信的范围，那你一定是个和尚了？”相忱说：

“我不是中国的和尚，如果要算和尚的话，也是个‘洋和尚’。”

一句话逗得干部哈哈大笑起来，居然没有继续追究相忱什么了。从那以后，“洋和尚”这个绰号就一传十、十传百地在监狱里叫开了。这个绰号甚至还和他一起被带到了东北的监狱里，一提起“洋和尚”，人人都知道那说的就是相忱。当时，监狱里很多人都盘算着怎样争取“立功”，好能得到减刑，而“立功”的最直接方法就是去“检举揭发”他人。相忱看着有好几个人被判了十多年的刑，但靠着屡屡“揭发”有功，就多次获得减刑。在这种情况下，相忱更加注意说话的谨慎，一般不与别人多说话。也可能是相忱被判的无期已经是最高刑期的缘故，那些急于“立功”的人并没有找上他这个寡言少语的“洋和尚”。相忱自己当然更没有想要“立功”和减刑的念头，从听到自己判决书的那一刻起，相忱唯一的想法就是：我老死在监狱里就算了，只求神保守我不论在何处，都持守他的道。

一九六〇年夏天，北京监狱里的犯人越来越多，已经人满为患，政府就决定把二十年徒刑以上的重刑犯都遣送到黑龙江省，在那里劳动改造。当年的夏末，相忱和其他犯人一起被押送到黑龙江省东部的兴凯湖监狱服刑。火车起行的那天，犯人们都坐在车厢里，车厢两头都有人架着机关枪负责看守。车到沈阳时正赶上是夜间，相忱就感觉到外面的天气变冷了，等到了黑龙江，还没下火车，看守就让大家戴上刚刚分发下去的大皮帽，穿上厚棉袄棉裤和棉鞋毡袜，冬天的装备已经全副武装在身上了。下了火车，相忱他们被押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十多辆军用大卡车，送往监狱。汽车走过大街，小孩子们都跑出来看热闹，边看边拍着手喊：“你们都是‘反革命’！你们都是‘反革命’！”

相忱他们要去的兴凯湖位于中苏边界，隔湖与苏联相望。那一带原本是一块广袤的荒原，刚到达时，犯人和看守都只有先住在一座座帐篷

里，帐篷外面用一道道铁丝网围住，又有持枪的人四面把守，这就成了临时的监狱。由于在东北住帐篷根本无法过冬，所以犯人们到了之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先要烧砖盖房子，也就是犯人要动手为他们自己盖监狱。犯人中的一部分被派去烧砖，其余的人就用刚烧好的砖砌围墙，砌起围墙后又给看守盖住房，最后才是为自己盖监舍。每个监舍有五十米长，一条南北的大通炕，当中间有个用砖头砌成的火炉，冬季时火炉里烧木柴或煤炭取暖。监舍里非常的拥挤，每个人睡觉的地方都只有那么窄窄的一条，翻身时就会碰到边上的人。伙食上的恶劣更是难以想象，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季，只有在每月一次的“改善生活”时才能吃上白面馒头，一个人只限给八两，这就是“大餐”了，剩下的时间全是吃玉米面和高粱米；几乎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蔬菜，偶尔只在“改善生活”时吃到一点豆腐，平时的菜一律都是发黑的冻土豆，顿顿如此。以至于相忱回家后，好多年都吃不下土豆。相忱还记得到了东北不久，正赶上过中秋节，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显露出端倪，所以即使是过中秋节，监狱里仍旧是吃窝头。转过年的春天，监狱里连窝头都吃不饱了，犯人们不得不到四外去找寻野菜，用野菜做成菜窝头来勉强充饥。有的犯人常把窝头扔过边界线那边去，对面的人就把面包扔过来。也有不少犯人实在忍受不住饥饿，寻机越境逃进苏联的地界去，结果却被苏联人装进麻袋里，又送了回来。

兴凯湖监狱共分为六个劳改农场，相忱所在的劳改队隶属于第四分场。监狱的房子盖好后，犯人们的工作就是种庄稼了。秋天收过庄稼后又要去打草，一年的生火取暖都要靠这些草。这里的草长得很繁茂，比人还高，相忱说他以前从未见过有这么高的草。人们常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离开北京以前，我专门为相忱预备了毛袜子，可他到了东北以后才发现，把乌拉草卷一卷塞进鞋里可真是暖和啊！足见这真是一宝。那里冬天的气温经常在零下二三十度，真正是滴水成冰，说实际点就是拿着脸盆去打水，回来就冻上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体裸露在外面的器官，比如耳朵、鼻子什么的最容易被冻伤致残。一次冬天在外面干活的时候，队长看见相忱的鼻子白了，马上叫他回屋里去，原



来他的鼻子已经冻了，可他自己还不知道，幸亏那位好心的队长及时发现，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相忱还听人说起这里时常有冻死人的事，可有一次这样可怕的灾难险些就要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一个冬天，监狱的一位老伙夫出来取柴火时，见一个人倒卧在门外的雪地里，他一看，这不是那个“洋和尚”吗？就赶快把他拖进伙房，放在灶台旁边的劈柴堆里，相忱这才慢慢地缓和过来。这件事，相忱自己没有讲过，我们也都不知道，是那位老伙夫的儿子来家里时告诉福音的。

另一位曾和相忱同在兴凯湖农场的弟兄，后来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那里的条件极端恶劣。冬季的生活全要靠化冰取水。曾有一段时间他们每人每天只能得到一杯水用于个人的洗漱，连着三个月不能洗脸，更不能换洗衣服，人都不像样子了。吃不饱，穿不暖，但劳动强度却相当大。东北的冬季有半年之久，冻土深达一米多。为了能赶在春季灌溉农田，劳改犯人被迫在冬天挖掘水渠，他们先要使用炸药炸开深厚的冻土，再把沉重的冻土块一块一块地从坑里背上来。

一九六二年，中苏两国关系破裂。政府又觉得把这些重要的犯人放在靠近边界的地方不合适，就决定把他们全部调回来。秋天，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犯人也被押回内地。一切都像他们两年前乘火车北上的时候一样，运送他们的专列车箱的两头有士兵持枪把守，所不同的是随着火车一路南下，他们身上的衣服是一件件地往下脱。这列载有两千多名犯人的列车中途停靠天津附近的茶淀时，犯人下车吃饭。相忱和众人被带到车站的一间大屋子里，依次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在这时相忱意外地看到了杨津广弟兄也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原来杨弟兄一九五六年获释后仍回到北京安定医院工作，一九五八年四月，只比相忱早两天，第二次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并送“劳动改造”，又和相忱同时押送到兴凯湖劳改农场。以后听说他在那里有一次冬季上湖面打苇子时不慎落入了冰窟窿里，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刺骨的冰水加上那一身厚重的棉袄棉裤，落水的人绝难再有侥幸生还的希望，也无人敢于上前施救。但杨弟兄却感到脚下有一股奇妙的力量托住他，使他不能沉下去，更有一个信心和强大的

力量驱动着他，完全靠自己的努力爬了上来，在场所有的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这是神以他神奇的大能，保守他的儿女经历各样的险境却最终安然无恙。相忱此前并不知道杨弟兄再次被捕，也不知道他和自己一道关在兴凯湖农场。两个人的目光相遇，几乎同时扬起头，这个不约而同的动作使两位弟兄的心立时连结在一起，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仰望神。相忱见到杨弟兄仍然在持守着自己的信仰，心里很高兴，又见他的身体和精神都还不错，也很得安慰，只是不能上前问候，唯有遥遥对望，彼此点点头。

开饭时，犯人们每人领到一碗稀溜溜的菜汤。相忱还以为这是考虑到他们长途跋涉会有口渴，先让大家饭前润一下喉咙，没想到喝完了这碗汤以后却再也不见有什么饭食送上来。他不知道当时正是饥荒时期，全国的人都在饿肚子，所以对待他们这样的犯人只给一碗菜汤，没有饭。饭后，相忱和另外五十多个被政府认定可能“里通外国的危险分子”又登车被押回北京，杨弟兄和其他大多数人则被留在茶淀的劳改农场里。

能够回到北京，就能离自己的家人更近，相忱当然很兴奋。还没有从那边出发就忍不住给家里发了一张明信片，告诉我们他快要重回北京了。接到这个出乎意外的好消息，我们也是兴奋不已，觉得简直像做梦一样。不仅我们又可以经常见到亲人，而且可以给相忱送些吃的东西。因为当时粮食严重匮乏，监狱当局说是为了要“减轻国家负担”，就破例允许家属给犯人送些食品。相忱在兴凯湖农场时，开始还能吃上野菜窝头，到后来就只能吃糠窝头了。回到北京后，监狱的条件比外地要好很多，能吃到白薯干，家里每月也能给他送些点心。我经常想如果相忱还是被留在外地，结果很可能不堪设想；后来听一位当年曾在山西劳改的弟兄说，他所在将近三百人的劳改队中，那时就饿死了一百多人。可神却在这时带领相忱回到北京，保守他的身体平安度过了饥谨的磨难，这完全是神的恩典。

那时，即使是在城市里，一般人家的生活也是相当的艰苦。北京的居民每人每月也只配给二两油，半斤肉，半斤点心。点心全家人一口也

不吃，八口人的四斤点心全留着，到探视的日子全给相忱带去。每到探视的那天，我都要一大早就起来，赶到卖糕点的商店里排队。因为当时商店里的东西也只是有限的那么一点点，虽然手里有点心票也得赶早去排队，不然去晚了就什么也没有了。点心买回家，几个平时从来都吃不上点心的孩子都围过来，左右看个不停。我对他们说：“这是给爸爸买的，谁都不能吃。”孩子们都很听话，都不开口向我要。

相忱重新回到北京监狱以后，先是在毛巾厂干活，不久又被调到塑料厂，专干给塑料象棋染颜色的活。这些强度不大的室内劳动，相忱还是能够应付得来。我也还是像以前那样带着几个孩子轮流去看望他。一九六五年十月底，二儿子福声将要去宁夏建设兵团。临走前一天，他也没跟我说，就独自一人跑到右安门第一监狱，想要再见上父亲一面。那天，福声早晨八点钟就到了监狱，但因为不是规定的探视时间，监狱门口的卫兵说什么也不许他进。福声知道自己这一走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就哭着坐在监狱门外不肯走。过了好久，他见到大门里走出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就又跑近前去把自己的理由重新说了一遍，他反复地恳求说：“我就要去宁夏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您就帮帮我，让我见父亲一面吧！”那人听了说要福声等一会儿。福声又在外边焦急地等待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快十一点的时候，他才被允许进去。

相忱走进接见室，看见儿子在那里，很是吃惊。福声告诉父亲，自己马上就要去宁夏了，这次是特意来看看他。相忱听了很高兴，握着福声的手说：

“去吧，在城里也不太好过。你已经二十岁了，自立也好。出门在外，自己多保重，要多写信回家。我这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着。去农村很好，我传福音也是在农村。”又问福声：“你现在对信仰有没有信心？”

福声答说：“有。”

相忱又问他：“还会不会唱诗？”

福声说：“会，诗篇二十三篇我现在还记得很熟。”

相忱听了儿子的话很得安慰，鼓励他说：“信仰坚定就行！”。

在这难得的半个小时里，父子二人就这样拉着手，轻声地交谈。福声走后的第二年年初，大女儿安湖结婚了。女婿对我说：“妈妈，我还没见过爸爸呢。下个月接见的时候，我想去看看他。”下一个探视的日子，安湖就带着丈夫到监狱看望相忱，相忱见到女儿已经成家立业，心里自然很是高兴。

一九六五年底，北京监狱又已人满为患，政府再次决定把重刑犯人解送到东北去。一九六六年的三月，相忱结束了在北京监狱四年多的监禁生活，第二次踏上了前往东北这个苦寒之地的路程。相忱此时并不知道，一场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大风暴正在拉开序幕，同样也给基督教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深重影响。早在相忱被捕之后，北京原有的六十多间教会由政府强令合并为四处，到了一九六六年，剩下的这四所教会最终也被迫关闭，圣经被公开焚毁；那些已经加入“三自会”的传道人员，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均在此时遭到无情的批斗和侮辱，甚至被残酷地打杀。那位“三朝元老”王梓仲就是在文革中自杀的。“我主在以前的时代，就是这样惩罚那些忘恩负义的人；他们拒绝他的真理，毁灭他的光明，所以上帝使他们感觉麻木，陷入极端虚伪，与无尽黑暗之中，甚至真正的教会因而不复存在，但同时黑暗和错误之中，他仍旧保存了那些分散和隐藏的人。”（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题献，基督教改革宗出版社，第23页。）

## 四

在当时，一个人没有工作都是难以生活的；何况我们这八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这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我们搬到白塔寺不久，一位热心的邻居看到我们家的境况，就主动提出介绍我和安湖到房管局工作。因为这时正赶上“大跃进”和“公私合营”，到处都需要人手。虽然房管局里主要都是体力劳动，但我仍然很高兴地接受了下来。安湖刚好小学毕业在家，马上就去上班了，我则是先

在街道交待好了工作才过去。

我们先被安排到房管局下属的一个工厂作学徒工，工作就是将扩音器上用的小喇叭，先打磨后喷漆。三天以后，领导发现我是识字的，就把我和其他几个人从五十多名新工人里选出来重新分配工作，我被派去管理仓库。当时正值“公私合营”的高潮，各个行业中的私营企业包括物资和人员等都被合并到国营单位，从西城区私营建筑企业运来的油漆、涂料等等各种建材堆满了锦什坊街二十二号的一个大四合院，而给我的工作是把它们按不同的类型、品种和容量清理出来，分别登记造册。我马上动手清点这些堆积如山的物品，一一做账，再指挥工人把它们分别存入库房。过几天领导来检查，一看仓库井井有条，账目清晰，再看我不仅字迹工整，而且算盘打得很利索，就说：你把这里先放下，我们正缺一个统计，你来做吧。这个统计工作的内容就是把新近才从私营企业合并过来的六七百名工人，按照工种和级别分门别类地登记上册。没过几天，领导又来检查，看到我刚编写好的几大本人员花名册很是满意，就又叫我把管理工资的工作也兼起来。那时的工资和现在不一样，不是一个半月开一次，而是每周开一次；而且级别各异、为数众多的工人还分散在不同的工地上，统计难度很大。但是我和另外一位同事把这一切都管理得有条不紊，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最后领导又把工人的考核定级工作也交给了我，让我做统筹人员和劳资管理的“总统”。我是一九五八年的十月到西城区房管局上班的，起初只是算作临时工，第二年单位开始吸收长期工，第一个就批准我转成正式工。说实话，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才能，在这以前除了教会的事奉和家务以外，也从没有在社会上做过什么工作，面对这一个个全新的工作，我唯有不住地向神祷告，向神交托。感谢神，垂听我的祷告，怜悯我这愚拙无助的人，使我手中所做的尽都蒙他的祝福，甚至使我少年时学就的书法和珠算，在这时竟都意外地派上了用场；感谢神，因我深知我手所做的尽都出于他的恩典，而我正是靠着神的恩典才得以克服了工作的困难和压力。

新的工作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我们全家所承受的生活压力。我的工

资每月是二十四元，另外还有一点奖金。虽然领导和同事们都认可我的工作，每月都可以拿到十二元的一等奖金，但是当时一斤米面的价钱都是一角五分左右，玉米面也要八分钱一斤，如果按照八口人每人每天一斤口粮计算，我这全部三十多元的收入，除去十二元的房租和必要的煤、水、电费，剩下的就连每顿喝玉米面粥都不够，更不要说还要有菜蔬和油盐副食。没有钱给孩子们买衣服，我就把相忱留下的旧衣服改一改，给大孩子穿，再把大孩子穿过的衣服改一改，给小的孩子穿。而且我白天要上班，工作又繁重，经常要加班，只有到了晚上九、十点钟回家后才能有时间做点家务。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睡觉，我把电灯围上厚布的灯罩，拉到窗前，尽量轻缓地蹬着缝纫机给孩子们改制衣服。在相忱走后的七、八年里，这几个孩子的衣服全是靠着这样的“大改小”，几乎都没有买过什么新衣服，最小的爱湖到一九六五年的时候还没有穿过毛衣，直到大姐安湖结婚后，才把她自己的那件旧毛衣送给小妹穿。那几年，家里顿顿吃的都是窝头、玉米面粥和咸菜，虽说我的单位和孩子们的学校都有食堂，但为了省钱，我和孩子们都是从家里自带午饭，所带的当然也是窝头、咸菜。福乐上学的北京第三十五中是一所重点学校，他是班里的尖子生，考试总得满分，有些好事的同学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窝窝头脑袋”，说他：“你这个‘窝窝头脑袋’凭什么老考第一啊？你考得再好，还不是天天吃窝窝头！”福乐气不过，回来就央求我说：“妈，咱们就吃一回馒头吧！您就给我带一回馒头吧，堵一堵他们的嘴，就一回，好不好？”听孩子这样要求，我心里其实比他更难受。要给他带，就也得给另外几个孩子都带一份，可我实在买不起这么多馒头，只能硬着心说：“不行！等到‘六一’儿童节时，咱们才能吃馒头。”

我们居住的白塔寺里有百十户人家，实际上就是个“大杂院”，邻里间彼此争吵和偷窃的事情都时有发生，我这样的家庭状况更成为偷窃的对象，家里虽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日常用品还是三天两头的丢失，甚至放在屋檐下已经升着了火的小煤球炉子，一转眼就不见了。刚住进来时全院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我们用水都要到大门口的这个公用水龙头那里接回来。我不会挑水，只能靠手提，装满水的桶我提不动，所以每

次只能提两桶八成满的。我工作忙，顾不上照料家务，这几个孩子都很听话，也懂得自立，放学回来自己在家里做功课，从不出去乱跑；按照我给他们定的值日，轮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两个人一组出去抬水，到点就自己上床睡觉。我晚上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到床边去看看孩子们，见他们都睡好了，我就放心了。四个还在上学的孩子的学费对我来说也是个难题，小学每学期的学费是两元五角，中学是五元，可我一下子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啊？好在学校了解到我的情况以后，同意我可以缓交，这样我就每月交一个孩子的学费，一个学期四个月正好把四个孩子的学费交完。那时孩子们的学校离家都比较远，虽然一张学生的公交车月票只要两元，可我也根本买不起，他们几个都是往返步行一个多小时去上学。只有爱湖上中学时，因为家里的条件稍好一些了，才用上了月票。

安湖在做了几个月油漆工以后，单位看这个小姑娘老实本份，手脚也麻利，就推荐她去参加一个医务培训班，回来后在医务室工作。老大福音十三岁时，在学校的体育课上不慎摔伤了腿，在家休学。第二年，他就到附近一家专做各种书皮的私人烫金社当学徒工，每月挣十多元钱补贴家用，直到十六岁才重新上学。福音在学校里品学兼优，是老师和同学都喜爱的好学生，还被选为少先队的大队长。相忱离家的那年，福音十八岁，正上小学六年级。学校没有讲什么原因就撤销了他大队长的职务，他也没有问老师。同学们也很不解，袁福音怎么忽然不是大队长了，但他却一声不吭。回到家福音也没有把这事告诉我，只是很认真地对我说：“妈，您别发愁。等我六月份毕业了我就找份工作，我来养活您。”

突如其来的压力使这孩子一夜之间就长大成人，成了能为家里担当责任的男子汉。相忱走后，福音骑着他父亲从河北农村带回来的那辆旧自行车，四处找工厂去考工，几经周折终于被新建的首都钢铁公司录取为技工，并被送到北京钢铁学院附属的技校培训三年。技校管住宿，每月另发十六元的生活费，他把其中的十元每月按时寄给我，自己只留六元。每次收到福音的汇款单时，我的眼泪总是止不住往心里流，默默地

为福音祷告。福音回家时，我问他剩下的六元钱够不够吃饭，他总是回答说够。其实我们谁都明白，这区区六元钱怎么可能维持一个小伙子的一日三餐呢！那时福音每顿饭只吃一个馒头和一点点咸菜，每逢周末他都会去参加钢铁学院的学生舞会，不是为了跳舞，而是为了等待舞会结束后那顿免费的夜宵，这是他每周唯一能吃到的一顿饱饭。这件事情，直到过了四十多年以后，我才听已经六十多岁的福音讲起，当时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吃不饱，营养差，白天要在学院的工厂里实习劳动，晚上还要上课学习，加上住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福音受过伤的腿患上了关节炎，一直到今天。

一家人日常的生活尚且难以为继，一旦遇到意外的变故就更加无力应付。一天，我正在积水潭的工地上干活，突然接到电话说：“你婆婆摔了，现正在积水潭医院。”等我心急火燎的赶到医院，见婆婆还躺在医院的走廊里等着我，医院需要钱才能收治病人，可我手里却连几元钱都没有。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向单位求助，幸好单位很同情我的处境，先给我开了一张空白支票，要我用多少填多少，算是暂时替我垫付了这笔医疗费。婆婆的腿骨折了，在医院住了二十七天，总共花了一百三十八元多。她出院后，我给单位写了借条，对领导说：“我每月从工资里还十元吧。”可我当时的工资一共才二、三十元，再扣掉这十元，我们一家可怎么生活啊！这时福音已经到首钢上班了，回家来问我：“妈，您单位的书记叫什么呀？”我随口答道：“叫李玉坤，你干什么啊？”他说：“没事儿，我就问问。”说完就走了。

我没顾上细琢磨他的话，也只当他是随便问问而已。没想到过了几天，李书记把我找去，问：“你有一个孩子在首钢啊？”

我说：“有啊。”

他马上追问：“叫什么名字？”

“袁福音。”李书记兴奋地一拍手说：“哎呀，那就是你的孩子啦！”他拿出一封信，对着还愣在一旁的我说：



“你的孩子寄了一笔钱来，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把自行车卖了，我把钱寄给您替我妈还账，请您别对我妈说。请您每月别扣我妈的钱了，我妈挣的也不多，扣她的钱会影响我们家的生活。余下的钱由我来每月替我妈偿还。’”

我完全没有想到福音会这样做，一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李书记在单位的大会专门讲到了福音卖车替我还账的事，大家都被感动了，说：“这孩子真好！”于是会上讨论决定，虽然按照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能报销医药费，儿媳妇与婆婆不算直系亲属，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特别优待我，为我免除了剩余的费用，也不再扣我的钱了。我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这辆曾经在农村跟随相忱各处传道的自行车，此时又在福音的手里解决了我的大难题。这真是神奇的恩典！福音回到家，我问他这事，他承认把相忱留下的车卖了六十多元钱，又把钱全部寄给了我的单位。我问他：“那你上班怎么办呀？”他回答说：“走着。”我又问他：“那你得走多远啊？”他说：“两站。”我又被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心里很为他心疼。福音就是这样一个话不多，做事却很明白的孩子，他能吃苦，能忍耐，在这方面实在很像相忱。那次会后，单位的工会主席问我：“你家有布票吗？”因为那时的布票都是按人头配给的，我家人多，布票不少，但我没有钱，买不了那么多的布，因而有剩余。主席说：“你都拿来吧，我这儿需要布票，用钱跟你换。”我知道他这是想要帮助我，就打算谢绝他的好意，但他却坚持要我拿来交换，这也是福音的举动产生的另一个效果。

相忱出事以后，我并没有在家信中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在天津的家里，因为家里的人都还没有信主，我怕他们不能理解，也怕他们为我担心。一九五九年的春节，我也像往年一样回家探亲，母亲没有见到女婿，一个劲儿地问我：“相忱怎么没来呀？”我只好用“他忙”之类的话勉强给敷衍过去了。直到又过了一年多，在天津建筑单位作工程师的大弟弟来北京出差，顺道来家里看望我们时，才终于被他看出了真情。弟弟按照我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我们在白塔寺的家，进门一看就大吃了一惊，忙问我：

“大姐，你的床怎么都没有了？”我只得装作轻松地说：“大炼钢铁的时候，我都捐了。”他又问：“我大姐夫呢？”开始我假装没听见，故意用别的话题岔了过去，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还是支吾过去了。弟弟坐了半天还见不到相忱回来，才察觉出了不对劲儿，又一次追问我，我被他问得实在没办法回避了，才不得不说出：“告诉你吧，走了一年多了。我是怕你们担心才不告诉你们，你也别告诉妈，我怕她老人家受不了。”

弟弟听了我的话很镇静，反过来安慰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说，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过苦日子！我不怕受连累，你是我的手足之亲，你现在这样子，我理该帮助你的。”边说着，边掏出身上带的几百元钱全都交给我，说：“大姐，你用这些钱给孩子们买些布做衣服吧。你是我的亲姐姐，你的丈夫是我的姐夫，你们的孩子是我的亲外甥，我不怕受连累，姐夫不在，我照顾你们是应该的！”

从那以后，大弟弟每月都给我寄些钱来。不久，母亲和在天津的几个弟妹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令我感恩的是他们竟没有一个人因此疏远我。母亲每年都给六个孩子每人做一身棉衣，平时也常寄来些吃的用的；五弟和四妹夫每次来北京出差时都要专程来家里坐坐，给我留下一些钱物。我始终没有告诉母亲他们，相忱被判的是无期徒刑。母亲总忘不了相忱，每年我回家时，都要拉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问我：“相忱回来了没有？相忱有信来了没有？他在里面身体怎么样啊？”一年又一年，老人望眼欲穿地盼着自己心爱的女婿早点回家，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只能含着泪，叹着气，自言自语说：“相忱什么时候能回来啊！”母亲一九七六年去世，终于再也没能看到自己最钟爱的女婿——相忱的面。但是令相忱和我最感欣慰和感恩的是，母亲和大弟弟都悔改信主了。他们没有因家人所受的逼迫而远离神，反而在其中得以真正地认识他的恩典，归向他。这也是相忱和我几十年为家人不住祷告，从神所得的又一份安慰。

回忆着二十多年的日子，生活的压力这么大，老老小小八口人，要吃，要喝，要交学费，这些主都一一看顾了；生活的压力成为我们的恩典，主是借着诸般的恩典，引领我来仰望他，借着艰难的生活，造就我，

炼净我。我们没有一天不是摸着神的恩典走过来的，没有一件事不是靠着信心从神的应许中领受的。我们还没从“福音堂”搬出来，就第一次收到一位姓于的寄来的五十元的汇款单，以后一直到相忱回来每月都收到他三十到五十元不等的汇款，姓名从来不变，字迹也是不变的工整，但汇款的地址却是每次不同，有时是信箱号码，有时是工厂的名称，有时是地址，有一次写的还是“以马忤斯路二十号”，可北京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条道路的名称，显然这位汇款的人是要我从神里面接受供养，而不要我记念他，回报他。我也有几次试着按汇款单上的地址给他去信，向他表示感谢之情，并请问他的姓名，告诉他我星期日休息，希望他有空能来家里交通，可这样的信无一例外地被以“查无此人”退了回来。这份汇款即使在文革最紧张的岁月也从未间断过，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给我汇的款，唯有在祷告里不断地为他代祷，求神记念这位满有忠心又满有爱心的无名肢体。这真是神难以言喻的奇妙恩典！要知道在当时，基督徒长期受到全面的逼迫，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困难，五十元钱差不多相当于普通一个人两个多月的工资，不是容易拿得出的；而且看来这位有着美好信仰的圣徒，在文革中竟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还能不断地帮助我们。

感谢神，是他在如此深重的患难中，保守了一些人，又使他们成为更多人的安慰和帮助，让我们见证了这奇妙神迹的人，就知道他真是全能的主，与我们同在的神！

有一次，我早上出门上班，见对面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位高个子的老太太正在望着我，仔细看却不认识，走到远处我故意回头一看，见刚才那位老太太正在我的门前，我赶紧走回来，看见门缝里塞着一个小小的纸包，打开纸包，里面写着“以马内利”，还有二十元钱，等我抬头再找时，那位老姊妹早已离开了。还有一次，福乐学习的那所技校要求学生买一个计算尺，可买这个尺子所需的十四元几乎是我一半的工资了。我对福乐说“你向神祷告吧！”这天晚上我也为此向神祷告，果然第二天一早打开门时，门缝里已经有了一个小纸包，里面是整整二十元钱。那一

段时间，我每天下班都要看看门缝，因为那里经常塞着各式各样的小纸包，里面有钱，有粮票和布票，还有勉励的话语。我们一家八口在这二十年中，就是这样日日过着乌鸦叼饼的日子，我们的每一个需要神都知道，每一个需要也都在他的恩典中得到饱足。

出于大家都知道的那些原因，相忱被捕后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到我们家来。这中间，第一位主动来探望我的是陈梅伯姊妹。陈姊妹比我要大几岁，因为有很多亲属在国外，家里的条件比较优越，所以从协和医学院毕业以后，她并没有从事医生职业，也一直没有结婚，独自一人过着比较清闲的生活。她先是问候过了我的生活，又问我有没有什么缺乏，我回答她说：“看似一无所有，其实样样都有。神的恩典够用！”这时常来看望我们的还有王克忱老师的太太王师母，王先生去世之后，我每月一次去王师母家和她一起祷告。王师母真是位敬虔爱主的人，她的二儿子本是积水潭医院一名出色的骨科医生，同样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派到北京远郊山区的怀柔县医院。他不幸因病去世了，家人恐怕老人伤心就把这个消息瞒了她三年，后来王师母终于知道自己最爱的儿子已经不在，却没有悲伤，反而劝慰其他人说：

“他已经安息在主那里了，将来我们都要去主那里和他见面的，你们不要伤心，应该为他欢喜。”王师母还是一位大有信心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中，王师母说：“主啊，我相信在我没去世之前，一定能看到相忱回来！我有这个信心，等着看到他再为主做工！”那时王师母已经八十岁了，而且相忱被判的是无期徒刑，哪有希望还能回来啊？每次看着王师母如此有力地为主祷告，我自己却不敢这样想，只在祷告中祈求神：“求主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坚固相忱的心。不要因着顾念家里的妻儿老小就软弱妥协，任何时候都不要手扶着犁向后看！让他以你的名为重，能在监狱中为你的道持守到底！”神果然垂听了王师母的祷告，在她九十六岁的高龄等到了相忱平安归来。与王师母的信心相比，我当时确实是很软弱，很亏欠神。

相忱从监狱里发来明信片，专门问到我：“聚会光景如何？”后来在

我去探监时又问起同样的问题，我简单地回答他：“随圣灵的带领，各自在家灵修。”自从“福音堂”被迫关闭后，我也失去了可以聚会的地方。我渴望聚会，一九五八年的五、六月间，我曾去过一次“三自会”的缸瓦市教堂，但进门就见到讲台上迎面挂着大红色的横幅标语，台上正讲的是批判王明道、袁相忱的“地下教会”，下面的人也纷纷上去发言，看来这里早已根本不是聚会了。所以，在这二十二年里，我没有过聚会，只能自己在家读经祷告，有时去和几位可以信赖的姊妹一同祷告和交通。后来我听说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中，仍有信徒在坚持秘密地聚会。我也想到，倘若是相忱处在我的地位上，他也必定不会停止聚会。与这些有忠心的弟兄姊妹相比，我当时也是软弱的。

相忱走的那年，我还不到四十岁，在别人的眼中或许我那时的相貌和身体比我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于是，就有很多人开始以各种方式追求我，还有人主动要给我介绍对象，这是在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之外的第三个压力——情欲的引诱。首先是我所在单位的房管局局长，他的妻子已经不在。他到我家来，对我说：“看你家就住这么一间房子，我给你一套楼房，你把你的工资养孩子，你人过来就行。”我坚决不同意，正言以告：“我不做这个事，我也不走这个路！因为我是信耶稣的，我不能再嫁人！”他又劝诱我说：“他是无期徒刑，你要是一改嫁，你的身份就改变了，就不再是反革命家属了。”我依然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说：“我不管什么身份，就是他死了，我都不会再嫁人。我决心不走这条路，你死心吧！”可这人偏偏还不肯死心，想在背地里送我衣服和钱，企图用利诱打动我，都被我一一拒绝了。有一次，我见他又借故跑到我家里来，就用广东话提醒不明就里的婆婆：“您别给他倒茶，别理他。您要冷淡他，这个人没安好心！”上班时他也时常到我的办公室来东拉西扯，软磨硬泡，我严肃地警告他说：“你要没事就请出去，不要影响我的工作！”他是局长，是这个单位的最高领导，我得罪了他不免会招来报复，但我决心不顾这些了。可没过多久，这个局长就因为经济问题被撤职查办了。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相忱和我结婚的时候，由牧师证婚，我们在神

面前立过约的。誓词上说“或福或苦，一辈子白头偕老，一同服事主”。我要用一生来持守我们当初在神面前的约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绝对不能毁约，绝对不走离婚改嫁这条路。另外，还有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为我恒切地祷告，是他们用祷告托着我。我若在这事上后退了，第一是亏欠神，也对不起众弟兄姊妹，所以我立志不走那一条路。他们这些人所用的，无非就是撒但引诱夏娃的手段，不过是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而已。然而，感谢主，我靠主的力量，作刚强人；靠主的保守，站立得稳。以后的几年中，不断有人张罗给我介绍对象，费尽心机地劝说我：“他判的是无期，根本就没有机会回来了。你就死了心吧！你的心眼就活动一点吧。”

“他怎么能回得来呢？他是无期徒刑。你这样，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

“你还年轻呢，你再向前走一步，就不至于受苦了！”

有“热心”人甚至连离婚书都帮我写好了，跟我说：“我把离婚书都给你写了，只要你签个字就行了。只要你签一个字，我就帮你往法院一递，再写一张给你的单位，这就行了，两方面就通过了。”还许诺说：“你只要签了这个字，就脱离了反革命家属的身份。摘了帽子，你的生活就改变了，你的生活就优裕了。”但我心里的力量支持着我，没有答应他们任何的要求，无论他们怎样三番五次地或威逼或利诱，我始终没有向他们低头。我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瞎忙乎了。单位那样逼我，我都没有离婚，我不会再考虑婚姻上的事了！”

还有一次想起来很可笑，一天晚上，我给孩子做完衣服已经十二点多了，刚刚关灯躺下，外面就有人来敲门，敲一下，叫我的名字，敲一下，又叫我名字。我一听，这是个熟人，就是我们办公室一个人的声音。我心里“咚咚”地跳，想着三更半夜找我，一定会有好事情。我就躺着不动，不搭理他。那人还在外边敲来敲去，又叫我，有半个小时才走。第二天上班，在办公室里他一直盯着我，我也不理他。后来，他病了，就打发人叫我替他做结算，我对来说：“他的工程，我不熟悉，这个我

不能做。”隔不很多的日子，听说那人死在医院里了。

## 五

东北黑龙江这块土地对于相忱已不再完全陌生，六十年代初他曾在兴凯湖边的劳改农场生活过了两年多，时隔近四年以后他再一次来到这里。

这次相忱一行人被押送的目的地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一个叫做音河的地方，那是一大片荒无人烟的土地，原来的名字叫“阴河”，意思是阴翳恐怖的地方，据说还常有鬼怪出没，以后为了“破除迷信”的缘故才改成现在的名字。

这里同样是一块未被开垦过的处女地，附近既没有人烟，更没有房屋。相忱他们初到的时候连帐篷都没有，只能露天睡在用枯草铺成的地铺上。到达的第二天，犯人们就开始用水泥预制板为自己搭建简略的住房。虽然相忱他们来到这里的时间已经是开春的三月份，但晚上的气温还有零下三十多度，狂风舞动漫天的尘土，把周围的一切都刮得天昏地暗；吃的还是高粱米，黑土豆；穿的也还是监狱每年发的一套棉袄棉裤和一件白粗布褂子，那套又粗又硬的黑棉衣足有七斤多重，脱下来几乎能自己立住。但是相忱靠着感恩和顺服的心，很快就适应了这样艰苦的生活。

临到年底的十一月份，文革的紧张局势终于也波及到监狱。管教当局为了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惩治，决定把像相忱这样一批“反革命”重刑犯从音河劳改农场收回到齐齐哈尔监狱。监狱的管理虽然严格，远不及在农场那般自由，但好在生活条件和伙食上都有了不少改善，劳动也轻省了很多。相忱被分配到监狱的铰丝组干活，就是做螺丝钉，这对相忱来说是个新工作，但比起在大田里的劳动要轻松多了。

在监狱里，相忱他们除了劳动，每天还要参加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内容主要是收听广播，然后还要发言，有专人把各人的发言记录下

来。一九六八年，一次相忱听完了广播后，随口说：“这两天怎么没看到刘少奇的消息，难道共产党里面也有党派吗？”说者虽是无心，却没有料到听者有意，马上就有人把相忱这句话上报给看守。第二天监狱管教的队长就来了，问相忱是不是说过这些话，相忱说是。那位队长立刻严肃地说：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能在这里解决。我们一直忽略了你的思想状态，现在郑重其事地问你：你现在还信不信你的上帝了？”

相忱并没有被这个阵势吓倒，平静的说：“我还相信！”

队长被相忱激怒了，声色俱厉地说：“看来这句话真是你的反动思想的大暴露！我再问你一次，你还信不信？”

相忱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信！”

队长暴跳如雷，一连声地呵斥道：“你这个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你的问题不是在学习会上所能解决的，必须要从严惩处！”不由分说，一伸手“啪、啪、啪、啪”地把相忱衣服上的扣子全都揪掉了，还把腰带也抽走了，命令人把相忱带去关“小号”。相忱二话不说，提着裤子就跟着他们走了，就这样被关进了监狱最惨无人道的“狱中之狱”。但是如此惨烈的惩罚也丝毫没能压倒相忱，半年之后他们不得不把相忱从“小号”放了出来。

才过了两年多，齐齐哈尔监狱里的犯人也爆满了，只得在黑龙江省嫩江地区的肇源县另建一座新的革志监狱，革志监狱紧邻著名的大庆，现在对外改称作“矿山机械厂”。相忱和另外一千多人再次被派到这个新的荒地上，他们像以往一样重新住进围着铁丝网的帐篷里，像以往一样地重新烧砖盖房，像以往一样地重新开荒种地。因为相忱当年在兴凯湖农场干过拖坯制砖这套活儿，此时居然还成了熟练工人。他们所去的地方是一块遍布坟茔的荒野，需要先挖掉荒坟，平整土地。相忱被分配到专门负责开荒的小组中，去干拔草、挑运石头的工作。这样的活计虽说很重，但却暂时脱离了监狱的严管，相忱反而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



一九七三年，相忱又和一批犯人被调到距离革志监狱三十里外，与吉林省一江之隔的嫩江之滨，开荒种植水稻。种水稻是个要求比较精细的农活，可相忱是个近视眼，眼睛不好使，他干活的速度比别人慢了很多，特别是在稻田里拔草时，他分不清哪个是草，哪个是稻子，结果往往是把稻子和草一起给拔了出来。一九七七年春季的一天，收工时组长一看相忱刚拔的那些“草”就嚷了起来：“这是谁拔的啊？怎么把稻子拔出来放这儿啦？”接着就把这事汇报给了队长。队长认为相忱是在“故意破坏生产”，就在队里开大会批斗他。相忱被推上台，下面的犯人们挥拳攘臂把口号喊得震天响，有些为求立功减刑的犯人还争先恐后地跑上台去揭发相忱，为了表示他们的“愤怒”之情，还乘机对相忱推推搡搡，拳脚相加。但此时相忱在批斗台上却是神态自若，大有一副旁若无人的架势。结果，相忱又被迫接受了长达半年的“严管”。“严管”是监狱对付那些“不听话”的犯人常用的一种惩罚，被“严管”的人在行动自由上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不许随意走动，不许随意说话，工作时也要有人监督；伙食上也比普通犯人要差，分量也少；并要被派去做一些整个监狱里最脏最累的活儿，相忱就是被派去掏厕所。我曾听其他从监狱出来的人说，那里面“批斗会”的惨烈程度与外面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打死人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我还知道有一位弟兄在监狱中也曾一连七个月，每天都开会批斗。我相信，是神又一次保守了相忱。

这一年，恰好福乐有机会从他工作的贵州去东北出差。路过北京时，福乐自己向我提出他要借这个机会去探望一下父亲，听到孩子有这样的想法，我心里特别高兴。相忱离家时，福乐才十一岁，相忱第二次去东北后，我们已经十一年没有见过他了。我即刻去商店买了很多罐头、点心和糖果，福乐就拎着这些大包小包启程了。他坐火车先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换火车到一个叫泰康的地方，从那里再换乘汽车去革志监狱。当时正赶上“二九”天气，哈尔滨市的气温是零下二十九度，呼啸的北风夹着尘土扑面而来，顶得人喘不过气来。福乐冒着刺骨的寒风，好不容易才找到泰康的汽车站，一看发车时刻表，才知道从这里只有每天早晨六点钟的一班车开往革志。福乐只得在附近随便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

这间小旅店本是给那些拉大车的人“赶脚”预备的，唯一一间屋子里挤着十来个人，到处乌烟瘴气，白色的被里都被盖成了黑灰色，只在有褶皱的地方还能勉强看见出来一点点白布本来的颜色。福乐想着就在这里凑合一夜，明天一早就可以去看望父亲了。躺下去以后，他才觉察到肚子在“咕咕”地叫，福乐这才想起来自己多半天忙着赶路，找车站，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可这个小旅店又没有卖饭的。他的包里就装着从北京带来的点心，可他一块也舍不得吃，他想父亲这么多年在监狱里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自己若吃一块，父亲就少一块，还是留给父亲吃吧。自己还年轻，饿一顿两顿没关系。福乐就这样合衣躺了几个小时，凌晨五点钟就爬起来赶到汽车站。

早上八点多钟，汽车在一片荒野上停了下来，革志到了。福乐下车找到一个当地人打听后才知道，他要去的监狱离这里还有三公里的路程，而且这段路上不通汽车。走三公里的路，对于拎着大包小包的福乐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感谢神，当时的天气很好，前一天还是北风呼啸，可今天却一点风也没有，气温也比昨天暖和多了。想着很快就要见到久别的父亲，福乐的心情也越来越兴奋，大步向前走，没用一个小时就到了父亲所在的那个农场。场长听福乐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又查看了他的工作证和出差证明，才同意他见父亲。

福乐在接见室里等了十来分钟，听到门外有人喊：“报告！”队长说进来，这是监狱为犯人定下的规矩。相忱进来了，先朝着在场的队长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头也不抬地站在一边。队长说：“袁相忱，你来看一下，是谁看你来了！”

相忱抬起头来，看到面前有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只觉得似曾相识，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更想不到是谁会来看他。相忱略迟疑了一下，开口问道：“你是谁？”

福乐忙叫：“爹，我是老四福乐！”

相忱这才猛然认出这个年轻人就是自己已经十多年没见过面的孩子

福乐，他有些激动，眼里含着泪花走上前来，摸了摸福乐，说：“你这么远来看我……”

队长看相忱有些激动，就说：“孩子来看你，你不要难过。你儿子来看你，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此时，福乐的眼里也和父亲同样含满了热泪，从相忱进屋的那一刻起，他就认出了父亲，但眼前的父亲却比记忆中苍老了许多。队长叫他们隔着桌子分别坐下，父子二人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时相忱正因为拔草时误拔了水稻苗，还在监狱的“严管”期间，那位队长就说：“袁相忱，你儿子好不容易才来一次，你要好好向你儿子汇报一下自己改造的情况。把你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被关小号的事讲一讲；再把你在狱中还搞破坏，在劳动时把稻子当作草拔下来的事也讲一讲。你今后要好好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和你同时进来的许多人都已获得减刑，只有你，改造快二十年了，还是老样子。你以后要多向党和政府靠拢，不可抗拒，否则死路一条！”队长说这番话的时候，福乐心里不住地在为父亲难过，他想：父亲眼睛不好，又没干过农田的活儿，怎么能分得清什么是草，什么是水稻呢！

相忱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福乐，他问：“家里人都好吧？”福乐就把家里人的近况一一详细地说给相忱听，他告诉父亲：“您不用惦着家里，妈妈能够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您好好放心，不用挂记着我们。”相忱点点头，又嘱咐福乐东北很冷，出差时要注意保暖。四十分钟的接见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福乐忽然想起自己忘了拿出带来的东西，他取出从北京带来的那些食品，告诉相忱：“这全是妈妈给您买的。”但队长却说不不能留这么多吃的，只准留下很少的一点。福乐不甘心，再三地请求说：“我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请领导允许多留一点吧。”但队长执意不肯答应，福乐只得把剩下的再带回来。相忱被两个人带出去时，一直低着头，心里很难过，不敢多看福乐一眼，生怕一看儿子就会忍不住掉下眼泪；福乐也不敢看父亲，也怕自己会忍不住落泪。相忱走后，福乐也就背起自己的旅行包离开监狱，赶去出差的地方。他到哈尔滨后，立即就往家里

打了一封电报，告诉我：“我已平安探望了父亲，父亲一切均好，勿念。详情回家再叙。”因为他知道，我一直挂记着他探望相忱的情况，这几天肯定连觉都睡不好，打一封电报，可以让我尽早放心。

和脚下这块大荒原一样无边无际的苦难，也不能压倒相忱对于福音的满腔热忱；他在这坚硬贫瘠之地，凭着信心播下的一粒小小的种子，终于在神的恩典中结出了果实。那还是从兴凯湖农场回到北京监狱以后，与他在一个监区的都是和他有着同样罪名的“反革命分子”，其中绝大多数还是知识分子。相忱结识了同监舍一位叫刘浩的狱友，刘浩是北京人，比相忱小五岁，毕业于辅仁大学，原本是中等机械学校的一名教师。他们俩人起初从劳动中开始相识，先是相互交谈各人被捕的缘由。一九五八年，刘浩在下放农村期间，看到农民群众被“大跃进运动”逼得走投无路，又是敢怒不敢言，良心就促使他起来表示反对，因此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也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相忱告诉刘浩：“我是传道人，只是因为坚持传福音，拒绝参加‘三自会’，政府就认为我们是‘反革命’。其实，我们只是坚持信仰，不是‘反革命’。”

两个人渐渐熟悉后，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相忱就利用一些方便的机会向刘浩传福音。北京监狱是一座八角形的建筑，每个监舍前面都有一个三角形的空间，被犯人们称为“三角院”，每月有一个星期日，犯人们被允许在这个院里自由活动，休息或是洗衣服。因为平时监狱里人多，干活时也不许随便说话，相忱和刘浩就趁着在“三角院”里活动的时候，避开众人小声交谈。监狱不准犯人阅读书籍，更没有圣经，相忱就对刘浩说：“我口头讲，你就听。”他知道刘浩曾是哲学系的大学生，就从《约翰福音》入手，一段一段地给他讲解经文，讲什么是真正的“道”，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信仰和人生。相忱还教导刘浩如何祷告，告诉他：“祷告是信徒属灵生命的呼吸。虽然身在监狱中，但是我们并不孤单，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借着祷告随时与神交通。”刘浩这时才恍然大悟，以前他常见相忱一个人低头闭目原来就是在祷告。此后，刘浩也开始和相忱一同默祷，他们成了亲密无间的弟兄。

刘浩入狱以后，他的妻子带着唯一的女儿离开了他，家里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老母亲，因此他很为家庭的事忧愁。探视的时候，刘浩和相忱总是排在一起，我在那里也见过刘浩和他的母亲。一次刘浩对相忱说起：“我们在监狱里，家里的生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老母亲和一个女儿，你有老母亲、妻子，还有六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将来该怎么办？”相忱就安慰他说：“听从上主的安排吧！我爱人也信主，我相信她会妥善安排好这一切的。你要认识神，神就是爱，我们相爱，不只在舌头和言语上，也在行为和诚实上。”当时，监狱里每顿饭只给一勺白菜汤和一个不足二两的小窝头，犯人们还要劳动，人人都吃不饱，相忱却常对刘浩说自己吃不了，把自己的窝头掰一半扔进刘浩的汤碗里。刘浩从相忱的身上认识到他所信的神是真神，更加渴慕神的话语，相忱就利用两个人铺位相邻的机会，在夜深人静时和他悄声交通。

一九六六年被送到音河的人中也有刘浩。初春时节，北京虽然已经暖和了，但东北却还没有解冻。刚到的时候，他们一起挤着睡在草窠子里，每当刘浩觉得自己快要顶不住的当口，相忱就鼓励他：“这不算苦！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才叫苦呢。要挺得住！”在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中，相忱的乐观豁达深深地影响到了刘浩，即使是在批斗会上遭人殴打以后，相忱仍是凭着信心，神态自若地对前来问候他的刘浩说：“没有神的许可，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我根本不在乎他们对我的态度，只当他们是一群疯子，让他们嚎叫吧，我靠主的大能大力，作刚强人，才能不被一切外在的东西所压垮。”刘浩被圣灵感动，终于决心接受耶稣基督作他个人的救主，相忱就带领他悄悄做了立志祷告。

后来，两个人都一同被分到革志监狱，相忱在水田组，刘浩在大田组，彼此接触谈心的机会少了，相忱就每天默想以前背诵下的经文，偷偷地记在纸上，传给刘浩看。大约是那时被关押的基督徒着实不少，各处监狱都有专门规定：在里面传福音按“散布反动言论”论处，犯人里若有人悔改信主当然也是“罪上加罪”，都会招致更为严厉的惩罚。相忱和刘浩都已经被判成无期徒刑，在极端暴政的年代，一旦被人发现，难免

立刻即被处以极刑。但是对神的道的信心，使他们不惜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这才是蒙神悦纳的，也是值得我们敬佩和效法的真信心。

在相忱二十一年八个月的监狱生涯中，有十六个年头是在黑龙江这块严寒荒凉的黑土地上度过的。那时的劳改农场没有任何农业机械，春种秋收的田间劳动全靠的是人手之力；漫长的冬季里，还要冒着风雪出去打草、轧草绳；每天至少要工作九个小时。吃的是窝头、高粱米和冻土豆，住的是“干打垒”，穿的是粗布的囚服，更有数不清的“批斗会”、“严管”和关“小号”，谩骂甚至殴打。面对着这种种无法以常理来解说的苦难现实，相忱依然没有怀疑过神的信实和慈爱，他相信这一切全然是出于神，是为了神的荣耀，也是为了自己得益处；所以在相忱心中，从不对任何人存丝毫的怨恨。他定意顺服主的安排，凭着完全的信心，平安喜乐地过每一天。劳动中间休息时，别人都去抽烟闲聊，他却时常独自站在旷野，唱诗赞美神。他最常唱的两首诗歌，一首是《诗篇》第二十七篇，另一首是《古旧十架》，“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同样是出于对神的忠心，无论是在监狱工厂，还是在劳改农场的农田里，相忱从不怠慢手中的每一项工作。相忱被捕时已经是人在中年，身体瘦弱，眼睛又近视，监狱工厂里的手工活倒还能够胜任，农田里的体力活对他来说就是力不从心了。收割水稻时，别人一天能割一亩地，可他用尽全力也只能割上五分；拔草时更是因为眼神不好，常把稻苗和稗子一起拔了出来。

除了信仰的问题之外，相忱的多样表现倒也很令监狱的管教们满意，还曾让他作过小组长和记录员。在齐齐哈尔监狱时，负责相忱这个队的管教队长是个复员军人，人虽淳朴却没什么文化，认为基督徒都是“美国特务”。但他看相忱劳动认真，吃苦耐劳，就对相忱印象不错。一次过年改善生活，谁也没想到当过兵的人竟然不敢杀鸡，还是在家杀过鸡的相忱动手替他解决了难题。这位队长有意帮助相忱争取立功，以提前获释，

就找来一些报刊上批判迷信的文章给相忱，希望相忱能提高认识，针对自己的信仰做个反省表态。可相忱却半开玩笑地说：“我信的不是他们这个，我是‘洋和尚’。”一句话把队长也逗乐了，也就不好再勉强他。当时监狱里还有一条立功的途径就是“检举”他人，可相忱既不肯在信仰上有丝毫让步，又从不“检举”他人，这个立功减刑的事情也就只好没有下文了。周围的人，谁也不能了解到相忱此时的心思。自从被判处无期徒刑以后，相忱就打定了为主殉道的心志。很多人都想他在监狱这么恶劣的环境中，恐怕坚持不了几年；被送到东北去的时候，连相忱自己都想他这把骨头是要留在东北了。他已经彻底脱离了对死亡的恐惧，把自己完全交给给主，只要为主尽忠。

基督徒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需要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他不住地问着自己：“袁相忱，你能在这条路上跟从主走到底吗？”北大荒的朔风见证了神的仆人的祷告：“主啊，我若稍微偏离正路，立刻就能舒坦；但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所以坚定不移。我愿作你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也愿甘心顺服到底。”

## 六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巨澜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一场新的政治压力也随之临到了我们。

一天上班时，我一踏进办公室就发现不大的房间里四面都糊满了大字报，上面写的是“反革命家属○○○，不能在办公室里担任要职。把反革命家属○○○下放到第一线劳动改造。”虽然大字报上没有公开点出我的名字，而是用了三个圆圈来代替，但谁都明白这是冲着我来，因为这间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没有理会这些，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第二天，我的椅子居然也被他们贴上了一张大字报，我还是没吭声，默默地另外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旁边，照旧继续工作。这时我想：看来我真的要被下放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了，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果然，只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政工组的人就来通知我，说：“老梁，现在

我们办公室不要那么多人啦，你去支援第一线吧。”我当然知道这不过是他们的托辞罢了，因为我当时正担当着单位里最重要的建筑预算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本来就缺乏熟练的人手。但我心里已经完全做好了预备，也没有分辨什么，很爽快地对他说：“可以啊，去哪儿都没有关系。我也是能劳动的，领导分配我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人就说：“那好吧。明天你就到铜管厂工地，去那儿劳动。”

在四十六岁那年，我成为一名真正不折不扣的建筑工人，工地上的每道工序，每一个工种，我都亲手做过。最初，我被叫去做推砖、筛沙子这类技术要求不高，而纯属于重体力劳动的“小工”。砖头是五斤一块，按工地的要求一辆手推车要装满一百五十块，就是七百五十斤，小车上码得尖溜溜的。我双手扶住车把，低头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接着咬咬牙，用小腹向前一顶，那车就轻快地走了起来。我相信，倘若没有从神来的帮助，凭我自己的力气无论如何也推不动它。以后，我每做一件工之前，都是先向神祷告；每一次祷告，就有一个从上头来的力量加给我，让我能够做那些我手本不能做的工。筛沙子也不比推砖轻松多少，河沙含有很多水分，常常粘在纱网上筛不下来，我不愿意像有些工人那样糊弄了事，就找块空地先把湿沙子摊开，晒干之后再筛。工地上最累的活儿要数“和泥”和“上灰”这两样了。那时没有搅拌机，全靠人工把水泥、沙子、石灰和“麻刀”（碎麻絮，同灰泥搅拌在一起，用以增加墙体表面的粘合力）掺上水搅拌在一起。这项工作要求速度快，需要连续不停地搅拌，我一边不住地和着泥水，一边不住地擦汗，但是脸上的汗还是像断了线的珠子不住地“哗哗”往下掉，脖子上围的那条毛巾都能拧得出水来，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像刚刚淋浴过似的。对于我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上灰”，就是把搅拌好了的灰泥送给在脚手架上砌墙的工人。脚手架围着房子的四周，“上灰”的人要把装满灰泥的小车推到墙边，再用铁锹把灰泥依次扬到脚手架上的灰泥槽子里。而且脚手架会随着墙的高度不断升高，第一层架子只有一米多高，还是容易做到的，第二层就比我的头还高，我已经开始感到吃力了。当脚手架升高到第三层，才真是到了最费力的关头，我必须要双脚站在小车两侧的推把上，手中的



铁锹立直了才可以够得到。如果碰上是楼房，我还得顺着搭在两层脚手架之间的坡道，把小车推到更上面的一层去。冬天的工地更艰苦，我经常要一车一车地推着几百斤重的砖头、灰泥，踩着冰雪，一步一滑地往上推。记得有一次是冬天在积水潭游泳场的工地上“溜缝”，就是用很细的灰沙抹平砖与砖之间的缝隙。那是在户外的工地上，正赶上那几天的天气特别冷，刚和好的灰泥就冻住了，后来不得不加盐水和泥才好了一点。干活的人，手冻得都拿不住工具，很多人都是边干边哭，我却是一边干，一边不住地祷告。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不仅没有被累垮，反而在身体和劳动技能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到了最后，我甚至能和那些小伙子一样，用平锹把两块砖头非常准确地一下子甩上高处的脚手架。

那时工地上的管理很严格，各项工序都设有定额，例如“溜缝”就要求一天最少要完成十二平米。我不仅都能超额完成这些定额，还要做一些工地现场的预算工作。有时我原来的工作需要，他们就把我临时召回去几天，完成了马上再把我重新打发回工地上。

和我同一个工队的工人们知道我原来是在办公室做预算的，不知为什么被下放到工地来，有人悄悄问我：“你犯什么错误了？”我说：“我没犯错误。我是因为我爱人的问题，所以下放我。”工友们听了很不理解，大都为我抱不平，说：“你爱人的问题，干吗下放你呀？真是太不应该了！你有什么错啊？你在办公室做预算挺好的呀，我们都夸你呢。”有位老师傅看见我踩着小车往第三层脚手架“上灰”，就跳下来对我说：“太高了，你下来吧，我帮你搓几铲子。”他让我坐下休息一会，动手帮我把高处的几个槽子都上满了。大家看到我干活太认真，就提醒我说：“梁师傅，你干活太死心眼啦，没有像你这么死心眼的，你怎么不会偷懒呀？”我说：“我不会偷懒，干活，干就干好！”他们说：“你得学会偷懒啊。你看看人家，上厕所、抽烟、喝水，你也去呀。”“你别这么整天的傻干，你得偷点懒，要不三天就给你累趴下啦！”我没有照他们说的去偷懒，结果当然也没有被累趴下。后来，工队的领导找我谈话，说：“这样得了，我们看

你干这活太累了，怕你年岁不行，现在让你去热饭。到十点半钟你就回去，负责把大家带的午饭都熇上。”我明白这是大家照顾我，为了减轻我的劳动强度。

我所在的工队因为成绩突出，被评为先进施工队，队里让我执笔写成的先进事迹和经验登上了报纸，还被录了音到各个单位播放。可在表彰会上，发奖的人给成员逐个颁发奖品的时候，唯独却从我面前一越而过。会后，工友们对于没有我的奖品很不理解，找到上级去质问，上级说：“她不是‘基本群众’。她家里有问题，她丈夫有问题，我们决定不能给她。”说实话，受到刻意羞辱的那一刻，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发烫，可转念一想，“这有什么可难过的呢？地上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转眼都要过去，我为什么还要看重这个名利呢？主啊，我是你的孩子，我的名字是要记在永远的生命册上，我的心也因你而满足了。”于是，我的心里马上就平安了，脸也不发热了。

与被下放劳动相比，真正难以忍受的是那些无耻的陷害和野蛮的批斗。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就被叫去参加学习，与我在同一学习小组的全是专门抽调的十多个积极分子，学习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批斗会，目的是要我放弃信仰，因此我成了第一个被批斗的对象。同组的人首先让我批判自己的信仰，他们把我围在当中，轮番上阵地斗争我。先有一个说：

“梁惠珍，我们知道你是个信耶稣的，你到现在还在信耶稣，我们认定你是个根深蒂固的老迷信。现在我问你一个话吧——天上能掉馅饼吗？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是怎么活着的？没有共产党，你根本就无法活着。你信耶稣，就是和无产阶级对抗，是没有好下场的！”

又有一个说：“你必须彻底批判你的信仰。你要是从此不信耶稣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吸收你入党。你只要肯当众表个态，不再信耶稣了，一切就都好办了，你也不用再受这么多苦了。”他们见我不说话，就叫嚷得越发起劲儿：“你批判信仰不批判信仰？”“你还信不信耶稣了？”“你回答问题，你交待，你为什么信耶稣？”

我说：“信耶稣，是我自己里面的事，跟我的工作并不矛盾。我里面信耶稣只能叫我更好地工作，并没有妨碍工作，只能使我更好地工作……”

没等我说完，这群人就起来乱喊乱叫地打断了我的话：“胡说！”“不对，这是唯心主义！你知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吗？”他们跳起来，手指着我的鼻子，冲我歇斯底里地狂喊：“你胡说！”“胡说！”

从这时起，我就不再说话了，只是坐在中间，闭着眼睛，任由他们肆意喊叫。除了强迫我放弃信仰之外，他们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企图逼我和相忱离婚。他们说：

“我们认定你现在根本和他没有划清界限，你们坐的还是一条板凳！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还给他写信，你还给他寄东西，你到邮局给他寄东西，一大包一大包的，我们都看见了，你给他寄东西，寄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你并没有和他划清界限，你还是跟他坐一条板凳！”“你和反革命坐一条板凳，你必须划清界限！你得和他离婚！”“你必须跟他划清界限，必须跟他离婚！”“叫你跟他离婚，你听见没有？”

他们强令我不得再和相忱保持通信联系，说：“我们若是发现你还和反革命分子袁相忱联系，一定不轻饶了你！”

我明白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我放弃信仰，要我和相忱离婚，他们既然不容我稍作分辨，我就干脆不说话了，只是坐在中间默祷：“主啊，我完全地仰望你，求你帮助我！”这时，他们见软硬兼施都达不到目的，就撕下伪装，转而对我施以最狠毒的谩骂和人身攻击。一群人围着我，吐沫横飞，声嘶力竭地吼叫：“梁惠珍，你是根深蒂固的老迷信！我们看你是不堪救药啦！”“大家看看这条死鱼！死鱼不张嘴，她现在就是死鱼，她连嘴都不张！”

看我还是不为所动，他们就更变本加厉：“她的脸皮还真厚啊！你看我这一身汗了，咱们都一身汗了吧，她倒睡着啦。”

原来他们把我的默祷当成是在睡觉了。“你看她坐在中间睡觉呢！你

说你的脸皮，一丈八尺厚，比城墙都厚！”“你脸皮多厚吧你！我们斗争你都一身汗了，跟你嚷嚷，你还敢睡觉！”

最后，这一伙批斗我的人使尽了浑身的解数还是不能压服我，他们中的一个摆开一副要冲我动手的架势，举着拳头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伙也跟着一块扯着嗓子喊开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那个人凶相毕露地指着一间储放杂物的小屋，威胁我说：“今天要关你的后屋！后屋都给你预备好了，你就甭想回家了！”

我心里一紧，猜想他们可能要把我“关牛棚”，不免掠过一丝的惧怕，但我还是咬紧牙不答话，只在心里向神祈求：“主啊，求你搭救我！求你搭救我！”好在这帮人喊够一阵后就把我放走了，并没有真的对我“武斗”。我相信，这是出于神的保守！他们一天不落地开我的批斗会，一连斗了我很多日子，但是斗来斗去，他们再也要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就换了题目。他们说：

“这个问题，你甭想蒙混过关，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现在先给你挂起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本身的问题，你得老实交待。”

我不得不一怔，我本身的问题？我本身有什么问题呀？我睁开眼睛，看着他们。“本身的问题，听见了吗？本身的问题！”我很奇怪，就问他们：“我本身什么问题呀？”他们听我终于开口说话，马上来了劲儿，厉声说：“贪污问题！”我的脑袋突然“嗡”的一下，觉得全身的血都在往上涌。他们一个一个地接着说：

“你们家里八口人，你不贪污，你怎么生活呀？你看你挣那点儿钱，你怎么生活的？你就是指着贪污吃饭！”

“你今天不要再想蒙混过关，现在外头检举你的材料都这么厚，你如实交待，你如实退赔！”

“你趁早儿一个一个地交待清楚，甭想蒙混过关，你今天是过不去的！”他们见我还不说话，又加紧逼问我：“以前的问题，你都不回答，现在这个问题是你自己做的，你这次没法抵赖了吧？”

“你贪污了多少？你说呀！你说呀！”

“你怎么还不说话啊？你有嘴没有？”大伙这个说完那个说，七嘴八舌，个个都如同凶神恶煞一般，就像要吃了我似的。此时我压抑了一肚子的苦闷、冤枉却没有人可以诉说，单位里的所有人都对我板起了面孔，有的见到我就故意往地上“呸”地啐上一口唾沫，回到家我也不能把这些事对婆婆和孩子们说，更不能写信告诉相忱……唯有每每在祷告中流着泪，向神倾诉：

“主啊，我明明没有贪污，他们怎么说我贪污呢？他们怎么可以卑鄙到诬陷人的地步？”这样的日子真是难熬，单位里在我前后受到审查的几个人，有一个被气得半身不遂；另有一个被逼疯，直到我退休时还住在疯人院，就是因为有二十七元钱没有查清楚；还有一个，自杀了。我心里软弱的时候，也曾经想到过死的念头，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主不喜欢。在我濒临绝望的时刻，主的话光照了我的心，“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 12：19）我的心豁然开朗，大得安慰，“主啊，你是公义权能的神，我还畏惧什么呢？总有一天要水落石出，总有一天会清楚的，我也没做坏事，我也没有贪污，我害怕什么呢？”心里得到了平安和力量，再受批斗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样胆怯了。有一次，我觉得我该说话了，就正色地告诉那些正在批斗我的人，说：“我一分钱没贪污过！”那群人一听这话，就好像真的抓到了我的把柄似的，一下子都窜了起来，拍着桌子吼道：

“呵！你敢拉这个口子！”“你敢拉这个口子不敢？给她记上，她说她一分钱也没贪污！”“给她查！她一分钱没贪污，一分钱没错帐！啧啧啧，她多清白呀！”“给她记上，给她查！”这伙人搬出了他们的“证据”，“哪天哪天，你装了一百元，哪天哪天，你又装了二百元，你把钱都带回家去了。”“哪天哪天，我们都看见你怎样怎样。”虽然他们煞有介事地把这些子虚乌有的谎言涂抹得活灵活现，就好像他们真的亲眼看见过一样，但我的心里反而更加坦然了，因为他们所说的这些事我都没有做过，这些话都不过是他们的信口雌黄罢了。就这样，我被整整批斗了半年，这

半年里，我处处都是低人一等，时时都遭人白眼。在被人啐吐沫的时候，我想：“主啊，你在世的时候，也是被人唾弃，遭人鞭打。学生不能大过先生，我这点又算得什么呢？”想到主，我心里很平安，一点不觉得难过。

忽然有一天，周围的人对我又恢复了以往的笑脸，我已经有半年没有见过人们的笑脸了，我想事情可能有了转机。果然，我所在那个“学习小组”的组长来找我，故作亲切地说：“梁师傅，你没有问题啦。可你为什么不能揭发别人呀？你应该争取主动嘛。”我说：“我没有问题，我自己知道啊。别人怎么样，他们知道，我也没看见，我不能说人家的坏话。”那人还不死心，接着鼓动我说：“你应该争取立功啊！你没问题，你就大胆地揭发，你看有什么可疑的都可以揭发。”可我是基督徒，怎么能随着外邦人撒谎呢！我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好意”，说：“我自己没贪污，我自己知道；别人贪污没贪污，他们自己知道。”这些人看我不为所动，就转去斗其他的对象了。又过了几天，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老梁，现在运动接近尾声了，我们对你的问题都查清楚了，经过内查外调，你确实没问题，我们以前对你只不过是大胆的怀疑。”我感到一块石头落地了，心里不住地感谢主，口里却只能说：“我相信：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他说：“你说的对。你看有问题的，贪污了五千多元的，都下放了。既然证实你没问题，我们决定还要你官复原职，你原来做什么，你现在还做什么。”我说：“队长，我岁数越来越大了，钱是不能再管的了。”队长打着官腔，说：“你革命不革命啊？你要革命你就还要管，你有问题，想做都不给你，还要下放你。现在都证实你没问题了嘛，你还要管。”也不容我再多说，就把我原先的工作又一股脑儿地推还给了我。

这场劫难中的种种残暴行径，将人犯罪堕落后的本性暴露得淋漓尽致。我的单位有一位同事，造反的红卫兵就在他住的院里残忍地打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被五花大绑，吊在树上活活饿死，他被吓得不敢回家，躲在单位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福声的班主任徐老师本是一位和蔼又有同情心的中年妇女，在家访时看到了我们的生活状

况后，就特别关心福声，还为福声买过一双鞋。可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竟也在文革中被逼得自杀了。如果不是有神作我的依靠，我自己也难逃与她同样的噩运。

至于圣徒们在当时所承受的逼迫则更是难以言表。一次，我经过东四，在胡同里迎面遇上了萧太太的二女儿萧语平，她穿着一身肮脏褴褛的衣服，吃力地蹬着一辆收集泔水的三轮车。她的丈夫陈以和弟兄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曾任北平基督徒学生会的文字组组长，负责编辑出版学生会的刊物《基督徒真理报》。一九五五年，在王明道先生被捕的第二天，陈弟兄闻讯赶到史家胡同的基督徒会堂，质问在那里看守的警察，随即被当场逮捕。一九六〇年，陈弟兄也被押解到兴凯湖农场，就是在爆破冻土时的一次事故中，不幸被炸身亡。留下语平自己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艰难中度日。文革开始后，语平在街道也被批斗，受到极其野蛮的殴打，打手们甚至把滚烫的开水浇在她的头上，直到把她打得昏死过去。在被抬上火葬场的汽车以后，别人才发现她竟然还有一丝微弱的呼吸，这才又把她抬了下来。但那些恶者并没有就此放过她，语平又被强迫去每天掏洗公共厕所和收集泔水，以此来继续侮辱她。

我们俩站着，手拉着手，却都哽咽着说不出话，她也哭，我也哭。我心里为自己的姊妹难过，却没有办法帮助她摆脱困境，唯有和语平相约彼此代祷。她的大姐语中这时还在狱中，萧太太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家里还有语平和弟弟语正。我知道她们生活非常困难，就常给她们送一些挂面之类的食品。萧太太一家已经被赶到同院的一间小房子里，她们原来的正房里住进了一个军人。我去看望萧太太时，经常遭到那个军人的盘问和阻拦。一次，我从萧太太住的里院出来，在外院的一位中年妇女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对我说：“你是信主的吧？我也是信主的。我见你常来看萧太太。”她告诉我：“里边的那个军人是专门派来监视萧太太的，凡是来看萧太太的人，他都要盘问。你以后再给她们送东西，就先交给我吧，我可以找机会帮你送进去。”这位姊妹姓李，是一位护士。我非常感谢神在这里还预备了一位满有爱心的肢体，从那时起，我就把

东西交托给李姊妹代转。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由美国政府出面交涉，萧太太一家才最终得以返回她的故乡。语中出监回国前，来家里看我，交给我一件她在监狱里穿过的长毛的山羊皮大衣，要我寄给相忱，语中说她也在东北呆过很多年，深知那里非常的冷。

政治压力也波及到了几个孩子，文革开始以后，他们都被打成“黑五类”子女，无论在工厂还是在学校，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福音的工作很出色，很多别人做不来的活儿他都能应付自如。之前首钢的领导来家访时，曾当面对我夸奖他说：“这孩子很好，就知道闷头干活。”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人家要福音交待父亲的“罪行”，要他必须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他们追问福音有没有和父亲通过信，又强逼福音按他们所规定的口径给相忱写信，劝说相忱“认罪悔改”。可福音却坚持对他们说自己的父亲只是一名传道人，没有“反革命”，更没有做过坏事。那时的历次运动搞的都是所谓“人人过关”，其他的人都过去了，就剩下福音总也过不去。为此厂里在上班之余还每周开三次会专门“帮助”他，最后，人家给他下的结论就是“认识不清楚，划不清界限”。以后的每次运动，福音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帮教重点”，因为他总是和父亲“划不清界限”。但福音回家来，这些事他一个字没有说过，都自己默默地承受了。

相忱离家时，从老三福声下边的几个孩子都还在上学。福声最淘气，外号叫“猴三儿”，他是唯一因为不听话被相忱打过的孩子，也是唯一学习不好的，还曾留过一次级，结果一九六五年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平湖一起从初中毕业。毕业后，福声在家里等着分配工作，可他的通知书却迟迟没有下来。一天福声的几个同学来家里，说是负责招工的办公室叫他们来看看福声为什么还没去分配的单位报到。正巧那天是个星期六，我也在家。我听说他们各人都早已收到了招工单位的通知书，就问他们：“你们怎么得到通知书的呀？”他们回答是从学校发下来的。我一看时间才下午四点，就决定马上去福声的学校问问。找到了主管分配的老师，他说：“现在我告诉你吧，他的通知已经来了，是我们压下了，没有发。”



因为什么缘故？很坦率地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父亲的原因。家里有关押的人，子女不能留在北京，只能往外走，所以袁福声的通知我们压下来没有发。”虽说几年之间我已经不是初次遭遇到这样的情形，但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中我却感觉仿佛被置身于一个冰冷的世界之中。我尽可能平静对那位老师说：“那就没什么了，我家里是双职工，平常没人，我怕把通知书丢了。”停了停又说：“这个是不可回避的，大家都知道。”他说：“是的。我们没发，将来要分配到外地去。你回去吧。”这个结果对孩子影响很大，既然去外地已经不可避免，福声就主动报名参加了去宁夏的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是第一批兵团成员，条件最为艰苦，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盐碱水。寒冬季节，连着几天不分白天黑夜地在贺兰山上修引水渠，人人又冻又饿，福声却依旧很喜乐，照样唱着《诗篇》第二十三篇。感谢神的保守，福声所在的兵团没有搞过整人的运动，所以他在那里没有受到什么政治冲击。可是他这一走就是整整十一个年头，人家都是从城里往兵团带吃的，福声却把省下来的大米利用探亲假带回来给我。

平湖本来也得去农村插队，但临出发的前一天忽然发高烧，连站都站不稳，要我搀着去医院看病。这样她才被允许暂时留下养病，等待和下一批人一起走。没想到平湖刚好，我就患急性阑尾炎住进医院。给我做手术的医生说，我的盲肠里面都是常年吃玉米面遗留的渣子。我躺在床上的二十多天，全靠平湖做饭和看护我。因为我的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平湖终于被同意留下了，这真是神的格外怜悯。同样是出于政治上的压力，条件好一些的大工厂哪个也不可能接收像平湖这样有出身问题的人进厂，第二年初，她被招工到一家街道办的小厂，当上了磨工。平湖工作踏实认真，技术也很出色，是工人中少有能熟练掌握四种不同磨床的技工。她连续三年都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但是工厂每次报送参加市级评比的先进都被换成了别人。厂领导把她找去谈话，说：“袁平湖，你现在的工作很好，但要拿到市里比你就不行了。你只能在厂里当先进，不能拿出去，因为你父亲有问题。你有意见吗？”平湖说：“我没意见。”等到了“五一”、“十一”这样的节庆日，大家都去参加庆祝活动，去唱歌、跳舞，却把平湖和厂里平时调皮捣蛋、表现不好的几个人一起

留下干活。平湖的班长很为她打抱不平，就找到当时负责工厂的军代表反映，说：“出身不好不能怪袁平湖，人的出身不可以选择，你们不是老说要给这些人出路吗？”军代表对此的回答竟然是：“对于这样的反革命子女，我们已经够宽大的了。她现在有工作还能拿工资，给她工资就算是给她出路了。她还想要什么啊？”环境也促使这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姑娘养就了自立的个性，几十公斤重的钢质主轴都是她自己在机床上搬上搬下，从不求人帮助。世人虽然离弃，神却依旧眷顾他的孩子。每次工级考评的时候，平湖都因工作成绩突出被免试晋级，还曾一次被晋升过两级工资。

福乐初中毕业后考取了一所技校，以后被分配到贵州天然气化工厂，在那里工作一直到退休。

几个哥哥姐姐都陆续工作了，轮到最小的爱湖初中毕业时，家里的条件已经有了一些的好转。这时我深感到孩子们知识的不足，应该尽可能让他们多念些书，就想让爱湖继续上高中。我去学校，向老师说明了来意，没料到老师竟冷冰冰地给我泼了一盆凉水：“你别幻想啦！‘黑五类’的子女不让考高中。我告诉你，像你们这种情况，升学和招工都不可能，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趁早赶快下乡去吧，不然以后越走越远喽。”这次去学校，还意外地得到另一个使我震惊的消息，爱湖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我在学校没找到袁爱湖的名字，一问才知道她已经改名叫梁永红了。回来我问她：“你为什么改名字了？”她回答说：“我姓您的姓不一样嘛。”我心里很难过，却没再多说什么。后来她自己去把户口本也改了。

与父亲分开的时候，才刚七岁的爱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对父亲的印象比较模糊。那时，几个大一点的孩子都能懂得我的心情，从不问父亲的情况，只有爱湖总是不住地问我：“我爹去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有一天，她从外边哭着跑回来，告诉我说：别的小朋友骂她，欺负她，不跟她一起玩，说她没有爸爸。孩子追问我：“我爹到底在不在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童年生活中的那些阴影促使爱湖在学校更加好学上进，在小学她是大队长，中学是校学生会的干部；这孩子很聪明，

学习也很好，回家很少看书，但考试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因为她不明白相忱被捕的真正原因，只隐隐地觉得自己的父亲有问题，又加上当时社会的环境，所以她就加倍表现，凡事都比别人更加积极，希望借此可以摆脱那个一直缠绕着自己的梦魇。但她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得到承认，她仍是处处低人一等的“黑五类子女”，连学校的很多政治活动都不许她参加。失望之余，争强好胜的爱湖就在她即将初中毕业前做出了那件令我十分痛心的举动。相忱在家时，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严格，尤其注重建立他们的信仰，要求他们必须参加教会的主日学。从前，相忱是全家属灵敬拜的带领人，相忱走后，我却并没有能够很好地继续他的工作。我很矛盾，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我没有直接向他们讲过福音，也就找不出办法把家里的事向他们讲解清楚，只能经常简单地告诉他们：“你们的父亲没有做坏事，他是为主的缘故。”孩子们都听着，但不吭声。特别是文革中，他们都被打成“黑五类子女”，孩子们的心里都感到压抑，都有着解不开的疙瘩。我也常为孩子们祷告：“神啊，求你保守我们，不要从我和孩子们的身上羞辱主的名。”我固然是软弱，神却是怜悯我们。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之下，孩子们都很老实本分，工作和学习也很出色，没有一个学坏的。

在监狱里的相忱，或许是我写给他的只言片语中，也或许是从他自己在里面的亲身感受中，也隐约察觉到了外面环境正在发生的变化。原本从不过问家里生活的他，在文革开始后就接二连三地来信，反复询问家里的状况，问家里的生活、困难等等。当时，单位里还在天天批斗我，逼迫我表态和相忱彻底划清界限。我虽然严词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里面也正有着一股情绪，耐不住相忱的刨根问底，也没有体谅他对我们的关切，就给他回了一封信，信里说：你安心改造，不要再问这个，问那个了，什么都别问了，一切都交给主吧。在信的末尾，我特意为他抄了一段宋尚节博士编的赞美诗：“我有位天父上帝，吃喝穿何需忧虑？全世界一切所有，都在父手里。”从这封信之后的一个时期里，相忱和我们中断了通信来往。

进入文革后期，政治压力相对减轻了一些，主内的弟兄姊妹也开始渐渐地恢复了彼此的交通。一天，以前在基督徒会堂聚会的王洪义弟兄骑着车来找我，只说：“宋师母（即著名传道人宋尚节的遗孀）找你去。”王弟兄曾是大学生物系的学生，但他宁可去作木匠，也不肯在学校作老师去向学生讲授进化论。我匆匆吃了一口饭就赶到宋师母的家里，七十多岁的宋师母一见我就流下了眼泪，拉着我的手说：“你为我祷告吧！”宋家在文革中曾被造反派抄家，这时宋师母同女儿宋天真和女婿王恩庆夫妇住在一起，女儿在中学里的工作忙，常不在家，宋师母不免时常感到孤独与苦闷。这样，我有空就常去宋家陪宋师母一起祷告，老人的心也慢慢开朗起来。已经多年不见的刘淑洁姊妹也来家里看望我，她是杨津广弟兄的妻子，是同仁医院的妇科医生。这时杨弟兄还被关在山西劳教，他们的两个儿子被发配到东北的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她自己也受了许多磨难。我们两人都是流着泪，诉说各自在这些年里的遭遇。一九七九年的夏天，刘淑洁姊妹与我约定，我们俩利用公休日加班，把假期积攒起来，计划第二年的开春后去东北探望相忱。我非常感谢她的爱心，因为当时没有人敢说出去监狱探望相忱的话，她是唯一的一位。

在这些最艰难的年岁中，神借着各样的苦难熬炼我，带领我在苦难中更认识他，更亲近他。圣经中说：“**我受苦是于我有益**”，（诗篇 119：71）所以，我们不要惧怕苦难，没有经历诸般的苦难，就不能真认识神，不能真认识神的恩典。

## 七

一九七六年，中国历史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已然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到此被画上了句号。随着那股政治狂热的退烧，社会空气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也不再如以往那样生活在显著的政治压力之下。新的领导集团也开始调整政策，着手重新审查甄别在以往历次运动中所决定的一系列案件，很多重大的冤假错案纷纷得到了平反。

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福乐从东北探望相忱回来后，就和妻子一起

去北京市政府的信访办公室，问他们说：“我父亲为什么被判刑？而且判得那么重？那么多血债累累的国民党战犯都释放了，而我父亲不过就是思想问题，为什么还不能被释放？”那里的人也回答不了，只得先让他们填了张表格。福乐去过了两次都没有下文，我见他第三次还要去，就劝阻他说：“你别去了。一切出于神，交托给神吧。”

在那个时期，确实有一些早年因坚持信仰而遭关押的基督徒先后归来。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陈本伟弟兄。他是“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在上海被捕，并被遣送到青海劳动改造。陈弟兄原本是由他的妻子带领信主的，可他刚一被定为“反革命”，妻子马上就和他离了婚。文革中，陈弟兄在北京的老母亲被赶回原籍，但她在家乡的亲人却不肯接纳她这个“反革命家属”，走投无路的老人不得不远去青海，在儿子所在的劳改农场的墙外找了一间小屋栖身。陈弟兄解除劳教后，先回到上海，但他的前妻不认他，不许他进门，无奈之下他只得来北京找我。我很高兴地接待了他，因为我的婆婆已在一九七六年去世了，几个儿女或已成家，或在外地，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正好安湖一家刚分得了一套三居室的楼房，住处比较宽裕，我就安排陈弟兄晚上住在安湖那里，白天回我这里吃饭。直到他在上海原来工作的学校为他落实了政策，才送他回去。

一九七九年夏季的一天，我和福音抱着他的小孩正要出门去，在门外的胡同里正遇上杨津广、刘淑洁夫妇双双推着车迎面走来，杨弟兄认出了我，兴奋得连着自行车一起跳了起来。我引他们回到家，听杨弟兄说他也是前不久才从山西的劳改农场回来。杨弟兄询问我家里的情况，我一边给他讲着我们这些年的经历，一边拿出全家人的合影给他看，杨弟兄流着泪说：“我看到了你们，就看到了神的恩典！”我和在场的人都哭了。

后来我听说吴慕迦也回来了，就特意约上刘淑洁姊妹一起去看望他。吴慕迦被判的是十五年徒刑，服刑期满后又继续留在劳改农场里，近期才被允许回到原籍。吴家与我们住得很近，以前就常有来往，我知道吴的妻子不太善于家务，孩子又小，就常在休息的时候接她们来家里吃

饭，不断接济她们一些钱物，还找了一件旧皮袄给她送去，要她寄给在监狱里的吴慕迦。吴慕迦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所以我和刘淑洁姊妹特为他买了一只烤鸭，还另外带上三十元钱。在传道人中，吴慕迦的英文和希腊文都是出类拔萃的，我们在院子里就听见从他的屋里传出英语广播的声音。吴慕迦一见我们就说：“我不像从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了。”他这话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可更令我不解的是，我们一谈到有关信仰的话题，他就不回答，总是说些其他的事情岔过去。后来，吴慕迦看实在绕不过去了，才承认说：“我已经放弃信仰了。我们信耶稣的为什么要欺骗人呢？为什么要信呢？马克思原来是信主的，他还改了呢。为什么要信呢？我不信就是不信了，我不想欺骗人，我现在就是不信了，我批判信仰了。我不想再深说，怕你难过。我为你高兴，你没有和相忱离婚，那么多年都没有和相忱分手，我很为他高兴。希望你现在要多订一些进步的书籍，让袁相忱的思想转变得快一点，快点出来。他太固执了。”

我和刘姊妹都愣住了，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我真的不敢相信这话竟是出自吴慕迦的口中。一位曾经是那么有恩赐和能力的传道人，一位曾经在压力和逼迫之下坚守真道的忠心仆人，一位曾经为主忍受了二十多年捆锁的人，竟然在主已经为他打开了监门的时候，不认主了！吴慕迦见我们还在试着劝说他，就反复地说：“我不信就是不信了！”“我不信就是不信了！”他的话像鞭子，一下一下地抽打在我的身上，痛在我的心里。临走时，吴慕迦告诉我：“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们，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你来了我还得向一个高个子、长脸的人汇报。那人你也认识的。”我马上明白了他说的是谁，那个人原来也是基督徒学生会的，曾在王明道先生那里聚会过。我们带来的烤鸭和钱他都不肯要，说：“我郑重其事地说：你们也不要再拿钱来了，我不要。”吴慕迦说这番话时，他的儿子大卫在一旁问他：“你批判的是什么？算哪一类？”吴慕迦答道：“我就批判信仰。我现在不信了，不自欺欺人了。”大卫说：“你每次汇报就是做间谍工作，出卖人！”吴慕迦被自己的儿子说得哑口无言，只好沉默不语了。看见这种情景，我和刘淑洁姊妹也就不再多说什么，把东西和钱留

在桌上，转身离开了。

和我一样，孩子们也时时盼着父亲的归来。特别是福音，他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也最了解父亲的工作。相忱被捕后，福音独自一人跑到灯市口“三自会”办公的地点和缸瓦市教堂看大字报。大字报大多是批判王明道先生的，还有丑化王先生等人的漫画，其中也有一部分是针对相忱，说相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三自会”在大字报上把“福音堂”和王先生的基督徒会堂等都称为专与政府作对的“地下教会”，要把相忱从阜成门大街一百六十号“福音堂”里赶出来。这些事情当时他都没有对我说，他虽为父亲的遭遇感到无比悲伤，但他相信自己的父亲绝不是像大字报上所污蔑的那样，即使后来在运动中他也从来没有承认父亲是个犯了罪的人。现在，福音看到越来越多的冤案被平反，越来越多的人得到释放，就萌生了为父亲申诉的念头。他找到北京市宗教事务处，可那里的人一听他讲出事情的原委，马上推说袁相忱的事与他们无关，又说领导都不在。以后福音又去了三四次，每次不是说他们不管这事，就是说领导不在。最后他们看福音总是来找，才不得不说了实话：“他的事情很复杂，放了他还能放王明道吗？这个不可能翻案了，就这样了，没有放回来的可能了。”

福音不愿就此放弃，又和我商量再向法院写一封申诉信，信上说：“我是袁相忱的儿子，我父亲是一九五八年四月被捕的，但我不清楚我父亲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不知道，我家里人也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被判这么重的刑。我觉得我父亲不应该判这么重。现在有许多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我父亲这种情况，能否平反？”

大约过了半个月，法院给福音回信，让他去面谈。在法院的接待室里，一个女工作人员坐在桌子后面，福音坐在对面的小板凳上。那个女的问过了福音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就说：“你这一封信不要紧，我们费了许多的事去调查。我们今天叫你来，就是告诉你：你父亲的问题很复杂，具体的不能跟你说。他跟王明道一样，是反革命集团的首恶，问题很严重，我们一九五八年对他的量刑是很确切的，也是很恰当的，不能改变。”

福音反问她：“我父亲的情况再复杂，也应该能说得清楚，如果说不清楚，你们又是依据什么判刑的呢？”那人不回答福音的提问，却说：“你的出身是不可选择的，但道路可以选择，你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工作。”

福音不理她，继续说：“我父亲的事情我了解，我是他的大孩子，他被捕时我已经十八岁了，我知道他没干过什么坏事，但不知道你们怎么就判了他个反革命！刘少奇当初不也被判反革命吗，后来你们又说是判错了，你们都能把国家主席判错，更何况是其他人呢？”

法院的人打断了福音的话，很恼火地说：“你别往刘少奇那里扯！刘少奇是刘少奇，你父亲是你父亲！”说完就把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交给福音，纸上印着法院的正式答复。福音去法院面谈之前并没有告诉我，他从那里出来时已经是快中午了，就直接到单位找我，把从法院得到的那张答复交给我，语调低沉地对我说：“没什么希望了！”

我看那上面的标题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函，正文是：

“袁福音：你的来信已收悉。经复查认为：原我院（58）中刑字第1013号刑事判决，对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确的。特此函告。”

日期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下面还盖着中级法院的大红印章。我看了，也觉得是没什么希望了，不由地叹了一口气，安慰福音说：“交托主吧，我们只能等候！”就在法院把福音找去谈话的前几天，我忽然接到相忱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若是主许可，我也许很快就能获释。”我先是一阵惊喜，接着又开始疑惑，相忱怎么只说可能获释，却又没说任何具体的原因呢？现在法院都说不可能释放了，谁还能有法院说得更准呢？

过了几天，福声的妻子告诉福声说：“我梦见你爸了，好像他要回来了！”福声听了，只是笑了笑，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时，我不慎摔断了一只胳膊，生活需要有人照料，经过申请，有关部门在第二年终于同意把福声从宁夏调回北京。后来福声成家了没有房子，只得在我那间房子的对面搭了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暂住。福声的妻子也



曾在兵团呆过，起初介绍人并没有告诉她我们家里的事，只说福声的父亲不在了，所以她先前并不知道福声还有父亲，更不知道相忱在东北。但她却有一次梦见自己在井边遇到一个人，和她说话，醒来后她对福声说：“跟我说话那人好像是你爸爸啊！”这次是她第二次梦见相忱要回来。可福声想着自己的妻子根本没有见过公公，大概是她前些日子听到父亲的来信说要回来的事，才有了这种想法的，所以当时他也没跟我说起这事。我也认为相忱的情况和杨津广他们不太一样，相忱判的是无期徒刑，况且法院刚给的答复上又是那样言之凿凿，看来至少在近期内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五点多钟下班回家里，看到一封邮递员刚刚送来的电报，内容是：“我十二月二十二日乘车，二十三日晚十点半到。请接我。”下面却没有署名。我就想，这是谁发的电报呀？怎么连个名字都不写呀？再看看电报发出的地址——吉林省太平川，也是个我从没听过的陌生地方，我想来想去，实在琢磨不出有谁会在这个叫太平川的地方给我发电报。晚上有一位福乐的同学来家里，我想起他的妻子恰好是在东北工作，前不久来北京看病，还在我这里借住过十来天，就问他：“这是不是你爱人来的电报啊？没有写名字。”他看了电报上的地址，说：“不是我爱人发的电报，我爱人在吉林市。”福声忽然灵机一动，冲我说：“妈，说不定是我爹发的电报！”我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手里那张没有名字的电报，心想：这丢三落四的事儿倒真像是相忱做的，可地址又明明不对嘛！相忱是在黑龙江，不是在吉林啊！福声已经一溜小跑地回到他那间小屋里，翻出一本列车时刻表，边看边兴奋地大声说：“没错！一定是爹回来啦！您看，从革志有车到太平川，从太平川又有车到北京。爹一定是在太平川上的车，明天就能到啦！”我看着福声那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心里也是热乎乎的，可转念一想：上个月法院刚给的答复，哪儿能这么快就有改变呢？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都觉得这不可能是相忱发来的电报，大概是某一位朋友要来。最后我们决定，既然收到了人家的电报，那么就不论对方是谁，我们明天都要去接站。

第二天，我下班回到家，还没进屋门，就见福声从屋里迎面冲了出来，朝我大喊一声：“妈！”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喊声吓了一跳，不容我开口，福声就一口气儿说道：“我爹来信啦！我昨天说是我爹要回来，您还不信，您看，现在他的信来啦！”说着，就把一封信塞到我的眼前，信上写的是“我就要回来了，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接我。接站的日期，我再打电报告诉你们。”我看那上面千真万确就是相忱的笔迹，相忱真的要回来啦！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原地一连把这封信又看了好几遍，直到福声的妻子来催促我们赶紧吃饭，好早点去车站接人。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个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好消息搞得有些手足无措，晚饭时谁都吃不下去，只草草地喝了点粥。福声又赶到安湖和平湖的家里，把相忱今天晚上就要回来的消息告诉她们。

福声和安湖夫妻跟着我一起到车站去接相忱。虽然相忱坐的那趟车要十点半才到，可我们大约在八点半就到了北京站，四个人分别把住火车站仅有的四个出口，在紧张和焦急当中，等待着……寻找着……期盼着……

我们四个人虽然没有商量过，但不约而同地都在各自的心里为相忱画了一幅相同的肖像：自己的亲人，一定已经是个衰残不堪的老头了，弯腰驼背，步履艰难，甚至想到过没准接回来的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十四年的北大荒生活，风餐露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种种非人的折磨，这样的结果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们都想着，人能回来就不错了。已经十四年没有见过面了，我们谁也想象不出相忱可能会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戴着什么样的帽子，二十二年前，他离开我们时的印象，此时还能比较准确地显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就只剩下那副眼镜。我们紧紧地盯住每一个戴眼镜的人，挨个地细细辨认……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车站里出来的旅客也越来越少，可还是不见相忱的影子。终于，站里再也没有人出来了，我们却仍在翘足张望，不愿离去……车站的工作人员就要锁大门了，我们赶忙问他，里面还有没有人？火车是不是晚点了？工作人员说：“那班车早到

了，人都走完了，没人了，你们别在这里傻等着了，回去吧。”

出站口的大门关闭了，原本昏黄的灯光熄灭了，周围的人声也寂静下来了，我们心里的希望也已仿佛被这一片无声的黑暗湮灭殆尽了……四个人就这样站在寒冷的北风里面面相觑，疲劳的身体，酸楚的眼睛，我们都沉默着，不知所措……我们已经在这里足足等过了四个小时，可还是不甘心就此离开，困惑……失望……

过了好半天，安湖噘着嘴，话音中带着哽咽说：“我爹又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又回不来了……”我看她的眼睛里噙着亮晶晶的泪水，不由得自己的鼻子也酸酸的，我和她的想法一样，也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深深的愁绪笼罩着我们，从极度的兴奋激动跌入到极度的失望，这种大起大落的反差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精疲力尽。

这时已经过了子夜时分，正常的公交车早就没有了。安湖家住的朝阳门距离车站不远，她怕我回家路远，也怕我一个人回家心绪不宁，就说：“妈，您今晚就去我家吧，明天再回去。”我说：“不用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呢。”安湖见我走，忙说：“我给您找辆出租车吧，现在也没车了，坐出租回去方便些。”那时北京大街上还没有自由运营的出租车，不仅只有在不多的几个点上才可能雇到车，而且价钱昂贵，不过北京站前的广场上正好有一个出租车的点。我谢绝了女儿的好意，说：“不用了，雇出租车多费钱啊！我和老三坐夜班车回去就行，挺方便的。”安湖又说：“那我给您雇个三轮车吧。”我说：“三轮我更不坐了！十二月天，多冷呀！”

安湖他们俩走了，我和福声也向着夜班车站的方向走去，一路上我努力搜索着从身边远近经过的每一个人，想着相忱或许不认识路，正在四处乱走；上了车，我又把车上那不多的几位乘客一一察看了一番，又想着相忱或许也正在这辆车上。

在车上，福声和我，谁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想着各自的心事。汽车在深夜空旷无人的路上开得飞快，然而离家越近，我的心就愈发地往下沉，不住地默祷着：“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夜班车只到西

四，我和福声还需要再步行一站路才能回到白塔寺的家。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在寂寥的街道上，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无法平静，风卷着尘土打在我的身上，让我不禁又想起了二十一年前的那个夜晚……

走入白塔寺，我顺着那条熟悉的小巷机械地朝家里走，远远地可以看见我们的家了，我的眼睛被从窗户里透出的灯光猛地刺了一下，我明明记得出门前亲自关灯锁门，把钥匙交给了对面小屋里的儿媳，这么晚了不会一个人呆在我的屋里……难道真是……我的心热烈地跳动着，脚下不知不觉地已经开始小跑，身后的福声也跟着跑了起来……

我推开门，只见一个光着头，穿着一身黑棉袄的人正坐在板凳上洗脚，我一眼就认出那正是相忱！福声两口子也随后进来了，儿媳在门口悄声问福声：“这是你父亲吗？”福声喜出望外地一连声答道：“是啊！是啊！”意外地突然相见，谁也说不出什么，也不知该说什么。除了有点老，有点瘦，相忱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最大的差别就是没有戴着那副近视眼镜。这时，儿媳故意笑着揶揄福声说：“你可真笨！你这怎么接的人啊？你没接着人家，人家自个都回来啦！”相忱接口说：“我等了半天，也找不着你们。”我说：“我们也等了半天，找你也找不着啊。”一家人都呵呵地笑了。

相忱坐的那趟火车确是晚点了，本来应该是十点半到，结果十一点多钟才到站。他穿的是一身黑色的棉衣，戴着大皮帽子，只露出两只眼睛，又没戴着眼镜，加上出站口的灯光昏暗，所以我们四个人谁也没有认出他来。相忱在那里也没看到我们，就以为或者是家里没接到他的电报，或者是因为车晚点，接他的人等不到他，就先回去了。他只想急着回家，也没顾上再仔细找找家人，出来就直奔 103 路汽车站。可找到了站牌才发现末班车早已过去了。我问他：“那你怎么回来的？”相忱说：“我也不认识路，正好车站上来了两个人，说要坐夜班车去白塔寺。我就一路跟着那两个人走。我也是从西四下车走回来的。”相忱走的时候，北京站还没有建好；二十多年间，北京城市的变迁很大，街道拓宽了，白塔寺的庙门也拆了，街道两旁的景观与当年完全判若两样，相忱还能找进

去，全凭神奇妙的带领。

白塔寺院里也完全没有了相忱在时的原貌，空地上挤满了各家搭建的临时房屋，把曲折狭窄的巷道夹杂在中间。虽然他碰巧走在我们所住的西夹道，但他根本不知道哪间是自己的家，那时已经过了十二点，各家都已关灯休息了，院里也没有一盏路灯，他在一片漆黑中看不到门牌号，只能由南向北一路往前走，边走边喊着我的名字：“梁惠珍，梁惠珍！”也没人应答。走到最里头，那里还有一家没睡觉，就在屋里应道：“梁惠珍在前边那间最高的房子。”相忱不知道那人说的是那间高房子，猜想自己可能是走过头了，就折回来又往南走，仍是边走边喊。福声的妻子本来是在家里等着我们，时间太晚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时候相忱的喊声把她唤醒，听清是有人在外边喊婆婆的名字，就问：“我妈没在家，她去车站接人了。你有什么事？”相忱说：“她接的就是我！”儿媳一听赶紧起床，出门看见相忱，这是她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公公，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说自己是福声的妻子。她拿出钥匙打开我的房门，把相忱迎进屋里，又打水给相忱洗脸洗脚。正这时，我和福声就回来了。

相忱洗漱好了，我连忙找出预备好的衣服给他换上。一个月前，陈本伟弟兄的母亲陈老太太从青海寄来一个包裹和一封信，信上说：“我看这里好些犯人穿的衣服非常得褴褛，就想起我的牧师是不是也那么褴褛，没有衣服穿，所以我有感动做了一身衣服，给我的牧师穿。”包裹里就是那套古铜色的棉衣。还有北京的一位姓赵的大夫，也是信主的，听说我要去探望相忱，就托人送来一大包衣服，有绒衣绒裤和衬衫等等，有新的，也有是穿过的。原本这些衣物是准备我在来年春天去东北时带给相忱的，不料现在就用上了。这真是神的预备！相忱换衣服时，我吃惊地发现原来他的棉袄里面竟然只贴身穿着一件背心，而且背心上也是补丁擦着补丁，更令我惊奇的是他穿回来的那身黑棉衣异常的粗重，几乎竟能自己立住。

既然相忱是被判的无期徒刑，是没有希望回来的，为什么又回来了呢？相忱写来第一封信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那时政府对于监狱在押的

犯人已经制定了一项新的措施。因为当时中国各地的监狱里关押着数量庞大的重刑犯人，很多人都关了二三十年，普遍都已年老体衰。虽然他们大都是像相忱一样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判处了重刑，但究其实质不过是历次政治运动下的产物，继续长期关押下去不仅意义不大，而且越来越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所以政府就在一九七九年的下半年做出决定，分批释放那些年龄在六十岁以上，实际失去劳动能力，并且在监狱中改造超过二十年以上的犯人。与此同时，革志的黑龙江第一监狱也开始有符合释放条件的老犯人，断断续续地离开。相忱看到这一情况，心中一动：“我不也是符合条件的吗？难道是神要我出去再继续为他工作吗？”他这样想着，但心中又有疑惑。直到后来，经同监中其他已获释的人证实，政府确实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要分批释放劳改超过二十年以上的重刑犯，相忱就马上给我写了那封“若是主许可，我也许很快就能获释”的信。但他在信上没有讲出具体原因，何况那一张小小的明信片上的确也写不下这么多的内容，我当然无从知晓内中的详情。并且这次释放的计划是由监狱负责执行，监狱放人后，才再到原判法院备案，所以北京的法院也不了解这次行动，就给了福音那样一份答复。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相忱收工回来吃午饭的时候，正吃的中间，监狱领导进来念公告。相忱和所有犯人就都站立听着，在此之前的几天里，每天都要念几个人的名字宣布释放。这些天里，他们的农场前后已经有三十多人被释放了。二十日这天中午，相忱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当时他很平静，在平静中也有阵阵的兴奋。获释的人，吃完饭后就赶紧收拾东西，相忱收拾行李时，把有些东西丢掉，有些东西送人。监狱方面为将要出狱的人每人新发了一套黑色的棉袄棉裤，把他们原来那灰色的，后面印有“犯”字的劳改服装替换下来，表示这些人已经不是犯人了，另外还给每人发了六十元钱，作为遣返费。回到家里，相忱把监狱发给他的这六十元钱交给我，很高兴地说：“我还带回来六十元钱，给你买点什么吧。”相忱以前就从不留心家事，对钱也没有什么概念，在监狱里呆过了二十多年，他根本不知道这时的六十元钱已经不算什么钱了，还觉得是个大数目呢！我笑笑，说：“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人回来就好

了。”相忱还带回来一条被子，我一看都烂得不成样子了，就把它扔了。相忱看着我拾掇他带回来的东西，呵呵地笑着说：“我要知道这会儿咱家里这么阔，我就不必大老远地把那些破烂带回来了。”

被宣布释放的那天下午，相忱已不用去劳动了，收拾好个人的东西只等着离监回家。他当即写了一封快信，告诉家里他已经获释的消息，因为还不知道可以离开的具体日期，就只说要我们准备接他。第二天清早，监狱为他们发放《释放证》。相忱领到的是编号为“79刑清字第655号”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裁定书中写着：“对罪犯袁相忱予以假释，考验期限和剥夺政治权利均为十年，从假释之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止。”裁定书签发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单位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

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拿到释放证的当天，相忱就马不停蹄地即刻启程。他先是从监狱步行三公里到长途汽车站，从那里坐汽车到革志县城，再从革志搭上开往北京的火车。革志是个小站，只有慢车经过。火车从革志开出后，由于天气太冷，蒸汽机车热能不够，车速就减慢，再加上沿途要不断停靠很多小站，慢车就成了慢慢车。而这时，归心似箭的相忱在这趟慢吞吞的火车上如坐针毡，当车开到吉林省的太平川车站时，相忱当机立断下了这列火车，准备在太平川这个大站换一趟快车回北京，哪怕能早一秒钟见到家人都好。他下车后先直接去买好了快车的车票，随后又赶到车站的邮电所给家里打电报，通知我们二十三日晚十点半去接车。相忱打电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邮电所快要下班关门了，在营业员一个劲地催促之下。相忱只来得及匆忙写下了“我十二月二十二日乘车，二十三日晚十点半到。请接我。”这些字，却忘记了写上自己的名字。营业员因要急着下班回家，也顾不上认真查对，所以这封无名无姓的电报就这样发了出去。相忱是先发的信，后来在半路上发的电报，但是电报却比信先到了，却是一封没有姓名的电报，当然我们在二十二日傍晚接到电报时弄不清要来的人到底是谁，直到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三日接到他先发出的那封信，才恍然大悟。

我告诉相忱，王克忱师母这么多年一直在为他祷告，相忱马上就要去看望王师母。在他到家的第二天，我下班后带着相忱去了王师母家。一进门，我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说：“师娘，您猜我带谁来看您了。”相忱叫了一声：“师娘！”王师母一眼就认出了相忱，激动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拉住相忱，说：“相忱，是你回来啦！快让我看看你！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师母眼里涌出感恩的热泪，把相忱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又一遍，好像总也看不够，拉着他舍不得放手，口中连连赞美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的主真是听祷告的神！他真是信实，让我活到九十多岁，就是为了让我亲眼看到他回来！主啊，我相信你还要使用相忱，要他继续为你做工！”我们和师母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献上感谢和赞美。王师母又活了六年，以九十六岁的高龄安然被主接回天家。

从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相忱被捕那天算起，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被假释回到家里为止，整整是二十一年八个月。在这二十一年八个月当中，相忱因着为主传道被无辜监禁，承受了无数难以言表的磨难；在这二十一年八个月当中，我虽有丈夫却如同寡妇，独自承担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在这二十一年八个月当中，孩子们虽有父亲却如同孤儿，忍受着少年失怙的苦痛。现在，一家人终于得以重新团聚，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任何言语都不足以述说我们的感恩之情。这真是应验了圣经中的话，“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诗篇 68：5-6）

## 八

第二天上午，安湖和平湖接到消息，都请假赶回家来看望父亲。回来的第三天，相忱就要安湖带着他去天安门、故宫、北海溜达了一大圈。到家后，安湖跟我说：“爹走得真快，我都跟不上他的脚步。”以前从没见过公公的儿媳也惊讶地对福声说：“爸身体还挺棒的啊，一点不像老头啊！”相忱的身体确实很好，腰板挺直，头发还是黑的，没有一点儿白发，眼睛炯炯有神，近视眼镜也不用戴了，连从小就常闹毛病的肠胃也没事



了。相忱说他在监狱里的二十多年从没得过病，只有一次小感冒，常年的体力劳动却使他原本不太好的身体得到了锻炼，现在的体质甚至比走时更健康。因为大儿子福音那里没有电话，他是在星期日回家时才知道父亲已经回来了。福音进门，叫声：“爹，您回来了。”相忱闻声抬头，认出了自己的大儿子，马上把脸转过去，停了一下又缓缓地转过来，望着福音，点了点头，说：“嗯，回来了。”父子二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却都强忍着没有让它们流出来。我们又忙着写信把好消息通知在外地的福乐和爱湖。相忱逐个询问了每个子女的个人情况，结没结婚，有几个小孩，当他得知自己的六个孩子不仅都已经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而且个个品行端正，工作出色，就由衷地夸奖我说：“你真是贤妻良母！”又问我：“你们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我告诉他：“困难虽然很多，但恩典更大！”相忱和我同是为我们的家向神感恩，完全是神的恩典保守了我们这个家庭，保守了全家的每一个人。

在北京的四个孩子都见到了，福乐前年曾去革志监狱探望过相忱，只有当时在山西大同工作的小女儿爱湖，是相忱离开北京之后一直没有再见过面的。一九八〇年初，相忱决定去大同看望小女儿一家，在那里过春节。临走前，我对他讲了爱湖改名字的事情，相忱并没有一点因此责怪女儿的意思。爱湖在大同插队时和当地的一位军人恋爱结婚，以后随丈夫转业在大同工作。相忱到大同的时候，女儿和女婿也是各自守着一个出站口等着接他，女婿也是从来没见过相忱，只凭着照片上的印象觉得一位老年人好像有点面熟，上前一问，果然正是自己的岳父，就赶快领着他去找在另一个出站口的爱湖。相忱已经不太认得清十多年不见的小女儿，还懵懵懂懂地问了一句：“你是永红吗？”可爱湖却一眼就认出了父亲。后来爱湖告诉我，她觉得父亲老了，也瘦了，扑进父亲的怀里就忍不住哭了起来，可相忱却没有哭。

回到女婿家，相忱见女儿一家的条件不错，就问女婿：“看你们家挺好，可你信不信主啊？”其实女婿在认识爱湖的时候就已知道相忱正在坐监的事情，还为此失去了在部队提干的机会，被提前转业。他们俩回北

京探亲时，从我这里带回去一些海外送进来的圣经和传福音的小册子，他自己都看过，也每周陪着爱湖去参加当地“三自会”的主日聚会，但他自己对信仰一时还想不通。相忱到了大同就主动提出要去看望亲家，进门问候了亲家的身体，就开始向爱湖的婆婆传起了福音。在大同期间，女婿的同事朋友纷纷请他去做客，他每到一家都不忘向人家传福音，讲自己经过二十一年监狱生活而平安归来的见证，于是他们当中就有好几家都是全家悔改信了主。相忱见女婿是个有知识也肯动脑筋思考的年轻人，只是由于受唯物论教育的影响，对信仰存有误解，就每天晚上和他讨论有关信仰的问题，带领他重新阅读和认识圣经，最终促使他也悔改信主。对福音的无比热忱，驱动相忱刚刚回来就迫不及待地重新投入到传福音的工作当中。

相忱回来后有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就是上户口。那个年代，中国还有着极其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没有户口的人几乎无法在当地立足。在监狱办理释放手续的时候，办事的人问他的家庭住址在哪里，相忱回答说在北京白塔寺内四十号，那人听了就说：“现在全国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这五大城市已经不能进户口了，你有没有儿子在小地方住啊？可以把户口上在你儿子那里。”相忱说有，就把大儿子福音在北京郊区石景山的地址写了下来。可他边写边想：自己走时儿子才十八岁，儿媳妇又根本不认识，怎么好把户口上在他家里呢？可办事的人这样问，他也不能申辩，只有按着人家的要求写。待到第二天发给他《释放证》时，他才惊喜地发现上面写的地址竟然是“白塔寺内四十号”。他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相信一定是出于神的安排。

但是要在北京上户口，除了有相忱的《释放证》，还必须要单位开具的介绍信。我是一九七九年五月退休的，单位又返聘我，仍在房管局做建筑工程的预算工作。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单位政工组一位姓陈的组长，对他说：“我的爱人回来了，他原来是无期徒刑。”其实相忱的事情他们原来早就清楚的。小陈说：“回来了，你需要什么？”我就说：“我需要报户口。”小陈是位年轻的复员军人，听了我的要求，很爽快地答应说：

“这个没问题，我可以帮忙。你都为单位做了那么大的贡献，这事就交给我们办吧。你写个申请交给我，我给你办，办好了，我就找你去。”因为当时我做预算工作确实为单位创造了不少效益，所以他们就很愿意帮助我。隔了没几天，外面正下着大雪，小陈来了，一进门就高兴地叫我：“梁师傅，梁师傅，我今天给你送喜信来了！”说着就把一卷材料递给我，说：“你拿着这个上福绥境派出所去，找一个姓何的，给他材料，他就会给你办的。”我也很高兴，连声向他道谢：“陈师傅，真是谢谢你！这么快就给办下来了！”他说：“哎呀，你甭管了，就拿这个快去吧。”

我赶紧收拾好手头的工作，冒着大雪去福绥境派出所。到了那里，找着那位姓何的民警，把材料交给他，他边看边“哦，哦”了几声，最后说：“好吧，交给我吧。什么时候批下来，我什么时候到你们家找你去，你就不用再来了。”很痛快，就这么一句话。又过了些日子，民警果然来家里找了，我当时正在上班，家里只有相忱一个人。来人问：“这是姓袁的吗？”相忱答说：“是。”他就说：“你的户口批下来了，你赶紧去派出所报户口吧。”相忱就拿着我的户口本，跟那个人到了派出所。负责办理户口的民警看过相忱的材料，问他：“你的户口关系怎么没转来呀？”相忱就把自己的《释放证》拿给他看了，说：“那是监狱，户口和就业问题都由当地政府解决。”民警转身进了里屋，没多久就出来，把户口连同粮票、油票、布票等都发给了他。相忱的户口就算是办好了，这天是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三日，距离相忱回到家正好一个月。

一个从监狱释放回来并且还在考验期内的人，能在北京这样人口拥挤的大城市如此顺利地报上户口，实在不能不说是件奇妙的事情。和相忱一起被释放的二三十人中，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在北京报上户口，很多人听说相忱的户口已经报好了，纷纷打电话问我是怎么办的，吴慕迦的儿子也来找我，问：“我爸的户口不能上北京，只好落到内蒙我姐的家里。为什么你们就可以上呢？”我告诉他：“这是神的恩典，感动我们单位的领导给报的。我自己没有花钱，也没有找人活动。”

相忱很关心那些当年和他先后被捕的肢体们，问了一些原来熟悉的

传道人的情况，第一个问到的就是武文蔚牧师，因为他是在“福音堂”被捕的，所以相忱就特别纪念着他；我告诉相忱，武牧师被捕不久就在监狱里殉道了。相忱又问神召会的姚志辉牧师，我说：姚牧师也不在了，是在监狱里冻死的。相忱还问到了很多人，但大多都已经不在了，这些事情相忱在监狱里一点都不知道。

我把在吴慕迦家里遇到的那些事情讲给相忱，相忱告诉我，他在革志监狱时曾遇见过吴慕迦。吴慕迦是由外国传教士养大的，毕业于山东滕县的华北神学院，曾在东北白城子的一所神学院教过书，后在北京东四二条的一间教会传道，是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主要带领人之一。他也是一九五〇年代北京基督教会中拒绝参加“三自会”的十一位代表之一，并为此于一九五五年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相忱回忆说，他是在田里劳动时第一次遇上吴慕迦的，当时他在种甜菜的田里耕地，无意间看到吴慕迦正在不远处的另一块地里插秧。相忱说那一刻他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以前他并不知道吴慕迦和他同在一个劳改农场，现在发现这位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弟兄原来就在身旁，当然感到很亲切。相忱很想立刻过去和吴慕迦交通，但监狱里有规定，犯人在劳动中间不许互相说话，更不许跨越界线，于是就想了唱赞美诗的主意，希望通过歌声来和吴慕迦打招呼。相忱在田里放声唱了起来：“主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路途花香长漫。”在那块地头的吴慕迦果然听见了歌声，抬起头来，看到了相忱，却马上就又埋下头去继续干活。相忱本以为他一定会接着唱，可他却没有，相忱又唱了一遍，吴慕迦仍是一声不吭。相忱很不理解，在监狱里能够碰上一位主内的肢体挺不容易，更何况是亲密的同工同道，可吴慕迦为什么没有丝毫反应呢？后来他们两人又有过几次接触，趁着没人的当口，相忱故意把话题引到信仰上面，可他发现吴慕迦却绝口不提任何有关信仰的事。有一次，相忱带着补靴子的工具到吴慕迦那里，帮他补鞋，意外地看到吴慕迦和他们小队的看守混得很熟，别人都称他“吴老师”。从那时，相忱就隐隐约约地察觉到，起初曾经是同路的人，不一定都能坚持走到最后的终点。相忱和我都没有再去探望过吴慕迦，吴慕迦也没有来探望过我们，只有一次，陈本伟弟兄的母亲来北京，住在我们的

家里，吴来白塔寺看过陈老太太，但也没有和相忱交通。

家里的事，相忱最先问到我这些年有没有遵守“十一奉献”。我如实地告诉他，前些年我的工资只有二十四元，每月拿出三元专门用于接济过去在“福音堂”聚会的张卓源老弟兄。这位张老弟兄原来在大栅栏的一家商铺作会计，也是因为信仰的原因被辞退，老两口无儿无女，生计无着，我每月领到工资的当天，就把三元钱还有从食堂买的一口袋馒头送到他们家里，直到他们去世从未中断。以后收入略好了一些，我又陆续帮助过夏老先生、王化南老弟兄以及吴慕迦一家人等等。相忱对我所做的，很是满意。我也对相忱讲述了他不在家的这二十多年中，众多弟兄姊妹在主里曾给我的奉献和支持。相忱回来时，那位姓“于”的弟兄还在每月坚持给我汇来五十元钱，他也亲眼看到了那张汇票，我给他讲了事情的过程，相忱要我给这位“于”弟兄去信，请他来家里交通，我说以前按着汇票上的地址写的信全都被退回来了，相忱说：“你再写吧。”我照相忱的吩咐又连着写了两封信，结果又是和以前的“查无此人”。

大约是在相忱回来后的第三个月，一个上午，有人打家里附近的公用电话找我，我去上班了，是平湖接的。电话里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说：“我找你妈妈。”平湖说：“我妈不在。”那人又问：“你爸爸是不是回来了？”在得到平湖肯定的答复后，他就不再多问什么，把电话挂了。正是从这个电话之后，我就没再收到来自“于”弟兄的汇款，我猜这个电话一定就是“于”弟兄打来的。虽然我很遗憾地错过了这个电话，时至今日我还是不知道这位“于”弟兄到底是谁，唯有时时在祷告中记念这位在主里有真爱心的肢体。

我退休后又被单位返聘，除了退休金，还能另外领到一份返聘的工资，相当于有了双份的薪水，儿女们的生活也很好，一家人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缺乏的困境。“**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也是满有怜悯的。相忱和我，都深深地明白：从前，神怎样顾念了我们，我们也当怎样顾念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经历过苦难，因此对在苦难中的肢体身有同感；我们自己曾经缺乏，现在最能体

会到正在缺乏中的人；我们既在自己的缺乏中经历了神，同样也愿意神在别人的缺乏上使用我们。只要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都要尽力去帮助他们。因为“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哥林多前书 1：15）

相忱回来后，第一个探望的是王师母，第二个去探望的是我的四弟夫妇。我的弟妹很早就信主，但是信心却非常软弱，不仅在工作单位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更不敢接近我们。四弟当时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每天上下班都要从白塔寺门前经过，却一次也不敢进来，已经很多年和我们断绝了来往。相忱听了这些情况，就说：“那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相忱平安健康地归来，着实令他们两个人大吃了一惊，弟妹看着相忱，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半晌才说出：“你……你判无期徒刑，怎么回来了？”听相忱讲了出狱的见证，她很受感动，流着泪说：“主的恩典这么大！你判无期徒刑都回来了！”又惭愧地承认：“我原来信主，但是在单位都不敢承认。我真是亏欠主！现在我要悔改，好好地信靠神！”后来她在白塔寺教会当着大家作见证，说道：“我实在内疚，大姐那么困难，我在北京都没有帮助过她。我一点爱心都没有，我远离了主！现在请你们原谅我！”原本不信主的四弟也被打动，痛哭着向主认罪悔改：“我走了四十年的错路，现在才走在正路上！”从此夫妇二人都成为在主前热心事奉的门徒。

相忱对几个儿媳和女婿都很满意，逐一去看望了各位亲家，每到一家都主动向人家传福音。他还先后去探望了很多人，有原来在“福音堂”聚会的老信徒，也有从前同工的传道人。相忱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人也来家里看望他。第一位是苏纪纲弟兄，他是“福音堂”教会的老弟兄，还有一位住在西廊下的王化南弟兄，也是在“福音堂”聚会的。当年他家里生活困难，饿得实在没办法，那时他还没有信主，就要带着两个孩子去投河自杀。幸好他的小孩在“福音堂”的主日学，相忱从孩子的嘴里听说了他家的事情，给他们送去两小袋面粉和一些小米，帮他们度过了饥荒。以后这父子三人就在“福音堂”悔改信主，参加聚会。相忱回来

时，王弟兄已经身患重病，由两个儿子搀扶着来看相忱，要孩子给相忱下跪，说：“这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相忱坚决拦住他们，不许下跪，告诉他们说：“这是主的恩典，我们都要感谢主！我们要彼此相爱，要爱人如己。”王弟兄能亲眼看到自己的牧者归来，也非常得安慰，不久就安息主怀了。

就在那些与相忱一同回来的人，正在为了报不上户口就不能找工作而发愁的时候，相忱却对世上的工作没有一点兴趣。同院一位热心的邻居主动找我说：“老头儿回来怎么办呀？其他工作都不好找了，这样吧，我想办法帮你介绍一个卖晚报或者是看门的工作吧。”我微笑着谢绝了这位邻居的好意，因为我深深地明白相忱的心，他的心里所惦记着的只有为主传福音这一个工作。杨津广弟兄回来以后，原来工作的医院迟迟没有给他落实政策，就只能暂时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做一些翻译的工作。他听人说这套书的宗教卷正在物色合适的翻译人选，就打算把相忱推荐过去。杨弟兄来家里，对相忱说：“现在这个大百科全书的宗教部分正需要翻译，你的外语那么好，正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工作也有意义，还可以有点收入。你也不用去上班，只要把该翻译的东西拿回家来做就行了。”让杨弟兄没有想到的是，相忱毫不犹豫地说：“不，我不准备做任何工作了。我现在有惠珍的工资，再加上孩子们都很孝顺，我们的生活已绰绰有余了。我要趁着还能动，要多做点神的工作，把以前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相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回来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在家里带起了查经班，个人的生活习惯也完全恢复到和从前一样，清早起来晨祷，白天不是出去探访，就是在家里灵修，傍晚时搬着一个小板凳独自坐在屋檐下读经，直到天黑看不见了才进来。唯一的改变是他会先焖好米饭，等我下班回来再炒菜。

大概是在一九八一年底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们俩在家里，一边用热水泡着脚，一边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审判“四人帮”的场面。相忱看了一会，忽然感慨地说：“江青还能坐着，她多好啊，很自由的，你看她还大摇大摆，理直气壮。我那时候可真了不得，审我的时候可不是这

样，对我可是严，低着头，九十度低头，上面说什么也不准抬头。”相忱从来不讲他在监狱里的状况，为了不引起他的痛苦回忆，我也没有向他问过这些事，正是眼前这段电视节目激起他的联想。相忱似乎意犹未尽，又接着说：“我还学会了盘腿。”我好奇地看着他说：“我都不会。你盘一个我看看。”他二话不说，真的就笑呵呵地盘腿坐在了床沿上。我知道他以前在家时从来没有过盘腿的习惯，很稀奇他怎么竟然学会了盘腿。相忱告诉我，因为他在齐齐哈尔监狱的批斗会上公开拒绝放弃信仰，被关进了“小号”。进去之前，看守为了怕他会自杀，把他衣服上的扣子都揪掉了，还把腰带也收走了，其实这些对于一个真正的圣徒而言，实在是多此一举。

所谓“小号”，就是一间长宽都仅有一米的小牢房，高度也只是一米多，人可以站着，却站不直，里面没有窗户，只在门底下开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洞口。这里是整个监狱条件最恶劣，最摧残人性的地方，故被称作“监中之监，狱中之狱”。按着监狱的命令，相忱在“小号”里，除去规定的睡觉和吃饭时间外，都必须盘腿坐着，看守还会随时察看他是否符合规定的姿势。被关在“小号”里的人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每顿只给一个小窝头，到时有会从门下的那个小洞塞进来。早晨还会另外塞进来一块湿毛巾，相忱就用这块毛巾擦一擦手和脸，就算是洗脸了。大小便也不准出去，一律都要解在牢房的马桶里。其他的人都是只关几天就放出去了，唯独相忱因为不肯屈服、不肯放弃信仰，在这里被一关就是半年。整整半年，监狱仍然无法在相忱身上达到他们的目的，只得无可奈何地把他放了出来。离开蜗居了半年之久的“小号”，相忱的眼睛由于长期在黑暗中，已经无法适应外面的光亮，视物模糊不清；长期不能用水洗脸和手，更不能换洗衣服，身上虱子成堆；特别是他的双腿，因为被迫长期盘腿而坐，已经不能正常地站立和行走了。然而，靠着神加给他的力量，相忱硬是自己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回了原来的监室，并且很快就奇迹般地完全恢复如初。

我惊愕了……没想到相忱竟是在这样条件下学会的盘腿！人们都说



劳改犯通常只有三个结果，第一个是忍受不下去，用自杀来结束生命；第二个是精神受到刺激，身体受到损害，不能再过正常人的生活；第三个就是通过熬炼，意志更坚强，身体也更健康。相忱正是这第三种，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这是神的恩典，也是神对他仆人的忠心的奖赏。尽管相忱无端受尽了种种磨难，但是即使在磨难中也是充满喜乐，无论对神，还是对人，都从没有过一丝一毫的抱怨。正如相忱自己所常说的，他把苦难看成是学校，把重获自由当作事奉的新开端。为了传扬主的福音，他甘愿不看地上的一切，为要得着那天上的赏赐；甘愿活在地上一天，就为主工作一天。相忱是为主而活的人，而我却还在贪恋世上的虚荣，满足于从人手所得的……我被圣灵感动，里面感到扎心，我实在是亏欠了神，也对不起相忱。我决定不再为这个世界工作，回来和相忱一起同心事奉我们的神！第二天，我就对单位的领导说：“请你们另外找人吧，这个工作我不能再干了。”单位连着四天早上派人到家来劝我回去继续上班，我每天都是早早地避出去，他们见我去意已决，才不再找了。

在主里面重新得力以后，我一方面照顾好相忱的生活，让他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另一方面帮助他接待来访的信徒。那时家里来访的人很多，对所有的来人我们都是一味地款待。相忱总要首先问人家：“吃饭了没有？马上去做饭。”最多时甚至一天要开十多顿饭，有时我一个人守着两个火眼同时炒菜，半夜十一、二点来人都要马上去做饭。相忱很满意我的工作，常对来人夸赞说：“北京饭店的菜都没有我家的菜味道好！”



第十章

強暴人備過人的時候，

端時作就

暴令之外

判外却人

想元下落，禁止強暴

象想，元被之物消能。

去遠宏書十卷



相忱回来以后，问起他走后教会聚会的情况，这也是他还在监狱时就反复问过的。我详细地向他讲述了这些年里教会的境况，告诉他：我们没有条件聚会，只能各自在家里读经灵修祷告。相忱听完，只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过了几天，相忱又把福音和福声叫到面前，问他们：“大教堂都还有吗？”兄弟俩回答，听说正在筹备，准备都要开。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政府开展了一项叫作“拨乱反正”的运动，目的在于纠正文革中的错误，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部分在文革中被封闭的教堂陆续恢复开放。就在相忱回来的当年，宁波、上海的教堂先后正式开放，而北京最早恢复的聚会是在米市大街原中华圣经会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初时还不敢提“聚会”这两个字，只能说是“开会”。那里在文革前，曾是北京市“三自会”的办公地点，文革中则成了专门批斗基督徒的场所，里面还贴过指名批判王明道、袁相忱等人的大字报。相忱问福音他们：“教堂开了，你们去不去？”他们说：“只要开堂，我们就去。”相忱对孩子们愿意去参加聚会感到很满意，鼓励他们说：“你们可以去，你们去聚会是个好事。”第二年夏天，先开的是缸瓦市教堂，随后几年里，崇文门教堂和其他几所教堂也恢复了敬拜。一九八一年，福音和福声一同在缸瓦市教堂受洗。相忱很关心教堂聚会的情况，经常询问他们教堂讲的什么道，唱什么诗，礼拜是采用什么样的形式等等。

当时，不仅中国的信徒在察考着教会新生的道路，国外关爱中国教会的人也在注视着教会的前景。一九八一年，艾喜德教士来北京探望我们的时候，特意要我陪她前往米市大街参加过一次那里的主日聚会。记得那天讲道的是阙学卿牧师，题目叫做《永恒的爱》。艾教士在里面只坐了短短不到二十分钟，就再也听不下去了，起身拉着我，连声说：“走吧，走吧，不听了，不听了。”这一回不要紧，外面马上就传得满城风雨，说“袁师母都来‘三自会’聚会啦！”

与教堂开始恢复礼拜的同时，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三自会”也重新开始活动。一大批曾经遭受过批斗或者已经“转业”从事其他工作多年的原“三自会”教牧人员，又被召回教会的岗位。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曾揭发检举，甚至残酷斗争过他们的同工同道，更有人曾经公开不认主，而在此时，他们不仅矢口否认自己当年的种种恶行，而且摇身一变，重又粉墨登场，扮演起了“属灵人”的角色。上海就有这样一位昔日的“名牧”，在文革时期为了表白“彻底与基督决裂的革命态度”，竟不惜把自己的名字从“大卫”改成为“大革”，此人居然也官至“三自会”常委的高位。还有一些人，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造”，已经从“神的仆人”被驯化成政府控制教会的工具。

缸瓦市教堂重开后的第一任主任牧师，就是曾在“福音堂”痛哭流涕地劝说相忱“顺应形势”，尽早加入“三自会”的那一位。他在得知相忱带领家庭聚会之后，就拍着福声的肩膀，煞有介事地说：“回去告诉你爸，趁早儿别聚会啦！别自找苦吃，考验期还没过呢，这么大胆子，还敢聚会？说不定哪天又逮回去啦！”另一位缸瓦市教堂的牧师找来家里，对相忱说：“有外国人到教会打听你的住址，我都给你挡回去了，没告诉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相忱听了，也不跟他争论什么，只说：“那好，那好。”

至于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过打击的传道人，有很多灵性下沉，早已失去了起初为主传道的热心，转而开始关注自己的利益，把精力投入到如何为自己争取平反的事上。文革前，曾在“三自会”属下的崇文门教堂担任过主任的郑如冈牧师，早年留学美国专攻声乐，文革中因海外关系的缘故而被捕入狱。他自以为和相忱都有过坐监的经历，还算有些共同语言，极力邀请我们务必去他家作客。在郑牧师的家里，他对我们大讲他是怎么样上下奔走为自己申冤，他自己和家人前前后后写了多少材料，找哪些部门申诉，最后终获平反。但即使这样，他仍为自己感到不平，悄悄地对相忱抱怨道：“人家看咱们都是‘外秧’，不是他们的正统！”他也极力鼓动相忱和他一样，说：“你这是冤假错案，你应当写！花上两

年申诉下来，也不用等十年啊！你平反以后，你的家属子女也不用再背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了。”可相忱却没吭声。以后也不愿再和他来往。另一位“三自会”里以前对圣经颇有研究的传道人，也热心地给相忱写来一封信，说：“这些年我对马列很有研究。你把你的情况一条一条地说出来，我能给你写申诉材料，保证给你平反。”相忱却对此不屑一顾，在回信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我不求告亚述，我单单仰望主。”

相忱回来那年已经整整六十六岁了，按他自己的话说：“我的肉体是爱工作，爱活动，想为主工作，传福音。”但他还有长达十年的考验期。在这十年当中，我们原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就是向政府靠拢，主动找宗教管理局汇报思想，这样可以很早期地解决相忱的个人问题，用不着等待十年之久。相忱的案子当然是“冤假错案”，就连一九五八年当时的宗教事务处给他戴的“右派”帽子都还没有摘掉，这是政府主管部门的问题，按照有关文件的精神，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为相忱摘帽平反。第二条路是圣经上说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 12：19）当初我们的主，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神。所以，我们既领受了神的话，就再不去求告亚述，也不求告埃及，只在主的道中，学习那等候和忍耐的功课。

即使那些还在“三自会”事奉的人也已深谙明哲保身之道，时时小心翼翼，处处唯唯诺诺，唯恐再越雷池为自身招来横祸。我曾去宽街教堂参加过一位老弟兄的追思会。有人悄悄在身后扯我的衣服，我回头见是一位胖胖的老者，他小声问我：“你认识我是谁吗？”我回答：“您是孟长老。”他眼中闪出一丝亮光，高兴地说：“我是孟向召，你听相忱说起过我吧？我是和他同一天受洗的。”接着他又小声地说：“我们每次聚会掰饼都记念相忱，都为他祷告。主有冠冕在天上为他存留。”可正是在他管理的宽街教堂，有一个被按立为牧师多年的人，竟从来不讲道，也不带领祷告会。在堂里看门的是一位原籍成安县大寨村的吴弟兄，很早就与我们相识，他曾当面责问过这个牧师，说：“牧师，我对你有意见。我在

这里五年了，从来没听过你讲道，也没见过你祷告。你这个牧师不太称职吧！”这个牧师躲躲闪闪地辩解说：“我接受，可我……我不会讲道……我事务太多，也没功夫看圣经。”另有一位日后升任北京市“三自会”最高负责人的年轻牧师，倒还算是位热心事奉的传道人。常常私下托人把自己的讲道文稿预先转给我们，请求帮助她审改。她也来家里探望过相忱，尊称相忱为“前辈”，自己非常谦卑，这在“三自会”的传道人中已属难能可贵。相忱和她谈了一个下午，送她走后，相忱摇了摇头，叹口气，说：“唉，这个牧师还不够格。她现在还在院外宰牛宰羊呢，还没进到至圣所，还没有真正经历神。她适合做这些事务的工作，不适合牧养。”

然而，最为令人痛心的是有几位曾经带领众圣徒一道坚持真理，并且为之付上过一二十年铁窗囚牢代价的传道人，竟在这个黑暗已尽，光明重现之时，离弃真道，投入“三自会”的怀抱。吴慕迦就是这样的一位。在“三自会”为他解决了户口、住房等之后，吴慕迦不仅参加了“三自会”，并且成为燕京神学院的一名教师。实在难以想象这位口口声声地宣称自己已经“放弃信仰”，而且“批判神学”的人，该如何教导他的那些学生。有人就真的拿着吴慕迦的事来游说过相忱：“你也应该靠拢政府。你看人家吴慕迦多好啊，加入了‘三自会’，楼房也有了，薪水也有了……”相忱打断那人的话，掷地有声地说出：“我没把那些看在眼里！”

另一位与吴慕迦一道堕落泥沼的是当年最强烈反对“三自会”的王镇。他出狱后，生活比较困难，内心也陷入苦闷。“三自会”借机派人打着“弟兄姊妹的爱心”的幌子按时给他送钱。当他终于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三自会”的受薪人时，却已是欲罢不能，况且他也完全失去了拒绝的勇气。就这样，王镇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大“巴比伦”，他先是到“三自会”的教堂“作礼拜”，后在一九八一年被封为北京市“三自会”的委员。为了感戴“三自会”的知遇之恩，王镇表现的异常积极，利用自己的“名望”，四处活动，拉人入会。一九八三年底，相忱收到一封王镇的来信，他在信上说：“我在聚会、祷告会上都见不到你的面，使我百思不解。为什么你不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呢？若不是共产党打开这个铁门，谁能

打开呢？哪怕你来坐一坐呢，不叫你讲道，也不叫你祷告，你坐一坐就会吸引一些人。”

看到这里，相忱说：“我不去，我连门槛都不登他的！”信的下面还说：“我受了二十多年的苦，现在还向党靠拢呢！去找他们交心吧，他们能给你房子，还能给你个教会。你挑哪个教会，就上哪个教会。”

相忱把信一撂，说：“我绝对不靠拢！”我见那信上写着，他们要给相忱一个教会，还要相忱自己去挑。可教会是属神的，怎么能由着人来挑选和分配呢？这岂不是把基督的教会，当成是地上的组织了吗？就在写出这封信的七天之后，王镇由于食用羊肉罐头中毒，被送进同仁医院抢救，两天后去世。一位姓黄的姊妹告诉我，她去医院看过王镇，劝诫他说：“王牧师，你错了。你怎么又加入‘三自会’了？你违背了神的旨意！”躺在病床上的王镇，很凄苦地答道：“我实在是错了！但是已经是这样了……”刘淑洁姊妹就在同仁医院工作，她和杨津广弟兄就是早年由王镇亲自介绍相识的。他们俩告诉我，王镇最后的状况非常的不好。由于他的遗体极度肿胀，卡在停尸房的匣子里，不得不动用工具才硬撬出来，衣服只能反着套上。“三自会”也因此被迫取消了原定的遗体告别仪式。杨津广弟兄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神实在是轻慢不得的！”

“三自会”的问题不在于表面所暴露出来的、已经被察看到的这一系列弊病，它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根基上。

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哪，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铸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



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列王记上 12：26-33）

纵观“三自会”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我们首先可以看出，“三自会”正是耶罗波安王运用他的政治手段所建立的“伯亚文”，是招惹神愤怒的“金牛犊”，是“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的地方”（见何西阿书 10：8）。

其次，“伯亚文”既是出自耶罗波安王之手，自然接受王的领导，尊奉王为它的头；如此，它就必定不是属基督的“伯特利”。因为主已经明说，凡属他的教会必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以弗所书 2：19-22）又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哥林多前书 3：11）“伯亚文”的丘坛是耶罗波安作它的头，受世上的王暂时统治；“伯特利”的神殿有耶稣基督为元首，由永生的主治理，必存到永远。两者的区别是绝对不容混淆的，属神的人必须要分辨清楚。

第三，建立“伯亚文”是为了服务于耶罗波安王的政治目的。有关方面最具有权威性的宗教政策文件《十九号文件》<sup>1</sup>中对此即有明确阐述：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同盟，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在“三自会”的简章中，也有与此相对应的同样内容。这一切岂不是与主基督建立教会的宗旨背道而驰吗？基督教会被建立的目的在于彰显神荣耀的圣名，宣扬他的美德，见证他的真道；在于传扬基督耶稣的福

---

<sup>1</sup>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中发【1982】19号文件，1982年3月31日。并曾发表于同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内容作了小部分修改。

音，讲说他的圣言，拯救失丧的灵魂；在于造就门徒，使他们在基督里得丰盛的生命，作神合用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于圣徒合一，同心盼望主耶稣的再来，仰望他荣耀国度的降临。这是主基督建立教会的目的，也是教会和全体圣徒在地上的唯一使命。

最后，我们还要根据他们所讲的道来对他们加以必要的分辨。是否忠心地宣讲纯正的真道，是区分真假教会的基本标记。这真道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他的复活和升天，就是他的再来；这真道唯独存在于神借着他的使徒和先知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之中；这真道是圣洁的，能救人灵魂脱离死亡，进入基督的永生；这真道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为他作见证；这真道就是基督耶稣的福音。可“三自会”讲的又是什么呢？为了追随政治的需要，他们可以讲“雷锋也能得救，雷锋是精神不死，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们可以把“因信称义”妄自篡改成为“因爱称义”。“三自会”所传的，是与世界的潮流相混合的虚假的福音，不是基督教会所传的十字架的福音；他们所领受的那个灵，也不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圣灵。

教会是主基督亲自建立的，又有他作我们的元首。因此，教会必须与主联合，在一切事上遵行他的命令，必须行走在主所走过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而现今“三自会”所走的道路却是另外一条与世界联合的道路，那路虽然看似平坦通达，但是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 7：13-14）

## 二

相忱回来以后，就不断有全国各地的弟兄姊妹来家里探访，还有更多的是通过书信和我们交通，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求事奉主的道路。在福音传入中国的前一百五十年中，中国教会主要是接受国外差会的牧养和支持，之后则是三十年的逼迫，此时浴火新生的教会应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呢？经历过偶像崇拜的破灭和追求人间天国的失败，人

性的败坏和理想的缺失已经把中国人彻底地抛入绝望空虚的境地，促使那些身处死亡之地的人们转回头来重新找寻曾经被他们拒绝过的福音。从七十年代开始，国内信徒的人数空前地增长，迫切需要教会对他们的带领和真理的牧养，然而应当如何在中国重新建立起基督的教会呢？“三自会”的道路既然已经被主的道证明是完全错误，那么合乎主心意的道路又在哪里呢？

建立家庭教会，就是以家庭聚会的敬拜形式来建立基督的教会，是神为现今的中国教会所预定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神给所有寻求他的儿女们，在基督的真道中共同的得着。一九四九年之前，城市的教会几乎全都是采用会堂的敬拜形式，家庭聚会主要存在于农村的教会中，但那主要是受到广大的地域和交通条件的限制，而不得已所采取的，并非是教会有意识的主动作为。其后三十年的逼迫时期，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秘密的家庭聚会都成为虔敬人的最后选择。在文革极为严酷的环境中，家庭聚会也从来未曾被扑灭过，信徒们不仅在家庭中，甚至在旷野、深山中，敬拜赞美神。到了文革后期，家庭聚会在浙江、福建、河南等地的城乡里更加扩展开来。但是，这样的聚会还大多处于不公开的状态，敬拜的内容和形式也还不够完善，继续发展的道路也不明朗。面对新的形势，疾风暴雨式的逼迫虽已暂时过去，但或明或暗的逼迫却依旧凶猛；面对重新活动的“三自会”的严峻挑战；面对仍然不可能恢复与国外教会的正常联系，而只能走自立道路的迫切要求，神的忠仆们毅然高举起家庭教会的旗帜和道路，相忱也有幸蒙神的拣选，成为这众人中的一员。

大约在一九八一年的四、五月间，有一位弟兄把我找到他家，到了那里才知道是听王明道先生的一份录音带。我问他：“怎么不让相忱来听？”他说：“相忱刚从里面出来，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并且他认不清好坏人，什么都说，对谁都没有戒备，你听了回去再告诉他。”我就没有再多说什么，留下来认真地听录音。那天来听录音的人很多。这是王先生在思考了一些中国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之后，和其他几位开会的录音。王

先生讲话的大意是：“当前教会有两个趋势，一个是教会，政府所控制的，一个是家庭教会。现在的大教会是共产党利用‘三自会’来压制信仰，我是极力反对，坚决站在主的那一边。不过现在我觉得很惋惜，到现在我觉得与我同心的人非常少，为我受牵连的人很多，为我的问题牵连了一大片，中学、大学、各行业都有为我受牵连的人，我是知道的。但真正与我同心的人特别少。真正不向政府低头的，能够站立的人太少太少了。你们说说还有谁呢？据目前的情况，有两个人是我最大的安慰，一个是广东的，姓林（指林献羔弟兄），一个是北京的，也是广东人（指相忱）。这两个人我觉得还是能站立得住，能令我安慰的。广东的那个屡次经过考验，是这样的，北京的那个也是这样，别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很多人都是见了事情就躲，不是真正把自己摆上，令我很痛心。”这个录音里主要是王先生在发言，也有其他人的讲话，讲的观点和王先生差不多。回到家，我把所听到的原原本本告诉相忱，相忱思索了一下，说：“他说的是对的。但我也不是跟着王明道先生走，他怎么说都没有关系。我不动摇，坚定我的信仰。”

相忱回来的第二年就已经在在塔寺的家里开始带领聚会，并且也在积极思考教会存在和发展的道路。对于家庭聚会这种形式，相忱并不陌生。追溯到四十年代我们在河北成安县服事的时候，相忱就曾带领过当地的家庭聚会，对农村的这种敬拜形式有过深刻的印象。现在看来，起初这段亲身经历也是神的奇妙预备。

相忱对于建立家庭教会的信心，绝不仅仅是源于他个人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依靠神的话语。圣经记载，使徒们所建立的初期教会就是从家庭聚会开始的。在使徒行传的 1：13-14；2：44-47；4：23，31 和 12：12 等处，记载着主基督升天之后，使徒们“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徒 Act 1：13-14）他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

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徒2：44-47）主也借着赐下他的圣灵，与这些聚会的人同在，悦纳他们的敬拜，加添他们的力量。“……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徒4：31）

由此可见，耶路撒冷的教会正是从马可的母亲马利亚的家，还有其他信徒家里的聚会建立起来的。此外，使徒保罗建立的腓立比教会同样是从一个家庭的聚会开始。腓立比城里有一个贩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名叫吕底亚，是个“素来敬拜神”的外邦人。因为当地犹太人稀少，没有会堂，吕底亚和她的全家受洗以后， she就把保罗他们请到自己的家里，在她的家里聚会。后来保罗和西拉继续在腓立比传道，被囚在监里。蒙神的保守，“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在这里，保罗他们出监就去吕底亚家里，见了弟兄们，证明吕底亚的家里已经有聚会了。我们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可以看到更多有关家庭教会的证据，他至少有四次“问在家中的教会安”。第一次是在罗马书的16：3-5，保罗“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的安。”从使徒保罗的问安，我们知道在百基拉和亚居拉的家里有教会。还有哥林多前书的16：19，“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地问你们安。”在这里是使徒保罗代表亚居拉和百基拉家里的教会，问哥林多教会的安。第三次是歌罗西书的4：15，“请问老底嘉的弟兄和宁法，并她家里的教会安。”原来老底嘉的教会就是在这位叫宁法的姊妹家里聚会的，老底嘉的教会也是一个家庭教会。

最后，歌罗西的教会同样是属于家庭教会。使徒保罗在腓利门书的问候中提到：“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腓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腓利门书1：1-3）腓利门是住在歌罗西的一位地主，家境富裕，

就把自己的家庭开放来接待聚会。

从以上这些圣经的记载中，我们看得很清楚，使徒时代初建的基督教会，无论在耶路撒冷城的犹太人，还是散布在各地的外邦人，大都是在信徒的家里聚会。家庭聚会是使徒们创建教会时，所采用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这是神的话语，这是神让我们建立家庭教会的依据。

在现今的末后时代，在中国，以家庭聚会的形式建立基督的教会，是神对我们的要求。首先，神要求教会必须忠心于他的托付。有些人看家庭教会规模分散，相对人数很少，远不如大教堂那么“轰轰烈烈”的，就软弱动摇了。但是，主并没有要求那些表面上的形式，主对教会的托付是一心一意地遵行神的旨意，传扬和见证主的福音，用神的真道忠心地喂养主的群羊，同心合意地荣耀神。我们的主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正是这样做的，“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约翰福音 4：34）“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约翰福音 17：4）今天教会和神的工人都应当效法我们的主，遵行神差遣我们的旨意，按照神所托付我们的，去作成神的工。神的工人更要谨慎，不要被这个世界牵引；我们作的是神的工，不是各人自己的工作，要按照神的要求去作才成。如果只把眼睛单单地盯在个人的工作成绩上，容易使人走两个极端，一个是你的工作好，使你骄傲；另一个是你的工作不好，让你灰心丧胆。主不是要看我们外面那些满足人眼目情欲的花架势，乃是要看我们各人是不是忠心于主的托付，巴不得我们作一个忠心的工人。主托付我们多少，我们就忠心地作好多少，主托付我们三只羊，我们就牧养好三只，托付五只，就牧养好这五只，按时为他们分粮。我们各人只要作一个忠心于主托付的工人，这就足够了。

其次，更重要的是主要求教会为主保守住她的圣洁。使徒保罗把教会比作“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林后 11：2），因此教会决不能“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林后 11：3）。如果一个作妻子的，失去了贞操的话，那么别管她怎么做，怎么服事她的丈夫，她也得不到丈

夫的喜悦，也不能得蒙悦纳。我们今天要行在神的公义之中，预备好自己，当主再来的时候，才能“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启示录 19：8），去赴羔羊的婚宴。主对教会的要求不是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服事，而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马太福音 22：37）爱主的，就要为主持守圣洁，凡为主持守圣洁的，必蒙主的恩典和喜悦。教会既是童女，就不能与世界有任何的联合，必须要始终如一地忠心于我们的主。可我们再看现在的大教堂，所谓的教会，已经与世俗妥协了，同世界的王联合了，去讨人的喜欢了，已经把圣经的真理摆在后面了。他们在主的面前，已经失去了纯一清洁的心，失去了贞洁的童女的地位。他们这些人，实在已经与主基督对教会所要求的圣洁和忠心，完全相反了。

在现今的末后时代，在中国，坚持以家庭聚会的形式建立基督的教会，就是坚持走十字架的道路。在宗教改革时期，和马丁·路德同时代的加尔文曾说过：“十字架下有真教会”。真教会、假教会就是要根据十字架来区别；真假先知和真假信徒也是根据十字架来区别。衡量真假教会的唯一标准就是主基督的十字架。什么才是真的基督教会呢？真的基督教会要建立在十字架的下面，必须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第一，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效法主的道路，是一条贫穷和缺乏的道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行的，主在世上的时候，“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路加福音 9：58）我们的主实在就是这样一位贫穷的主。今天，家庭教会坚持走十字架的道路，也要面对这样的贫穷。教会在信徒的家庭里聚会，条件肯定比不上大教堂，农村教会的条件就更加艰苦。还有我们家庭教会的牧者们也必须有预备过贫穷生活的心志，倘若不能从教会得到充足的供应，就要靠主的应许过信心的生活，相信主必为他的工人负责到底。还有就是缺乏的问题。过去家庭教会曾经缺乏过圣经，在逼迫最严酷的时候，圣经都被没收和烧毁了，那时的弟兄姊妹们就在家里油印甚至手工抄写经卷，来为主传道。国家开放以后，“三自会”直到一九八二年才重新印刷圣经，起初数量也不足，而且限定只卖给在他们大教堂里参加聚会的，不给家庭教会。但是，神感动在港澳和外国的

教会帮助我们。早在文革末期，和海外教会有联系的国内信徒就开始通过这个渠道秘密得到圣经，也有弟兄给我送来过一些，我用来传福音，另外还给爱湖带回山西大同，那时相忱还没有回来。

国家开放以后，海外教会终于获得机会更多地为家庭教会输送圣经，有的教会鼓励信徒利用在来华访问出差时，携带若干册圣经，还有的专门组织旅游团，每个人都在行李里最大限度地带上圣经，奉献给国内的信徒。他们当中不仅有华人，也有操着各种语言的外国人。当时香港有一个专职从事向国内运送圣经的机构，叫作“敞开的门”，负责这项事工的周牧师是位年轻的广东人。他和同工们把大批的圣经秘密地运到北京，通知相忱和我，还有其他的家庭教会前去领取。仅在一九八一年那一年里，经相忱和我的手，就为家庭教会送出去两千多本圣经，全国各地都有人闻讯来要圣经，特别是农村的教会。

今天，家庭教会仍然面临着很多的缺乏，我们还缺乏大批的传道人，缺乏为他们提供必备的培训，缺乏各样的属灵书籍等等。我们应当把这一切的缺乏，借着信心向神祈求，相信在神丰富富的恩典中，他已为我们预备，教会必不至缺乏。

第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跟随主的道路，是一条在人眼中看为羞耻，被诬蔑和囚禁，遭受鞭打和侮辱，以至于流血、舍命的道路。这是主基督所走过的又吩咐给教会要走的道路，是历世历代基督的教会和圣徒们曾走的道路；这是教会成长和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今天的教会也必须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窄路，是充满了苦难的路。我们看教会的历史，从建立那天开始就是在苦难中。从使徒时代起，就先后有四个罗马帝国的皇帝逼迫过教会，但是结果，强盛的罗马帝国不但没有把教会消灭掉，反倒借着使徒们的手把福音传遍了地中海沿岸，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基督教会的发展，越是在苦难当中发展得越快，在使徒时代是这样，在现代也是如此。

我们回顾一九〇〇年的庚子教难，那时教会在中国大受逼迫，义和团在慈禧太后的操纵下，杀害了很多宣教士和信徒，甚至有的宣教士连



同他们的小孩子在内全家遇难。这些蒙主所差派的福音使者，把最宝贵的福音种子和他们的鲜血，一起播撒在中国这块坚硬贫瘠的土地上。结果怎么样呢？杀戮基督徒越多，迫害教会越疯狂，教会反而越发兴旺！在外国有人说过：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能使沉睡的灵魂苏醒。很多人为主殉道了，但是教会却发展得更快，也更多。

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那三十年大逼迫中，教会同样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迎来的是空前的大增长。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的教会付上了忍受苦难的代价，坚定地走十字架的道路。今天逼迫仍然没有过去，教会要走的还是这条充满苦难的窄路。时至今日，家庭教会不是仍旧被视为“非法聚会”，而时时遭到取缔吗？信徒和传道人不是仍旧常常被逮捕，被驱赶吗？那个世界的王不是仍旧企图用种种不合理的法令法规，来捆绑基督的教会吗？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惧怕，这些不过是十字架的道路上必不可少的试炼，“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雅各书 1：2-4）逼迫不能从十字架的道路上把我们掳去，反而坚固我们的信心，借着经受百般的试炼来荣耀神。“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 1：12）

相忱在一次和同工们分享教会的道路时，曾经说过：“十字架的道路是个窄路，十字架的道路是个羞耻的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吃苦的路。我们跟从主基督，不是那么简单的，应当像使徒彼得说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彼得前书 4：1）如果你的教会的路走宽了，恐怕你是走错了。我们一定要照主的吩咐，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主既然已经把他的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末世的教会就要回到圣经去；回到十字架的道路上去；回到《使徒行传》去，跟着使徒的脚踪行。今天在中国的教会应该走什么道路？我们的回答是：家庭教会才是今天教会应该走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使徒行传》这卷

书是基督教会建立和发展的蓝图。我们的口号就是：回到《使徒行传》去，跟着使徒的脚踪走！回到《使徒行传》去，跟着使徒的脚踪行！基督的教会应该反对“三自会”的那条错误道路，也反对一切试图将教会与世界相混淆、相联合的道路，而唯独坚持带领主的羊群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使徒带领教会在信心中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主在圣言中为他的教会所见证的道路。

### 三

葛培理博士 (Billy Graham) 是世界知名的福音布道家，原来我们并不认识他。一九八八年初冬的一天，陈梅伯姊妹来电话说葛培理博士正在中国访问，邀请我们两人到建国饭店吃饭。梅伯姊妹有亲属在国外，和国外的联络比较便利，一些外国的主内肢体就常通过她找到我们。接到这个消息，相忱起初有些犹豫，这么大的人物邀请我们，何况我们又不认识他。但梅伯姊妹劝相忱说：“请你就去吧，盛情难却！”于是，到了约定的那天，下午四点钟，我们和梅伯姊妹一起到了葛培理博士下榻的建国饭店。见面后，相忱和葛培理博士先在饭店的大厅谈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在相忱讲话的时候，葛培理博士谦恭地端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听得非常认真，而他自己的讲话则是思路清晰，挥洒自如，确实颇有大家的风度。随后我们一同去餐厅就餐，当时在座的人中有葛博士的夫人、滕近辉牧师、许牧世牧师夫妇，都是我们久仰其名而未曾见过面的，另外还有施美玲姊妹、毛太太和葛博士的次子等，一共是十一个人。

在餐桌上，大家边吃边谈，大约还不到六点钟，葛培理博士就说：“很对不起，今天我不能陪你们。因为明天我还要参加一个国家首长的会见，我要回答他们的问题，我需要预备，所以就不奉陪了。”说完就提前退席了。葛博士离开后，相忱换到他刚才的座位上和在身边的葛夫人交谈。葛夫人 (Ruth Bell Graham) 的父亲 L. Nelson Bell (中文名钟爱华) 早年是一位美南长老会在华传道的宣教士，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她本人就出生在江苏省的清江浦 (今江苏省淮安市)，中文名字叫钟路得，

十七岁时才随父母返回美国。因为这样的原因，她内心中有一层割舍不断的中国情结，称自己是“清江浦的女孩”，对于中国的福音事工也深有负担。相忱问葛夫人：“你还会说中国话吗？”葛夫人笑着回答：“我差不多都忘了。我十七岁才离开淮安回美国去，现在基本都忘了。假若我在中国再住一个时期，我还会说的。”她还讲到：“这次我要到淮安去看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那里有一位把我带大的老阿妈，我要去看望她。”饭后，我们就告辞了。这就是我们和葛培理博士的第一次来往。因为只是短暂的初次见面，所以相忱和他谈话的内容比较简单，吃饭时和其他人的谈话也主要是彼此问安，双方都没有更多地谈及有关教会的话题。

我们并没有把这次同葛培理博士的见面看得过于重要，过后也没有和他再有联系。想不到六年以后的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忽然接到对外友协的一个电话，通知我们：三天之后的一月二十四日，葛培理博士约请我们到王府饭店吃午饭，当天晚上还要来我们家里讲道。这个突如其来的安排让我们感到很奇怪，时隔六年之久，葛博士怎么会在我们没有邀请的情况下，突然提出要来白塔寺教会讲道？教会的同工们商量，他既然已经提出要求，我们如果拒绝也不太好，那就让他来吧。可是要在我们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子里接待葛培理博士这样有名望的大布道家，实在勉为其难。最后我们不得不临时把床都拆了，腾出地方来尽量可以多坐一些人。就在这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二十三日的下午，相忱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乘公交车去附近的邮政局取包裹。过了不一会儿，我正在家里和几位同工忙着收拾屋子，就见相忱回来了，脸上沾满了鲜血，开口就问我：“我干什么去了？”我被惊得几乎说不出话，忙告诉他说：“你不是去邮局了吗？”相忱“哦，哦”了几声，才说：“我摔了……”众人把他扶到床边坐下，正好在场的同工中有梁慕光大夫，她为相忱检查了伤情，发现相忱右眉骨上方有一个不小的伤口，下嘴唇也被自己的牙齿咬破一个大口子，足足有一个小孩的嘴唇那么大，里面的肉都向外翻了出来，眼睛周围还有很多淤血。梁大夫说：“送到医院最少要缝四针，这必须缝，缝了好得快。”可他不肯去。我看着眼前这血淋淋的伤口，禁不住一阵阵的眩晕，手直发软，是爱湖用清水为父亲洗净了

伤口中和脸上的血污，止住了血。相忱说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疼痛，坚持不肯去医院，只要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七位同工就跪在地上，同声向神祷告。晚饭时，我给相忱煮了一碗软软的面条，相忱都吃了，嘴唇一点儿也不疼。这真是神的奇妙恩典！相忱回想他摔倒的经过，说自己正要抬脚上车的时候，似乎觉得有人在背后推了他一下，就向前摔倒了，脸部重重地撞在地上。旁边的路人把他扶起来，要送他上医院，相忱说我不去，我的家就在这儿。好在他还没有昏迷，只是一时有些迷糊，自己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会儿，就摇摇晃晃地走回来了。

第二天中午就要去见葛培理博士，可早晨起来发现相忱脸上淤血的地方都成了紫黑色，我看着他的模样就活像一头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无奈之下，平湖拿出自己的一副墨镜给父亲戴上，才勉强使那些痕迹略被遮挡，看上去不太刺眼。这天中午，我们在王府饭店和葛培理博士共进午餐，席间作陪的有我们见过的施美玲姊妹和葛博士的次子，另有许多随行人员是我们不认识的，在场的还有对外友协的工作人员，但没有见到有“三自会”和宗教局的人。因为在场的人很多，相忱也没有机会和葛博士多谈什么，仅仅是礼节性地表示欢迎他当晚到白塔寺教会讲道。饭后我们就回来继续做准备，下午对外友协的人提前来家里看了看，见我们已经把这件狭窄的房间收拾妥当，也没说什么。本来同工会商量恐怕现场太过拥挤，就决定不把葛培理博士要来讲道的事情提前公开地通知白塔寺教会的信徒们，只是把原在星期二晚上的查经聚会调到二十四日也就是星期一的晚上，也没有向参加查经的人说明调整的原因，这样我们预计参加晚上聚会的有四五十人。但还是有很多人得到了这个消息，那天晚上来的人很多，屋里坐了六七十人，门外站着的人更多，窗户上都挤满了人。傍晚七点钟，对外友协的专人专车把葛培理博士送到白塔寺。他进来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他就很有礼貌地微笑着和我拉拉手，然后从正在唱诗的人群中间挤过，到了最前面。唱诗和祷告结束后，先是由相忱致词欢迎，他说：“今天我非常高兴，葛培理牧师来到这里，我们是一九八八年才认识的。我们都关心全世界的教会，虽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但我们是异地同工，我们常为你们的工作祷告。”随后他话锋一

转，就批评道：“现在美国有人主张同性恋，我觉得非常不讨神的喜悦。这在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实在是太不应该了！”相忱讲完，葛培理博士站起来讲话，对于相忱的批评，他回答说：“我们美国的信徒多半是爱主的，是好的，不好的人只是极其少数。”接着他讲的是他个人蒙恩的见证，说道：“我不是一个名人，我是个放牛娃。”他讲他自己小时候是个放牛的孩子，怎样在农村长大，天天放牛挤奶；讲他的母亲是怎样的爱主，怎样地为他祷告；讲他后来信了耶稣以后，怎样奉献为主做工，最后他说自己正在发烧，不能多讲话了。葛博士讲的内容很简洁，只讲了见证就结束了，但他的谦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葛培理博士下面讲话的是他的次子，他说：“我今天来到白塔寺教会，见到袁牧师夫妇二人，感到非常荣幸。”又对信徒讲了一些勉励的话，希望大家在福音真道上，竭力为主做工。当天为葛培理博士作翻译的是陈恩明牧师，他原籍是广东潮州，在香港的潮州教会服事。因为此前相忱在看葛培理博士讲道的光盘时，听出来翻译的人把他所讲的“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这句话给故意漏掉。相忱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就预先提醒葛培理博士：“这次你来最好带自己的人作翻译，不要请外人。”意思就是告诉他讲道时要请信主的人担任翻译，而不要使用不信的人，因为在无神论的国家，他们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把一些重要的话故意删掉。陈恩明牧师那天晚上的翻译非常出色，葛博士在香港的布道大会也是由他担任现场翻译的。葛氏父子讲过后，陈牧师也讲了几句，就散会了。临走前，葛培理博士说他第二天就要启程去北朝鲜，请求大家为他们的行程代祷。这是我们和葛培理博士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直接的交往。

当年葛博士的次子又来过一趟，仍是通过电话约请我们到阜成门外的金都假日饭店见面。葛培理博士的次子，中文名字叫葛爱德，葛博士前两次来访时都有他陪同，这次却是只有他一个人来。落座以后，葛爱德就直接表达了他此行的目的，说：“这次来是为要请袁牧师参加一九九五年的白宫早祷会。我们美国每年二月份都要由总统出面邀请各国的领袖人物和知名人士参加这个早祷会，这次特别邀请你参加。”葛培理博士

曾出任多位美国总统的宗教事务顾问，筹划组织每年白宫的早祷会正是他名下的重要工作之一。相忱问：“邀请的都是些什么人呀？”葛爱德说：“就是各方面的知名人士，有你们家庭教会的，另外还有‘三自会’的。”相忱听到这里，立刻就道：“有‘三自会’的？我根本和他们没有来往，我们也没有共同语言，我见了他们没有话可说。我不能当时答应你，我觉得我也没有受感动要去。”

葛爱德的脸色明显有些不好看，但他还在努力试图劝说相忱：“你这个看法不怎么对。因为‘三自会’也救人灵魂嘛，它也印圣经，也传福音，信徒那么多，你们有什么不可以合作的呢？”这是葛氏父子第一次向我们提出有关家庭教会与“三自会”合作的问题，前两次葛培理博士本人都不曾直接或是间接地提到过，这次是由葛爱德提出来了。相忱耐心地对他解释说：“你所听说的，你所见到的，完全是宣传，恐怕你是被它欺骗了。”葛爱德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不住地点着头念叨：“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合作呢？耶稣还爱仇敌呢，你们怎么能这样？”忽然又转头问我：“是不是你不放心呀？”我说：“不是。我怎么会不放心呢？”他说：“你不放心的话，我可以亲自到你家里接他，陪他上飞机，开完会以后，再把他送回家。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很诧异，不明白他怎么会得出这样的想法，只能说：“不是，不是我不放心。”相忱见他还要对我说什么，就插进来，接过我的话，对葛爱德说：

“是这样的，第一，我在中国坐监那么多年，人家不会批准我出国的，怕我在外面说出对他们不好的话。”葛爱德说：“这是美国政府和总统的邀请，中国政府不会不给面子的。以总统的名义请你，他们不会不批准的。”相忱继续说：“批也好，不批也好。但是第二，我的身体条件不许可我做长途旅行；更主要的是，第三，我不能和‘三自会’一起参加活动。我现在没有受感动要去，放在祷告里吧，我现在不能决定的。”葛爱德急切地说：“你说和‘三自会’的人没有共同语言，那么你们可以在一起听大会报告，到分组讨论时可以分开，不让你们在一组，那有什么关系呀？长途旅行可以这样，我们安排你中途先在旧金山休息几天，再飞到华盛

顿。身体不好，休息就可以啦。”相忱的态度依然很坚决，说道：“那我也不去。因为我是个传道人，一向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这是我的第四点。”相忱和葛爱德又谈了半天，可说来说去总也没有个结论。最后相忱说：“不是她不放心，是我不去，我不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于是，这次谈话就只得不欢而散了。

葛爱德空手而回之后，大约又过了两个月，相忱收到一封葛夫人的亲笔信，大意是“袁牧师，参加白宫的早祷会是个很好的机会，你应该不要失去这样的机会。我希望你能来，开完会后，还要请你在我家作客三天，然后再送你回国。”虽然葛夫人的心意确实很真诚，很感人，但相忱还是坚持谢绝了这个邀请。他用英文给葛夫人回复了一封长信，重申了他和葛爱德谈过的四点理由。他在信中还说：“假若是葛夫人的个人邀请，我是可以考虑的；假若是出于美国政府的邀请，我是不能考虑的。”

和相忱收到同一份邀请的中国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还有广州的林猷羔弟兄和上海的李天恩弟兄。相忱告诉我，他先后接到过林、李两位的电话，询问他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相忱毫无保留地讲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们两位也和相忱有同样的感动。最终，中国家庭教会的三位传道人约而同地拒绝了美国总统的邀请。

记得当年的圣诞节，我们还收到一张葛培理博士亲笔的贺卡，相忱也不回，说：“他搞‘三面人’，我不和他来往。”我心里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说：“你应该回人家。”可相忱却一摆手，用不容置疑的语调说：“不回。”其实我们每年圣诞节期都会收到来自国内外的几百张贺卡，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卡片挂满了小屋的墙壁。虽然相忱本人主张不过圣诞节，白塔寺教会也没有举办过圣诞节的专门活动，但他每年都会尽力回复所有收到的圣诞贺卡，特别是那些来自国外的，更是由他自己一一地亲笔书写，十多年间从未中断，直到他在世的最后两年身体实在难以支持的时候，才改由同工帮他打印贺卡。起初我对他这样坚持亲自回复贺卡的作法还有些不解，又怕他太过劳累，就问他：“不回不行吗？”相忱很认真地解释说：“目的是让大家知道我还没死，还活在主里面，还在为主做

工，这样大家才好知道为我祷告。”其他许多不认识人的贺卡相忱都回复了，唯独没有大名鼎鼎的葛培理博士。相忱对此的评价是：“他是‘三面人’，既讨好政府，又讨好‘三自会’，还想讨好家庭教会。他来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和政府‘三自会’合作。”

我们与葛博士的前两次交往，第一次是由陈梅伯姊妹介绍的，第二次是由对外友协代为沟通，无论政府还是“三自会”都没有出面参与，因为对外友协名义上只是一个民间性质的国际交流机构，不是政府的部门，更与宗教无关，所以我们才接纳了他在白塔寺教会的那次讲道。事后我们才知道，前一天他还在“三自会”下属的崇文门教堂也讲了一场，如果我们当时了解这个情况，肯定不会同意他来我们这里讲道。葛培理博士本人固然从没提及过家庭教会与政府和‘三自会’合作的问题，但却由葛爱德代表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葛爱德自己还主持着一间名为“东门”的机构，专门从事向中国输送圣经的工作，为此他也曾数次向相忱表示愿意同我们合作，为中国家庭教会提供圣经，但我们既已察觉出他们的意图，自然不能和他们再有更深入的合作。和葛爱德同来的人确实送过六箱圣经到白塔寺，并且要求我付九百六十元的费用，我把钱给他们了，但没有把这事告诉相忱，恐怕他的倔脾气上来又让人家难堪。以后的事情当然是不了了之。

后来有一次，我们去一家饭店看望外国朋友，无意间在那里遇上了施美玲姊妹和她的丈夫大卫弟兄，他们两人都在葛培理博士主持的机构中工作，与葛博士的关系十分密切。交谈中提到了那次白宫早祷会的事情，我顺便问大卫，“三自会”的人是否参加了，大卫说：“没有。因为你们都不去，所以我们连他们也不请了。”由此看来，参加白宫早祷会确实是葛培理博士等人“热心”撮合中国家庭教会走向与政府和“三自会”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相忱和林、李两位弟兄拒绝参加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选择。感谢神，保守中国教会，抵挡了这一次的诱惑。

有些国外的弟兄姊妹对我们存在误解，他们认为相忱如果参加那次白宫早祷会，对我们的工作和教会都有好处；甚至认为我们还陷在以往



的怨恨中，影响教会的合一。相忱的看法是：“如果我去的话，对我个人当然有好处。但我不是为个人而活，我是为主而活，我的工作就是传耶稣的十字架。葛培理总希望家庭教会和‘三自会’和睦同处，但其实是不可能的。外国朋友以为我们这些家庭教会的不与‘三自会’合作，是因为心灵中的伤痛还没有被神的爱医治，其实不是的。我们不能与他们合作，完全是因为双方的道路不同，我们是基督作头，他们是政府的领导作头。我们做任何事，不是要凭自己的能力和意思，而是借着祷告，凭圣灵的感动而做。我们不求人的认同，只求合神的心意。”

现在有许多海外的教会、机构和信徒们热切地关心中国的教会，希望了解中国的教会，也愿意为中国的教会提供各样的帮助。我们劝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要慎思明辨，以免受到蒙蔽。对于“三自会”，不能仅仅是看它的表象，更要深入地考察它的本质；对于家庭教会也是一样，也需要加以深入细致的考察。相忱生前在被问到“海外教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中国的教会”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唯一可能做的，就是祷告。请你们为三件事情祷告。第一件，要为将亡的灵魂祷告。虽然中国有几千万信徒，但是比起十多亿人口来说还是很少，只占百分之几。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没有得救，所以请为这些将亡的灵魂祷告。特别是西藏、新疆地区，他们很不容易接受福音。

“第二件，中国教会已经有超过六千万的信徒，他们需要被建造，他们需要在主基督里面长进，他们很需要在患难当中站立得稳。所以要为新信主的人祷告，巴不得他们赶快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患难中凭着坚固的信心能够站立得稳。我们中国的教会缺少传道人，原来这些传道人差不多都老了，都八、九十岁了，那么信徒怎么能得到造就？而且我们的属灵书籍也很少……这么多信徒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传道人的培训是一个很大的需要。感谢主，国外有很多教会和信徒有这样的托付，很关心中国教会的成长，正在做着很多培训的工作。虽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主都加给他们力量，使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培训的工作，帮助中国的教会和传道人在真道上更得长进，更有力量，更好地为

主工作。

“第三件，要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祷告。因为我们相信在《箴言》12：1中所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我们祷告，求主感动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能够把福音的门开得更广，开得更大大，使我们传福音没有任何的阻拦。好像和现在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样，神怎么样感动古列王，让犹太人返回故国，重建他们的圣城和圣殿；神也照样感动前苏联的领导人，让他们放弃‘无神论’，在国家里重新有信仰的自由。当然，前苏联从一九一七年到后来，有七十多年完全被‘无神论’控制，但是，你看报纸上的报道，现在克里姆林宫的教堂完全开放了，用作礼拜，特别叶利钦是热心的东正教徒。被‘无神论’控制了七十多年的前苏联，‘无神论’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以前在学校里，老师教学生把列宁当作楷模，现在不行了，学校有宗教课了，讲耶稣了。我们相信神会做奇妙的事情，在苏联能够开放，在中国也能够开放。所以，请你们为中国的领导人祷告，许可宗教信仰有更多的自由，使福音的门在中国开得更广大。”

## 四

一九九七年初，我们再次接到电话，说葛夫人要来看我们。葛夫人下午六点钟下飞机，我们和陈梅伯姊妹八点钟赶到国际饭店。这次葛夫人是一个人来的，同行的随员中有吴慕迦的女儿吴静，她在葛培理博士的家里作看护。葛夫人的身体非常瘦弱，行走都显得异常吃力。我在搀扶她的时候，发现她的身上竟然穿有一件钢制的背心。葛夫人对我解释说：“我就靠这个，不然我走不了。我的腰不好。”我们这才知道她的腰椎部位已经有了很严重的病。

葛夫人对我们说：“我这次是特意来看望你们，因为在美国都传遍了，说你们受到迫害。我听到了这个传言，实在不放心，特意坐飞机来就是要亲眼看看你们。看见你们，我就放心了。”葛夫人告诉我们，她在美国还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九九四年葛培理博士来白塔寺教会讲道的前

一天，相忱那次意外的摔倒是有人故意所为，目的是阻拦相忱与葛培理博士的见面。

因为葛夫人的身体状况，她不能在外多做停留，第二天一早七点钟就要坐飞机返回美国。葛夫人拉着我的手，流着热泪，同我们依依惜别。她很动情地说：“我实在不放心你们。我的身体不好，以后恐怕不能再来看你们了，我会为你们祷告。我们天国再见。”我们也流下了泪，深深地被葛夫人的无比爱心所感动，同她久久地拉手，不忍分别。

葛夫人并没有向我们讲述她所听到的详情，我们也没有向她询问。因为各样的逼迫在我们的身边，从来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就是在葛夫人来的这一年当中，白塔寺教会的聚会至少有两次因阻挠而被迫停止。

第一次是六月二十九日，早晨还不到六点钟，公安局的人就来了，进门说：“老袁，今天请你们去看电视，看看香港回归的大好形势，还向你们学习圣经。”因为这天正好是主日，相忱不同意去，但来人却说聚会必须停止，因为国家领导人都去香港出席回归的仪式，这期间要确保北京的安全。当时家里只有相忱和我两个人，我就要求等孩子们来了再走，那人却强令我们立刻就跟他们走，而且既不许我留个便条，也不许我留下钥匙。汽车把我们拉到离白塔寺仅有一站之远的能仁胡同，进了一所没有门牌的院子。院里的房间很干净，有沙发，有床，有大电视，还预备了早餐和水果，像个宾馆一样，周围的人对我们也挺客气。

上午，公安局一位姓王的科长来和我们谈话。他说：“老袁，你现在怎么样啊？思想进步了吧？”相忱无动于衷地回答他，说：“还那样。”王科长又问：“还没有和‘三自会’合作呢？”相忱答：“没有，没有。”于是，这位科长马上摆出一副说教的架势，也不管相忱听不听得进去，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老袁，你太不对啦！改造了那么多年，你还不改呀？二十多年啦，你知道吧？退一步说，你对得起老梁吗？你走了这二十多年，她带着一大堆孩子，多不容易啊！你不要再自找苦吃了，我们等待你那么多年，现在对你很失望！你要再这样下去，你就没有家了，你要是再走了，你就更对不起她了。”相忱也不理他，转头看着我，抿着嘴一个劲

地乐，我也以微笑望着相忱。这天中午，王科长陪我们吃饭，有米饭和炒菜。下午我们就在那里看电视。傍晚六点多钟，汽车又把我们送回家里。

孩子们都在家等着我们，听他们说，早晨最先来的福声和平湖见屋里没有我们，就去街道办事处查问，那里的人开始死活推说不知道，后来看实在赖不过去了，才不得不承认我们被接走了，晚上就送回来。另外，他们还派人守在外面的胡同口，拦住来参加聚会的人。

第二天和第三天因为没有聚会了，他们都是早上快八点了才来。还是用车把我们送到头一天去的那个地方，还是整天把我们留在那里看电视。这两天吃的都是盒饭，我倒还可以吃，但相忱的牙不好，盒饭的饭菜太硬，他嚼了嚼都吐出来了，而后他就干脆不吃了。第三天是星期二，他们知道我们这天晚上有查经聚会，说：“今天你们得晚点儿回去，你们有聚会。”结果硬是把我们留到晚上九点多钟才放回来。

同一年里白塔寺教会第二次被迫停止聚会是在九月份中共召开“十五大”的期间。我们有连续两个星期被强迫留在位于北郊昌平区的家中，不许离开，也不许聚会。相忱愤怒地向那些非法拘禁我们的人抗议，说：“你们这是强制！信仰没有自由，你们不过是大力压我，我没有办法，但我心里不服气！还是信仰不自由，我保留意见！”但来的人也不说什么，只要我们不出去，不聚会就行。

第三次是一九九八年六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的时候，当时有两千多名记者随同访问，有关方面唯恐有记者可能采访和报道中国家庭教会的情况，再次强迫我们停止聚会。相忱说：“克林顿是大总统，我是小老百姓，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可那些人说：“克林顿不来，他可以派人来啊；他还带着很多记者，这些记者难免不找你。所以只要克林顿在北京，你就不能聚会。”相忱愤怒地质问他们：“克林顿是你们政府邀请来的，又不是我请他来的，你们请来的客人，你们自己管好，凭什么反倒来限制我？”最终我们还是被软禁在昌平，不许出门。他们还想让相忱写个纸条，说自己生病了，停止聚会。相忱说：“我

们基督徒不能说谎，这个纸条我是不会写的！”他们无奈，只得派人守在白塔寺外面，软硬兼施地把来参加聚会的人拦回去。

第四次是一九九八年的八、九月份，公安局派人来到我们在昌平的住所，对相忱说：“这么热的天儿，你就在这里自己查查经吧。”他们也清楚这么做没有道理，所以就特别的客气，也没有说出是因为什么，只是不让我们离开昌平。那天也是主日，相忱原本约好一位从美国来的乔治弟兄下午到白塔寺教会讲道，一时却来不及把这个变化通知他。上午十点钟，福音从白塔寺的家里打来电话，告诉我们教会那边已经被公安局的人把上了，说今天不许聚会。福音也知道乔治弟兄要来讲道，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出来，想要在半路上迎到他们。福音一出家门，守在门口的两个警察马上跟了上来，他装作要买东西的样子，一边和跟踪的人周旋，一边注意着来往行人。过了一会儿，福音就看见乔治弟兄他们四个人正在要过马路，就快步朝他们走过去，对他们说：“现在公安已经看着我们了，你们赶快走，今天停止聚会。”正在这时，后面的警察就过来了，问福音：“你们干吗呢？”福音说：“没干什么。”警察又要乔治弟兄拿出护照，乔治却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糖扔进嘴里，福音冲乔治他们摆摆手，四个人就转身离开了。福音也掉头往回走，那两个警察追上他，恶声恶气地问：“你刚才到底跟他们说什么了？”福音说：“人家来旅游的，问个路都不行吗？”那人说：“不对！你没说实话！”福音也有点火了，说：“那你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刚才你不也在旁边吗？你听见什么就算什么！我在自己家里说话都没自由了吗？”另一个怕把事情闹大，连忙说：“算了，算了。”就把先前那个拉走了。那天凡是来聚会的人都被守在外面的警察拦住了，说：“别上老袁那里去了，今天不聚会。”有些信徒不相信，问他们：“为什么没有聚会？”警察就撒谎说：“老袁病了。你们快走吧。”

我们连续一个星期都不许走出昌平的住所，楼门口和小区门口有人二十四小时把守。进来的人都被严格盘查，连安湖出去买菜也被跟踪，生怕她是去向什么人传递消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过后才听说那几天正有一个由三个美国宗教机构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北

京，消息也登在北京的一份报纸上，他们本是应国家领导人的邀请，前来考察中国宗教信仰状况的，可有关方面却怕他们来访问相忱。

除了被强迫停止聚会之外，我们还随时可能被限制行动自由，被试探，被监视等等。有时在聚会的时候，公安局的汽车就等在门外，聚会一结束就把我们拉回昌平，不许离开。等到了下次聚会之前再把我们拉回白塔寺，聚会完了马上送走。有一次，一个和我们打过了十多年交道的警察忽然不请自来，进门先是假意寒暄，而后就问相忱：“老袁，现在‘两会’都开了，你有什么想法啊？”相忱说：“人民代表大会开了，人民参政议政，好啊！”那人自讨了个没趣，只好悻悻地走了。还有一次，福音无意之间发现一个人正脚踩着一摞砖头，扒着后墙上面的一扇小窗户往里看。因为在白塔寺聚会的人太多，我们就在后墙上面开了一个小窗户，安装了一台排风扇，从那里可以听见屋里的说话，还能看见一部分人的活动。福音问他：“你干嘛呢？”那人的回答竟是：“我在执行任务。”

我们被逼迫的另一个原因是传送属灵书籍。因为寄到家里的书籍经常遭到查扣，所以平湖就提议把书寄到她工作的单位，这样不仅比较安全，而且那里离白塔寺很近，送过来也挺方便。平湖在单位工作积极，为人诚实，甚至连单位的领导都曾有好几次主动派车帮她运送这些书籍。可过了没多久，警察就找上门来了。那天一共来了三个人，两男一女，直接到单位找平湖谈话。开始还是他们那套惯用的开场白：“袁平湖，按着问题的性质，我们把你带到分局、派出所谈话都是合适的。但是我们考虑为了你的前途，还是到单位找你谈，你要好好配合我们的工作。”然后接着问平湖取过多少次书，平湖说三次。说实话，平湖自己也记不清为父亲取过多少次了，三次只不过是最近的次数。他们又问平湖有多少册，都是些什么书，发给了什么人，平湖说：“我没开箱，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本。取回来都拿去给我爸爸了，一本也没看到，不知道是什么。”

问话的人肯定对这样的回答很不满意，就恐吓平湖说：“这些都是国外的版本，是反动书籍！”见平湖默不作声，三人当中那个姓杨的就做出

一付关心的姿态，说：

“我和你爸爸打了十多年交道了。”原来他就是公安局里一直专门负责和相忱有关的各种事务的人。他说：“老爷子人挺好的，那么大岁数了，想聚点儿会，聚就聚吧，我们也不太管他。可这书不成，这是大事儿。现在有许多宗教狂热分子，打着你爸爸的旗号搞别的活动，你爸爸成了他们反对共产党的旗帜，也是被别人利用的，你以后也要帮着我们做你爸爸的工作。老爷子信仰是忠诚的，他就跟毛泽东似的，老了，糊涂了，江青等人就打着他的旗号在外头乱搞，你爸爸就像毛泽东晚年，自己说过的话也许都糊涂了，别人就利用他，打着他的旗号干坏事。你还年轻，要为你爸爸做好防范的工作，以后再有人把书寄给你，或是要做别的事，只要知道了，就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也可以帮你办理。你收到书后，也可以先打开看一看，如果需要发的就发，不需要的，咱们就处理掉。以后来的信和书就都这样办。”

平湖没有搭理他们。警察看问不出什么，就让平湖在记录上签字。他们又去找平湖的领导调查她的个人情况，领导很诧异地说：“袁平湖是我们单位的老职工了，很老实，人挺好的，还是工会主席，她不会做什么坏事的。”那个姓杨的说：“我们来查的不是她的事，是她爸的事，这老头可不一般，共产党弄了他二十多年，他能说共产党的好吗？”平湖的领导却不以为然，说：“我听说她老爸都八十多了，眼睛又不好，他还能做什么坏事啊？”警察们刚走，平湖就骑上车往家里赶，到家一看，刚才那三个人已经先到了，正和相忱说话呢。相忱的态度比平湖更明确，更坚决，他们只得把刚才对平湖说过的话，再对相忱宣讲上一遍了事。

逼迫纵然严酷，神的奇妙恩典却在时时保守着属他的儿女。那次警察到南豆芽胡同逼我们搬家时，也同时盘问相忱：“你这里有没有宗教书籍？这是非法的，要没收。”相忱实实在在地回答：“有。”警察就要相忱带他们去找。我在住的北屋里，透过窗户，眼看他们跟着相忱走进存放着上千册书籍和圣经的小屋，心里不住地向神祷告。过了一会，只见警察手里拿着几十本书走了。相忱回到屋里，快活得像个小孩子，笑呵呵

地说：“说实话真是有好处的，神自己会保守他的书籍！”原来警察看都没看那些靠墙码放，已经被我用旧床单遮盖妥当的书，只把窗台上散放的书拿走了。

二〇〇一年，白塔寺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所有的住户都要被腾退，我们也离开居住了四十多年的地方，搬到北京南城丰台区的洋桥。这里是一处新建的高层居住小区，生活条件比以前改善了很多，所受到的监控也远比以前更加严格了。一天，福声和平湖用自行车驮着相忱去路对面的小店理发，小区大门的保安却不许出去，要他们先去物业公司“请假”。这实在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住户为什么要向为自己提供服务的物业公司“请假”？福声不理睬他的纠缠，推着车往外走。那个年仅十来岁的小保安见拦不住，急得冲着对讲机大喊大叫：“哎，老家伙出来啦！”不久，就从后面跑步追上来一个男人，一路跟着他们三人到了理发店，还不时地拉开门向里面张望，要看相忱在里面做些什么。

不仅我们的进出遭到无理限制，就连来访的客人也受到盘查。尤其是有国外的朋友来探望我们的时候，公安局和宗教局的人必定到场，对客人逐一登记和拍照，甚至强行翻检人家的书包，没收里面的光盘等。从此，我们只得放弃在自己的家里接待国外来的弟兄姊妹，而只能改到外边和他们见面。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能摆脱被跟踪。一次，我们去北纬饭店会见一位从北美来的牧师，刚出门，那个跟踪我们的人马上尾随在我们后面。我气愤不过，相忱却不以为然，很豁达地说：“让他跟着吧，他就是干这个的。”在饭店的电梯间里，那人居然面对面地问我：“来的什么人呀？是记者吗？”我告诉他说：“不是，他是传道人！我们根本不认识记者！”进入楼道，他还是亦步亦趋地不离我们左右，客人为我们打开房门，那人又抢先伸头朝里面张望。我让开门口，故意对他说：“你进去吧，你不是跟着吗？”他一看房间里都是外国人就赶紧灰溜溜地躲开了。我们祷告交通后出来，见那个人还一直守在门外，等着再把我们“护送”回家。路上他问我：“你们都说的什么呀？”我说：“哎呀，我让你进去，你怎么不进去听呀？”他有点蔫蔫地说：“我不会英语。”我猜他这次



的“任务”大概没完成。受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唆使，小区的保安对待我们两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极端粗暴无礼，他们还只是些不到二十岁的孩子，我为他们感到难过。至于那个专职跟踪我们的人也终于暴露出他的身份。那是他有一次跟我们到麦当劳餐厅，并且坐在相邻的桌子上不住地偷听和骚扰我们和客人的谈话，当时在场的福乐见此情景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接报赶来的巡警把福乐和那个人带到派出所分别谈话，福乐听到两个办案的巡警窃窃私语道：“我叫你不要去吧，闹了半天那人是个‘雷子’（便衣）！”果然，那个人当即就被释放了，继续照旧天天跟着我们。

二〇〇五年四月三日，相忱照常在家带领主日聚会。会后吃午饭时，说自己不饿，不想吃，只吃了一小块蛋糕。我见他有些愣神，以为他累了，就让他去睡一会。刚躺下不久，孩子们就发现相忱好像有些中风的先兆，立刻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到附近的一间普通医院。医院诊断为脑梗塞，这时相忱还能说话，神志也清醒，只是半边身子不能动。医院决定采取保守治疗，可几天后相忱开始昏迷，发高烧，心跳高达每分钟一百八十次以上。因为病情加重，我们把相忱转到主治心脑血管专科的 TT 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那里不允许家属陪护，我们只能在每周规定的半个小时内轮流进去探视，进出病房都要更换专门的隔离服。可是病房外却总有一个很特别的陌生人，他可以随时随地进出，而且从来不需要穿戴隔离服。平湖曾偶尔听见两个护士彼此悄悄说：“这里面住的是个什么人呀？”有人告诉我们，医护人员之间都在私下传说，相忱是个“危险人物”。其实，早在相忱被送进第一间医院的同时，公安局和宗教局的人就到场了，以后几乎三两天就要来一次。在 TT 医院，相忱的病情曾有所缓解，各项指标都已基本恢复正常，但医院却在这时忙着催促相忱出院。一位主任医生把平湖找去，说他听说相忱是“国际名人”，怕我们在医院里闹事，执意要我们马上把相忱接回家。我们被迫把病危的相忱再次转到 YY 医院。转院的当天，我们刚进 YY 医院，平湖一眼就发现丰台区宗教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和另一个陌生人早已经等在那里了，后来福音还亲眼看见他俩和医生在一处嘀嘀咕咕。

我看到孩子们从 TT 医院取来的费用清单时，禁不住浑身哆嗦，那份单据上明明白白地记着：在相忱总共住院的二十三天中，被抽了二十一次动脉血和二十三次静脉血。我接连向两位信主的资深医生咨询，他们都说：医院对抽取病人的动脉血有着严格的规定，只有在家属签字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抽一次，绝对没有天天抽血的道理。可 TT 医院抽了这么多次的血，却一次也没有告知过我们。一位医生气愤地说：“这是置人于死地！我行医几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的！”我赶到 YY 医院一看，相忱的身体已经衰弱得不成样子，胳膊的皮下布满了淤血，耳垂都干瘪下去了。医院重新诊断的结论是极度贫血，低蛋白，营养不良。我看着相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唯有彻夜在主面前流泪为他祷告，倘若不是靠着从主那里得的安慰，我一刻也不能支持下去。

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活在这世上，在他里面就是平安。即使饱受病痛和迫害的双重折磨，相忱在地上最后的日子，仍旧保持着清醒的理智，能认出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能用手势与我们交通，能在纸上写出工整的字迹，能写出“回家”和我的名字“梁惠珍”。有弟兄姊妹来看他，他就在病床上和他们一一握手，大家为他唱诗祷告，他的嘴唇也和大家一起动，只是发不出声音。苏约翰牧师来探望他的时候，相忱很想和这位相知多年的老同工说点什么，可是只能张嘴，不能出声。最后相忱在枕头上抬起头，用手指着天，我们都明白他这无声的心意，相忱要表达的是：“我们要仰望主，依靠主。”还有向众人道别：“我们天家再见了。”二〇〇五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四点二十分，天上下着滂沱大雨，相忱在病床上吃过最后一次午饭，就安详地被主接去了。

自从相忱病重住院起，公安局和宗教局的人就频繁光顾我们的家。假意劝我说：“老爷子住院都花那么多钱了，他又没医保，你们就放弃吧，也差不多啦。”又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有两次还拿出钱来要给我，一概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们说：“我靠主一无所缺，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不要你们的钱，请把你们的钱收回去！”

相忱去世以后，我们的家更是被日夜监视，所有的来人一个不落地

都被拍照和录像，连我的弟弟妹妹都不放过。举行追思礼拜的前一天，街道办事处的人奉命来家里传话，说：“最好你们明天别举行宗教仪式。”为了阻止相忱的追思礼拜，这些人使用了包括散布虚假礼拜时间在内的各种卑鄙手段。在“三自会”聚会的信徒也被告知不准参加袁相忱的追思会，否则后果自负，其实我们根本没有通知“三自会”的人，他们如此行事，反倒使更多人得到了消息，赶来参加这个聚会。追思礼拜的当天，有两千五百多位弟兄姊妹进入公墓园区与相忱告别。虽然八宝山公墓的几个厅堂都空着，但他们却只准我们使用其中最小的一个厅，而且不开空调，连一个麦克风都不租给我们。现场的警察还强行把上千名前来参加追思会的信徒阻拦在公墓的外面。

一切的逼迫都是枉然徒劳的，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相忱的追思礼拜进行的非常顺利，无论是进入园区内的，还是被阻拦在外面的圣徒们，无不庄重肃穆，秩序井然。全然彰显我们这些在主基督里的人，真是这世上的盐和光。

愿神在他的众儿女的身上，得他当得的荣耀。阿们。

## 五

与相忱出狱的同时，王明道先生也被释放。一九八〇年一月，王先生回到上海后不久，就给相忱写来了一封信。当时王先生的眼睛还未失明，尚能勉强写字，但字体写得很大，一共写了六页。王先生在信中首先向相忱认罪，承认自己在监狱里撒谎了，使很多人因为他的软弱而跌倒；随后，王先生又写到：“我有件事情提醒你，倪柝声也撒谎了，不能听他的……他的品行不端正，千万别上他的当……”相忱把这封信看了两遍，又拿给我看。对于王先生在信里提到的第一个问题，相忱的态度是：“人都是软弱的，不能抓住人家不放。人犯错误是正常现象，悔改了就是好的。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呢。”对于第二个关于倪柝声弟兄的问题，相忱很不以为然，和王先生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对我说：“他（指倪柝声弟兄）犯罪，我也没看见，我不能说，我不能跟着他（指王明道先生）

说。我没看见他犯罪，那可能是人家造的谣，不一定就是真的，所以我不说。他（指倪柝声弟兄）是神重用过的，我不说，不批评他。”对于一些对待别人的错误过于热衷的人，相忱一贯的立场是：“人家的事，你干吗那么费劲啊？将来他自己要向神交账的。”相忱的回信没有给我看，也没有对我说，不知道他是怎样回答王先生的。因为我从来不主动要求查看相忱的来往信件，只有他拿给我看，或者讲给我听。

王明道先生和相忱当年一同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分子”，王先生是以“……因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改判一年，提前释放”的名义获释，而相忱是“维持原判”，只是出于符合“年龄六十岁以上，在监服刑超过二十年”的条件，获得假释的。假释之后还有十年的考验期，考验期内没有公民权，一切要由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负责监管，因此相忱必须要定期向派出所上交思想汇报。开始时派出所要求相忱每两个星期交一次汇报，以后逐渐放宽到一个月、半年交一次。到了该交汇报的时候，我就从外面给相忱带回来两本最新的《半月谈》，让他照着上面的宣传口径抄写几段，好在相忱在监狱里常写这类汇报，在这方面也算是轻车熟路了。至于汇报的内容不外乎就是那几条，第一是汇报自己的学习：“每天听广播，看报纸”；第二是汇报个人的行动：“我爱人上班，我在家里做饭”；最后是：“请求所长帮助我，尽快获得公民权”。每次汇报交上去，所长也没说什么，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写来写去，就是这些内容，再写还是这些内容，后来派出所就不要了，只到年底写一次就算了。但是，相忱的考验期却一天不少地延续了整整十个年头。

考验期内的人没有公民权，也没有行动自由，若要离开居住地必须预先征得派出所的批准。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考验期结束后，相忱和我马上去上海，看望王明道先生。十月底，我们坐火车到达上海，陈本伟弟兄来车站接我们。一见面，陈弟兄就告诉我们：“袁弟兄，我们看来要改变计划了。王明道先生一听说你们要来，看见你们的信就哭了，吩咐我无论如何要你们一下车就直接去他家。”又对我说：“王太太直夸你呢，说：‘袁师母那么漂亮的人，能等相忱那么多年，真是神的作为！’”

于是，我们临时改变原先打算住在陈本伟弟兄家的计划，直接赶到王先生位于武康路的家里。

虽然这时王先生已经年届九旬，身体衰弱，眼睛也已完全失明了，但还是在王师母的搀扶下，到门口迎候我们。他拉住相忱的手，哭着说：“相忱啊，我的好弟兄！我看不见你了！”一边说着，一边用手不住地抚摸着相忱。屋里的人也都哭了。王师母说：“你们的身体还这么好，还这么年轻，太好了！快坐下吧，快坐下吧。”相忱和王先生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见面，彼此讲述着这些年里各自的经历。相忱回顾自己，感叹地说：“我这一辈子平平常常，啥也不啥。整天忙，也想不起写点儿什么，没什么著作……”王先生打断相忱的话，说：“你别这么想！没有著作不要紧，有忠心就够了！神是看你的忠心，至死忠心到底，必得生命的冠冕！”

原本上了年纪的人就易于怀旧，特别是看到相忱和我从北京来，就更唤起了王先生对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和他在甘雨胡同故居的思念之情，同我们谈起这些往事的时候难免有些伤感。

王先生在上海武康路的住宅是他儿子王天铎单位分配的。吃饭的时候，天铎也来了。天铎对父母很孝顺，每星期都要两次回来陪父母吃饭。他和我们不太熟悉，但见面还是很恭敬地称呼我们“叔、婶”。谢饭祷告时，我们轮流开口祷告，我没睁眼，不知道天铎祷告了没有，可是没有听见他开口。吃饭中间，王师母对他说：“你十二岁就受了洗，现在你却承认主，有你这样的吗？”但天铎不吭声。相忱也问他：“你父亲已经这个样子了，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老了，你的信仰如何呢？”天铎想了半天，才开口说出：“一言难尽！你看我现在生活得这么安稳，可我父亲信耶稣，传道，结果落到这个地步。”而后，他又谈到圣经不可靠，不科学，特别是其中的“创世记”。显然天铎虽说表面上对我们很是客气，却在回避和相忱作深入的交谈。天铎此时担任着上海市人大代表，又是上海市政府的参事，还曾代表中国出席过联合国召开的专业会议。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和宋天真的丈夫王恩庆是好朋友，听说王恩庆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曾作为“进步学生”的代表，秘密地赴“解放区”参观访问过，回来之后

他的个人信仰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铎的动摇就是受到了王的影响。王恩庆后来虽也成为知名的学者，但他在去世之前，曾指着满满一屋子的书，亲口对我说：“我岳父为主传道，我却没有学习他！我会五国外语，读了这么多的书，可都是没有价值的！我后悔莫及啊！”相忱认为天铎是属于流浪在外的浪子，儿子永远是儿子，相信神的儿子迟早会归回的。

王先生、王师母和我们在一起，主要谈的都是回忆以往的人和事。回忆他当年悉心培养过的两个传道人，一个是姓罗的，后来去了美国却是灵性下沉，放弃了信仰，不再为主传道；另一个就是彭鸿亮，彭很年轻，比相忱还小十多岁，当年他的讲道处处模仿王先生的语气和动作，因此人称“小王明道”。据说他在被捕后，检举了包括相忱在内的很多人，把他自己提议发明信片召集人到王先生会堂聚会的事完全推到相忱的身上，所以他在监狱里只呆了一年多就被放了出来。可他最后的光景却很不好，出狱后就患上了半身不遂。听杨润民先生的女儿告诉我，她在东大地桥亲眼见到彭鸿亮，脚搓着地走路，不停地流着口水，话也说不清楚。一九六二年就去世了。又回忆起当年曾在他的会堂聚会过的那十一位传道人，他们中间既有已经为主殉道的武文蔚牧师和张周新、陈善理夫妇；也有先后参加了“三自会”的毕咏琴和王镇、吴慕迦、刘秀瑾等人，这几个人虽也曾和我们一同受苦，但后来的道路却不同；还有未曾被捕的杨润民先生。杨先生带领的南城布道所是基督徒会堂的一个支堂，他有八个孩子，家里开销大，就过于计较王先生给他的供应，对王先生很有意见。还回忆起他曾经的亲密同工，同时也作过相忱老师的石天民先生和王克忱先生。王先生还专门向我们询问了几位他早年的同工的情况，我记得其中有曾在基督徒会堂担任过执事的张庆生弟兄。张弟兄对王先生十分推崇，曾经把自己经营私人工厂的所得大量奉献出来，用于支持王先生的主工。后来他被定为“资本家”，受到残酷迫害，这时已经不在世了。王先生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太好，言语表达时而清楚，时而模糊，耳朵也聋，对他说话要很大声才能听得到。相比王师母的头脑更清楚一些，对有些事情和年代比王先生记得更准确。

我们在王先生家里参加了一次主日的聚会，聚会的人不少，有一百多人，三间屋子坐得满满的，可是王先生的讲道的确显得力不从心。这期间，相忱还独自去探望了李天恩弟兄，因为李弟兄曾来过白塔寺教会一次，所以这次是特意回访他。

四天过去了，能说的往事都说得差不多了，再也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们决定告辞。临走时，王先生对我们还是恋恋不舍，流着泪，拉住相忱的手，说：“你们多住些日子吧！你们多住些日子吧！”相忱询问王先生：“你对我还有什么劝勉，有什么指示的？”王先生摸索着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交到相忱的手里，上面写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几个字，是王先生亲自用墨笔书写的。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相忱把这张纸条拿给曾是王先生会堂同工的黄道安弟兄看，黄弟兄告诉我们，王先生所写的这八个字出自《诗经·大雅·荡》，原意是指做人做事大都有一个开局，却很少有能够到达终点。王先生引用这句古诗的用意在于，既是勉励相忱，也是勉励所有在主里的同工同道，要众人在事奉神的工作上，既有了好的开始，还要用自己的一生为打美好的仗，竭力把起初从主所领受的真道，持守到底。同时，王明道先生也是在借此表达自己务要为主尽忠的愿望。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王明道先生终于息了他在地上的工作，离开世界，与主同在。接到消息的当天，相忱就准备即刻动身赶去上海。可是随后又有消息传来，说因为这天正好是主日，王先生是在聚会中间去世的，于是正在进行的敬拜聚会当场改成了追思会，此外没有另外举行什么。由于上海当时天气炎热，王先生的遗体在当天下午就匆匆被火化。相忱只得取消了自己的行程。稍后，相忱写就了《记神仆王明道先生》一文，作为对王先生的纪念。

又过了八个月，王师母刘景文姊妹也安息主怀。我们是事后才得到通知的，故而也没能去参加她的追思会。从上海寄来的照片里，我看到追思会的横幅上写的是“刘景文丧事聚会”。我心里因此非常难过，不理解他们怎么能把一位圣徒的去世看作是“丧事”。我们是在主基督里得有

永远生命的圣徒，我们暂时离开这个世界，是进入主的乐园当中，等待主再来的那天，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要复活，在永生神的荣耀国度里永永远远与他同在。这是何等美好的事。

## 六

相忱回来那年已经整整六十六岁了，按他自己的话说：“我的肉体是爱工作，爱活动，想为主工作，传福音。”一九八〇年初，他就开始在家里带领起了查经聚会。最初这个小小的聚会连相忱在内也只有四、五个人，有一位姓关的老姊妹是原来在“福音堂”参加聚会的，还有两位慕道的中学生。过了没多久，这个小聚会就有了一、二十人。于是，相忱就又开始在我们这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子里，带领起了主日聚会。流离失所的羊群，听闻到牧者的声音，就纷纷从各处聚集到他的圈里。他们当中既有不愿参加“三自会”的老信徒，也有前来慕道的青年人。白塔寺教会作为一个以家庭聚会的形式敬拜事奉神的教会，就是这样蒙主所建立的。因为聚会是从我们在白塔寺内的家里开始的，所以被称为“白塔寺教会”。开始聚会的当年，相忱就在十三陵水库第一次为白塔寺教会的信徒施洗，以后教会每年施行一次洗礼，一直延续到今天。感谢主的恩典，把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给他的教会。白塔寺教会的信徒人数增长得很快，大约到了一九八二年时，参加主日聚会的人数就达一百多人，屋子里已经容不下，往往是八点半开始聚会，而七点多钟屋里就已坐满了人，为了尽可能地节省下摆放椅子的空间，只有老年人坐着听道，年轻一些的信徒都主动站着，后来的人只能挤在对面那间小厨房里，甚至屋外的过道都站满了人。因为相忱这时还有十年的考验期，按照规定在这期间相忱没有权利从事宗教性的活动，有关部门随时可以以此为由强迫取缔这个在我们家庭中的教会，直至再次把相忱抓走。相忱当然对此毫不在意，权当没有这回事，有关部门在那段时间竟然也没有搅扰过我们，这真是神奇妙的保守。

经过改革和开放，政治在表面上已经不再是凌驾于国家和社会生活



之上的统治力量，也不再如在此之前的三十年那样赤裸裸地逼迫甚至企图消灭教会。一九八二年通过的新《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做出了比较以往更为明确的阐述。教会的外部环境确实有所缓和，但无论在台前还是幕后，政治势力针对教会的控制和利用却始终不曾放松，只不过是手段上更加隐蔽和诡诈，更具有欺骗性。教会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仍是教会正在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考验。在新的环境中，相忱带领白塔寺教会继续坚持“教会应当与政治相分离”的立场，务要持守教会的圣洁，反对政治势力操纵教会的任何企图，同时也反对打着教会的旗号参与各样的政治活动。

一九八九年初，派出所以“人多，扰民”为由，要求我们停止聚会，教会的主日敬拜因此搬到安湖位于城区东南广渠门的家里。在那个热浪滚滚的春夏之交，人们身不由己地随着政治的潮流起伏跌宕，就连向来“寡言少语”的“三自会”都破天荒地站出来表态了。可这时的白塔寺教会里却仍是安静如常，相忱在讲道查经中一次也没有涉及过外面发生着的事情。六月四日是北京全城戒严的第一天，也正好是个主日。因为一切交通已经完全被断绝，那天清晨相忱和寿梅华教授结伴步行从白塔寺前往安湖家里带领聚会。寿教授任教于北京农业大学，早先在缸瓦市教堂聚会，结识相忱之后，他认识到了“三自会”的错误，转到白塔寺教会参加聚会，成为教会主要的同工。当时街道上除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之外业已空无一人，而且从白塔寺到广渠门有十公里的路程，往返都必须穿越危险四伏的长安街，可相忱他们二人却处之泰然，教会的聚会也是照常进行。有人曾问相忱：“现在国内的宗教政策是松了还是紧了？”相忱的回答是：“共产党有一定的宗教政策，无所谓松紧。我们不管他们松也罢紧也罢，主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那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好像使徒时代一样，神迹奇事随着证明所信之道。复兴的火，不但在世界各国燃烧起来，而且在大陆也一样。”

一九八〇年代，随着福音的广传，家庭教会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都得到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到九十年代初期，家庭教会的规模和信徒

人数均已远远超过了“三自会”，而且在国内外也产生出重要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有关方面继一九八二年颁布了“十九号文件”之后，又先后于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四年连续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意在大力加强对家庭教会的管制。《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六号文件”，其中强调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和监督，并提出：“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应依法登记，坚决制止自封传道人的传教活动，以及其他各种非法的传教活动。”在此家庭教会已经明显地被定上了“非法”的罪名。一九九四年二月，由国务院颁布的第一四五号法令《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亦再次重申：“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必需进行登记。”同年五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根据第一四五号法令的精神，制定出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详细列出了有关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条件和申请手续等。寿梅华教授把这些文件带到教会，我们看到在《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的第二条中，政府为“设立宗教活动场所”规定了六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有固定的处所和名称；（二）有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三）有信教公民组成的管理组织；（四）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各宗教规定的人员；（五）有管理规章；（六）有合法的经济收入。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下，大致只有寺庙道观能够完全满足这六个条件，而主要是由平信徒带领，在个人家中聚会的家庭教会，则会因为没有“固定的处所”以及没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的原因被拒之门外。加之有关部门对于遍布乡镇的庙宇大都不闻不问，但对于各地的家庭教会却严加限制，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是企图利用“登记”的手段，使一部分家庭教会在“登记”之后得以和“三自会”一同被纳入政府的掌控之下，而其余的绝大部分则被借机取缔，从而实际上达到彻底消灭家庭教会的目的。因此，相忱对它们的评价就是：“纸上谈兵，说的好听！”并且，这个《登记办法》本身虽然没有强调申请登记的家庭教会必须要隶属于政府认可的唯一“爱国宗教组织”——“三自会”，但由于唯有“三自会”控制着合法按立教职的权利，可以自然而然地把它的人员派进来管理那些已经登记的家庭聚会点。所以国内绝大多数家庭教会都是冒着随时可能遭受逼迫

的风险，坚持拒绝了政府的登记要求。

一九九六年，西城区政府宗教科一位姓李的科长来到我们家，拿出文件和法规条例给相忱，提出要白塔寺教会向政府办理登记。其实那几份东西我们早已从寿教授那里看过了，所以相忱这时就直截了当地回答李科长，说：“我不登！”李科长问：“为什么？”相忱说：“我不够格。这里面的六个条件，我没有一条合适的，我不登记。”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容大度，李科长表态说：“这里虽然不算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但可以说是简易的，所以必须要登记。不够条件也可以登，只要登记就行。”还说：“你登记了，要隶属于一个教堂，缸瓦市也行，崇文门也行。”两个人谈来谈去总也没个结果，最后李科长只好让相忱再考虑一下，并约他下个星期二到区政府再做详谈。

为了登记的问题，白塔寺教会专门召开了一次同工会。在会上，相忱对大家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家庭教会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其他的都不是路。我们一旦按政府的要求登记，教会就成了人民团体，而不论什么团体一定要接受党的领导，一定离不开他们的领导。教会根本不能登记，我们宁可先暂时停止聚会，也不登记。”大家一致同意相忱的意见。

下一个星期二，相忱如约去了区政府，李科长他们对他很客气，还是反复地向他宣讲关于登记的政策。相忱把同工会的决议告诉他们，说：“我们不登记，因为我们不够登记的资格。按《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的第二条和第六条规定，我们都不够条件。我们就一间小屋子，这是我家的住房，不是专用的礼拜堂；我也不是牧师，我们既没有规章制度，又没有经济基金，我们认为自己不够条件，所以不登记。我们已经在聚会时对大家宣布了，从下星期起停止聚会。”李科长听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政府规定，只要不登记，就不能聚会，现在相忱既然主动把聚会停了，他们一时也抓不到什么把柄。可李科长还不肯甘心，又说他打算召集西城区各个家庭聚会的负责人一起开个会，请相忱一定要来参加。相忱说：“我们既然不登记，不聚会了，也就没有参加的必要了。”相忱不愿再和他们纠缠下去，留下一张自己的名片，说：“你以后有事再找我，

或者打电话吧。”说完就走了。

虽然上一个主日聚会时，相忱已经公开对信徒们宣布，因为教会拒绝登记，所以停止聚会。可是接下来的一个主日还是来了三十多人，大家都不说什么，只是坐着唱诗、祷告。第二个主日来的人更多，并不需要有人提议，聚会又重新开始了。没过多久，李科长就又找上门来了，那天正好是主日，和他同来的还有派出所的所长。他们一进白塔寺的大院，就看见屋外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气得火冒三丈。派出所的所长朝着屋里喊道：“把老袁叫出来。”当时我正好在门口，赶忙进去叫相忱。相忱正在讲道，手里捧着圣经就跟我出来了。所长对他说：“这样不行！让你们登记你们也不登记，现在又这么多人，妨碍交通。这里是非法聚会，现在正式取缔，你让聚会的人都走吧。”相忱一声不响地站着听他说完，转身回去了，接着屋里又传出他继续讲道的声音。这一下李科长可真急了，暴跳如雷地大吼大叫：“怎么回事儿？没听见啊？出来，出来，都出来！”他硬挤进屋里，提高嗓门喊道：“这里不能聚会了，马上停止！你们大家都散开，回家去！”又对着正在聚会的信徒们大讲了一通所谓的宗教政策，要大家今后都去“合法的教堂”参加聚会。但信徒们众口一词地反驳他，说：“大教会都是假的，我们就是不去！”“我们愿意来听，这里能得造就！”李科长无言以对，只得连连挥着手，说：“散了，散了，赶快散了！”在我们的劝说下，大家没有对抗这些“在上掌权”的人，很有秩序地离开了。聚会被迫中断。

等人都走尽了，李科长还是余怒未消，铁青着脸问相忱：“你们怎么又聚会了？”相忱回答说：“不是我叫他们来的，是信徒们自己要来参加聚会。”李科长重又提出要白塔寺教会登记的问题，可无论他怎样软硬兼施，相忱依然坚持不肯登记。两个人的谈话越来越僵，我在一旁看到李科长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听他对相忱说道：“你是怎么念圣经的？圣经上写的，在上掌权的，你们要顺服。你念了半天圣经却一点儿都不顺服政府！关你的门就关你的门，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敢！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逮起来！但你要想一想，你家里的人等了你二十多年，才把

你等回来，你如果再犯法，屡教不改，被我们抓起来，你这样对得起老梁吗？”相忱完全不为所动，义正词严地说：“信徒要来我没办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门封上，把我带走，他们就不来了。至于我个人，我是信仰至上。国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触，我只有顺服神！”这话如同是火上浇油，李科长腾地跳了起来，冲着相忱大发雷霆：“你不要以为我们真不敢动你！只要我说一句话，马上就把你逮起来！”一向极少发火的相忱这时也终于按捺不住愤怒，挺身而出，双手往他们面前一伸，说：“你现在就带我走吧！”李科长他们再也无话可说，只得气哼哼地出门走了。待到这群人走远，相忱转身问我：“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虽然我刚才自始至终没有在他们的谈话中发言，但心里完全赞同相忱的观点和做法，我对相忱说：“对，你顶的对！”相忱看了看我，点点头，自语道：“坐监算不了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怕什么？”当时的气氛确实很紧张，李科长和相忱谈话时，旁边还有个女工作人员一直在做记录，以至我觉得他们第二天就会来抓捕相忱。即使在如此的压力之下，我心里仍然很平安，没有特别担心什么。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再也没有为登记的事来找过我们。

登记的问题是教会至今都会时常面临着的一个极重的考验。自从有关法规颁布以后，就不断有来自各地教会的来信、来访，询问相忱对于登记的态度。相忱一概本着圣经的话语明确告之——教会要回到《使徒行传》去，跟着使徒们的脚踪行！在现今这个特殊的时期，家庭教会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教会应当拒绝登记。二〇〇七年，一位很有名气的旅美华人牧师在讲道中多次公开提议家庭教会应主动寻求向政府登记，再次在中国教会内部引发一场有关登记问题的轩然大波。尽管这时相忱已经不在在了，但还有各地教会前来询问这一个问题。我仍然是以相忱生前对此的立场告知他们，勉励同工同道带领基督的教会坚定不移地走十字架的道路。

二〇〇一年的秋天，我们即将搬出白塔寺。十月十八日，是这个坐落在古老院落深处的家庭教会，二十二年当中的最后一次主日敬拜。因

为我们的新居洋桥所在地的公安和宗教管理部门的无理搅扰，人数较多的聚会难以进行。在这天的讲道中，相忱首先回顾了白塔寺教会二十一年走过的历程，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以此激励信徒们不可灰心，不要丧胆；接下来，他又劝勉大家，虽然要分开了，但第一要紧的是盼望大家不要停止聚会。相忱说：“只要有条件就可以在各人的家里聚会。不要怕人少，三五个人，十人八人，在家里彼此交通，彼此看望，彼此劝勉，在一起读经祷告，这就是聚会。你们要在爱心里过真正肢体的生活，家庭聚会更要显出功效来。这样的聚会，有神同在，必蒙受神的祝福。”以这时为转折点，原有的聚会被分散到不同的信徒家中，由原来白塔寺教会的几位同工分别牧养。这是主借着逼迫，使他的教会加倍地发展壮大。相忱高兴地说：“家庭教会，遍地开花！”

在白塔寺教会的二十二年里，每年都有一次为信徒施洗。对于洗礼的方式，相忱也是主张浸礼。起先的洗礼是在十三陵水库和什刹海等地，中间分别在安湖的家里和南豆芽胡同各有过一次。我记得一九九四年在南豆芽胡同的那次洗礼还闹出了个笑话。当时我们是在院子中的一个折叠浴盆里为一百多人施洗，警察闻讯赶来查问，他们看不懂洗礼，居然问相忱：“怎么从你这出来的人，头发都是湿的？你又不开澡堂子？”以后由于受洗的人数逐年增多，从一九九九年，洗礼改到北京西郊门头沟的野溪进行。二〇〇一年也是年已八十七岁的相忱最后一次亲自为信徒施洗，那次受洗的有三百多人。野溪的水流湍急，小女儿爱湖担心父亲在水中体力不济，就从始至终站在相忱身后，紧紧地搂住父亲的身体。教会分开聚会以后，每年仍然联合举行一次洗礼。因为相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尽管他自己一再地坚持，可是同工和家人都不同意他再下水。年二〇〇四是相忱去世的前一年，也是相忱最后一次到洗礼的现场，那年的洗礼是以往受洗人数最多的一次，达到七百九十八人。这是“家庭教会，遍地开花”所结出的果子，是神的灵大大动工的果效。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阿们！

原本还在二〇〇一年之前，已经有几位白塔寺教会的信徒自发地在

家里组织起了聚会，其中包括盲人的聚会，还有一处是在八里庄的易大娘家。易大娘也曾在“福音堂”聚会过，文革中全家被撵回东北辽宁的老家。那时她仍惦记着相忱，把一家人凭票限量供应的猪肉存入一个埋在地下的坛子里，托人捎来，要我转给还在监狱里的相忱。回北京后，她先是在白塔寺聚会，以后在她家里也有了聚会。相忱每周都要去那里讲道，回来时总是带着这位老姊妹亲手做给我的食品。易大娘去世时很安详，她的最后一句话还在嘱咐她的儿媳，说：“家里的聚会，你不要停！”我们搬出白塔寺之后，教会又在几处信徒家里开设了新的聚会，相忱每周都要逐一到这些聚会点，去带领他们聚会，讲道、查经和主领圣餐。他来往都是乘坐公交车，路程远的地方还要换几次车，又不肯要别人接送。那时他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吃饭很少，经常一餐吃不到一两粮食，但他自己却全不在意，还是依旧怀着一颗孩童般喜乐平安的心，靠着主加给他的力量，不知疲倦地四处奔走。有同工劝他多在家休息，减少一些外出，相忱很诚恳地对他们说：“那不行！谁生的孩子，谁不惦记着啊？”听到他这话，我也就打消了劝阻他的念头。一位同工告诉我，有一次相忱去她们那里讲道，会后大家送他从五层楼下来。相忱也不要人搀扶，自己在前面走得飞快，当其他人在后面紧赶慢赶地追到一楼时，看见相忱早已站在楼外笑呵呵地看着她们，说：“你们还真不行，我这身体全是那几年挑担子锻炼出来的！”

我们搬到洋桥的第二年五月，相忱在去八里庄聚会点的路上不慎摔倒，但他没有告诉那里的同工，进门像往常一样带领聚会。有人发现他裤子上全是土，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才说出自己刚才摔了一跤，还一个劲地说：“没事，没事！”要大家继续聚会。可同工们不放心，只让他带领掰了饼，没有再让他讲道，就把他护送回来了。从那一次以后，相忱在家里又摔倒过四次，所幸都没有受伤，进食比以前更少，多数时间只能卧床休息。

相忱在世上的最后三年，虽然年龄和身体状况都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外出带领聚会，但他通过在家里接待来访，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他所深爱

的教会。在相忱去世前不久，他专门把同工们召集到家里，一同分享和探讨家庭教会的牧养和发展道路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家庭教会以及信徒事奉资格的问题。圣经中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2：9）相忱说：“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彼得讲的很清楚：基督是圣洁国度的君王，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是属神的子民；被神分别为圣，是君王专属的祭司。我们的事奉资格就是这样的。新约时代，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已经从主领受了这个祭司的职分，每一个信徒都能够直接事奉神，直接与神亲近。在家庭教会里，在敬拜的时候，每一个信徒都有事奉神的资格，都可以讲道和执行圣礼，而不必拘泥于某些教会传统的限制。因为我们事奉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相忱既是这样从神领受的，也是这样积极实践的。在宝塔寺教会中，相忱提倡信徒人人都要起来参与服事。他说教会的讲台是对信徒开放的，在聚会时，各人都可以上台讲自己读经的亮光和见证，最后再由相忱来为各人所讲的做总结；或是他先讲，再由各人按所听的分享各自的感动。正是由于有过这样的锻炼，以后教会分开时，同工们都具备独立带领聚会的能力。

第二个是家庭教会如何更好地体现肢体生活的问题。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家，而不在于华丽的礼拜堂和样式仪文；信徒在教会要活出彼此互为肢体的生活，而不是来开会听报告。相忱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信徒彼此都是肢体，我们应当把肢体的功用活出来，彼此服事，也能在主里得着彼此的供应。”相忱认为家庭教会的敬拜方式在这方面更有优势，因为家庭聚会的人数往往不多，信徒之间也比较了解。他鼓励大家在聚会之外应该有更多的肢体交通，特别是彼此探访，关心肢体在各方面的需要，各人要以实际的行动活出在基督里真实的彼此相爱。

第三个是建立家庭教会的条件的问题。相忱说：“成立家庭聚会，起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要你们全家都信主，这样才能成立一个家庭聚会。家庭教会，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建立在家庭里的聚会，如果



这家里有一个人不信主，要聚会，他不同意，那都不行。因为属灵的争战首先就是在家庭中发生，两个营垒的争战，在身边最激烈。所以必须全家信主才能建立聚会；第二个条件，必须这一家人敢于聚会。现在有人不敢在家里聚会，怕这个，怕那个。那个惧怕是从魔鬼来的，‘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 1：7) 现在好些基督徒为什么不敢聚会？《宪法》保障你的信仰自由，而且你聚会信耶稣不是做坏事，不是犯法，你为什么不敢聚会呀？在家里起码有宗教自由吧？只要你不耽误生产，不妨碍社会治安，在家里就可以聚会；第三个条件，必须环境许可。我们聚会，唱诗祷告，不要妨碍别人，不要干扰街坊邻居。我们在家里聚会不要人数太多，三十人上下就很好；人多了，我们可以再分开，以至于教会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更有易于传播福音。总之，只要有条件，我们就要敢于聚会。”

第四个是家庭教会的信仰基础及分辨异端的问题。相忱认为《使徒信经》是教会信仰的重要基础，也是信徒个人的信仰准则。凡是承认《使徒信经》的教会，不论所属的宗派，都应当彼此接纳，不要抬高自己，轻看他人。他也提醒大家在现今动乱的末世中，要警惕在教会中的各样异端；要把《使徒信经》作为基要信仰的准则，来分辨和抵挡那些离开圣经、似是而非的道理。

第五个是有关“教会联合”的问题。对于某些人再三鼓吹的“教会联合”，相忱从最初就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他说：“圣经中从来没有教会要在组织上联合的教导，把教会在组织上联合起来是人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启示录第二、三章讲到了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都在小亚细亚，使徒约翰写信时没有写给‘亚细亚的总督’，可见那些初代教会实行的正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教会与教会之间是在基督里的联合，在灵性上的联合。在物质上，要互相帮助，补足肢体的缺乏；在属灵的需要上，可以请外地的传道人来本地讲道或交通；但是在行政上，教会一定要独立，不存在其他大的联合的必要。圣经上从来没有过‘总会’、‘分会’、‘母会’、‘子会’的事情。”他还举了四、五十年代自己和王明道先生等人的例

子，当时“福音堂”和王先生的基督徒会堂等教会也不是凡事都要在一起商量，因为各自是独立的，王明道先生有时会把著作拿给相忱看一看，有时受邀来讲道，大家都是独立中又有搭配的。因此，相忱强调家庭教会要坚持地方自治，地方独立；教会不是地上的组织，不要搞“大联合”。这些都是相忱和同工们从神的道所得的领受，是我们数十年服事基督的教会的经验，同时也是我们对各种教会问题的回应。

相忱提出家庭教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务要坚持传福音，竭尽忠心地完成主托付给教会的使命。主耶稣在被接到天上之前曾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马可福音 16：15-18）相忱反复劝勉同工们，说：“今天在大陆，只要你敢传，就有人相信，就怕你不敢传。现在人的心都很空虚，愿意接受福音；特别是很多的青年人，他们找不到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他们无路可走，所以很容易接受福音。并且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个时机，努力传福音。”相忱又向同工们强调，在传福音的工作中，要抓住主的应许，要依靠圣灵的大能。他说：“我们传福音，缺少的是圣灵的恩赐，若使用恩赐来传福音，那效果就大了。所以一方面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恩赐；另外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把基督活出来，工作就更有力量。”在他即将离世归主之前，相忱还在念念不忘地为中国教会祝福：借着福音的广传，使家庭教会遍地开花。

## 袁相忱、梁惠珍生平年表

1914年7月 农历六月	袁相忱出生于安徽蚌埠，名袁振邦，祖籍广东东莞。父亲袁禹庭，母亲罗孝纯。
1915年	因袁禹庭工作调动到徐州铁路局，袁相忱全家迁居江苏徐州
1919年11月6日 农历十月十七日	梁惠珍出生于天津，祖籍广东肇庆。父亲梁巨骥，母亲林贵好。
1920年	袁相忱6岁（按周岁计算，下同），入读私塾，取学名袁相臣。
1923年	袁相忱9岁，随父母迁居天津，借住在外祖父罗子刚家中。因罗、梁两家是广东同乡和世交，袁相忱在梁家初次见到梁惠珍。
1925年秋季	梁惠珍入读天津铁路子弟学校。
1927年	袁相忱13岁，秋季随父亲到北平，入读北平基督教青年会附属学校，读四年级。
1929年	袁相忱15岁，由石天民老师介绍参加王明道先生带领的聚会，初识王先生。
1930年	袁相忱16岁，秋季小学毕业，升入北平基督教青年会附属学校的初中。并在此时将名字从“袁相臣”改为“袁相忱”。
1931年	梁惠珍秋季铁路子弟学校小学毕业，考入由教会开办的伯特利学校，读初中。
1932年12月29日	袁相忱蒙恩得救，时18岁。
1933年	袁相忱8月由王明道先生施洗，是为王先生第二次为人施洗。秋季初中毕业，升入北平基督教青年会附属的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当年秋季，梁惠珍转学至另一所由教会开办的仰山学校。
1934年	袁相忱夏季从财政商业专门学校退学；秋季考入远东宣教会于北平开办的远东圣书学院，因年龄不足报考的要求，为旁听生。梁惠珍秋季从仰山学校初中毕业，考入天津“三八女中”，读家政系。

1936年夏季	袁相忱得到信徒郭孙惠卿太太的资助，赴厦门参加由宋尚节博士主领全国第二届基督徒查经会。
1937年夏季 7月7日 7月29日 7月末 9月	梁惠珍从天津“三八女中”毕业。 “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军队开始进攻天津。 梁惠珍悔改得救。 梁惠珍赴北平报考“女一中”，其间借住在袁家；经由袁相忱的介绍，返回天津后开始到基督徒圣会所参加聚会。
1938年1月 5月 夏季 7月22日	袁相忱赴天津基督徒圣会所实习。 袁相忱与梁惠珍订婚。同月，梁惠珍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由张周新弟兄施洗。 袁相忱从北平远东圣书学院结业。 袁相忱与梁惠珍在北京结婚。婚后，袁相忱夫妇重返天津，在圣会所葛沽支堂事奉。
1939年秋季  12月10日	袁相忱结束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的事奉，返回北平。 应吴智院长的邀请到母校远东圣书学院事奉，担任吴智院长的翻译和助教。 长子袁福音生于北平。
1941年初春  12月7日  12月中旬	袁相忱带领妻子梁惠珍和长子袁福音，离开北平，前往河北省南部的乡村传道。袁相忱在宣圣会下属的成安东关教会与裴约翰牧师同工，梁惠珍在教会的开办的晨光学校任教师。 日本军队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驻华日军开始占领西方各国在华各地的宣教差会，拘捕美英等国的宣教士。 袁相忱离开已遭日军封闭的成安东关教会，转到成安县北散湖村继续在当地的乡村传道。
1942年3月20日 秋季	袁相忱的长女袁安湖生于成安县北散湖村。 袁相忱的父亲袁禹庭因病去世，临终前悔改信主。
1944年秋季	袁相忱全家离开河北省成安县，转到山东省魏县北皋镇的教会服事，继续在乡村传道。

<p>1945年2月 6月初</p>	<p>袁相忱的次子袁福声出生于山东省魏县北皋镇。袁相忱因母亲病重，带领全家返回北平。母亲得医治痊愈后和外婆一同悔改信主，并在猪市大街神召会由姚志辉牧师施洗。</p>
<p>1946年初</p>	<p>袁相忱结识了挪威神召会的苏朝生牧师，二人相约同工，在北平开堂传道。3月，袁相忱租下北平阜成门大街一百六十号，开办“福音堂”。但因袁相忱坚持独立传道，拒绝加入神召会，苏朝生牧师离开北平，独自返回张家口。</p>
<p>1947年1月25日 夏季</p>	<p>三子袁福乐出生于北平“福音堂”。袁相忱在“福音堂”第一次为二十多位信徒施洗。以后“福音堂”每年一次为信徒施洗，直到1958年袁相忱被捕为止。当年，袁相忱应瑞典宣教士费约翰夫妇的请求，接待和帮助一位来自瑞典的年轻宣教士艾喜德。</p>
<p>1949年2月3日 3月31日 9月21日  10月1日 冬季</p>	<p>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 次女袁平湖生于北平“福音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大会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专用权”。吴耀宗等五人被政府选派为基督教界参加该会议的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北平改称北京。 袁相忱在“福音堂”门外的大街上布道时，第一次遭遇到当时“军管会”的阻拦，从此被迫中断了已持续达四年之久的街头布道活动。</p>
<p>1950年6月25日 9月</p>	<p>朝鲜战争爆发。 吴耀宗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并在全中国教会的范围内寻求对于宣言支持的签名。以此展开所谓的“教会革新运动”。</p>

<p>1951年3月25日 4月</p>	<p>三女袁爱湖生于北京“福音堂”。 政府假借处理美国在华资产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将基督教指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该会议同时产生出基督教新的全国性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任主席。“三自革新运动”正式开展。同年，袁相忱和王明道等十一位北京教会领袖公开拒绝加入“三自会”。</p>
<p>1952年初</p>	<p>中国国内最有影响的自立教会领袖倪柝声、敬奠瀛先后被捕。</p>
<p>1953年5月</p>	<p>北京基督教联合会规定：任何教会均不得邀请袁相忱和王明道、王镇三人讲道。</p>
<p>1954年7月  9月30日</p>	<p>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员在北京灯市口卫理公会召开，正式成立基督教全国性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任主席。“三自革新运动”更名为“三自爱国运动”。 袁相忱参加由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处专为拒绝加入“三自会”的教会传道人举行的会议。会上由王明道先生代表各教会发言。会后，袁相忱等十一位拒绝加入“三自会”的传道人在王明道先生的会堂聚会，一致决议拒绝政府要求他们参加“政治学习”的要求。</p>
<p>1955年1月26日  8月7日</p>	<p>袁相忱参加了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处在北京新桥饭店举办的聚餐会。参会者大都是“三自会”的人员，没有加入“三自会”的传道人只他一人到场。 王明道先生夫妇等在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被捕。吴慕迦、王镇等人也先后被捕。北京没有加入“三自会”并且仍在坚持继续聚会的教会只剩下袁相忱和“福音堂”。</p>

1956年10月初	王明道先生夫妇等在被捕一年后，获得释放。其后不久，袁相忱曾去基督徒会堂探望王先生一次。年底，袁相忱开始参加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处组织的“政治学习班”，不久即退出。
1957年5月初	日本占领时期曾使用过“福音堂”的织田金雄牧师随日本基督教问安使团访华，专程前往“福音堂”看望袁相忱。下半年袁相忱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年底，梁惠珍和袁相忱的母亲被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处约去谈话，明确要求她们劝说袁必须参加“三自会”。年底，拒绝加入“三自会”的传道人之一武文蔚牧师在“福音堂”遭到公开逮捕。
1958年4月19日 9月 10月	袁相忱在“福音堂”被逮捕，预审期间被关押在草岚子胡同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时年45岁。 梁惠珍带领全家八口人搬出“福音堂”，迁居白塔寺内四十号。 袁相忱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开始在北京监狱服刑。同月，梁惠珍被招收到北京市西城区房管局，作工人。
1960年夏末	袁相忱被押送到黑龙江兴凯湖的劳改农场服刑和劳动。
1962年秋季	袁相忱被从黑龙江押回北京，仍关押在北京监狱。
1966年3月	袁相忱第二次被押送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先后被关押在甘南县音河、肇源县革志等地的监狱。梁惠珍被从房管局下放到建筑队，从事重体力劳动，并多次在单位内遭受无端的诬陷和批斗。
1979年11月16日 12月20日 12月23日	北京市中级法院对于袁福音所提的申诉给予正式的书面答复，称“对袁相忱的定罪、量刑正确的”。 袁相忱因符合“年满六十岁，关押超过二十年”的政策规定，获得“假释”，考验期十年。 袁相忱回到北京白塔寺的家中。时年65周岁。

1980年初  夏季	艾喜德教士得到袁相忱被假释的消息，专程从香港赶到北京看望袁相忱、梁惠珍夫妇。同时，袁相忱在北京白塔寺的家中开始带领查经聚会，随后即开始建立家庭教会。 北京市“三自会”下属的缸瓦市教堂首先重新开堂，以后几年其他几间教堂也先后恢复聚会。
1988年初冬	袁相忱应邀第一次在北京会见葛培理博士。
1989年10月底	袁相忱、梁惠珍夫妇前往上海，探望王明道先生。
1991年7月28日	王明道先生在上海家中安息主怀。数日后，袁相忱写作《记神仆王明道先生》。
1994年1月24日	葛培理博士到白塔寺教会讲道。同年，袁相忱明确地拒绝了葛培理博士提出邀请他参加1995年2月的白宫早祷会。
1996年	袁相忱多次坚决抵制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白塔寺教会向政府登记的要求。
1997年初 6月29日  9月	重病中的葛夫人最后一次到北京探望袁相忱夫妇。 白塔寺教会第一次因受到政府的阻挠而被迫暂时停止聚会。 白塔寺教会同一年中第二次因政府的阻挠而被迫暂时停止聚会。
1998年6月  8、9月	白塔寺教会因政府的阻挠，第三次被迫暂时停止聚会。 白塔寺教会第四次因政府的阻挠而被迫暂停聚会。
2001年夏季  10月18日	袁相忱弟兄在北京门头沟区的野溪最后一次亲自为信徒施洗。 白塔寺教会在白塔寺内四十号的袁相忱弟兄家中最后一次聚会。数日后，袁家搬迁至北京丰台区洋桥。自此时起，原白塔寺教会的聚会分散于若干处信徒的家庭中继续进行。
2004年夏季	袁相忱弟兄90岁，最后一次到位于野溪的洗礼现场。当年受洗的人数达七百九十八人。



<p>2005年4月3日</p> <p>8月16日 16:20</p> <p>8月19日 14:00</p> <p>9月3日 9:00</p>	<p>袁相忱因病入院</p> <p>袁相忱弟兄在北京安息主怀，时年 92 周岁（1914-2005）。</p> <p>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竹厅举行袁相忱弟兄追思感恩聚会。</p> <p>在北京八达岭人民公墓举行袁相忱弟兄骨灰安放感恩聚会。</p>
<p>2010年7月底</p> <p>8月2日凌晨</p> <p>8月7日</p> <p>8月21日</p>	<p>梁惠珍突患感冒，发烧。</p> <p>梁惠珍安息主怀，享年 91 岁（1919-2010）。</p> <p>追思礼拜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二千多位弟兄姊妹参加。</p> <p>和袁相忱一同安葬在北京八达岭人民公墓。</p>

## 后记

我是在二〇〇六年底初次接触到袁相忱牧师的生平资料。当时我刚刚奉献做全职事奉，看到大陆基督徒论坛在呼召收集整理袁相忱牧师资料的事工，就冒然地接受了这项工作。

二〇〇七年初，我第一次见到袁梁惠珍师母，这位慈祥和蔼的耄耋老人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一年里，我每周三个下午到袁师母家里，听她亲口讲述袁相忱牧师的信仰和事奉经历。我没有见过袁牧师，也没有参加过白塔寺教会的聚会，并且袁牧师是一位谦卑的传道人，从不谋求个人的名利，几乎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文字资料。因此，除了袁师母的口述之外，我也尽力联系和访问每一位熟悉袁牧师早年事奉的当事人，包括四十年代他在河北省成安县教会服事时的同工，和那里曾经接待过他的信徒家庭等等。总共积累了数百个小时的录音和其他资料。二〇〇八年起，我开始动手将这些材料整理成文，同时继续每周到袁师母那里，由她亲自逐字逐句地审核定稿。这期间当然经过了许多的波折，生活的负担和事奉的压力时常使我陷入软弱和动摇中。但是当我每次踏进袁师母的家门时，老人早已端坐在窗前，微笑着，等待着我。特别是在二〇〇八年七月袁师母不慎摔伤后，仍然坚持在病床上和我谈话。在这位可敬的老人身上，我看到了在信心和爱心里事奉和生活的见证，激励和督促我靠着主的恩典坚忍前行，直至二〇〇九年春季书稿最终得以完成。

袁相忱牧师从城市到乡村，又回到城市；失去自由，又重获自由。在袁牧师七十多年为主传道的生涯中，经历了“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林后 6：4-5），如同跋涉在那遍布着坎坷、荒凉的“流泪谷”（诗 84），但他凭着信心得着力量，执着向前，一心想往锡安的大道。上帝以他的信实，赐恩典和荣耀给一切忠心仰望他的

人，使他们的路径成为泉源之地。在《雅歌》中，良人把自己所倾心爱慕的那位佳偶，形容为洁白美丽的百合花。作为袁相忱牧师在事奉和生活中的伴侣，梁惠珍姊妹无论在各种境遇中，都满怀着爱心和喜乐，跟随和帮助袁牧师；即使在他们被迫分开的二十二年里，梁惠珍姊妹仍以她的信心和坚贞，保守了他们的全家。无怪袁牧师曾由衷地夸赞自己的妻子说：“你真是我的百合花！”，又为她取英文名字 Lily，意思就是百合花。她真是一只百合花，一只流泪谷中的百合花。

袁相忱牧师和袁梁惠珍师母作为中国教会多个不同时代的亲历者，他们的一生不仅见证了上帝在中国教会的恩典，也见证了忠心的圣徒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基督的脚踪，具有教会历史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这项事工中坚持诚实的原则，一方面采取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对书中所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等逐一加以严谨的考证；另一方面运用文学描写的表现手法，力求为当代读者再现那些已经过去的场景，唯一的目的在于见证上帝在中国教会和圣徒中间的荣耀。我们诚恳地请求各位读者，不要把这本书仅仅当作一部文学性的作品。

感谢诸位前辈的指导和鼓励。

感谢白塔寺教会和成安县教会的各位同工和弟兄姊妹。

感谢大陆基督徒论坛以及为我们提供过各样帮助的弟兄姊妹。

感谢协助我们在海外搜集资料的弟兄姊妹。

感谢所有关心我们，为我们献上代祷的弟兄姊妹。

感谢袁梁惠珍师母的全家，你们待我如同亲人。

感谢我的母亲、妻子和小加恩，在我过去三年的事奉中，你们始终是我的支持和安慰。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感谢各位亲爱的肢体。

白民

主后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于北京

